



红旗

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目 录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党是领导一切的.....《人民日报》社论 (3)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钟 文 (5)

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洪广思 (9)

抓紧理论队伍的建设

.....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会 (14)

注意发展女党员.....广西梧州市第二轻化工业局党委会 (19)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批孔与路线斗争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论述.....靳志柏 (23)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田 力 (35)

批林批孔促进了革命团结

.....济南铁路分局济南电务段党总支 (43)



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

.....新疆乌鲁木齐县反修大队党支部（48）

批林批孔要抓住路线问题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会（53）

正确处理领导机关和基层的运动的关系

.....朱江（58）

从银雀山竹筒看秦始皇焚书

.....卫今（62）

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京剧革命十年

.....初澜（67）

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

.....韦革（74）

在斗争中加强赤脚医生队伍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党委会（78）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加强协作 快装快卸

.....上海港务局党委会（81）

发展农业靠群众

.....齐跃（86）

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中国共产党临西县委员会（91）

☆ 七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
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
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主席语录

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党是领导一切的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三周年。

我们的党，是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成长壮大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又经受了新的考验和锻炼。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党的九大和十大，我们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运动中，根据“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党委内部开展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它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富有战斗力，能够更有力地来领导运动，而决不意味着可以



削弱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坚决支持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欢迎群众的批评监督，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原则，加以引导。毛主席指出，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我们应当这样做。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大胆地领导运动。要在斗争中，使自己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战斗堡垒。现在，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要把这个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还需要全党作极大的努力。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已经积极行动起来，研究两千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当前反修防修的斗争。这是运动走向深入的表现。各级党委要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工、农、妇、青等革命群众组织，也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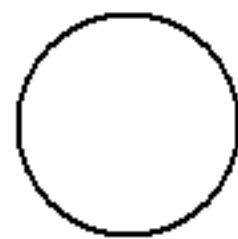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钟 文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城乡深入发展。这个运动，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党，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注意总结经验，在批林批孔中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毛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党的建设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十大通过的党章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建设是同对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处理与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确地处理这两个问题时，党的建设就前进一步。当我们党受到陈独秀、王明等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时，党的建设就后退一步。在我们克服了错误路线以后，党又大大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建设是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总是妄图改变和取消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证据确凿的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并使党增加了大量新鲜血液。广大党员在斗争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考验，从而大大加强了



我们的党，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个运动，是教育广大党员的最好课堂，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的极好时机。我们必须把党的建设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离开批林批孔，离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孤立地去搞所谓党的建设，就会走偏方向，甚至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同时，也要防止那种认为党员只要同群众一样参加运动就行了，而忽视发挥党组织先锋队作用、忽视抓好党员教育，不注意在批林批孔中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的倾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党的各级组织，应当加强党的活动，坚持必要的党内教育制度和党的生活制度，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党员要学在前，批在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增加了大批新的党员。这些同志勤于学习，敢于斗争，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但是，他们入党时间还不长，还缺乏党内生活的锻炼，还需要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章程，学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因此，加强对广大新党员的教育，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对于老党员来说，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有一个继续学习、提高和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问题。我们的党员又是生活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经常会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增强党员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克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些都说明，我们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帮助广大党员认真改造世界观，做到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完全入党。

在批林批孔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章程的教育，进行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教育，使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更有力地批判林



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不断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能够紧密地团结广大群众，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每个党员的根本任务。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比过去更加突出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先从上层建筑领域搞起，总是要抓意识形态，搞反革命舆论。如不加以批判和抵制，它们就必然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并进而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林彪等，为了反对革命，搞复辟倒退，也总是从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中，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动的思想武器。他们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策略，用修正主义冒充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为了战胜阶级敌人“**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为了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好地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在斗争中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两家的斗争、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中吸取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益的历史经验。要通过批林批孔，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能文能武。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各级组织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把它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来抓，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战斗力就会进一步加强，就能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历来强调要对党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路线觉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加强对党员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党员懂得基本路线，正确地贯彻执行基本路线，从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高度，认识批林批孔的深远意义，自觉地积极地投入这一斗争。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抵制和反对那些背离斗争大方向，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言行，以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十大通过的党章，概括了我党几十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规定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组织原则、党的作风以及对党员的要求等，是我们全党共同行动的准则。我们要经常地认真对党员进行关于党章的教育。共产党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不但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教育党员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具有政治远见，不怕困难，忠诚坦白，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如果不顾大局，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讲团结，口头上讲是为了革命，实际上是为少数人，为自己，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教育党员自觉地维护和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观念，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同那些削弱党的领导，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作斗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 and 贯彻执行，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仅仅满足于承认或一般地了解党的章程，而是要深刻地理解，坚决按照党章的规定办事，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团结群众，改造自己，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各级党委抓大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批林批孔中，各级党委应当把党的思想建设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认真进行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紧抓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



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洪 广 思

为什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为了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总要大造反革命舆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而修正主义则是他们的最好助手。面对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无产阶级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大造革命舆论，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修正主义。坚持这样做，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方面。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普遍地深入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使他们增强辨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是各级党组织必须经常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就是为了协助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

毛主席从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出发，反复强调加强理论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就着重指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还强调说：“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



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抓思想问题，包括着抓理论工作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毛主席还明确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除了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以及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等外，还必须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说，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长期以来，由于刘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的贯彻执行，曾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并涌现出一批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这就为落实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目前，北京市十二万余名不脱产的工农理论队伍和两千多名专业理论队伍，就是在这个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的。这说明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既是发展理论工作的强大动力，也是培养理论队伍的最好学校。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工作任务。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要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建设理论队伍是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需要，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是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实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措施。如果认为建设理论队伍只是宣传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大学文科的事，或者认为只是临时抽几个人，搞点学习辅导，写点文章，这显然是错误的。难道工厂、农村、商店、街道就不要理论队伍吗？难道就不要经常搞学习辅导和写文章吗？当然不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是各级党组织必须抓好的大事，也是各行各业必须抓好的大事。不抓这个大事，就会丢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势必搞“唯生产力论”，犯“业务第一”的错误。有了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牢固地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阵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必须抓紧专业理论队伍的建设，不断改造、充实和提高这个队伍。但是，只有这个队伍是很不够的，还必须



大力培养一支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斗争中把这两个队伍密切结合起来，这不但可以加强理论队伍的阵容和力量，而且有利于改变专业理论队伍的素质，提高整个理论队伍的水平。

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新的生力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斗争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所瞧不起的普通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街道妇女，能够登上讲坛辅导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讲解儒法斗争历史，拿起笔写出批林批孔的书和文章，注释法家著作，批注儒家书籍，这是亘古未有的，是值得歌颂的。这支理论队伍的基本特点是：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之中，斗争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最前线，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带动广大群众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搞倒退复辟的反动谬论。他们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群众热情地称赞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批林批孔的先锋，群众学习理论的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工人理论小组，除了以他们的理论活动带动了全厂的批林批孔向深入发展外，还在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编写了五本《工人批林批孔文选》（其中两本已出版），在报刊上发表了十七篇文章，到广播电台、电视台作了二十次革命大批判发言。这些事实生动地显示了工农兵的理论才干和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强大生命力，对那些轻视工农兵理论队伍的人是很好的教育。

重视不重视工农兵理论队伍，实质上是相信不相信工农兵能够掌握理论的问题，是在培养理论队伍的工作中执行不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搞不搞群众运动的问题。同搞任何革命工作一样，如果不依靠和发动群众，宏大的理论队伍是建设不起来的。许多经验说明，在广大工农兵学习革命理论、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注意培养、选拔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理论人材，理论队伍里经常地不断地增添这种新鲜血液，这是建设一支浩浩荡荡工人阶级理论大军的重要途径。

专业理论队伍是专门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是理论工作的骨干力量，不要忽视他们的作用。过去，有些理论工作者走偏了方向，那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毒害。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专业理论队伍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要进一步把专业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抓紧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专业理论工作者



应该特别注意向实际学习。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工作者，早就明确了，这就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整顿党的作风》）这是党和人民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努力奋斗的方向。

一般说来，专业理论工作者的书本知识比较多，但仅有书本知识并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理论工作者。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

（《整顿党的作风》）因此，把专业理论队伍拉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投入批林批孔的斗争，推动他们同工农兵相结合，向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引导他们去研究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这是改造专业理论队伍、提高其作战能力的正确道路。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有了进步，又在研究实际问题方面有了成绩，就会受到广大工农兵的称赞和欢迎。

批林批孔这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有力地推动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注意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结合起来，帮助他们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充分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看到，有些过去很尊孔的老教授，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受到了教育，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有的反戈一击，起了很好的作用。要肯定他们的成绩，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实现理论战线上两支军队——专业理论队伍和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的结合，密切两个队伍的联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是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已经创造了多种实现这种结合的好形式。大学文科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学术、出版部门到工厂和农村中去编书，大大促进了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及其理论队伍的联合。广大工农兵及其理论战士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对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就给专业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营养，提高了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北京大学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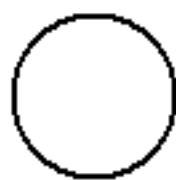


学系工农兵学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教员的帮助下，对《论语》进行批注，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北京汽车制造厂四名青年职工和中华书局一名青年编辑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注释和讲解法家的著作，写出了一本四万多字的《读〈封建论〉》。这些事实充分显示出专业理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巨大威力。

理论战士是搞上层建筑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必须抓紧自身世界观的改造。要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力图用他们那一套腐朽的货色来引诱我们的同志，征服我们的队伍。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树立正确的工作目的。要抵制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侵蚀，不忘记阶级的委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自觉地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战斗。专业理论工作者多数是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就显得更为重要。工农兵理论工作者也要注意思想改造，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理论工作者要认真看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我们作战的武器，必须下功夫刻苦钻研，要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一些法家的著作，看一点儒家的反面材料，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看书学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决不是为了好看，装潢门面，更不是当作猎取个人名利的“资本”。必须坚持在斗争中看书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决不能重走“闭门读书”、搞“三脱离”的老路。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反对本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由于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脱离广大工农兵群众，不注意改造世界观，搞“本本主义”，结果有的为修正主义路线效劳，有的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引以为鉴戒。

伟大的批林批孔斗争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理论队伍的发展促进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让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造成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而努力奋斗。



抓紧理论队伍的建设

河南郟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会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从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中，逐步培养了一支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在内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批林批孔运动是培养理论队伍的大学校。

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重要性，我们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理解的。今年二月初，我们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广大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和干部怀着满腔的革命义愤，口诛笔伐，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痛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同时，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批孔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批林和批孔的关系也不太清楚，不能从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上把两者联系起来，提高到理论上进行分析批判。贫下中农愈来愈迫切要求学习理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吴堂大队连续批判林彪鼓吹“克己复礼”的过程中受到了启示。

这个大队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时，在一些人中间存在着“不批孔老二，一样批林彪”的糊涂认识。他们说：“林彪叛党卖国，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死对头。孔老二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林彪和他没见过面，没说过话，咋会效法他开倒车、搞复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成了学习辅导小组，一方面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两千多年来尊孔与反孔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结合对“克己复礼”的批判，同群众一起大讲村史、家史，控诉旧社会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剥



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写出了《批林必须批孔》的辅导提纲，把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同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联系起来，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同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联系起来，分专题进行辅导。比如，孔老二叫嚷“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林彪胡说他是“受于天”的“超人”；地主富农散布“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说法不一，但他们宣扬的都是“天命论”的反动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维护或恢复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学习小组抓住这一共同的反动本质，边批判，边讲解，使大家认清了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是劳动人民世代受剥削的苦根。贫下中农反映说：“这一讲把孔老二和林彪串成串了，说的有根有秧。原来林彪和孔老二是一个窑里出来的两块坯，他们念的都是复辟经，走的都是回头路。”大家认识到批林必须批孔，不批孔，批林就不能深入下去。

通过总结这个大队建立学习辅导小组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使我们看到：这个队有了一支理论队伍，批林批孔运动就深入发展，而有的队不注意建立理论队伍，或者简单凑合几个人，徒有虚名，流于形式，运动就深入不下去。斗争的需要，已经把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任务，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但从路线上自觉地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还得有一个过程，还得要学习。为此，我们组织公社全体党委委员联系这个问题，认真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宏大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这不仅是找几个人写几篇文章、作几次辅导的问题，也不仅是为了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问题，而是在农村中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在各条战线包括广大农村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认识提高以后，我们把建立理论队伍的工作提到了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涌现出来



的路线觉悟高、有敢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反对错误潮流的革命精神、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分子中，经过挑选，建立了一支一百二十六人的理论队伍。公社建立了理论领导组，由公社党委书记兼任组长，各大队普遍建立了理论小组，生产队设有理论辅导员。

为了提高理论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采取集体学习、共同研究和互教互学等办法，促使贫下中农辅导员和知识青年辅导员这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并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进行培养。我们公社的理论队伍，大部分是从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有文化，领会问题快，是批林批孔的闯将，但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我们严格要求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向实际方面发展**”，使他们学得理论“**不停止在书本上**”，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一个生产队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老二“正名”的反动思想时，一个知识青年理论辅导员，第一次向群众进行辅导，照本宣科，光念材料。贫下中农反映说：“你念了半天，俺好象坐晕车一样。要是能和咱这里的事实联系起来说说，俺就清楚了。”她深入调查，从贫下中农中了解到一个阶级敌人阴谋篡夺生产队的领导权，公开叫嚷：“生产队要叫我领着，不信搞不好。不过，咱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暗地里却在领导班子里寻找他的代理人。第二次辅导时，这个辅导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联系这个事实，批判了孔老二的“正名”，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林彪踩着孔老二的脚印走，是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这个阶级敌人妄图在生产队领导班子里找代理人，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贫下中农赞扬说：“这次讲的有理论，有实际，一听就懂。”实践深刻地教育了这个理论辅导员：只有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过程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贫下中农是批林批孔的重要力量，从他们中间选拔出来的理论辅导员，苦大仇深，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一般文化水平比较低，学习理论有一定的困难。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他们“**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并帮助他们树立知难而进、敢于攀登理论山的革命精神，使他们认识到，马列的书，



毛主席的书，是对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写的，贫下中农完全可以学得懂，用得好。文化低，就请知识青年当小先生，边学文化，边学理论。对于一时弄不通的观点，联系实际，进行辅导，反复学习，反复琢磨；并根据农村的特点，建立必要的学习制度，保证学习坚持不断。杨庄大队有一个贫农女社员，文化低，家务活重，但在斗争中很积极。她当了理论辅导员后，身边带着书本，抽空就学，逢人便问。别人学一遍，她学几遍。在知识青年的帮助下，几个月来，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在批判会上，她带头发言，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是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产生的。要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还必须让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从战争学习战争”。为此，我们把理论辅导员推向批林批孔的第一线，促使他们把看书学习、调查研究和革命大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明和解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一个生产队揭发了一个阶级敌人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复辟活动，散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反动言论。这个家伙明里见人三分笑，又点头又哈腰，暗地却说“不要花腔抬不起头来”。理论小组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论述，联系建国以来本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写出了《阶级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辅导提纲，揭露了这个阶级敌人表面上伪装老实，实际上是“以屈求伸”，今天“克己”是为了明天“复礼”。我们公社普遍采用了这种专题辅导开展大批判的做法，把学、批、联结合起来，把群众揭露出来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到理论上进行分析批判，启发和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大批判的水平，推动了批林批孔的深入。理论辅导员还把社会上流传的受孔孟之道影响的反动俗谚搜集起来，分专题进行批判。例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的“天命观”；“亲不亲，看门分，一个姓氏掰不开，一捺没有四指近”的封建宗族观念；“得罪个人打堵墙，维持个人开条路”的“中庸之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做官论”，等等。在批判过程中，理论辅导员和群众



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联系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从政治上、思想上揭穿这些俗谚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阴险、毒辣、腐朽的实质，提高了群众的辨别能力，同时也丰富了理论队伍的斗争经验。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对我们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也决不会袖手旁观，必然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队伍。因此，我们不但要建立一支宏大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牢固地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加强理论队伍自身的思想建设。“打铁先得本身硬”，要教育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不断分析理论队伍的思想状况，针对知识青年中少数人“多学理论好回城”的错误思想，组织他们反复批判“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散布的“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谬论，进一步树立坚持乡村、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我们还针对少数人怕联系实际得罪人的错误思想，批判“中庸之道”，坚持斗争哲学，强调批林批孔必须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由于这样不断地在理论队伍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现在，我们公社党委和全公社各个理论小组正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同时抓紧研究法家的著作和儒法两家路线斗争的历史。《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在农村流毒很深，很广，我们正组织理论小组和群众一起进行批判。批林批孔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在批孔方面虽然还存在着文字障碍和资料缺少困难，但是，我们有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我们决心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大学校，进一步抓紧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建设，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注意发展女党员

广西梧州市第二轻化工业局党委

我们局所属的四十一个厂(社),有近万名职工,其中妇女占百分之六十多。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妇女积极分子,认真教育培养,注意吸收她们入党。一九七二年以来,先后吸收的一百七十二名新党员中,有九十七名女党员,占百分之五十六强。现在全系统女党员的总数为二百一十名,占女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她们在革命和生产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过去对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女党员认识不足,抓得不紧。后来我们到所属的一些工厂进行调查,了解到有的单位注意发展女党员,培养女干部,因而加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革命和生产都搞得生气勃勃。而有的单位不注意发展女党员,女党员很少,党组织的决议在女职工中贯彻得不深入,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不力,女职工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及时反映,她们的先进经验得不到及时总结和推广。我们联系这些单位的实际情况,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妇女运动的教导,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高了对发展女党员的重要性的认识。毛主席指出,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也在广大妇女中反映出来。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复辟的妄想,总是要和无产阶级争夺妇女群众。它们在政治上打击妇女,在思想上、生活上腐蚀妇女,以图达到其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我们要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击败资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就要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在妇女群众中发展党的



组织，并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带领广大妇女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局所属厂(社)，女职工占大多数，要不要积极发展女党员，这更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女职工的革命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我们提高了认识，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把发展女党员列入党组织的议事日程，认真抓紧。

为了培养和发展女党员，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深入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过去由于受刘少奇、林彪散布的孔孟之道的影 响，我们局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一些同志，对发展女党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有的人认为，“青年妇女一阵子，中年妇女带孩子，上了年纪卸担子”，妇女总比不上男同志，发展女党员作用不大。为了克服这种轻视妇女的错误思想，我们多次举办有局党委委员、基层党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参加的学习班，认真检查和总结发展女党员的工作。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和注意发挥妇女作用等一系列指示，联系本系统女党员、女干部的成长过程以及所起的作用的大量事实，批判了林彪、孔老二散布的“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我们所属一些厂(社)的妇女领导干部，原来都是一般女工，经过刻苦学习和斗争锻炼，入党后负责一个厂的领导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大家通过这样一些事实，进一步认识到，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确实也能办得到。林彪、孔老二对妇女的恶毒诬蔑，都是为其搞复辟、开倒车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这样，深挖了轻视妇女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排除了影响发展女党员的思想障碍。

满腔热忱地为妇女积极分子创造条件，让她们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在旧社会，广大劳动妇女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条封建绳索的束缚，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地位，文化很低。我们系统很多女职工吃过旧社会的苦，解放后她们接受了党的教育，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有了提高，是工厂里革命和生产的骨干力量。一些青年女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正在茁壮成长。为了能在斗争中进一步培养她们，提高她们，我们从实际出发，



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一批妇女积极分子参加了局里组织的调查组、宣传队，通过直接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进一步提高她们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有的让她们在各个工厂的工会、共青团、妇委会或车间班组担任领导工作，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坚持开办政治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和骨干学习班等，帮助她们掌握革命理论，提高文化水平。这样做了以后，收到较好的效果。梧州竹器厂有一个苦大仇深的女工，在旧社会五次被转卖，给地主、资本家当丫头，在街头讨过饭，参加革命工作后，思想上仍有自卑感。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对她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启发她认识今天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并让她到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振奋革命精神，提高斗争勇气。在斗争中，她有了较大的进步，于去年光荣地入了党。

针对不同对象，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总感到妇女工作难做，不愿深入细致地去帮助妇女积极分子克服缺点、弱点和解决她们前进中出现的问题。针对这种思想，我们引导大家从本质上去认识妇女职工的革命积极性，耐心地帮助她们进步。各基层党支部通过办夜校、办学习班和上党课以及请老工人、老党员作报告等办法，对妇女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教育、党的路线斗争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她们自觉地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另外还根据妇女积极分子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个别帮助。梧州电筒厂有个女工，平时认真看书学习，生产上敢挑重担，为了革命需要，她三次推迟婚期，但她有骄傲情绪，不注意团结群众。为了帮助她早日具备入党条件，厂党支部负责同志多次和她谈心，帮助她一分为二地看自己，正确对待群众，使她很快克服了这个缺点。有的妇女积极分子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不够高，就着重帮助她们提高看书学习的自觉性。有的敢想敢干，但工作方法简单，就帮助她们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注意帮助妇女解决她们的一些特殊困难。列宁说：“妇女要是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并且指出，“能够把妇女从这种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我们觉得，帮助妇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小事，



而是关系到妇女真正翻身解放的大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妇女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创造条件，把妇女从家务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我们把具体帮助妇女解决特殊困难，作为充分发挥妇女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经常教育她们正确对待和处理好革命工作和家务的关系，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并先后帮助厂（社）办了二十四个托儿所，同时教育男同志主动分担家务，为女职工创造学习和工作条件。

两年多来，我们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女党员的比例有了较大的增加，充实了妇女群众中的骨干力量，使全局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局面。现在，有二十名女党员担任了厂（社）党支部书记或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有八十七名女党员担任了车间主任、副主任和厂部各科室负责人。她们带领群众认真看书学习，努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成了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纽带。女党员增加了，在女职工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梧州电筒厂女职工占百分之六十四，原来没有一个女党员参加领导工作，女职工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不够好，她们的一些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一九七二年以来，发展了女党员，并选拔了三个女党员分别担任三个车间的领导工作。一个年青女党员担任电镀车间主任后，针对车间有的职工不安心本工种工作的思想，认真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全车间一百二十一人，她逐家逐户登门谈心的就有一百零六人。经过她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这个车间的工人增强了团结，进一步搞好了生产。这个厂由于注意了发展女党员和选拔女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她们的作用，所以工作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去年提前七十四天完成了年度生产计划。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女党员和男党员一起，站在斗争的前列。她们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带头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三百多名女党员和妇女积极分子，担任工人业余理论学习辅导员，她们组织群众和带领群众，认真学，深入批，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批孔与路线斗争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论述

新志柏

孔丘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的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适合一切腐朽的、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包括刘少奇、林彪，都曾把孔孟之道当作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思想武器。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主席在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斗争中，就对孔家店作了尖锐的批判。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结合这个斗争，反复批判孔老二，批判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批判错误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论述，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深入开展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仅就已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批孔的部分论述，来学习我们党在反对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结合批孔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路线斗争。陈独秀虽然一度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立场上呼喊过“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但当他搞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就完全背叛了这个口号，而去求教于孔家店的亡灵。当时，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特别是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这个革命发展的



紧要关头，陈独秀公然搬出孔孟之道来反对革命，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叫嚷什么“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陈独秀的“中庸路线”，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维护地主资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和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叫嚣相呼应，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左”、“过分”，恶毒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下去。要坚持革命，就要深入揭露陈独秀路线的反动阶级本质，批判这条路线所赖以骗人唬人的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

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篇批判陈独秀，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檄文。它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痛斥了污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反革命谬论，深刻阐明了“**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辩证法，尖锐地批判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老二用来反对社会变革、复辟奴隶制的理论武器，后来被一切反动派、保守派用来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前进。陈独秀之流指责农民运动“过分”，不准农民打破封建地主阶级吃人杀人的旧秩序，所用的正是这种维护反动没落阶级利益的中庸之道的谬论。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成为永远鼓舞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锐利武器。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当时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驳斥了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热烈赞扬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好得很”。这十四件事，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向孔孟之道宣战的。广大农民一脚踢开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奋起推翻地主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及压迫妇女的夫权，便是有力的证明。“**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孔孟之道是这四种权力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反对这四种权力，就是从根本上批判孔孟之道。在这里，毛主席十分鲜明地把反孔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来了。以后的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革命每前进一步，人民每前进一步，都要同孔孟之道和其他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成为中国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被清算以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又曾经出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危害最大。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同陈独秀一样，都是尊孔派，都崇奉孔孟之道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调查、不研究，用主观唯心论冒充辩证唯物论，散布孔孟之徒所鼓吹的“先哲”一类的神秘观念，妄图以此诋毁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路线，就是以主观唯心论为其思想基础的。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些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总结了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了他们奉行的孔孟之道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孔丘曾自封为“哲人”，历代尊孔派吹捧孔丘一类人物为“先哲”，这是用唯心论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反对一切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思想。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先哲”的极其错误的唯心论观点，指出革命的理论来源于革命的实践，并要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先哲”一类的神秘观念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明确说明了，批判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王明、孔老二轻视实践，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实践——理论——实践这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在《矛盾论》里，毛主席又直接批判了王明的形而上学思想，揭露西汉尊孔头子董仲舒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反动性。这种反动哲学妄图论



证剥削压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永世不变地长存下去，以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人民革命。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机会主义者拾取这种孔孟之道的破烂武器，也正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破坏人民革命事业，阻挡历史前进。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坚决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就是这个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却十分仇视唯物辩证法的王明，到抗日战争时期，又从极“左”跳到极右，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又回到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他为了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又搬出孔孟之道，大肆鼓吹发扬“忠、孝、仁、勇、礼、义、廉、耻”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叫嚷要使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实际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拜倒在蒋介石脚下，任其敲骨吸髓，卖国投降。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毛主席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反对党八股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清算了王明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

贯串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世界观的一条黑线，就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论”。他们总是用这种虚伪的口号来欺骗人民，模糊阶级界限，腐蚀革命斗志，破坏革命斗争。王明也不例外。他打着孔老二“仁爱”的旗号，掩盖其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毛主席在这里所批判的“圣人贤人”，头号代表就是高唱“仁者爱人”的孔老二。这既是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思想实质的有力揭露，也是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虚伪性的尖锐批判。

为了揭露国内外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的阶级本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



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成了非常亲热的两兄弟，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剥削压迫中国人民这种共同的反动目的，在政治上互相勾结，在文化上也必然结成反动同盟。孔孟之道这个没落奴隶主的复辟倒退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依附于反动腐朽的阶级势力。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它又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精神支柱。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除了灌输奴化思想以外，又和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结合起来，借以欺骗、麻醉中国人民。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蒋介石、汪精卫，无一不是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一身二任。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也无一不是既尊孔又崇洋，有的还充当了汉奸、卖国贼。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这两个难兄难弟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为了维护他们的血腥统治，又祭起孔老二的黑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成为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本来就是一个狂热的尊孔派，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被捕叛变，接着，他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的“四书”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重新钻入了革命队伍。一九三九年，他头一次抛出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则炮制“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纲领，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继之鼓吹“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妄图阻挡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毛主席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严厉批判了孔孟的“恕道”，尖锐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在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



动势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蒋家王朝全面覆灭的时刻到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又是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继续进行垂死挣扎，抛出孔孟所谓的“仁义道德”，恶毒攻击革命政权“不仁”。毛主席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鲜明地批判了孔孟的“仁政”学说，严厉地驳斥了反动派和刘少奇之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国家机器从来都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决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孔老二这个“仁政”论调的开山祖，上台三个月就杀掉了宣传革新道理的少正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剿匪就是行仁”的口号下，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帝国主义政府虽然满口的仁义道德，但从来没有实行，从来不说实话，而其反革命事业却每天都在做。这就充分证明“仁政”论调是极其虚伪、极其反动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仁政”，而只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制定了建立和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纲领。同时通过对“仁政”的批判，宣告了中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妄图利用孔孟之道来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阴谋彻底破产。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革命推向前进，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孔孟之道的思想是复辟、倒退；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机会主义头子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同孔孟之道结下不解之缘，孔孟之道这个反动的亡灵又附到那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身上。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同反孔与尊孔的斗争联系起来。



刘少奇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在建国前后就开始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他赤裸裸地鼓吹“剥削有功”，叫嚷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不搞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同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相适应，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抛出了《武训传》这部狂热宣传尊孔、反对人民革命的反动影片。影片所歌颂的武训，是死心塌地的封建主义卫道者，是极端卑鄙下流的尊孔派。刘少奇之流歌颂武训，就是歌颂孔丘，鼓吹孔孟之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武训传》这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一伙尊孔派的丑恶嘴脸，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论述，打中了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尊孔派的要害，孔孟之道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但是，斗争还在继续。修正主义者利用孔孟之道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的情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常尖锐地表现出来。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驳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思想时指出：孔夫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就是说，孔夫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一切革命的、爱国的人们，应当同他那一套划清界限。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我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亿万农民兴高采烈地奔向合作化的康庄大道。刘少奇一伙又跳出来，高唱中庸之道的滥调，污蔑合作化搞“快”了、搞“多”了，大砍合作社。毛主席当即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著作，并且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回击了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活动。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毛主席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曾亲自去曲阜“朝圣”的尊孔复古的丑态，批判了孔老二和他的“经典”，指出：孔丘“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二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从这个深刻的阶级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孟之道对于劳动人民是一文不值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造福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只用较短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



社会主义改造。

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坚决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驳斥了反革命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攻击。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信时指出：“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胡风反革命集团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是“封建潜力”，这是典型的尊儒反法的反动观点。通过这场斗争，全国人民受到了怎样识别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和分子的深刻教育，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觉悟。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敢想、敢说、敢干，兴起了大跃进的热潮。毛主席为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热情地写了题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批判了两千年来孔孟之徒竭力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历史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亿万革命人民，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风发的意气 and 昂扬的斗志。“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前进，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彭德怀之流十分恐慌和仇视。一九五九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赤膊上阵，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领导全党及时地粉碎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斗争中深入地揭露了彭德怀的反动世界观。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鼓吹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孔孟之道。毛主席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观点。在革命胜利前，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搞阶级调和，反对用战争和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取消革命。在革命胜利后，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



辟。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毛主席对这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只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就要握紧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铁拳，坚决打击敌人，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

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粉碎之后，接着刘少奇又和国际上帝、修、反掀起的反华反共反革命的逆流相呼应，大刮反革命复辟的黑风。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三次抛出了浸透着孔孟之道毒汁的黑《修养》，其中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不谈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大肆鼓吹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闭门“修养”，要求共产党员学习所谓“忠恕”、“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等孔孟之道；又支持召开吹捧孔丘的黑会。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就是妄想用孔孟之道搞“和平演变”，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针对刘少奇一伙猖狂复辟的阴谋活动，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贩卖的孔孟之道的唯心论的认识论，驳斥了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养”经。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总清算，也是一场深刻的批孔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中，毛主席还亲自写了一段文字，驳斥了刘少奇之流鼓吹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谬论，批判了孔孟之道的所谓“仁义道德关系”。毛主席十分明确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



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这就为这场大革命指明了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等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阐明了这场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的性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同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

继粉碎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我们党又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在他盘踞的见不得人的黑窝里，到处堆积着孔孟之道的思想垃圾，散发出尊孔复古的霉烂臭气。他把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的谬论糅合一起，作为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林彪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纲领“克己复礼”接过来，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为了实现“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迷梦，急不可待地抛出了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唯心论的“天才论”的理论纲领。毛主席洞察了林彪一伙篡权复辟的阴谋，多次指示不要设国家主席，又针对林彪、陈伯达鼓吹的反党理论纲领，专门批判了“天才论”，尖锐地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主席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深刻批判，揭穿了自命为“受于天”的“天才”、“至贵”、“超人”、“天马”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其实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才。

林彪一面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把孔孟之道捧上了天，一面又疯狂地咒骂秦始皇“残暴”，咒骂法家是“罚家”，借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反动观点，早就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一九五八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林彪恶毒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主席立即予以严正的驳斥，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坚决镇压反动儒生的革命行动，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林彪用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乞灵于孔老二，但孔老二却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林彪这个自诩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两次发动反革命政变都彻底破了产，落得个自我爆炸，叛党叛国，仓皇逃命，狼狈投敌，陈尸沙漠，独往无来了。



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尊孔，都吹捧孔孟之道，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而孔老二正是鼓吹复辟和倒退的祖师爷。孔丘的思想被历代反动派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完备的维护反动统治之道，它适应一切腐朽的、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政治需要，也必然被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用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

孔丘不仅有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反动思想路线，这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为了论证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为了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倒行逆施作辩护，疯狂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党内的历次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们都是遵循“从主观到客观”的反动思想路线，而这条反动思想路线的渊源之一就是孔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深刻地指出了一切顽固党的思想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孔老二就是这样的顽固党，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这样的顽固党。机会主义者要想阻挡革命前进，开历史倒车，就不能不从孔丘那里搬来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的哲学根据。

由于孔丘的反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都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强制推行，因而孔丘的反动思想体系成为走向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思想。毛主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毛主席还指出：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孔孟之道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孔孟之道在社会各方面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谁搞机会主义，谁就势必要利用孔孟之道，利用它的传统影响来推行他们的那一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要尊孔的历史原因。

毛主席正是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上抓住了中国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这个特



点，总是把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和革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夺取政权。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扯起孔孟之道的黑旗，都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因此，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集中在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继续召唤孔孟之道的亡灵，都是为了“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斗争中，通过对孔丘的批判，从机会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的联系上，深刻揭露了它们共同的反动本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斗争，就必然愈加深入发展到各条战线，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触及到人们的世界观。通过这样的批判，必将不断肃清孔孟之道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传统影响，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巨大的意义。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为了使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发展，夺取新的胜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领导全党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深入批孔的历史经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同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总结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研究总结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促进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普及、持久的开展。只有把批判和学习结合起来，才能学好批深，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克服干扰或背离这个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孔老二为复辟奴隶制而卖命，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料。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也已经“折戟沉沙”一场空。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止息。我们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革命精神，在批林批孔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

田 力

孟轲（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〇五年），是孔家店的二老板。由于继承和发挥反动的儒家学说有功，长时期来被反动统治阶级捧为“亚圣”。孟轲是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批判过的所谓“仁政”，就是孟轲极力鼓吹的一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口号。批判他的反动言行，分析他推行的政治路线的阶级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怎样力图复辟旧制度，怎样拚命攻击新制度，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认清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本质。

“法先王”——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

孟轲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战国时代。当时，在不少诸侯国中，奴隶制政权先后垮台，地主阶级的新政权相继确立，法家的政治路线取得了统治地位。孟轲出生前后，有魏国的李悝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著名的法家代表商鞅，则是和孟轲同时代的人物。孟轲窜游各国猖狂从事复辟活动之日，正是商鞅在秦国大刀阔斧厉行变法之时。

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往往会有代表被推翻阶级利益的、一心搞复辟的反动人物出现。春秋时代有一个专搞“克己复礼”的孔丘，战国时代又有一个专讲“法先王”的孟轲。与战国时代前进、革新的主流相对立的，是奴隶主阶级搞复辟、搞倒退的逆流。而孟轲就是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孟轲这个人野心很大，他一生奔走呼号，叫嚷“正人心，息邪说”，到处宣扬“法先王”的儒家政治路线。孟轲精心编造并鼓吹奴隶主“先王”的所谓“圣迹”，把早已过时的奴隶制吹得神乎其神，胡说只要以奴隶主的“先王”为榜样，“大国五年，小



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法家荀况尖锐地指出，孟轲打出“法先王”的破旗，就是要“乱”新兴地主阶级的“世”，即颠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当时，封建政权虽然在不少诸侯国建立，但奴隶主旧贵族在新政权内部还有相当的势力。一些执政者本身就是从奴隶主转化而来，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孟轲正是利用这种条件，率领党徒以“先王之道”游说各国诸侯，施展其反革命的“攻心”战略。他认为，要“正人心”，必须先正“君心”，说什么“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孟轲在齐国时，三次会见齐宣王，都不谈具体问题。当他的门徒问他时，孟轲说：“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这就是说，他要从改变封建君主的指导思想入手，进而改变各国诸侯的政治路线，改变政权的性质。法家韩非锐利地看到了这一点，痛斥孟轲之流乔装打扮，摇唇鼓舌，张口“仁义”，闭口“先王”，其险恶目的就是要“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所以，是一批危害新社会的大蛀虫。（《韩非子·五蠹》）

大肆鼓吹所谓“仁政”，是孟轲推行“法先王”的反动政治路线的一个中心内容。他说：“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孟轲的“仁政”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他在回答滕文公“问为国”时和盘托了出来。经济上，是恢复殷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政治上，是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教育方面，是仿照殷周奴隶社会的教育制度，设“庠序学校”，用夏商周“三代共之”的奴隶主意识形态去教育统治者的子弟。总之，孟轲同他的“先师”孔老二完全唱着一个调子：凡是过去的奴隶主头子所推行的，都是最可爱、最完美的“仁政”，必须统统继承和恢复过来。

其实，被孟轲吹得天花乱坠的“仁政”，不过是为了掩盖没落奴隶主阶级残暴统治的一块遮羞布。在阶级社会里，在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情况下，压迫阶级对被压迫阶级，是谈不上什么“仁政”的。孟轲的反动说教，真正目的是为了反对、否定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为他的复辟行动造舆论。

孟轲宣扬“仁政”，念念不忘恢复“井田制”。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这就清楚地说明，孟轲顽固地坚持要恢复已经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



主阶级打破的土地的“经界”，把奴隶们重新束缚在奴隶社会的土地分封制上。孟轲说，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美妙的井田制！孟轲胡诌这一套，决不是要让奴隶私有土地，而是主张恢复并保证大小奴隶主对奴隶的层层剥削。为此，孟轲还竭力鼓吹殷周奴隶社会的所谓“助”法，说什么“治地莫善于助”，“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公孙丑上》）所谓“助”，就是指奴隶主及其国家强迫大批奴隶从事耕作，并直接占有其劳动成果。孟轲鼓吹“助而不税”，也决不是为了减轻奴隶的负担，而是要否定早在孟轲出生二百年前就已实行的、与封建所有制相适应的“税亩”制度。

在鼓吹“仁政”的同时，孟轲还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子，多次讲到所谓“民”的问题。他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编造所谓“先王”时代“民”的幸福生活的谎言，恶毒咒骂新兴地主阶级实行“虐民之政”。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据此而把孟轲捧为“民本主义者”和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给孟轲戴上了“民主性”、“人道主义”的桂冠，疯狂攻击我们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这是徒劳的。在《孟子》这部书中，“民”和“氓”或“野人”，其界限十分严格，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孟轲一切“为民”的口号，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别野人”，即不包括奴隶，不承认奴隶的解放。他一贯极端鄙视“野人”，极力鼓吹“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由此可见，孟轲心目中的“民”，并不是指奴隶，而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失掉财产和权力的奴隶主，和奴隶社会延续下来的“自由民”。孟轲的所谓“制民之产”，其实是要新兴地主阶级放弃封建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给奴隶主和自由民。他提出“民为贵”，也是为了提高这些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政治地位。至于他所谓的“君为轻”，主要是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伪装成是“为民”，而把他们真实的阶级目的掩盖起来，孟轲为复辟奴隶制而向地主阶级政权进攻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手段。中外反动派对孟轲的吹捧，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伙敌视革命人民的孔孟之徒。

孟轲曾经引用过《诗经》上的一句话，叫做“不怨不忘，率由旧章”。（不要



背离，不要遗忘，一切都必须遵照旧规章)他鼓吹“法先王”，鼓吹“仁政”、“复井田”和“民为贵”等一整套黑货，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要一切“率由旧章”，恢复奴隶制，实行历史的大倒退。为了亲自实践这条反动的“法先王”政治路线，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狂热奔走于齐、魏、宋、邹、滕、薛诸国之间。哪里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苗头，他就赶到那里去，全力支持复辟活动。齐国地大人多，而且有一个孟轲的党羽匡章在那里“将五都之兵”。孟轲就三次入齐，策动复辟，公然叫嚣由齐国先行“王道”，易如反掌。宋国的宋王偃一度宣布要实行“王政”。孟轲就要宋王偃象当年商汤和周武王那样“发扬武力”，“把那些该死的统统杀光”。一时，小小的宋国竟成了奴隶主图谋复辟的大本营。但是，宋王偃的倒行逆施，由于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反对，只落得个狼狈出逃、身死异国的可耻下场。奴隶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孟轲妄图用“法先王”的反动政治路线来复辟奴隶制，终究也不过是一枕黄粱。唐朝韩愈是一个尊孔派，他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进学解》)拼命为复辟奴隶制辩护而不见什么效果，跑了很多地方而没有什么成就，最后还是在到处碰壁的处境中完结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孟轲的下场。

反秦反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立场

秦国的变法进行得最彻底，变化也最显著。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奴隶主旧贵族掌握着实权。他们骄奢淫逸，私斗成风，以致政局混乱，国土日削，经济也十分落后。中原各国把秦国视同夷狄，取消它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气得秦孝公说：“再没有比这个更丢脸的了。”商鞅厉行变法后，秦国在十几年内迅速富强，连续几次打败魏国，中原诸国不仅与秦国“会盟”，而且都来“朝贺”了。秦国的情况生动地说明，只要顺应历史潮流，坚决采取法家路线，落后的国家可以一跃而变为先进。反之，韩、魏等国，由于变法不彻底，不坚决屏弃儒家的反动路线，就削弱，就落后，甚至出现倒退。正如法家韩非所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有度》、《外储说左上》)这是符合战国实际情况的总结。



商鞅变法的胜利，秦国的兴起，引起奴隶主阶级的极大仇恨。在秦国内部，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反攻倒算，“车裂”商鞅。在中原各国，他们利用各国统治者对新兴秦国的恐惧心理，到处进行反秦反法的活动。孟轲作为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言人，也重整儒家的破烂旗鼓，向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

孟轲首先对当时法家路线统治下的整个政治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如同孔丘把春秋时代看成“天下无道”一样，孟轲把战国时代说成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人将相食”的黑暗时代。（《滕文公下》）他咬牙切齿，到处骂街，叫嚷：“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他宣称，春秋时代的“五霸”是夏商周时代“三王”的“罪人”，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是“五霸”的“罪人”，而推行法家路线的“大夫”是各国诸侯的“罪人”。（《告子下》）一部《孟子》，“半是挽歌，半是谤文”，除了缅怀奴隶制的哀音，就是对战国时代新社会的恶毒诽谤。

孟轲最仇视法家所推行的两项主要政策。其一是，“辟草莱”“开阡陌封疆”；其二是，“赏军功”。前者奖励新兴地主阶级和自由民开垦荒地，否定了奴隶主世代垄断土地的制度。后者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否定了奴隶主贵族垄断军政大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商鞅变法最根本的也就是这两条。实行了这两条，就可以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摧毁奴隶制度，发展封建制度。孟轲则认为，干这两件事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民贼”，必须处以重刑。为了反对这两项主要政策，孟轲挑起了两个论战，即所谓“义、利”之辩和“王、霸”之争。

孔丘标榜“罕言利”，胡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突出发挥了这个反动谬论。他满口“仁义”，而把法家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归结为一个“利”字，横加诋毁，说它“危害”人心，是一切祸乱之源，诬蔑法家是“暴君污吏”，是“孳孳为利”的“强盗”。法家确实是公开讲“利”的。商鞅就说过：“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都维护和坚持本阶级的利益，一切政治、道德、哲学概念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只不过革命的阶级，进步的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致，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能够公开“言利”。战国时代新兴



地主阶级的“言利”，就属于这种情况。与此相反，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对立，与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对立，与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就不敢公开“言利”，而是用某种抽象的、永恒的道德原则来掩盖本阶级的私利。孟轲所宣扬的“仁、义”之类，正是这种东西。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这话清楚地说明，所谓“仁、义”，就是要维护“亲亲为贵”的奴隶制统治秩序，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私利。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的“仁、义”，实际上是搞“亲亲者，以私为道也”，是“暴之道”、“过之母”，（《商君书·开塞、说民》）是祸乱之源。

“王、霸”之争，与“义、利”之辩是密切联系着的。战国时代，顾名思义，是充满战争的时代。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论持久战》）新兴地主阶级要消灭奴隶制政权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实现全国的封建统一，不搞“强兵”，不打仗，能够办得到吗？不行！法家明确地回答，必须强兵，必须打仗。商鞅响亮地提出要“以战去战”，（《商君书·画策》）这是一个十分光辉的思想。孟轲把法家的这种强兵政策和为实现统一所必须的封建兼并战争，诬蔑为“霸道”、“好战”、“嗜杀人”。这恰恰表明，孟轲所反对的正是革命的暴力、进步的战争。实际上，他和孔丘一样，到处鼓吹反动的武力“征伐”，煽动奴隶主复辟势力武装夺权，策动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实行反革命武装干涉。他对这种“征伐”极力加以美化，说什么：“征者，上伐下也”，“征之为言正也”。（《尽心下》）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孟轲嘴里讲的是“王道”，行的却是“霸道”，是一个十足的奴隶主霸权主义者。

孟轲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党，对法家路线大肆攻击以后，气势汹汹地威胁法家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不改变政治路线，即使得了天下，你们的政权一天也维持不了”。（《告子下》）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孟轲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不仅没有立刻垮台，反而进一步巩固下来，执行法家路线最坚决的秦国，则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孟轲的反革命凶言，同注定灭亡的奴隶主阶级一样，被无情地淹没在汹涌前进的历史洪流里。



“性善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摧垮了奴隶制度，也动摇了以“天命论”为核心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唯物论的思想有了显著的发展。为了坚持奴隶主意识形态，孟轲把“天命论”和“人性论”结合起来，用“人性论”补充“天命论”，鼓吹“天人合一”，炮制了一条更为反动、更富有欺骗性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

孟轲的“性善论”，就是继承了孔丘、子思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并加以发挥的。尽管他在口头上说什么“人无有不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但是，实际上孟轲一再强调这种“善性”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仁、义、礼、智等奴隶主阶级道德的源泉，说明他只承认反动奴隶主阶级才具有这种先天的“善性”。孟轲认为，这种“善性”，在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贤臣”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有不忍人之心”，能够“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也就是“王政”。他们具有“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尽心上》）是“先知”“先觉”者，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生的统治者。可见，孟轲的“性善论”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论”和“人性论”的大杂烩，是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而制造的反动理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善恶观属于道德范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东西，对被剥削阶级说来一定是恶的。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认为是善的，没落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一定认为是恶的。反之亦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必须镇压奴隶主旧贵族的反抗，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这就是“善”，这样做好得很。商鞅说：“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所谓“去奸”，首先是指镇压反抗封建制度的奴隶主。商鞅认为，对于他们必须“求过不求善”。（《商君书·开塞》）就是说，不能把他们看作“善”人，而要对他们实行专政。

孟轲在他的反革命一生中，就是用这种奴隶主阶级的“性善”标准，去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凡是符合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就认为是“善”，竭



力加以支持；凡是不符合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就认为是“恶”，疯狂地跳出来反对。燕国大臣子之掌握了政权，实行封建变革。孟轲认为这是对奴隶制的亵渎，必须严加镇压。他急急忙忙从鲁国窜到齐国，竭力煽动齐王出兵，说什么“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燕召公世家》）要齐王以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出兵讨伐燕国，支持顽固势力，镇压新兴地主阶级。在孟轲的策动下，他的党羽匡章，亲自率领齐军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抓住了子之，并极其残酷地把他剁成肉酱。燕国这场方兴未艾的政治变革，就这样被血腥地镇压了。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孟轲“性善论”的凶残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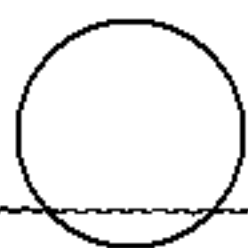
按照孟轲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既然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为了保存和发展这种“善”性，就必须避免外界的影响，在主观内省上下工夫，“存其心，养其性”，做到“反身而诚”。（《尽心上》）孟轲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这就是说，“诚”是上天规定的精神法则，为人之道就要竭力做到“诚”。人们要不断地“反求诸己”，努力探求和扩充内心所固有的“善端”。“至诚”可以通“天”。一旦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统治者就能成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圣者”、“神明”；被统治者就会自觉地“服从”统治。这无非是企图从哲学上来论证奴隶制的“永恒”不变，恢复奴隶制的“天然合理”。孟轲鼓吹的一整套以“诚”为核心的“修养经”，是如此阴险毒辣，以至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如曾国藩、蒋介石、刘少奇、林彪，都把它奉为至宝，视为“立国”之本和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原动力”。其目的就是要用“诚”来掩盖他们的虚弱本质；掩盖他们的野蛮残暴的反动统治；掩盖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孟轲是我国历史上在新兴政权下鼓吹复辟的反动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反动理论、反动路线、反动策略，为历代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派所承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时，也承袭了孟轲这一套反动货色。刘少奇的黑《修养》，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有孟轲的幽灵。但是，孟轲也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也好，他们既然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就不可避免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批林批孔促进了革命团结

济南铁路分局济南电务段党总支



编者按：此文总结了如何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批林批孔运动，促进广大群众的团结，搞好革命和生产的经验。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及群众内部不同意见的问题，写得具体而细致，比较有说服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以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为武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认真总结本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象《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才能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保证这场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逐



步提高的。运动一开始，我们总支部分领导同志对批林批孔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也就缺乏主动进行领导的自觉性。特别是看到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本段革命职工中存在某些不够团结的现象，思想上产生了“怕”字，不敢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前进。当着群众贴出批林批孔大字报、并对领导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时，我们就忙着向群众作检查，草率地处理一些政策问题。这样做的结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深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影响了群众之间的团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同时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实际情况表明，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共同愿望。他们爱憎分明，能够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深恶痛绝，而对段里领导上在执行政策和路线过程中的缺点、错误，则满腔热情地期望迅速得到改正，并积极支持党组织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我们段的领导干部在运动中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振奋了精神，把“怕”字换成敢字，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同群众站在一起战斗。各个班组写出了很多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涌现出一批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因势利导，先后组织了八次大型的批判会，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联系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本单位的影响，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这样，就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林彪及其死党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的罪行，对准反动的孔孟之道，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无产阶级义愤。同志们说：这样的批判，越批，斗争方向越明确；越批，路线是非越清楚；越批，广大群众内部越团结。

资产阶级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煽起广大群众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林彪及其死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贩卖的孔孟之道，是麻醉、腐蚀工人革命意志的反革命之道，



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分裂的路线。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总根源。如果我们搞资产阶级派性，闹不团结，那就正中林彪反党集团的好计。只有对敌狠，才能对己和。随着对林彪“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深入批判，我们结合本段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通过学习和批判，挖出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根子，分清敌我，分清路线，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

我们段里有两个同志，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过去隔阂较深。在批判“克己复礼”，诉旧社会的苦时，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前辈都是逃荒到济南来的。在旧社会，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有千条万条理由搞团结，没有半条理由搞分裂。他们说，过去劳动人民当牛作马、背井离乡，就是孔孟的“仁政”、“王道”。如果林彪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得逞，我们工人就要受二遍苦，哪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林彪一伙要开历史的倒车，他们才是我们工人势不两立的死敌。广大干部、群众在批判中，通过忆旧社会的苦难史，进一步认识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表示要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主动地去搞好团结。

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并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要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要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就必须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从根本上保护和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之间有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存在着不团结的因素，这些问题不能回避。作为我们基层单位领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进行工作。为了消除某些同志之间的隔阂，我们总支的干部多次同他们谈心，为他们加强团结“搭桥”、“引线”，引导他们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把仇恨集中到林彪一伙阶级敌人身上。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总支领导都主动承担责



任，并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找出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同时积极引导和耐心说服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支持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实践证明，这样做，才能在不断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实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搞好革命队伍的团结，关键还在于我们领导成员要有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敢于揭露自己的缺点、错误，真心欢迎群众的批评。我们所说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如果不把我们领导成员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就不能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去战斗。遵照毛主席“**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教导，我们组织总支“一班人”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论述，联系本单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找出了我们段领导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是对群众运动和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二是按照什么路线来办企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和新生事物，就不能抵制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也必然影响群众之间革命的团结。

从摆出的问题来看，我们总支有的同志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认识还不足。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执行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对领导的这些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对干部的爱护和挽救。但是，由于不能从路线上看问题，有的同志对群众的批判，思想深处仍然有些不认帐、不服气。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针，对争论较大的一些问题，从路线上进行了分析。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领导成员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执行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直接影响了群众之间的团结。如果不去正视这些问题，认真改正错误，



就不能同群众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斗争，继续领导群众前进。我们段有个领导同志，过去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够端正，在执行路线、政策中犯有一些错误。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他思想上有些顾虑，不敢大胆领导运动。经过总支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个同志从世界观上找出了犯错误的根子，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站到了批林批孔运动第一线，使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融洽了。我们体会到，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主动地接受教育，改正错误，比那种观望等待，消极的自我检查不知要好多少倍。

批林批孔是搞好革命团结的重要保证，也是搞好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通过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反复批判，我们电务段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消除了原来存在的某些隔阂，心情舒畅，团结增强，广大群众激发出的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投入到生产中来。铁路事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电务段又是铁路运输的“耳目”，对保证列车正常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保证行车安全，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广大职工革命、生产一肩挑，一直坚守生产岗位，坚持业余闹革命。干部站在生产第一线，大胆指挥生产。工人群众胸怀全局，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争当批林批孔的闯将，抓革命、促生产的尖兵，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我段今年一至六月份通信信号设备维修重点项目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通信信号事故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六十。斗争的实践深刻地教育了我们，批林批孔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紧紧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革命队伍就会更加团结，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日益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越来越兴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必将继续取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更大胜利。



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

新疆乌鲁木齐县反修大队党支部

我们大队是个维、汉、回族聚居、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以实际行动说明，维吾尔族劳动人民，不但能够批判剥削阶级的“圣人”孔老二，而且可以批得好。这里，除了解决如何学好以及如何抓住批判重点以外，重要的是解决好联系实际的问题。只要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我们就能够透过林彪那些阴暗晦涩的反革命语言和孔老二的那些“之乎者也”，识破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深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罪行。这样做，就能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努力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坚持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批判阶级敌人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对倒退；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我们大队，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

联系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提起旧社会，哪个贫下中农不是怒火满胸膛！不少贫下中农用遭受地主、富农残酷迫害，闹得家破人亡的事实，摆出旧社会的一本本苦情帐，一桩桩血泪仇，开展了群众性革命大批判，深刻揭露了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有一位贫协委员说：林彪、孔老二讲的是仁义道德，干的是喝人血吃人肉的事。狼走千里吃人，巴衣（财主）的心比恶狼还狠。我母亲给巴衣帮工，竟被活活烧死，这就是他们讲的仁义！大家愤怒地指出，林彪“克己复礼”，就是要象孔老二那样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把被打倒的地主、富农重新扶上台，复辟资本主义，让巴衣的皮鞭重新落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我们绝对不答应！

通过忆苦和批林批孔，使大家认清了孔孟之道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武器，是看不见的绳索，摸不着的铁链。地主富农过去统治和剥削我们，靠孔老二那些邪门歪道；他们想变天，也要靠这些邪门歪道。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不光我们这一代要批孔老二，子子孙孙都要批，才能永保社会主义江山。越联系实际，各族社员批林批孔的积极性越高。他们充分发挥批林批孔主力军的作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反复阅读批林批孔的文件，着重弄清孔孟之道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林彪把孔孟之道作为反动思想武器的罪恶目的，在田间地头、家庭院落，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联系本大队阶级敌人妄图复辟变天的反动言行，狠批“克己复礼”，提高干部、社员的阶级斗争觉悟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二小队有个富农分子，多次散布“世道还会变”，“他们（指贫下中农）的好日子不长了”等反动言论，并且拉拢腐蚀干部，进行阶级报复。大家就以这个富农分子为活靶子，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有个老贫农指出：孔丘要复礼，林彪要复辟，四类分子要变天，他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林彪拚命鼓吹“克己复礼”，完全代表了四类分子的愿望，就是要恢复巴衣的天堂。阶级斗争的现实使大家认识到，地富反坏右是林彪“克己复礼”的社会基础，林彪是地富反坏右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林彪“克己复礼”的迷梦，让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与此同时，群众还对划不清敌我界限的干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阶级敌人要变天，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的甚至和富农分子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这是执行什么路线？这样搞下去该多危险！社员的批评帮助，使这些同志的头脑清醒过来。他们检查了右倾麻痹思想，表示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干部、群众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后，各生产队普遍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加强



了无产阶级专政。

联系本大队阶级敌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批判“克己复礼”，使大家认清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提高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自觉性。

我们大队有两个反动富农，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遥相呼应，散布“今不如昔”的论调，咒骂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革命行动，甚至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大家就把我们大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加以对比，用切身的经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这两个富农分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大队是一个“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五保队”。那时，粮食亩产不过百十来斤，年年吃国家返销粮，多数社员闹透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大干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几年的奋战，甩掉了“五保队”的帽子。去年，我们大队产粮七十九万斤，平均每人达到近一千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占公社总交售量的三分之一。我们依靠自己的积累，添置拖拉机三台，汽车一辆，建立了面粉加工厂，在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还办起了合作医疗。到大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也正在茁壮成长。社员生活越过越甜，家家有余粮，不少人家有了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大家对比这些变化，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贫下中农说得好：没有经过寒冬的百灵鸟，就不知道春天的温暖。对比新旧社会的两种生活，更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林彪一伙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实现他们“克己复礼”的迷梦，让我们吃二遍苦。他们真是比毒蛇还毒，比恶狼还狠！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谁要搞复辟，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就一定和他拼到底！

联系本大队阶级敌人妄想依靠苏修复辟变天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言论，深



批“克己复礼”，使大家认清林彪叛国投敌的卖国贼面目，加强民族团结，增强防止苏修突然袭击、保卫祖国的战备观念。

我们大队的反动富农，为了实现他们变天的妄想，总是把复辟希望寄托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上。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暗中串连，造谣惑众，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准备反攻倒算。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激起了各族群众和干部的极大愤慨。大家列举了新老沙皇颠覆和侵略我国新疆的无数罪行，狠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并且把批判苏修同批判林彪叛国投敌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妄想依靠苏修复辟变天的反动言论，紧密结合起来。大家愤怒地指出：林彪“克己复礼”，要借助社会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保护伞”；阶级敌人要变天，妄想靠苏修的刺刀来屠杀我们；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千方百计地从我国寻找他们的奴才和帮凶。一个要靠，一个要找，是共同的反革命目的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就要人头落地，就要遭受苏修的奴役。但是，这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而已。林彪投靠苏修，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富农分子想靠苏修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更是办不到。苏修同美帝一样，也是一只纸老虎，是注定要失败的。通过批判，干部、贫下中农一致表示：新疆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内外反动派妄想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把新疆变成苏修殖民地，就象妄图搬移天山一样，永远办不到！批判苏修，提高了我们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自觉性，立即整顿和加强了大队的武装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大家决心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对敌，为把新疆建设成为祖国西北前哨的钢铁长城而英勇战斗。

联系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反复批判“克己复礼”，进一步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我们大队，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阶级敌人的煽动，一段时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倾向，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时，我们发动群众联系生产队的实际，回顾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重新出现的原因，揭发了资本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对煽动资本主义倾向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打击。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采取启发教育的方式，引导大家展开充分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

我们大队种苜蓿比较多。有的生产队为了多挣钱，军马饲料任务没有完成，却把苜蓿拿到自由市场上卖高价。有的甚至不留足本队饲草，把苜蓿卖光，造成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缺乏，膘情下降，影响生产。我们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家认识到：光为赚钱搞生产，指导思想错了，经营方向就偏，就会不顾党的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孔丘要复礼，林彪要复辟，都是要走回头路，开倒车，让我们重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如果我们搞生产不看路线，不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就会往资本主义路上滑下去。许多干部也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和群众一道向资本主义倾向开火。他们说：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一个生产队，要看到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资本主义臭气常常毒害我们，我们要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掌好权，为社会主义搞好生产。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群众和干部在一些问题上分清了路线是非，进一步理解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提高了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自觉性，整个大队革命蓬勃发展，生产热气腾腾，形势越来越好。干部精神更加焕发，主动安排批林批孔和各项工作，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欢迎群众联系实际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勇敢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今年虽然遇到多年未见的严重干旱，但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斗志旺盛，学习大寨人“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决心抗旱夺丰收。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我们大队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斗争实践中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养，逐步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为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战斗。



批林批孔要抓住路线问题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会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分局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以领导机关为重点深入发展。革命促进了生产。分局所属千里铁道线上，今年以来，月月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大批技术革新项目正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出现了革命迅猛向前，生产持续上升的大好局面。

认真搞好领导机关的运动，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深刻理解批林批孔的深远意义，认识以领导机关作为重点的重要性，并以积极的态度站在运动的前头，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揭露矛盾，在斗争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领导班子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

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是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开始，有些同志担心以领导机关作为重点，矛头会对着自己，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束手束脚，不敢大胆领导，一度影响了运动的进度。群众批评我们说：“挂帅的不出征，带头的不上阵，运动没法搞得深”，促我们领导群众共同战斗。

群众直率、诚恳的批评，对我们教育很深。为了搞好分局领导机关的运动，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有关文件，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进一步端正了认识。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的头子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总是乞灵于反动没落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就是从孔学的垃圾堆里找到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



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应当积极参加，领导干部更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

领导机关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重要战场。领导机关能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关系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全局。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回顾前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对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例如，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认识不清，把这条实质是极右的路线当成“极左”来批，把林彪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政治，错误地认为是“空头政治”，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分局下属有一个编组站，是全国铁路的主要枢纽之一。由于我们分局领导没有从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就生产抓生产，直接影响到这个站的领导班子没有狠抓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乘机冒了出来。有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散布什么“要想完成任务，加点钱就好办”。我们不但没有加以抵制，而且同意了这种错误观点。结果，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生产。批林批孔开始以后，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关键还在于领导上执行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就主动承担责任，并且深入到这个单位去开展批林批孔，狠抓阶级斗争，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罪行及其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等反动谬论，使大家看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个站的面貌很快起了变化。不仅扭转了运输的被动局面，而且创造了班解体列车的历史最高水平。广大群众说得好：“路线搞对头，一步一层楼；路线不对头，步步栽跟头。”这一事实使我们深深体会到，重点搞好领导机关的运动，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运动以领导机关为重点，并不是为了整那一个人，而是为了更好地清除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影响，使领导机关成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指挥部。通过学习和总结前一段的运动，同志们的认识提高了。大家甩掉了思想包袱，振作起精神，决心积极参加运动，和群众共同战斗，并在运动中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运动以领导机关为重点，应该抓什么问题、从哪里入手呢？起初，我们心里也



没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发动起来，问题的关键也就抓住了。原来，我们有些同志认为，通过这几年的运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广大群众却列举大量事实，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某些错误东西又重新搬了出来？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反而产生了“群众难管、工作难做、干部难当”的思想？并且揭发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流毒的各种表现。我们通过认真分析，深深感到，群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党委的多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担任领导工作，是所谓“老铁路”，受旧的一套影响较深。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没有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对新的变革不习惯，有时总觉得“老办法好使，老经验管用，老路子顺手”，自觉不自觉地用老眼光看新事物，用老办法来对待新形势。例如，有的同志检查，由于思想深处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意义缺乏深刻认识，总是忽视广大群众的力量，想单纯拿一套“正规的制度”、“正常的秩序”来解决企业管理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我们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是对待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这个问题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必须解决的。

于是，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比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深刻变化，大家认识到，革命的秩序乃是最正常的秩序。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的确是这样。就拿企业管理来说，现在，冲垮了“物质刺激”和“管、卡、压”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建立了革命化的管理机构，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普遍成立了各种“三结合”的技术小组，广泛开展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全分局的生产形势很好。去年完成的客运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货运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七。事实充分说明，并不是企业管理“松、散、乱”，而是我们看法不对头。我们把革命秩序看作“不正常”，把新的规章制度视为“不正规”，却把修正主义办企业那一套，看作是“正常”、“正规”，要用它来治“乱”，这岂不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吗？岂不是倒退回去吗？结合这个问题，我们深入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破坏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批判了孔老二宣扬“信而好古”，林彪诬蔑“今不如昔”等反动谬论，



进一步增强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自觉性。

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反映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委的认识一度也不是很清楚的。有的同志觉得，现在群众七嘴八舌，没以前“听话”了，当干部没以前“称心”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面深入群众征求意见，一面把工人代表请进来，帮助领导班子提高认识。工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三难”思想的实质，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群众是“靠”，还是“管”，一字之差，反映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你们为什么总是想着“管”群众，而不去依靠群众？工人同志的批评，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同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狠批林彪的“天才论”和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思想有很大提高。

毛主席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群众敢于发议论，提意见，是精神振奋、当家作主的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识大体，顾大局，最听党的话，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集体智慧，就可以使各项事情办得更好一些。去年，上级下达给我们分局的运输任务，比过去几年都大，当时我们感到人力物力不足，完成计划有困难，因而没有很快落实下去。后来，在基层单位的催促下，将任务、计划交给群众讨论，大家热情很高，他们说：要把压力变为动力，铁路一定要当好国民经济的“先行官”。群众踊跃想办法，提建议，订措施，很快落实了计划。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又比如，我们分局每天要向兄弟分局排送足够数量的空车。过去由于我们全局观念不强，没有充分依靠群众，总是有时排得多，有时排得少，很不主动。群众曾经几次提出意见，都没有引起党委重视。这次，群众又向我们提出，应该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把兄弟分局的任务当作自己的任务来完成。我们接受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并和他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结果不仅做到了均衡排车，而且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可见，过去我们所以只感到“难”，就是因为自己的路线觉悟没有工人群众高，林彪鼓吹孔老二“上智下愚”的流毒没有肃清，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工人同志说得好：贯彻群众路线，就能排除万难；背离群众路线，必然寸



步难行。

我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没有解决好，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树得不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领导班子的同志，联系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特别是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际，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共同总结了几条经验，这就是：要树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观点，用党的基本路线统帅各项工作；要有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自觉地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努力改造世界观；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我们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

为了搞好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们采取了学、批、联的方法。

首先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几个月来，我们党委在运输任务紧、工作头绪多的情况下，坚持了学习制度。有的同志除了集体学以外，还挤时间自学。初步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批判武器。还读了一些有关儒法斗争的材料。抓住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搞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这个要害，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深入批判。在学、批、联的过程中，我们改变了过去那种群众参战、领导观战的局面。领导干部带头批判，主动揭露矛盾，在党委扩大会议、机关大会上带头发言，使机关批林批孔很快形成高潮。我们党委主要成员，还分头深入群众，和群众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起畅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起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一起研究机关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问题，并请批林批孔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讲学习体会，介绍革命大批判的经验。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又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通过认真抓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提高了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也推动了基层运动的发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批林批孔日益深入，革命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铁路运输战线取得更大的成绩而努力作战。



正确处理领导机关和基层的运动的关系

朱 江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何正确处理领导机关运动和基层运动的关系,做到上下结合,互相促进,既体现领导机关是运动的重点,又把基层运动真正带动起来,使之继续深入、普及、持久地发展,这是当前领导好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

少数地区、部门和单位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运动初期,对搞好领导机关本身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基层多,抓领导机关少;而当强调把领导机关作为运动的重点以后,又把领导机关运动和基层的运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多或少地放松了对基层运动的领导,忽视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些同志认识上的片面性。

批林批孔要以领导机关为重点,这是由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也是加强党对这次运动统一领导的要求。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搞好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关键在于抓路线。而路线贯彻执行如何,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负有重大的职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往往在党的领导机关表现得比较突出。把领导机关的运动作为重点切实搞好,对于查清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肃清其流毒,是完全必要的。

批林批孔运动是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为了保证这场运动能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顺利进行和深入发展,以推动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等基层运动的开展,率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前进,首先需要加强领导机关的战斗力和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早就指出:“党的领导



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把领导机关的运动作为重点搞好，就能保证我们的领导机关成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枢，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继续革命的中枢。为此，也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地理解以领导机关作为重点的深远意义，自觉地站在运动的前头，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积极投入运动，大胆领导运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指示办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群众作出榜样。

以领导机关为重点，不能理解为可以放弃或放松对基层运动的领导，可以忽视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基层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基层单位革命和生产的形势如何，直接反映出领导机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而基层批林批孔运动能否蓬勃深入地展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革命团结能否日益加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能否执行好，又关系到能否有力地促进领导机关的运动。因此，领导机关的运动和基层的运动，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带和促的关系。

为了使领导机关运动和基层运动密切配合，互相促进，根据有一些地方的经验，主要是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发动干部群众联系实际进行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教育干部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判“中庸之道”，教育干部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批判“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教育干部群众认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点，教育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教育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二，把领导机关的运动同工厂、农村的批林批孔统一起来抓，在着重搞好机关内部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有领导地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同群众一起投入批林批孔的斗争。第三，注意领导机关、基层互通情报，及时总结交流经验。把机关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推动基层运动的发展；把基层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地反映上来，从领导机关角度查原因，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这样做，不



仅可以使广大基层进一步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大好形势，而且可以大大提高机关干部路线斗争觉悟，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领导机关和基层都要联系实际进行批林批孔。但是，由于二者所担负的工作任务不同，对于所要批判、联系的内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又应该有所侧重和区别。前一段，一些地区和市的领导机关，在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同时，根据各条战线的情况，组织、引导基层单位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揭发批判：在农村，注意揭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农村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孔孟之道在农村的影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在工矿企业，着重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揭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罪行，批判《三字经》等反动思想的流毒。事实证明，这样紧密结合工厂、农村、机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批林批孔，符合斗争的大方向，矛头都是指向林彪反党集团，指向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目的都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复辟倒退；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正确处理领导机关和基层的运动的关系，要有相应的、切实的领导方法，才能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有的领导机关的实践体会是：从领导力量上作出适当安排，除第一把手抓全面外，其余的领导成员分成两套人马，分工抓机关和抓基层的运动，做到上下运动有人管，机关和基层的业务、生产同时有人抓；从运动部署上统筹兼顾，在部署机关运动的同时，注意部署基层运动，做到既突出重点，又照顾全面；从抓好典型入手，既有领导机关的典型，又有基层单位的典型，做到以点带面，分类指导。这样，不仅使领导机关的运动步步深入，而且使广大基层的运动也不断发展。

要使领导机关和基层的运动都能搞好，必须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运动初期，有些同志曾经认为，工农兵“不懂古文，批不了孔孟之道”；运动深入以后，他们又说：“工农群众不了解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要揭发、批判，有



劲使不上。”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搞好这场运动究竟要依靠谁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是要靠试验和实践才能领会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工农兵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力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不但要彻底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还要深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批反动的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等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紧紧依靠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怎么搞得好呢？广大工农兵群众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最痛恨。林彪反党集团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欺骗不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的。前一阶段，全国各地工农兵挥戈上阵，横扫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运动在深入，仍然要继续发挥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是基层本身的运动，还是领导机关的运动，都要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把这场运动搞好。事实上，一些地区、单位正是由于发动了基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采取上下结合的方法，才使革命大批判同群众的切身体会相结合，真正收到反修防修的效果；才使清查工作中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得以逐步弄清。

为了进一步发挥工农兵的作用，有的地区采取了多样的办法：召开揭发批判大会，请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和其他各方面代表发言。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注意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各级革委会不脱产委员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举办工农群众代表学习班，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增强革命团结，共同对敌。建立不脱产的工农理论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这些方式，有助于在斗争中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也有助于领导机关运动的深入和基层运动的发展。这样做，要注意两条：第一是要执行党的政策，真正促进广大群众的团结；第二是注意党的一元化的领导，领导机关和基层的党组织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

卫 今

两千二百年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秦始皇，为着镇压反动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革命措施——焚书坑儒。它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禁止他们利用反动孔学制造复辟舆论，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以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实物，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见证，为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和秦始皇焚书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临沂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两千一百年。在两座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四千九百多枚。从初步整理的结果来看，包括《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繚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其中《孙臆兵法》一书，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而这次已发现的竹简有二百四十多枚，字数在六千以上。《孙子兵法》等书，字句和今天传世的本子也有不同，并且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佚文。秦汉以前的古籍这样大量地从地下发掘出来，在西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冢出土《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书后的近一千七百年间，还是第一次。汲冢发现的古籍，大部分不久又重新散失。临沂出土的竹简，在党和广大群众的关怀下，立刻受到科学的整理，并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有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现象：它的内容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还有一部分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却唯独没有儒家的经书。

这个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临沂汉墓的时间，上距秦始皇焚书不过几十



年。秦始皇焚书，是一场关系到前进还是倒退、统一还是分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东汉时的王充说得好：“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论衡·语增篇》）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复辟，不仅要在政治领域内，而且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强化对反动阶级的专政，禁止他们利用反动文化去蛊惑人心，制造复辟舆论。不这样做，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就会重新分裂，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日趋瓦解，奴隶制度就会复辟。

秦始皇的焚书，给予反动儒学的打击是强有力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明确记载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次出土大批汉墓竹简的临沂，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庄周曾记载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这里正是儒家的老窝，是儒家传统思想盘根错节、影响最深的地方。可是，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到了汉初，就连旧鲁地的这处汉墓中，随葬了那么多先秦诸子的著作，偏偏没有发现儒家的经书。这也说明了儒家在当时所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最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这个现象，同样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上，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的法家，适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正在各地朝气蓬勃地推行各种社会变革，极力提倡“耕战”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扫荡那些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用战争的手段来实行中国的统一。实行统一和防止复辟、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强烈的，统一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响亮地喊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法家另一个杰出代表荀况同样鲜明地指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荀子·议兵篇》）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它敢于大胆地肯定正在进行着的这场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必不可少的。法家这些言论，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孟轲之流竭力叫嚷“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统一战争，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孙臆兵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孙臆和当时其他法家一样，大声疾呼地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他明确指出儒家鼓吹的“责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



以禁争夺”那一套是根本行不通的，主张“举兵绳之”，就是说只有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用战争才能实行统一。孙臆还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覆面”（有功当天就赏，有过失立即处罚）；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显然，这些都是法家的观点。司马迁曾经写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把孙臆同法家的商鞅、吴起并列在一起，也证明孙臆是站在法家一边的。

随着新兴的封建制逐步战胜反动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十分普遍。生活在战国后期的韩非曾经描述他目睹的这种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进行专政。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推行的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这种状况大体上就一直延续下来。透过西汉初年墓葬中出土的这批竹简，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法家著作风靡一时的盛况。

临沂汉墓出土的先秦诸子著作还有《墨子》、《管子》、《晏子》等。《管子》不是管仲所写的，它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是齐国法家的著作。这次出土的《管子·七法篇》中关于《为兵之数》和《选阵》两节的片断，是讲军事问题的。《晏子》在《汉书·艺文志》里虽被列为儒家，但以后柳宗元、马端临、章学诚等都指出班固这种划分是错误的。出土的残简中，又恰恰保留了晏婴在齐宣王面前痛斥孔丘的一段文字。这些情况又表明：秦始皇的焚书，在政策上是区别对待的。它集中打击的是反动的孔学，并没有把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不分青红皂白地和儒家经书一起烧掉。

这个问题，其实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早就加以澄清了。王充“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对汉代图书的保存和流通情况十分熟悉。他谈到儒家经书时，明确地指出：秦焚书后，到了汉代“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论衡·书解篇》）。儒家的书籍是如此，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又怎样呢？王充同样也作了明确



而具体的答复。他说：秦始皇焚书时，“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论衡·书解篇》）王充这段重要的记载，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有的人即便看到它，但被一些儒家的传统偏见束缚住了，往往不敢相信。现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以实物作证，把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弄清楚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疯狂地攻击秦始皇焚书是什么“企图消灭以前的全部文化”。他们这些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对中国的历史一窍不通，居然也厚着脸皮来侈谈秦始皇的焚书，其实不过是别有用心地借题发挥。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为了污蔑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秦始皇焚书，是“消灭文化”吗？咒骂改变不了历史。上述事实已表明，秦始皇焚书，不但没有“消灭文化”，相反，对一切进步文化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兵书、史书、农书、医书以及法家的书，根本不在焚禁之列，都属保护范围内。即使是那些反动的儒家经书，也不是全部付之一炬，所焚的是以民间私藏为限，而“博士官所职”的则除外，也就是说，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来研究。《后汉书·天文志》记载：“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这都说明了秦王朝博士官掌管的一切文献档案典籍，都保存下来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试问：如果秦始皇“消灭以前的全部文化”，司马迁怎能写出这部完整的《史记》来呢？

实际上，“企图消灭”进步文化的不是法家和秦始皇，恰恰正是儒家和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就以《孙膑兵法》这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作为证，《汉书·艺文志》中尚有记载，但从东汉以后一直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这表明此书失传与秦始皇毫无关系。秦汉以后失传的古籍何止这一部，秦始皇明令不烧的许多古籍后来都无影无踪。《汉书·艺文志》曾详细记载了秦代的一些医药、种树之书，然而极少流传至今。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许多古籍的失传，正是儒家和历代反动统治者摧残进步文化的结果。儒家对进步力量的屠杀是残酷的，对进步文化的摧残也是狠毒



的。当初，孔丘为了维护反动奴隶主的思想统治，不但杀了少正卯，而且将三千篇左右的古诗（其中绝大多数是民歌）删砍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三百零五篇，这不是为后来儒家和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进步文化大删大砍开了先例吗？可是，中外反动派以及林彪一伙却完全抹杀这些事实，偏要抓住秦始皇焚书大造其谣，把古籍失传的责任记在秦始皇的帐上，这不是在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吗？

秦始皇的焚书，在历史上是起了革命作用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历史上一切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从来都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形式，公开地或是隐蔽地同取得胜利的新兴阶级作斗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是尖锐而复杂。秦始皇的焚书，是一个剥削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专政过程中的必然措施，斗争尚且如此激烈，遭到了古往今来的反动派的如此咒骂，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必然更加激烈，阶级敌人的攻击和反抗必然是倍加疯狂。

列宁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教益的”（《怎么办？》）。列宁这段教导，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在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理论上的斗争应当与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居于同样重要的位置。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就一定要有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一定要对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进行普及的、系统的、深入的、持久的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必须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把加强理论斗争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把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京剧革命十年

初 澜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京剧革命已经走过了十年的战斗历程。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在我国的文艺战线上则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十年前，刘少奇和周扬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在他们的控制下，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恶浊空气。盘踞在文艺舞台上的，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几乎全是封、资、修的那些货色。这是多么反常的现象：政治上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在文艺上却依然耀武扬威，而做了国家主人的工农兵在文艺上却照旧没有地位。这种情况，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危害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年后的今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状况。以京剧革命为开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经过十年奋战，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有十六、七个了。在京剧革命的头几年，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如平地一声春雷，宣告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革命文艺路线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千百年来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局面已经结束，工农兵英雄人物在文艺舞台上扬眉吐气、大显身手时代已经开始。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变革。近几年来，继八个样板戏之后，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新的革命样板作品的先后诞生，巩固和扩大了这场伟大革命的战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文艺作品如百花盛开，春色满园。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摄影、舞蹈、曲艺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并将继续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十年的发展趋势表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年比一年繁荣昌盛。

十年巨变，决非偶然。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京剧革命，是由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决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措施。

国内外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被打倒了的阶级不甘心失败，总是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形成的影响，腐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文艺领域，更是被他们用作宣传反动世界观、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苏修叛徒集团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就是把文艺作为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我国，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之流拼命地抓意识形态、抓文艺，目的也是如此。这些事实说明，单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包括文艺在内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梦想有可能变为现实。无产阶级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就必须同他们针锋相对，牢固占领文艺阵地，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行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艺战线上的历次重大斗争。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深刻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云水怒吼，风雷激荡。国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公开论战，国内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无产阶级反修防修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激化，文艺领域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进一步尖锐起来。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针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控制下我国戏剧以及其他艺术部门所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这就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



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领域里发动了革命。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同志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这一重要讲话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宣战的檄文。十年来，它一直鼓舞着革命文艺战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的胜利进军。

旧京剧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顽固堡垒。它的演出剧目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狂热地宣扬孔孟之道。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什么“忠孝节义”、“忠恕仁爱”等等反动思想，在旧京剧的舞台上都化为被歌颂的形象。唯其如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都把旧京剧奉为“国粹”、“国剧”，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也把它捧上了天。这与其说是在尊崇，不如说是在利用。他们利用旧京剧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来腐蚀、毒害和奴役中国人民。刘少奇、彭真、周扬一伙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把京剧界搞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舞台上继续用孔孟之道毒害群众，同时还利用京剧形式炮制了一支又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这些咄咄怪事，难道还能继续下去吗？不能了。如果容忍它，就是容忍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就是容忍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这是中国人民决不答应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选择京剧作为突破口，本身就是一场批判孔孟之道的重大斗争，就是要拆掉千百年来反动阶级赖以制造人间地狱的精神支柱。攻克旧京剧这个顽固堡垒，就能积累斗争经验，推动各个文艺部门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使之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十年巨变，来之不易。京剧革命，是十年来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头阵的一次伟大战役，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特别大，所花费的气力也特别大。这是一场大破剥削阶级文艺、大立无产阶级文艺的彻底革命，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何战胜旧京剧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如何创造崭新的革命京剧，如何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舞台，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先例可循。应该看到，地主资产阶级在京剧舞台上惨淡经营了一、二百年，使旧京剧成为我国戏曲中技艺性最强的剧种，无产阶级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它，超过它，压倒它，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万事开头难。这就要有顽强的革命毅力，去做大量的、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为后来者开拓革命之路。

无产阶级能否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关键在于创作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



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样板作品。有了这样的样板，才能有说服力，才能牢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资产阶级“秋后算帐”派的棍子。因而，京剧革命中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革命样板戏而进行的。面对这场革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刘少奇、彭真、周扬一伙如大难临头，气急败坏，他们利用篡夺去的那部分权力，使出浑身解数，明枪暗箭，百般破坏，无所不用其极。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故意设置各种障碍，他们还散布种种谬论，使用釜底抽薪的卑劣手段，篡改样板戏的主题，歪曲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企图把京剧革命引向邪路。在那时，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每一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过程，都有一部惊心动魄的斗争史。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无产阶级要在文艺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革命征途上的阻力越大，就越能激发出革命者的光和热；阶级斗争中的惊涛骇浪，反而更显示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马克思主义者率领一批革命文艺战士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同时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每个样板作品从剧本创作到舞台演出，从音乐唱腔上的一板一眼到舞蹈动作中的一招一式，无不经过反复修改、精雕细刻。无产阶级所以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就因为这一批革命样板作品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奠定基础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革命样板作品的榜样力量，将永远鼓舞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创作革命样板戏的核心问题是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从历史上看，塑造哪个阶级的英雄形象，由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文艺舞台的主人，是政治斗争在文艺上的集中反映，是文艺为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主要标志。搞京剧革命，就是要着重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使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把千百年来被地主资产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明确提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我们的文艺运动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文艺运动的界限。京剧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在文艺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孔孟之道，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在文艺舞台上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革命时期、各条战线上的伟大胜利，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



能实现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这一根本任务，就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

如何解决好京剧艺术形式的继承革新问题，是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紧相关联的重大课题。京剧艺术过去一直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刻画反面人物比较容易，要刻画新时代新人物就很不容易。京剧思想内容的革命，必然要求对京剧艺术形式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就能牢固地占领京剧舞台；解决不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会东山再起。对旧京剧的艺术形式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显然是与革命背道而驰的。让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去吟唱表现古人的老腔老调，模拟死人的举止动作，势必歪曲新生活、丑化新人物。相反，完全抛开京剧艺术特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另起炉灶，搞白手起家，也是走不通的。要让京剧的唱、做、念、打各种艺术手段都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服务，就必须从生活出发，打破老腔老调，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其有用的东西，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十年来，京剧革命坚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正确地解决了京剧艺术形式的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古与今、洋与中、推陈与出新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破字当头、立其中的道理。“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和舞蹈形象的产生，都是批判继承和改造了旧京剧艺术中有用成份而进行创新的结果。每个英雄形象的成套唱段设计，对传统的唱腔和唱法都进行了革命，既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发挥了京剧唱腔的艺术特色。今天，在人民群众中，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是京剧的内行还是外行，都乐于学唱革命样板戏的唱段，祖国大地到处飞扬着我们的英雄人物气贯长虹、激越优美的曲调。旧京剧中那些所谓“最精采”的唱段能有我们革命样板戏的唱段这样广为流传吗？事实已经有力证明：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已在艺术上战胜了旧京剧，压倒了旧京剧，为无产阶级开辟了批判继承和改造古典艺术形式的革命道路。

京剧革命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强大动力，也是培养文艺队伍的最好学校。十年来，京剧革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苦的艺术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勇于实践，敢于斗争，朝气蓬勃，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们和音乐、舞蹈战线的革命文艺战士并肩战斗，同广大的工农兵业余文艺队伍汇合在一起，组成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是在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只有从战斗中培养出来的文艺队伍，才有实



际战斗力。在京剧革命中培养出来的文艺队伍，在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上，都是过去旧的艺术院校所培养的人材不可比拟的。这就表明了，“从战争学习战争”，应当是我们培养文艺队伍的主要途径和主要方法。今后，仍然要坚持在战斗中形成队伍，团结队伍，扩大队伍。只要在战斗中狠抓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认真改造世界观、文艺观，重视抓创作思想，就一定能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

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样板作品，有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有了自己的文艺队伍，这就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纵览人类文艺史，各个剥削阶级为建立他们本阶级的文艺，用了多少年！封建阶级搞了几千年，资产阶级搞了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代表性作品有限得很。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完全腐朽、堕落了，文艺领域中充斥着什么现代派，野兽派，阿飞舞，脱衣舞等等荒诞下流的东西，五花八门，名堂虽多，实质却是一个，就是毒害和麻痹人民。苏修叛徒集团除了继续恶性发展这些光怪陆离的货色之外，近年来还竭力鼓噪写什么“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大肆宣扬军国主义，为侵略别国领土的扩张主义服务，为争夺世界霸权制造舆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文艺如同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什么象样的作品也搞不出来了。看看我们的十年，比比地主资产阶级的几百年、几千年，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胜利从斗争中得来，胜利以后还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占领了京剧阵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文艺领域里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当前，就有一小撮人在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中，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京剧革命。

所谓“‘根本任务’欠妥当”。提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工农兵作了国家主人之后在文艺上的必然要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但有人竟认为“这就欠妥当”，说这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这真是奇谈怪论。古往今来，每个阶级都用文艺塑造本阶级的英雄形象，宣传本阶级的世界观，以达到按照本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目的。哪个阶级的英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标志着由哪个阶级在文艺领域实行专政。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贬为一种“文艺手段”，甚至诬蔑当前文艺创作“吃了‘根本任务论’的亏”，这完全是否定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向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猖狂的反扑。请问：在旧戏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了几百年，你们何曾说过“欠妥当”？在过



去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统治下，舞台上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你们为什么不提一句“欠妥当”？如今工农兵英雄形象登上文艺舞台才不久，你们就叫嚷“欠妥当”。两相对照，就可看出你们所谓的“妥当”，就是要把已被赶下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重新捧上台来，复辟他们的统治地位。

所谓“样板戏标准太高，顶了台”。“标准太高”吗？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岂不就是给封、资、修文艺保留合法地位！要我们降低无产阶级的艺术标准，岂不就是提倡粗制滥造，给资产阶级以反攻倒算的可乘之机！所谓“标准太高”，不过是一种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借口。革命样板戏登上舞台以来，确实是把封、资、修文艺顶下了台。这个台顶得好，不顶不得了。不顶掉它们的台，怎样引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来？哀叹被样板戏“顶了台”，无非是要让封、资、修文艺卷土重来，把样板戏“顶”下去。革命样板戏既然已经占领了舞台，就绝不允许封、资、修文艺重新爬上台来。

所谓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这是反动的“离经叛道”论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把革命样板戏所遵循的创作方向、创作道路、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以及在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经验，统统诬蔑为“框框”，并且要“突”而“破”之，这究竟是哪个阶级的语言，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所要“突破”的，正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当今的世界上，文艺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突破”之后向何处去？就是倒退到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突破框框”的实质，就是要在文艺上搞“克己复礼”，把历史拉向倒退！

阶级敌人对京剧革命的诬蔑和攻击，毫不足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他们的反动叫嚣，恰好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京剧革命搞对了，搞得好，触及到他们的痛处，击中了他们的要害。革命是骂不倒的。敌人越是起劲地骂我们，我们越要坚持斗争，进一步普及和发展革命样板戏，回击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我们的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京剧革命十年，是战斗的十年，胜利的十年，是值得在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大书特书的十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前，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正向着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只要我们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必定是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的年代。“快马加鞭未下鞍”，我们应当加倍努力作战，继续谱写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新的篇章！



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

韦 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经过曲折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从辽阔的平原到偏僻的山区，逐步地普及了合作医疗，百万赤脚医生，三百多万生产队卫生员（包括接生员）战斗在除害灭病的第一线，广大农村的卫生面貌正在继续发生变化。

叛徒林彪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拚命攻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在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合作医疗“办早了”，“办糟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罪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认识合作医疗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促使它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广大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在农村，在国家帮助和城市支援下，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发展地方工业，举办文教卫生事业，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卫生工作是关系到亿万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的教导，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单靠国家来办。遵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国家正在把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广大贫下中农，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保障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根据当前集体经济的能力，举办合作医疗，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这是加速改变我国卫生面貌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合作医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旧社会，广大贫下中农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贫病交加，眼见多少阶级弟兄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们虽然有心想向疾病作斗争，但是无法改变缺医少药的情况。解放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使五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时曾经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随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就为他们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进一步在医药卫生问题上实行互助合作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培养了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实行合作医疗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就使几千年来广大农民减少疾病以致消灭疾病的伟大理想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合作医疗不可能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它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使卫生工作只为城市少数人服务，而把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置于不顾，以致使一九五八年以来有些地方陆续出现的一些合作医疗的萌芽遭到了摧残和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保护劳动力同发展生产的辩证关系，发扬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阶级友爱精神，农村合作医疗才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所谓合作医疗“办早了”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办好合作医疗是推动农村卫生革命的重要工作。卫生革命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解决卫生工作为什么人服务、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大多数人服务，是卫生革命的重要任务。合作医疗是贫下中农自己组织，自己管理，办医办药的一种好形式。各项卫生工作任务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都要通过它来体现和落实。实行合作医疗，可以更好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推行计划生育，保护妇幼身体健康，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中草药等，以达到解决农村缺医少药、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的根本目的。和合作医疗同时发展起来的赤脚医生，与群众血肉相连，亦农亦医，送医送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贫下中农“养得起、用得上、信得过、管得着”的好医生。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哺育下，赤脚医生的健康成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医生和病人的“金钱买卖”关系，是对“医不叩门”、“医道尊严”、“技术私有”、“恩赐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和医疗作风的深刻批判。赤脚医生队伍的发展壮大，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必将为我国新医学新药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几年来的实践显示了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在一些合作医疗办得好的地方，广大群众初步养成讲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不卫生为耻辱的风尚正在形成，生产大队有医有药，群众看病就近，治疗及时，疾病减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正象贫下中农说的那样：“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帮助我们挖穷根，合作医疗是帮助我们挖病根。”广大社员群众亲身体会到合作医疗的好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许多合作医疗办得好的地方都出现了革命和生产双飞跃的形势。群众说得好：“农业获得大丰收，合作医疗也有一功。”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坚持合作医疗七年，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逐步减少，一九七〇年比一九六九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一年又比一九七〇年下降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二年以来发病更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三年，全公社的粮食产量比创办合作医疗的初期增加了一倍，农业总收入翻了一番。象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已经不是个别的了，各地都有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典型。随着卫生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各地合作医疗的先进典型必将越来越多。事实已经有力地驳斥了那个所谓合作医疗“办糟了”的谬论。

合作医疗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作为一个新生的幼芽，它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得十分完善。对待这个正在成长中的新生事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象列宁所指出的，“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就是说，我们要积极、热情地扶植和帮助新生事物，作新生事



物的促进派。另一种态度则相反，他们对待新生事物是不关心，不支持，简直就象农业合作化时期的观潮派，自己没有积极性，也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奉劝这些人“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医治他们的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

什么是办好合作医疗的关键呢？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都集中地说明：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实行合作医疗，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革命。这里面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有复杂的思想斗争。合作医疗搞得不好，可以促使移风易俗，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群众看到战胜疾病的伟大力量存在于他们自身之中，就会积极地同那种“死生有命”、“求神治病”的封建迷信思想进行斗争。而如果不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旧风俗、旧习惯搞破坏活动熟视无睹，对群众不宣传、不组织、不依靠，合作医疗肯定搞不好。这是一件关系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生活，关系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的大事。各级党组织都应该把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对群众和赤脚医生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按照党的经济政策筹集和使用合作医疗的资金，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原则，合作医疗才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健康发展。

合作医疗同各个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各行各业都应该做合作医疗的促进派。几年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农业、工业、商业、财贸、文教等部门以及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医疗队，对扶植合作医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当前卫生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仍需要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大力支持。

毛主席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伟大任务，还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何松劲情绪、倒退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卫生部门要继续抓好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工作。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包括公社卫生院都要坚持开门办院，面向农村。要继续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放农村，进一步搞好巡回医疗。医疗队应该把支持办好合作医疗和培训赤脚医生做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坚信，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发展，必将推动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从而使农村的卫生革命继续胜利前进。



在斗争中加强赤脚医生队伍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党委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发表了，这是党和毛主席对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极大支持和亲切关怀。近六年来，我们公社的赤脚医生队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的锻炼，不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总人数从原有的二十八名增长到八十多名。赤脚医生队伍的壮大，对于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和深入开展农村的卫生革命，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不。在赤脚医生队伍巩固和提高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曾经有人刮起一股阴风，说什么“赤脚医生不象个医生的样子”。贫下中农立即驳斥了这种论调。他们说：“一边劳动，一边治病，脸是黑的，心是红的，赤脚医生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喜欢。”我们感到，把赤脚医生培养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按照什么路线建设赤脚医生队伍的大问题。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进行了两条卫生路线的对比。他们指出：如果按照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样子”来改造赤脚医生队伍的面貌，那就是妄图使我们贫下中农重新陷入缺医少药的境地。许多赤脚医生在斗争中进一步增强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自觉性，决心保持贫下中农所喜欢的那个样子。一九六八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一位赤脚医生，因受旧医科学校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滋长了名利思想，平时不大愿意跟贫下中农接触。这几年来，他在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进步较快。有一次，他路过临近大队时用口对口呼吸的办法，抢救了一个已经停止呼吸的溺水小孩。群众怀着敬佩的心情问他的名字，他说：“我叫赤脚医生。”新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也学到了老赤脚医生的好样子。一天晚上，东浜大队的七位渔民先后患了急性肠胃炎，这个大队的新赤脚医生闻讯立即出诊，挨户治疗，通宵战斗，终于使七位



渔民第二天又扬帆出海了。

赤脚医生队伍能不能巩固，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半农半医的道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一度，有的赤脚医生下田劳动少了。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就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进一步认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联系群众、改造思想、反修防修的重要意义。但是，赤脚医生要坚持走半农半医的道路，还必须要有相应的措施。一个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大队，如果只有一个赤脚医生，他就得整天忙在防治工作上，想“赤脚”也“赤脚”不成。为了保证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扩大了赤脚医生队伍。近几年，我们自力更生先后培训了三批，现在使每个大队有三名以上赤脚医生，建立了“三三轮换制”（一人在大队卫生室值班，一人下生产队搞防治，一人参加劳动，定期轮换）。这样做的结果，全公社赤脚医生的劳动时间，平均保持在同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红旗大队的赤脚医生由于“三三制”坚持得好，每年的劳动时间达到同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到二分之一，保持了贫下中农的光荣本色。由于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行劳动记工加误工补贴的计酬办法，虽然人数增加了，但贫下中农仍然养得起。

是预防为主，还是重治轻防，这是卫生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也必然反映到赤脚医生队伍中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结合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通过典型事例来教育大家，提高赤脚医生贯彻执行毛主席“预防为主”方针的自觉性。道新大队在文化大革命前，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比较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大打除害灭病的人民战争，把这个有名的邇邇村，改造成了人人爱清洁、家家讲卫生的社会主义卫生村，连续几年被评为上海市的卫生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两名赤脚医生，积极参加了大队“稻田高产灭蚊”的科学实验，三年如一日，坚持在试验田和对照田中定点测试，收集数据，终于掌握了水稻生长的规律和蚊虫孳生的规律，收到了既灭蚊又高产的效果。现在全公社绝大多数赤脚医生能够主动当好大队的卫生参谋，做到突击运动集中精力抓预防，平时结合治病搞预防。

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对赤脚医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医疗技术要求。我们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和赤脚医生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引导他们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时，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实行赤脚医生同卫生院医生定期轮换、对调等办法，有计划地提高赤脚医生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技术水平。现在，大部分赤脚医生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预防知识和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的还能独立诊治一些疑难病人或抢救重危病人；还有的赤脚医生能够拿起手术刀，和卫生院医生一起施行阑尾炎、疝气、痔疮、肛瘘、体表肿瘤等手术；不少女赤脚医生能够接生，有的能处理难产，进行人工流产、腹扎等手术。

赤脚医生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个沿着什么方向提高的问题。我们反对关门提高，鼓励赤脚医生在搞好群众性的防治工作的实践中，沿着中西医结合的方向提高。我们发动广大群众献草，献药，献方，就地取材，为赤脚医生搞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大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群众的帮助下，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细心摸索疾病的规律，研制了平喘止咳、治胃痛和腰痛等十八种比较定型的协定处方，根据季节定期加工成药，防病治病的效果更好了，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就地取材，又是勤俭办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巩固合作医疗的作用很大。近一、两年，我们反复宣传这个大队的经验，对全公社的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鼓舞很大，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推拿）的威力进一步发挥出来了。新华大队赤脚医生在实践中钻研针麻技术，基本上掌握了头面部的针麻要领，能够独自进行针麻拔牙和创伤缝合。

几年来的实践，清楚地证明，培养赤脚医生的道路，是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农村卫生革命的康庄大道。现在，我们公社已经形成了抓好赤脚医生工作的三条渠道：公社党委举办路线学习班直接抓，大队党支部结合中心工作经常抓，公社卫生院支部定期集中交流经验配合抓，基本做到了组织落实和措施落实。这几年来，我们公社的赤脚医生向大学输送五人，向部队输送五人，向公社卫生院输送四人。其他留在大队的六十八名，同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和一百四十几个生产队卫生员结合在一起，必将为农村卫生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加强协作 快装快卸

上海港务局党委会

在批林批孔高潮中，我们上海港和兄弟港口一样，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于兄弟单位的大力协作，装卸效率不断提高。今年一至五月份，全港吞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点二，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其中煤炭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外贸物资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船舶停港期也有所缩短，煤炭船比去年平均缩短近三分之一。

今年以来，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展开，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加上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到港的煤炭、钢铁以及外贸物资日益增加，装卸任务十分繁重。广大海港工人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工人们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大干社会主义！”大家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千方百计挖掘潜力，使装卸效率大大提高。杨树浦装卸站和第二装卸区过去卸一条两万多吨煤炭船，一般需要十天左右，现在只要三到四天。第九装卸区原来卸一条装载一万多吨废钢的船，需要二十多天，现在缩短到七天左右。工人们豪迈地说：不断提高装卸效率，压缩船舶停港时间，加快了船舶的周转，从增加船舶的实际运输量上看，就好比码头工人造了大船。

加强协作是提高装卸效率，加快船舶周转的一个重要问题。港口是水陆运输



的枢纽，具有环节多，变化大，时间性强等特点。仅港口内部，装卸一条船，就要涉及装卸、机械、库场、理货、调度、修理等十多个部门。不论那一个环节发生脱节现象，都会直接影响到装卸进度。因此，加强各工种、各部门的密切协作，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自觉地调整和完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对于不断挖掘潜力，扩大港口通过能力，做到快装快卸，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我们对搞好协作的重要性，认识比较肤浅。去年，杨树浦装卸站工人群众创造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和启发。这个站泊位少，场地窄，装卸设备也不多，是上海港所属单位中条件较差的一个。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装卸任务和吞吐能力的矛盾十分尖锐。以前，各工种、各部门之间由于协调不好，常常发生扯皮现象，互相埋怨，效率很难提高。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这个装卸站学习了先进单位的经验，广大工人发扬主人翁的精神，增强了办好社会主义码头的责任感，自觉地调整相互关系，提出“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我们都是一根杠棒的前后肩”的口号，协作配合不断加强，大大促进了装卸效率的提高。一九七三年这个站吞吐量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三，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六点八，成为全港成绩显著的一个单位。

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使我们对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教导，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存在着矛盾，自觉地解决这些矛盾，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抓好阶级斗争，努力改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尤其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认识提高了，今年以来，在批林批孔中，我们联系实际进一步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推广了杨树浦站的经验，“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的思想广泛传播，各工种、各部门相互配合、团结战斗，使港区工作出现一个讲协作，比风格的新局面。

提高装卸效率，不仅需要港区内部的协作配合，还必须加强港、航之间以及港区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港区的对外关系千头万绪，拿外贸物资的装



卸来说，往往涉及几十个单位；煤炭船的货种虽然比较单一，也要关系到十多个单位，一处工作衔接不好，都会影响装卸的进度。过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货轮急于要卸货，而我们码头和内河运输衔接不紧密，驳船没有准备好，货卸不下来，造成停工待时，延长了货轮的停港期；有时，货物卸下后，由于我们主动和货主单位联系不够，不能及时运出去，使库场发生壅塞，又影响到以后的装卸。可见，加强有关各方面的大协作，对于加快装卸进度，压缩船舶停港期，非常重要。只有在各个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之间，不断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持久地开展“一条龙”的大协作，才能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更快地提高装卸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的水运事业。

在这方面，兄弟单位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许多兄弟单位主动协作，积极配合，宁可自己多麻烦，也要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方便。船员们提出：“港、航一家”，“我们也是一根杠棒的前后肩”。为了配合装卸工作，许多船进入吴淞口后，就为装卸工人做好准备工作，检修起吊设备，烧足蒸气，以至把起货机操纵台四周的玻璃都擦洗干净，确保卸货时视线清楚。这样，船一靠港，装卸工人就可上船工作，大大缩短了开工准备时间。有些货主单位，如煤炭部门，在船还没有到港时，就安排货物的流向，大大方便了装卸的衔接。铁路、水产、钢铁厂等部门的专用线和专用码头，也为我们疏运物资提供方便。在兄弟单位的大力协作下，我们上海港区的各个装卸区，也主动加强了港、航之间以及港区和其他方面的协作，做好各方面的衔接工作，调整和改善相互关系，促进了装卸效率的提高。

加强协作，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港、航协作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解放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水运事业，客观上存在着开展社会主义协作的要求，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也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前提。但是，由于错误路线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的干扰破坏，又阻碍着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回顾解放以来港、航协作关系的发展变化，我们有过许多经验教训。每当社会主义革命处于高潮，例如一九五八



年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的思想风格大大发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受到打击，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得到改善。当时船员、装卸工人共同提出了“向协作要运力”的口号，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港、航以及港区和其他方面的协作就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资产阶级思想抬头，这种协作关系就受到影响和破坏。从前，为了解决港、航之间的协作问题，双方还签订过所谓协议书，彼此规定若干条，想用这个办法来搞好协作，实际上是你卡我，我卡你；还搞过奖金挂帅，船一到港，根据所谓装卸标准，规定一个卸货时间，提前则奖，过期则罚，把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搞成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有一时期，也曾干脆把港、航合并起来，还建立过所谓海区“托拉斯”，企图单纯从体制上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反而增加了矛盾，后来又不得不分开。事实证明，协作风格决不是单纯规定几条制度就可以“卡”得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更不能靠用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来实现。至于调整体制，如果不是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即使形式上合并了，仍然达不到搞好协作的目的。因此，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要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最近以来，我们港区、航运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协作能有一个新的发展，正是因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在有些港区，海员工人和港口工人一起开批判会，狠批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和林彪鼓吹的“不同心也要协力”的谬论，狠批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大破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广大工人同志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目标，想全局所想，急全局所急，自觉地改善相互关系，不论分内分外，不管困难麻烦，主动搞好协作，千方百计为对方创造条件。工人们说得好：“我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心是为社会主义！”“不分你家我家，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这种胸怀全局的思想，就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思想基础。可见，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狠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同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算小帐、不



算大帐的本位主义斗，同怕麻烦、怕吃亏，只图自己方便，不管别人困难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才能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扫清道路，使社会主义的大协作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加强协作，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还要在制度方面破旧立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破除了一些束缚广大群众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制度，并且依靠群众，建立了新的规章。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些制度就又显得不适应了。特别是港区装卸涉及许多单位，有些在本单位的通常情况下是可用的、合理的，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从全局需要来看，就显得不适应、不合理了。只有区别情况，改革不适应生产发展的旧制度，建立适合生产发展的新制度，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协作关系的发展，有利于装卸效率的提高。例如，过去市内汽车运输部门实行两班制，物资部门的仓库是常日班，而我们港区装卸则实行三班制，三方面作业班次的不一致，影响了装卸运输的连续进行，今年以来矛盾更为突出。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汽车运输部门和物资部门仓库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克服困难，主动增加作业班次，改变作息时间，和我们港区装卸统一衔接起来，这就加快了装卸进度，进一步挖掘了运输潜力，增强了彼此的团结协作。当然，改革旧的规章制度，必须经过认真分析。港区装卸涉及面广，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有时从一个方面来看是可行的，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却不可行，这就需要从全局出发，及时沟通情况，互相协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有利于协作关系的发展。

现在，我们港、航和港区与其他方面的协作比之过去虽有进步，但还只是开始。我们主动和各兄弟单位搞好协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各个装卸区的工作也很不平衡，有些和各方面的协作关系比较好，有些则较差，有些还不够巩固。但是，加强协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一定要在批林批孔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热情支持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断总结经验，使社会主义大协作的革命风格，在我们港、航以及港区和其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更好地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水运事业，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发展农业靠群众

齐 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大寨为榜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艰苦奋斗创新业，自力更生起宏图，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广大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群众、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越来越大，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九七三年粮、棉、麻、糖、烟的产量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今年夏粮又获得丰收。整个农业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胜利了，不要忘乎所以。形势越好，我们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革命。在当前正在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应当紧密结合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反对倒退。要注意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总结推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经验，促进社会主义农业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

经验表明，农业学大寨，首先是要抓路线，要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也就是说，要象大寨那样，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通过批判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和他们散布的“天命论”、“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加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从干部到群众，从老贫农到青年社员，从广大的农村妇女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无不精神振奋，斗志高昂。他们说：“林彪效法孔老



二‘克己复礼’，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社会主义的快车。”这种可贵的革命积极性，是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力量，基本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各级领导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毫不松懈地继续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发展农业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生产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任何生产斗争，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和阶级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是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农业战线上表现出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如何开展？是坚持批林批孔，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阵地，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放弃农村阵地，削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还是埋头生产，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不顾国家计划，不管集体利益，以钱为纲，搞自由种植，什么来钱就搞什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怕流汗，不大干，两手向上，依赖国家支援？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要使这些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依靠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也是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过去，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主席在领导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总是教育全党同志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正是由于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了群众，实行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才有力量粉碎蒋介石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日本侵略者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改善边区群众的物质生活，从而扩大革命军队，巩固革命根据地，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解放以后，毛主席又明确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充分发挥了这种积极性，广大农民群众才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才有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斗争实践证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今天，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夺取农村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广大社员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从长期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从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两重天的鲜明对比中，深刻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广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也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那些是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应该坚持；那些是资本主义道路，违背他们的根本利益，应该反对，广大贫下中农体会最深，看得最清楚，斗争也最坚决。他们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夺取农业丰收的力量和智慧。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充分调动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就能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集体经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

有的同志一讲发展农业生产，夺取农业丰收，就把着眼点放在自然条件上，一看风调雨顺，就盲目乐观，一遇自然灾害，就垂头丧气。这是一种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搞农业生产要同大自然打交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好的自然条件固然是农业丰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人和自然的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不是靠“老天爷”赐给的，而是广大群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大寨的自然条件并不好，还经常遇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可是大寨的生产却发展很快。有些地方自然条件比起大寨来不知好多少，可是生产的步子却迈得不大，甚至年年是老样子，老产量。同样的自然条件，农业的面貌也大有不同，有的一年一个样，一步一层天，有的是年年如此，踏步不前。这都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是否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能够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就是自然条件再差，也可以把它改变过来。

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广大劳动人民正是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世界上原来并没有田，没有农业机械，没有农药，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能够抗



风、抗寒、抗虫的优良植物品种，这些都是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和创造出来的。人们同大自然究竟谁怕谁呢？只有那些愚蠢的唯心论者，对大自然才逆来顺受，广大劳动人民，则在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前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那种崇拜自然，屈服于自然的压力，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观点，而是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的反映。按照林彪和孔老二他们的反动说教，广大劳动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受奴役，是命里注定的，而且在同自然界的关系到，也不能违背“天命”，只能做自然界的奴隶。这种东西，长期以来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一具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阻碍着社会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这完全是为他们那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必须同这种反动的东西彻底划清界限，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批判林彪、孔老二散布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自己，坚定地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广大群众说得好：“不怕你‘老天爷’千变万变，批林批孔锻炼出来的社员群众定能胜天。”

由于自然界充满着矛盾，不断发生变化，加之我国幅员广大，地势、气候复杂，不可能都是那么风调雨顺，部分地方出现这种或那种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一些困难，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毫不奇怪的。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树雄心，立壮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群策群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努力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灾害，有困难，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同困难作斗争，可以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学会战胜困难的本领。比如，有的地方连续三年大旱，连续三年大干，结果带来了生产面貌的大改变。群众说：“抗旱抗出了水利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害又是人民群众的反面教员。当然，困难转化为顺利，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正确路线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要我们对自然灾害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存有侥幸取胜的心理，能够充分发动群众作好应付各种自然灾害的准备，在思想上多作几种设想，在措施上多作几手打算，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到前头，就可以取得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主动权，战胜困难，夺取农业丰收。

采取积极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发明创造，这是许多地方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一条重要经验。广大贫下中农长期战斗在农业第一线，有改变自然条件的强烈愿望，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而且对当



地的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情况最熟悉，对生产上可能发生的一些困难，什么时候可能出现旱、涝、风、雹、虫、冻等自然灾害，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在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许多意见、设想，大都是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切实可行的。他们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夺取农业丰收的主力军。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主力军的作用，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调查研究，把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总结起来，加以推广。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发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乡知识青年和广大农村青年社员的积极作用。他们有文化、有朝气、有干劲，富于革命的理想，较少保守思想，有敢闯精神，是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不要抹杀了他们的特点，要大胆地支持他们搞发明创造，搞技术改革，搞科学种田。毛主席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我们要帮助青年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逐步争取在社会上和自然界里得到更多的自由。这样，我们就有力量、有办法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使大自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依靠群众，还必须关心群众。没有对群众政治上、生产上、生活上的热情关心和帮助，就谈不到更好地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讲依靠群众发展生产，并不意味着减轻了领导的责任。我们的领导同志要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不断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同时，还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的痛痒，帮助群众努力解决好生产和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生产队的财务帐目、社员的工分是不是由贫下中农民主管理、民主评定，是不是定期公布了？群众的口粮是如何计划安排的？合作医疗办起来没有，办得好不好，群众的治病问题如何解决？以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等等，我们都应予以帮助和解决。特别是在群众的干劲高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做到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生产生活遇到困难有人帮。群众的干劲，群众的情绪，是同领导者的工作紧密联系着的。更好地关心群众，就能更好地调动和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断激发广大群众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责任感，提高为革命种田的自觉性，努力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不断发展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中国共产党临西县委员会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发动广大干部深入基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县、社脱产干部长期到农村蹲点，与广大群众一起，同批修，同学习，同劳动，向群众学习，带领群众前进，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使全县的革命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变化。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县和全国一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群众迫切要求干部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到基层中去，更好地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群众的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我们干部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考验。一九六八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打破了重叠的行政机构，改变了过去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干部队伍朝气蓬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精简了的机构又逐步恢复起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旧作风又有抬头。摊子越搞越多，机构越搞越大，使基层忙于应付机关，形成“上边千条线，下边团成蛋，那股拉得紧，就跟那股转”的现象，影响了基层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有的机关干部下到农村，也站不住脚，不能真正深入群众。结果下边的问题又都涌到机关，领导干部埋头于日常具体事务。这样下去，势必造成机关脱离基层，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最后走上修正主义邪路。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干部与群众对这种脱离群众的旧作风重新抬头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大家指出，阶级敌人和钻进我们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最害怕、最仇视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他们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作风来腐蚀我们的党，妄图割裂我们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机构重叠，干部作风飘浮，不愿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是林彪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孟之道的流毒，也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一种反映，必须批判和纠正。于是，我们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



线斗争的实际，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讨论了干部深入基层同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关系，同相信群众、走好群众路线的关系，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坚持继续革命的关系。我们认识到，领导机关能不能密切联系群众，是关系到能不能深入贯彻执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的重要问题，从而提高了干部深入基层的自觉性。我们对障碍联系群众的重叠机构进行了精简，撤销了一些可设可不设的办事部门。机构精简了，互相扯皮的现象克服了，出现了一员变多员，同心协力干，工作抓得紧，办事效率高的新气象。这样，就使得大家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联系群众。

改进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抓好大事。不了解下边的情况，不对实际情况作科学的分析，必然会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就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使党的路线得到贯彻落实。这样必然是想抓大事抓不住，想做工作做不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战斗，亲自搞调查研究，亲自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并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研究总结实践中的丰富经验，才能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真正抓好大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农村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农村的主要矛盾。对这一点我们的许多干部在理论上是知道的，但实际上并不十分理解，更没有做到始终自觉地以这个基本观点去指导农村工作。到基层中去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就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我们研究、比较了先进社队和后进社队两种类型社队的情况。它们的具体情况虽然是很不相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长期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能不能紧紧抓住基本路线这个纲，首先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这是决定它们工作好坏的关键。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但表现形式却又是千差万别的，各有各的特殊性。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的心贴在一起，才能真正了解问题的症结，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门径。下堡寺公社有个张三寨大队，与东留善固是邻村，自然条件比东留善固好。东留善固大队认真学大寨，一九七二年粮食产量过了“长江”，而张三寨仍停留在二、三百斤上。过去，县、社领导干部也曾指出张三寨的工作首先要抓大事，但由于没有克服那种溜溜转转、说说看看的飘浮作风，没有实行具体的工作指导，面貌变化不快。后来干部下去以后，与群众实行“三同”，广泛访问了社员群众，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弄清了这个大队长期上不去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搞中庸之道，阶级斗争抓得不紧。群众批评他们是说话顺和，办事圆和，解决问题调和的“三



和”班子。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受不到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贫下中农对蹲点干部说：“要想变摊子，必须抓班子。”贫下中农的话，象一把钥匙，打开了这把长期没开的闷锁。在蹲点干部的帮助下，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批林整风，深入批判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露了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领导班子由“三和”变成了“三敢”：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此，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面貌很快发生变化。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一年多来，全县有六十五个后进队甩掉了“老大难”的帽子，跨进了先进行列。

干部深入基层蹲点，把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创造的经验，加以研究、总结，化为集中的、系统的经验，可以更好地指导全县的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某些人的右倾保守思想。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过去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斗争形势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果我们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能不断认识和掌握客观运动的规律，及时了解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思想就有可能落后于形势。在我们的干部中，确实有一些同志习惯于按照常规走路，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往往估计不足，对新生事物常常抱着怀疑态度。造成这种被动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客观实际。许多干部到基层以后，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不少干部在农村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文件，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把运动引向深入。在开始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时，有的人曾经担心群众的批判能力不够。但当他们和群众一起学习、批判时，看到群众鲜明的阶级爱憎，认真看书学习的顽强精神，深感自己落后于群众。东留善固大队的干部和群众，认真读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剖析“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把学习与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效果很好。在这个点里进行调查研究的县委同志及时作了总结。这一经验推广后，很快在全县出现了一个以学促批，以批促学的热潮。后来，我们又及时总结了摇鞍镇公社组织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讲村史、家史，用大量生动事实批判“克己复礼”的经验；黎博寨公社组织新生事物报告团，热情歌颂新生事物，批判“克己复礼”的经验。通过总结和推广这些典型经验，不仅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也大大解放了一些人的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我们在组织干部到基层蹲点的过程中，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的正确性。

干部深入基层，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也是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改造和锻炼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广大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但是，决不能认为从此就可以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了。少数同志，由于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忽视世界观的改造，滋长了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贪图安逸，搞特殊化的资产阶级作风。他们到农村以后，经过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黎博寨公社孙庄大队蹲点的一位同志，是个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与这里的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进城以后，坐机关多了，接触群众少了，革命精神也差了。在蹲点中，他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吃苦耐劳，为革命种田的忘我精神，很受教育。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和群众在一起，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三水”冲掉了官气、娇气，增添了继续革命的朝气。他表示，年纪大了，更要争取时间，为党多做工作。群众斗争的大风雨，使老干部焕发了青春，也使新干部得到了锻炼。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必须学会领导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但这种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经过斗争实践才能锻炼出来。因此，要有意识地把新干部放到群众中去，放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放手让他们“挑担子”，指挥战斗，掌握政策，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领导艺术，增强独立工作的能力。不少年青干部下乡以后，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经受锻炼，增长了才干，迅速成长起来。事实证明，组织干部深入农村蹲点，不仅有利于世界观的改造，也有利于破除“论资排辈”的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步伐。

干部深入基层，转变作风，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斗争是曲折、复杂的。干部下去，并不等于联系了群众，搞不好就象井里的葫芦，看起来很深，实际上漂着。围绕着要不要坚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的斗争，是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紧密联系着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搞好县委本身的批林批孔，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更自觉地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红旗

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 认真看书学习 掌握理论武器**.....池 恒 (5)
- 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齐 新 (8)
-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翟 平 (13)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罗思鼎 (16)
- 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李 群 (27)
-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陈 今 (33)
-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钟 达 (40)
- 韬晦之计和林彪的复辟阴谋**.....师 平 (46)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沈 思 (49)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党支部 (57)

批林批孔 促进战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六连党支部 (61)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65)

发扬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 (70)

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找油找气
.....中国共产党大港油田委员会 (74)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 年
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 (82)

学大寨 讲路线
——湖北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的调查报告 (87)

路线搞对头 生产争上游
——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的调查报告 (91)

☆ 八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
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
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
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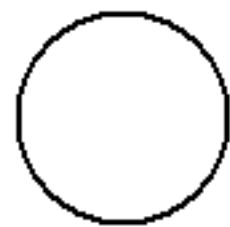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思想评论

认真看书学习 掌握理论武器

池 恒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奋起扫除孔孟之道的垃圾和污秽，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形成了一股具有强大威力的革命洪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蓬勃发展。

怎样才能使群众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呢？许多先进单位的经验表明，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在运动中始终抓紧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同时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进行一次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清除它的思想影响，总是要同时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批林批孔也是如此。为了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孔孟之道；为了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吸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现状，分析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关的各种重大问题。批判尊儒反法观点，正确地评价不同历史时期法家在历史上的



进步作用和局限性，深入地批判不同历史时期儒家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和欺骗性，也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击中要害。这是广大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一条重要经验。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反动小册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看，这些书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忠臣”和“孝子”，即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不是专门写给劳动人民看的通俗性的大众读物。在旧社会，反动统治者根本不允许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读书呢？正因为如此，我们首要的是批判这些书所宣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认识它的反动本质，同它划清思想界限。正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思想都毒害劳动人民一样，《三字经》之类也毒害人民，我们今天对它进行批判，就是为了清除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对谚语也要进行阶级分析：有一些完全是腐朽反动的，它们散布孔孟之道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加以批判；有一些则是劳动人民斗争经验的总结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有少数，我们后来使用时赋予了新的涵义。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看清楚哪些必须批，哪些不能批，哪些要区别它们在不同情况下运用时的不同涵义。我们批判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认清它们反动的阶级实质，并通过这样的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因此必须从阶级实质上、从路线上去着眼，而不要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要批判就要讲道理。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宣布孔孟之道是错误的、反动的，比较容易做到，而要真正从理论上把它批倒批透，就必须用气力，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讲明道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法家的代表人物批判孔孟之道时，都从他们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讲了很多道理，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原因就是他们受



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我们今天能够彻底批倒孔孟之道，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外，最主要的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运用这个科学的武器，我们的批判，就可以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准确得多，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能够对历史现象，包括儒法斗争，得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批林批孔运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广大工农兵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思想水平和批判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革命的大批判也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联系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可以更牢固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了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为了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历次路线斗争的论述。坚持这样做，就能不断促进理论同实践的结合。革命大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我们应当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广大群众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使广大群众的学习也能不断向前发展。群众性的学习和批判，对领导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努力赶上，力争比群众更多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阅读和研究报刊上的主要文章，并尽可能多学一些历史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运动，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先进经验。

今天，孔孟之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摧毁了。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应部分，正在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借孔孟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出修正主义。因此，反修防修、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

齐 新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使我们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以及群众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的路线觉悟，使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进一步得到发展。全国热气腾腾，形势一片大好。当前，我们面临着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搞好革命团结，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革命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努力增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搞好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内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深入和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鼓吹、提倡和强制推行，孔孟之道这种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旧中国形成了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并且影响到现在，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反革命的策略，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孔孟之道。批林必须批孔。我们要彻底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上层建筑，在斗争中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极



大的努力。这样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我们依靠工农兵这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还要注意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人，推动他们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批林批孔大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更大胜利。

孔老二和林彪的路线，都是倒退、复辟、搞分裂的路线。反动的儒家学派，从没落阶级的利益出发，向来都是搞投降、卖国和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林彪反党集团效法孔老二，尊儒反法，咒骂秦始皇，在他们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明目张胆地叫嚣要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国家，实行反革命的割据，妄图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林彪和孔老二的这条反革命的分裂路线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总根源。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批判他们的这条分裂路线和罪行，进一步加强我们党和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斗争本身，就要求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还要看到，批林批孔这场斗争，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我们搞批林批孔，就是要挖掉他们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难以得逞，这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和破坏。阶级敌人为了实现其反对革命的目的，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破坏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包括用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等卑鄙伎俩进行阴谋活动和分裂活动。因此，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必须深刻地理解搞好革命团结对于搞好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在批林批孔中增强革命团结，克服那些妨碍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思想和行动，做搞好革命团结的促进派。对于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的反动言行，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

经验表明，搞好革命团结的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我们所讲的团结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如果没有领导“一班人”的团结一致，就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去战斗。因此，各级领导班子能否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对于搞好党内外的团结关系极大。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站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敢于积极引导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做，就坚持了无产阶级党性，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的团结就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就抓住了搞好革命团结的根本。所以，我们要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首先就要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地参加批林批孔斗争。许多事实都说明，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和单位，广大干部就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增强，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地方的少数领导干部怕这怕那，不敢上阵，不能大胆地领导运动，同群众一起战斗。他们中间，有的人不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缺乏自觉革命的精神，不但影响了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也影响了群众之间的团结。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同志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还不够端正，他们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对批林批孔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才能解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必然引出的革命运动，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实践。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革命运动要进行多次。不这样做，就不能彻底粉碎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就不能对付帝、修、反的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是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伟大号召，奋起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同时联系实际，批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了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这正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现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能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或者回避矛盾，放弃领导，或者不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落实党的政策，结果使矛盾激化起来，损害革命团结。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务必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

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是促进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群众中，对于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存有某些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这些意见和分歧是不难解决的。但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再加上某些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得那些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复杂化起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不能不给以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和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他们的重要经验是，引导群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罪行，使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人民群众的死敌，人民群众同林彪反党集团是势不两立的。认识到，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团结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搞分裂。要对敌狠，对己和，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反党集团身上。只要分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要让群众在斗争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



广大群众都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党依靠的基本力量。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作为领导干部，对于群众中的意见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出以公心，正确对待。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发扬和支持，凡是不正确的意见就要指出，并帮助他们自己认识和改正。要引导他们“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对于在批林批孔当中搞好革命团结，也是完全适用的。

有的人把这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成是“路线是非不清”，是“和稀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讲路线是非，首先要分清敌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当前最大的路线是非。批林批孔，首先就是为了分清这个路线是非。当然，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是一种是非。但是，分清这种是非，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就是要斗私批修，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无产阶级的品质，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通过这种方法，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怎么能说是“和稀泥”呢？那些离开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纠缠人民内部的一些具体问题不放，反对在同志之间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硬是要论高低、争输赢的做法，势必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根本上混淆是非，走偏方向。这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背党的思想和作风，非常不利于革命团结的。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当珍惜和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做促进革命团结的模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搞好批林批孔，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

翟平



正当广大工农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说法：“儒法斗争是狗咬狗。”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从他们产生之日起，就由于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势不两立。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专门制造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舆论；以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大喊大叫。这两家之间，围绕着“礼治”还是“法治”、“复井田”还是“废井田”、“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尊天命”还是“反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家坚持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步变革，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反动的。只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的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两个阶级的生死存亡。既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怎么可以说成是“狗咬狗”呢？

事实上，儒法两家都各自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诛少正卯，射杀吴起，车裂商鞅，其罪名都是因为闹革新，搞变法。这是反动势力迫害进步势力的反革命事件，而不是什么“狗咬狗”。同样，法家的态度也很鲜明。韩非明确指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他强调儒法两家的斗争就象冰块和炭火不可共处，冬天和夏天不可同时一样，没有半



点调和的余地。韩非就怀着对奴隶主贵族及其儒家的“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子·孤愤》），英勇战斗了一生。

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是不是“狗咬狗”呢？也不是。儒法斗争延续到封建社会，比起春秋战国有着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阶级基础，但仍然是对立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孟之道被腐朽的地主阶级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之后，批判儒家思想往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儒家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的利益，顽固地宣扬孔学，对内鼓吹守旧和分裂，对外一般都搞民族投降卖国主义；法家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对孔学的批判，代表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宣扬革新和统一，在侵略者面前一般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柳宗元的《封建论》同李贽对孔学的批判，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同儒家是两条路线，能说这是“狗咬狗”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历史上站在反孔斗争前列的也是劳动人民。从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连绵二千多年、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势力和儒家路线，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历代法家的革新、统一的路线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行。综观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史，是一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儒法斗争说成是“狗咬狗”，就必然歪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时，它还抹煞我们今天对尊儒反法思潮批判的深刻意义，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尊孔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尊孔派，他尊孔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反法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同林彪一伙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背叛了十月革命的苏修新沙皇，蜷伏于海岛的蒋介石，他们和林彪一样地尊孔反法。他们要尊孔，我们要批孔，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恶狠狠地咒骂法家，否定法家，并借此咒骂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分析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吸取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种斗争同样是不可调和的。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对法家进行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为了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引导人们向前看，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加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对历史遗产不区别精华和糟粕，采取一律拒绝、一律否定的态度，那就是对“古为今用”方针的否定。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这本身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阶级敌人宣扬它是为了掩盖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借以浑水摸鱼；我们的同志也信这一套，那就一定认识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容易受骗上当。历史上有没有“狗咬狗”的现象呢？有的。那是在反动派、尊孔派内部的尔虞我诈。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待当时民族矛盾的态度时，曾经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各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瓜分中国，它们之间，它们的走狗之间，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例如，当时的胡汉民与蒋介石这两个尊孔卖国派之间就形成一种对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正如《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内部各派系的勾心斗角那样，他们之间“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即使是这种真正“狗打架”的争斗，毛主席也指明“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用以对付主要的敌人。这种科学的阶级分析同用“狗咬狗”抹煞一切的论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澄清错误观念，警惕坏人的造谣和破坏，学会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好更深入！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罗 思 鼎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法家和儒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条战线大决战的时刻。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农民起义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研究、总结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包括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帮助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替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创造了条件。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摧毁了在关东六国还大量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①李白的诗，歌颂了秦始皇



统一中国的功绩和他的卓越政治才干。凭借着已经成熟的历史条件，在奴隶们反抗奴隶制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在经过商鞅变法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形势下，秦始皇坚定地实行法家路线，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敢作敢为，生气勃勃，成为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最杰出的代表。

秦始皇统一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曾满腔热忱地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②。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宣告了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当秦始皇死后，在短短三年内，秦王朝也随即灭亡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从来的尊儒反法派，从董仲舒、朱熹到林彪，从苏修到国民党反动派，无不抓住秦朝二世而亡，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秦朝迅速灭亡是秦始皇实行“暴政”的结果。秦朝的覆灭，是因为对儒家复辟派镇压得太多了吗？不！事实同这种断语相反，秦王朝的失败，正好不是因为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太多了，恰恰在于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是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秦始皇在粉碎吕不韦复辟集团的同年，鉴于吕不韦大批招募六国儒生入关，图谋复辟，曾下了逐客令。法家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因而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书》，这是正确的。对“客卿”应该作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③的政策，一概排斥。但“客卿”中也确实有象吕不韦、淳于越这样代表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坏人，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企图从内部瓦解秦朝的地主阶级专政。根据历史记载，所有知名的秦博士都是齐人和鲁人。齐鲁地区原是孔孟一派儒生根深蒂固的老窠。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深深地隐藏了下来。这就为秦王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在全国各地隐藏着大批心怀



不满的六国奴隶主复辟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章太炎指出：“六国公族，散处间巷之间”，“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④，他们企图复辟已经失去了的天堂，是必然的情势。秦始皇对公开的敌人是有一定警惕的，也采取了措施。如平毁六国军事要塞，征收全国的武器，多次巡视，到处刻石，宣传封建制的优越性，批判奴隶制的落后性。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由于这个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时间不长，对反复辟、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在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便滋长了太平麻痹观念，幻想从此“天下和平”^⑤。秦始皇一死，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的恶果便迅速暴露，从埋藏在秦王朝内部二十多年的赵高，到躲藏在全国各地的六国旧贵族，一下子都从地底下涌了出来，而地主阶级却没有能够把这股复辟逆流打下去，秦王朝的灭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明朝张居正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秦始皇的继承者能够“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秦朝就不会这么快灭亡。他所说的，实质上是一个继续和加强秦始皇法家路线，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问题。而历史事实却相反，“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⑥，导致了秦王朝的倾覆。“六国余孽”是颠覆秦王朝的复辟势力，而所谓“奸宄内发”，就是指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官以进”^⑦，在秦宫廷里当上了一名宦官，并成了公子胡亥的师傅。赵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赵高父母都因犯秦法而被判处重刑，他本人也差一点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被处死。“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⑧。后来秦始皇看他能说会道，又“复其官爵”^⑨，给予重用。阴险的赵高从此改变策略，骗取信任，除继续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后又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这样，就使赵高有可能趁秦始皇病危，发动政变。

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但“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⑩。紧接着是赵高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他“留所赐扶苏玺书”，诱骗胡亥，



大谈“汤武杀其主”，“卫君杀其父”的历史，叫嚷卫君杀其父“孔子著之，不为不孝”^⑪，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同时又拉拢李斯，说什么“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⑫，使用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李斯就范。然后，赵高伪造诏令，逼死太子扶苏，逮捕并杀害坚持秦始皇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得逞了。汉代的樊哙曾用秦始皇的历史教训警告刘邦：“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⑬樊哙和赵高是同时代的人，他对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记忆犹新的。

赵高政变后，立刻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他改变秦始皇执行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政策^⑭，把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在赋税和徭役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企图使贫苦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秦自商鞅变法后，对公开的奴隶主反对派都是坚决镇压的，“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⑮。赵高篡权后，公然下令“更为法律”^⑯。反革命派上台，都要搞翻案，实行“大赦”。秦二世元年一月，“大赦罪人”^⑰，被秦始皇专政的罪犯纷纷跑出监狱，在咸阳街头弹冠相庆，而法家人士却遭了殃。儒家比法家杀人要厉害得多、残酷得多。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名反动儒生；赵高却千方百计“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阶级报复。继扶苏、蒙恬、蒙毅之后，秦始皇的子女二十多人先后被害，“相连坐者不可胜数”^⑱。接着，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被迫自杀，李斯也遭到被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同时，赵高对各郡县地方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赵高镇压了法家的反抗，任意“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公元前二〇七年，又杀了秦二世，并公开主张恢复六国的分封制。这个钻进秦朝内部的六国旧贵族代表，终于达到了“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⑲的罪恶阴谋。

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的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和动摇。李斯曾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来又参加制定了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政策，反对倒退，反对恢复分封制，是一个有过重要贡献的法家。但他也有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在赵高策动政变时，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以至容忍了赵高



的阴谋得逞。后来，李斯企图重新进行斗争，然而大势已去。李斯的致命伤是私心重，骨头软，他企图“委曲求全”，但向反动政变策划者讲“委曲”，是无法“求全”的。当然，李斯同赵高有本质的不同。李贽把李斯和赵高作了比较：“斯，龙也。高，蛆也。”^{②0}李斯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功大于过。而赵高则是韩非在《孤愤》篇中痛斥的那种“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是新兴地主阶级及法家的最危险敌人。从赵高的政变，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复辟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二

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教训是惨痛的。它证明秦王朝没有能够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革命农民的肩上。就在赵高发动政变，篡夺政权后九个月，陈胜领导的革命农民，在大泽乡上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宣告了赵高、胡亥反动统治的迅速灭亡。

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包括林彪及其死党，总是把陈胜、吴广起义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胡说什么“坑灰未冷山东乱”。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毫无疑问，秦王朝是要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是要把地主阶级的挥霍享受建筑在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基础上的。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无产阶级就立即开始了反抗一样，从封建制产生的第一天起，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斗争就出现了。这种阶级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在历史上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维护这个革命成果的斗争是很艰巨的。秦始皇采取的专政措施，当然有针对农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迫切的却是要解决防止奴隶制复辟的问题。特别是“焚书坑儒”，根本就不是对农民的镇压，而是对反动派的专政。那些被坑掉的儒，明明是奴隶主的代言人，也是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坑掉一批“不耕而食”的寄生虫，广大农民只会拍手称快，决不会加深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章太炎认为，“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章太炎还指出：“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②1}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对待法家尉缭的态度看，也并不象是儒家所攻击的那样不能听取正确意见。总之，把“焚书坑儒”说成



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一种违反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是反动派混淆是非的言论。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秦二世的时候，正是钻进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复辟派，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应当从阶级观点比较一下秦始皇和赵高两条不同的路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尚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在以后的石刻中，多次提到“黔首”，如二十八年的石刻中讲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②②}。三十一年下令实行“使黔首自实田”^{②③}的政策，鼓励发展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赵高掌权后，却对广大农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掠夺，造成“黔首振恐”^{②④}。应该指出，引起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赵高实行使“黔首振恐”的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

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废除了井田制，解放了奴隶的生产力，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的政策，使“秦民大说(悦)”^{②⑤}。当时“山东之民，无不西者”^{②⑥}，东方诸国的人民都想跑到秦国来。可见，人民群众是拥护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政策，“缓刑罚，薄赋敛”^{②⑦}，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贫苦农民即“闾左”，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也就是说，一般是不随便“发闾左”服役的。赵高上台后，改变了秦朝法家政策，“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②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在赋税方面，采取“头会箕敛”^{②⑨}，甚至大规模地“发闾左”充戍卒，实质上也就是使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奴隶，这是革命农民所不能容忍的。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③⑩}，大规模地征发农民服徭役，把全国各地分散的农民都集中和组织起来了。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广大农民就能很快地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给赵高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赵高的倒行逆施，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赵高在沙丘发动的



政变，“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赵高也担心“皆不服，恐为变”。随着赵高、胡亥“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④，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反对奴隶制复辟。当时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也参加了推翻秦二世统治的斗争。陈胜起义时打出扶苏的旗帜，正是为了孤立和打击赵高。但当时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赵高政变，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防止奴隶主复辟的主力。对农民来说，一旦奴隶制复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奴隶制残余保存得越多，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在思想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是束缚奴隶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桎梏。因此，农民起义的斗争锋芒必然要指向奴隶主复辟势力，指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由关东六国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也参加了革命的洪流。如东阳陈婴起义，就有“异军苍头特起”^⑤，由奴隶组成的起义军成为一支重要“异军”。陈胜牺牲后，“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⑥，继续进行英勇斗争。

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失败了。除了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从内部的破坏。随着秦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为燎原烈火，潜伏在各地的奴隶主复辟派也蠢蠢欲动，起来“造反”。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反动儒生乘机混进了农民起义队伍。如秦王朝悬赏通缉的要犯陈余就“好儒术”^⑦。他和另一被通缉的要犯张耳都与孔子后代孔鲋“相善”^⑧。陈余隐姓埋名，四出游宦，“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⑨，积极从事复辟活动。混入陈胜起义军队伍后，张耳、陈余又派人去动员孔鲋，认为“天下之事已可见矣”，时机成熟了，“子宜速来”^⑩。于是，孔鲋等鲁诸儒抱着“礼器”也混了进来。大批反动儒生混入起义队伍，必然企图改变农民起义的路线，于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

孔丘的后代孔鲋公开要陈胜“法先王”，胡说：“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摆在施政方针的首位，要陈胜“诚法之”。陈胜当场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安能纯法之乎！”我是靠自己起来造反的，同周灭商不一样，怎么能完全去学呢？把孔鲋顶了回去。陈胜对孔孟之道是采取怀疑批判态度的，他说：“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陈胜手下将领武臣，在与孔鲋辩论时，也认为



孔学未必正确，“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⑳。可见，尊儒还是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

孔鲋等反动儒生的政治目的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张耳、陈余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行动是“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他们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主张“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遭到了陈胜的抵抗。张耳、陈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骗陈胜分兵“北略赵地”。陈胜对他们是有所警惕的，派“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率领三千农民军出发。后来武臣受张耳、陈余腐蚀，自称赵王。陈胜命令武臣向咸阳进军，张耳、陈余又反对，主张“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公开从农民起义队伍中分裂出去。在张耳、陈余的蛊惑下，武臣派韩广“略燕”，在燕国旧贵族支持下，韩广也割据称王^㉑。

六国奴隶主残余和割据势力纷纷“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㉒，实行复辟，这样就牵制和分割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如田儼是齐王田氏后代，他收罗“豪吏子弟”，自立为齐王，带兵进攻陈胜手下大将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儼因率兵东略定齐地”，然后就在齐鲁一带割地称王^㉓。当时，各地起来称王的都是韩、赵、魏、楚等国的贵族后裔。汉代的刘敬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㉔六国旧贵族虽然经过秦始皇的沉重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一旦时机成熟，又死灰复燃。他们是农民革命的死敌。

陈胜、吴广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㉕。在这期间，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起义的革命大扫除，地主阶级也第一次受到农民起义的强有力的冲击。秦统一后，六国旧贵族盘根错节，在地方上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起义还显示了农民革命反封建的巨大威力，使历代封建统治者提起这次起义就胆战心惊。



三

陈胜、吴广起义后，紧接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斗争的实质是继承还是推翻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项羽和刘邦，原来都属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农民起义斗争。陈胜、吴广牺牲后，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立楚国贵族后裔为楚王。后来，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则占领了关中和秦的首都咸阳。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并封刘邦为汉王。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战争，历史上就称为“楚汉相争”。

楚汉相争，从路线上看，是一场儒法斗争。刘邦平生“不好儒”^{④④}，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④⑤}。项羽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门信徒。刘邦平时“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④⑥}。同刘邦相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仁而敬人”^{④⑦}，很讲究儒家那套虚伪的礼节，但对劳动人民却极残酷，他将秦朝放下武器的二十余万士兵当作奴隶，“奴隶使之”，最后残暴地全部杀害^{④⑧}。项羽好“礼”，儒家之徒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下来了。他任人唯亲，“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④⑨}。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也决不是偶然巧合。项羽死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按照儒家的“礼义”，标榜为项羽“死节”，但不久“乃降”^{⑤⑩}。可见，项羽依靠的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刘邦原是个亭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另一些人是劳动者，如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以屠狗为业，灌婴是小商贩。项羽和刘邦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但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阶级基础是不同的。

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项羽则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了一条儒家的反动路线，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在项羽和刘邦进入秦国的首都咸阳时，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刘邦入关后，废除了赵高的严刑苛法，对杀死赵高、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取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项羽入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官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⑤⑪}。项羽挖秦始皇坟



墓，火烧阿房宫，大肆抢掠，完全是一种发泄六国旧贵族亡国之恨的阶级报复。公元前二〇七年，项羽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一下子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章邯等三人为王，“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⑤②}。刘邦列举项羽的十大罪状，痛斥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⑤③}，项羽恼羞成怒，但无言可对。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关键是这个集团的路线比项羽正确。同时也依靠了秦始皇时留下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从军事实力上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次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券。汉朝建立后，评肖何为第一功。大臣们也认为：“肖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肖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⑤④}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失道必然寡助，项羽转战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未尝败北，但政治路线错了，军事上仍旧要失败。垓下之战，四面楚歌，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但项羽临死时还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难怪司马迁要嘲笑他：“岂不谬哉！”^{⑤⑤}

在战胜项羽后，刘邦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汉承秦制”，刘邦基本上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⑤⑥}，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但在战争过程中，仍然还遗留了一批六国贵族残余势力，并形成了一批新贵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刘邦不得不同他们作暂时的妥协，对他们的代表人物封王封侯。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卢绾等。这就酿成了汉代初年汉王朝同以异姓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楚汉相争的继续。这些异姓王，对内实行分裂割据，保护工商业奴隶主残余势力，对外向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奴隶主贵族屈膝投降。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又封了一些同姓王，为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根子。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期过去了。从刘邦、吕后，中经文



帝、景帝，到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和中央集权，标志着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巩固了下来。它离开秦王朝统一中国又经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始终非常激烈。历史证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光有一代人的努力也还不行，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我们今天要巩固社会主义江山，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和项羽的倒行逆施的教训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即使反动派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短命的，暂时的。赵高政变，不到三年，很快就垮台了。项羽倒行逆施，也只能昙花一现。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在批林批孔中加强团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

- ① 《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第三首
- ②⑨ 《史纲评要·后秦纪》
- ③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史记·李斯列传》
- ④⑲ 《秦政记》
- ⑤⑲⑳㉑㉒㉓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⑥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 ⑦⑲ 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
- ⑧⑲ 《史记·蒙恬列传》
- ⑬ 《史记·樊噲传》
- ⑮ 《商君书·赏刑》
- ⑰ 《史记·六国年表》
- ⑲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 ㉑ 《史记·商君列传》
- ㉓ 《商君书·徠民》

- ㉔㉕㉖㉗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 ㉘㉙㉚㉛ 《史记·项羽本纪》
- ㉜㉝ 《史记·陈涉世家》
- ㉞㉟㊱ 《孔丛子》
- ㊲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九》
- ㊳ 《史记·田儋列传》
- ㊴ 《史记·刘敬传》
- ㊵ 《史记·郿生陆贾列传》
- ㊶ 《史记·黥布列传》
- ㊷㊸ 《史记·陈丞相世家》
- ㊹ 《汉书·高帝纪》
- ㊺ 《史记·淮阴侯列传》
- ㊻ 《史记·高祖本纪》
- ㊼ 《史记·肖相国世家》
- ㊽ 《史记·肖相国世家》



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 群

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所作的伟大贡献，正确评价法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批判儒家的阻碍、破坏作用，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很多农作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驯化选育而成的。远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创造了先进的耕作制度——绿肥轮作制。我国有悠久而又系统的天文观测记录，战国时期就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从汉朝起就记载了新星、太阳黑子等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筑起了雄伟的万里长城，修建了至今受益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开掘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等伟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发明家、科学家。有在建筑、木工、器械各方面都有发明创造的鲁班，有设计赵州桥的石匠李春，有发明活字印刷的“布衣”毕升，有平



民天文数学家卫朴，有巧合龙门的治河工人高超，有纺织技术上的女革新家黄道婆等等。这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他们是科学技术的真正主人。

在劳动人民发展科学技术的伟大斗争中，儒法两家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

儒家代表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他们敌视革新，轻视生产，鄙视劳动人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把请学稼的樊迟斥责为“小人”。孟轲叫嚷：“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就是说，要对善于打仗的人处以极刑，对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人也处以重刑。在儒家的经典《礼记》上甚至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儒郑玄明确地注解，所谓作奇技奇器者，就是象古代鲁班这样的人。韩愈叫嚣说：“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发展生产有罪，创造发明该杀，这就是儒家的“礼教”！一方面要劳动人民供养他们这伙寄生虫，一方面又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这就是儒家的“王道”！

在儒家的反动思想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才能被扼杀，发明创造被湮没，科学技术的历史被颠倒。在儒家的历史书上，根本看不到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高超巧合龙门等记载。我国古代许多极有价值的科学典籍，由于受到儒家反动思想的鄙弃、摧残而失传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那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可是到了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东汉以后，除《内经》外，其余的都没有了。据《齐民要术》记载，秦汉时期重要的农书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多种，后来却没有一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儒家所代表的反动没落阶级的腐朽、寄生的本质，他们所推行的那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们所奉行的天命论的反动思想路线，决定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起消极的、破坏的作用。

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时是生气勃勃的革新者，他们主张革新、前进，重视耕战，因此在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秦汉之际，我国水利事业有几次大的进步，从秦代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到汉代的白渠，在工程技术上都有提高和发展。它们是我国古代水利发展史上几个光辉的里程碑。这些工程是劳动人民所



创造的，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宏伟壮观的工程都出现在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地说明了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促进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与自然作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积累了日益丰富的自然知识。这就使得法家思想家能够逐渐总结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且拿起自然科学这一武器，同儒家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

先秦法家代表荀况明确指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识到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有自己运动的规律。荀况研究了农业生产的经验，指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益，一岁而再获之”。并总结出“多粪肥田”、“桔耕伤稼”等农业科学规律。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是对孔孟之流所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东汉时期的王充，认真研究自然现象，分析了四季成因，指出：太阳离北极近，昼长夜短，就成了夏天；太阳离北极远，昼短夜长，就成了冬天。这就驳斥了董仲舒把四季说成是“上天”喜怒哀乐的谬论。王充根据实际观察推断：“雷者，火也”，批判了儒家认为打雷是天怒的胡说。唐代法家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他在《天说》《天对》等著作中，论述了宇宙是物质的，是无边无际的，是不断运动着的。北宋的革新家王安石明确指出：“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蚀、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他与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根本对立，提出“尚变者，天道也”，并认为“新故相除”是必然规律。这些法家代表都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他们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儒家反动的天命论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作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而且推动人们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这样，就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思想上开辟了道路。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法家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唯心史观的圈子。然而他们坚持革新、前进，比较重视群众的生产实践，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



想。因此，历史上进步的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总结生产斗争经验和从事科学实践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法家那里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往往同法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特征常常象恩格斯所形容的那样：“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

北魏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继承了管仲、李悝、晁错、桑弘羊等法家人物的先进思想传统，批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丘之流。他能够作到“询之老成”，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他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上升为比较系统的农业科学理论。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他一生的科学实践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他注重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贾思勰和沈括，分别写出了《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重要的科学典籍。这些著作成为记载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一块块丰碑，至今仍然发出不可磨灭的光辉。

列宁曾经指出：“难怪有人早就说过，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始终同反儒斗争联系着的，可以说，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科学成就都是冲破了儒家反动思想的束缚才取得的。

东汉时代，儒家反动思想甚嚣尘上，谶纬迷信风靡一时。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敢于冒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痛斥谶纬之说“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他努力研制浑天仪和地动仪等科学仪器，观测天象，研究地震，在科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科学活动有力地打击了谶纬迷信。

南北朝时进步的科学家祖冲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根据自己观测的结果，创造了新的历法——大明历。他打破了传统观念，改革闰法，第一次在制历中考虑了岁差，使我国历法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朝廷宠臣戴法兴之流，站在儒家立场上，墨守成规，反对改革。戴法兴胡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有错也不能改”，“月亮运动的快慢，凡人测不出来”。祖冲之一一驳斥说：“明知古历有错，却要永远照搬，那就太荒唐了”，“月亮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不是什么神仙鬼怪搞的，是



可以测量、可以推算的”。戴法兴理屈词穷，给祖冲之安上“诬天背经”的罪名，妄图以此扼杀大明历。祖冲之无所畏惧地回答说：“空洞的咒骂吓不了人”，“你有根据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几经曲折，大明历终于在公元五一〇年（祖冲之死后十年）被正式采用。

儒家仇恨一切新生事物，反对一切先进的科学思想。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传到我国后，清代腐儒阮元还固守“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的信条。他攻击哥白尼的学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历史的事实证明，儒家顽固地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总是反对从自然本身的运动去说明自然，还要给进步科学家安上“离经叛道”等莫须有的罪名。

儒家不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赤裸裸的镇压和打击，而且竭力歪曲科学成果，想方设法地把它纳入反动天命论的教义，使科学成为儒学的附庸，实际上取消科学。例如，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数学成就的《九章算术》，被说成是周公所作以教天下的。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曲阜的孔继涵叫嚷“九数之作，非圣人孰能为之哉”，宣称《九章算术》“囊括后贤胥不能度越范围焉，犹六经之临百氏也”，不许人们逾越《九章算术》一步，阻碍数学向前发展。还有人用数学注释儒家经典，竟用等比级数去解释《仪礼》中的丧服经带法等，妄图把数学引入经学的死胡同。宋儒朱熹竭力给科学灌输神秘主义。法家沈括曾考察太行山地层中的螺蚌壳和卵石带，作出了海陆变迁的科学结论；而朱熹却歪曲这一科学事实，去论证邵雍关于天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发生一次大开合的谬论，胡说那时“人物消尽，旧迹大灭”。这同西方宗教唯心主义歪曲地质学成果宣扬灾变论真是如出一辙。

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一套科举制度，是用儒家思想束缚、扼杀科学的一条绳索。他们把孔孟之道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以当官晋爵为诱饵，把读书人引上死背“经书”，专作“八股”的邪路上去。鲁迅指出：反动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结果使许多人思想凝固僵化，扼杀了多少新鲜活泼的思想创见。清代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也批评说：“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竞怀侥幸，不务实学”。



事实确是如此。我国历史上那些中状元的人，大都是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的。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敢于同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决裂，摆脱科举制禁锢，打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的人。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明代，有的人连举人都没有考取，却在科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如李时珍多年行医，长期上山采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数十年之努力，集药理学之大成，写成医药学名著《本草纲目》。徐霞客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三十多年不避寒暑，不畏艰险，游历考察十六省。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对所到之处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作了详细的科学记录，是宝贵的科学文献。他最早考察了石灰岩地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应星虽然是个举人，但他能够冲破儒家经典的桎梏，深入到工场实地进行调查，写成了总结我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他在自序中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并且清楚地说：“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这是说，世上那些有发明创造的人，是众人推动的结果。象这种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是那些陈腐反动的儒家之徒永远不能得到、也永远不敢承认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那些皓首穷经、追求仕禄的儒生根本达不到的。

综合以上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人民的推动下，法家进步、革新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则恰恰相反，它的思想政治路线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刘少奇、林彪之流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胡说什么儒家是“我国文化的来源”。长期以来，一些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学者”，也多次散布这种胡说。这是对历史严重的歪曲，必须彻底批判。研究儒法斗争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伟大真理，使我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更加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夺取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新胜利，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

陈 今

翻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尊孔思潮的泛起，都有它的国际背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在近代这个尊孔合唱团中，一个是尊孔连着崇洋卖国，一个是尊孔连着侵华反华。研究近代史上这股反动逆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崇洋卖国和苏修新沙皇尊孔反华的狰狞面目。

林彪是当代最大的尊孔派，也是最大的卖国贼。尊孔和卖国的一身而二任，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尊孔和卖国的一身二任，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特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侵略的需要，它们首先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的附庸，“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他们要维护根基脆弱的反动统治，就必然要用孔孟之道作为毒害和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需要找洋主子作后台老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尊孔与崇洋成了中国近代反动派须臾不离的东西，两者缺一不可。

在近代，曾国藩是把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相结合的鼻祖。他一面高喊孔老二是“圣之盛也”^①，一面叫嚷乞求洋大人是“第一要务”^②。怎样把尊孔和崇洋勾通呢？曾国藩叫喊“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③。他的所谓经世济用的“经济之学”，就是“通经致用”，通晓载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致封建买办“借洋兵剿贼”^④之用，即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得明白些，这个“经”和“用”，就是以孔孟之道的“中学为体”，配合坚船利炮的“西学为用”，叫做“中体西用”。一手拿着孔孟之道的软刀子，一手拿着帝国主义的洋刀子，来对



付那时高举反孔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冲锋陷阵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曾国藩则极为惊慌，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⑤；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攻打太平军，曾国藩便感激涕零地说“有德于我”^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尊孔和崇洋有着共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妙用。

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派袁世凯也是这样。他一头伸进二千多年前的孔墓，鼓吹“孔学博大”^⑦，同时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声言对帝国主义“敦睦”是外交政策“唯一之基础”^⑧。他一当上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为被革命人民冲击了的孔老二恢复名誉，要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要在全中国中小学中恢复读经。袁世凯这个大军阀提倡尊孔读经，目的是要把孔老二当作敲开复辟之门的砖头。他率领百官祭孔以后，回身就跪在洋大人脚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说明，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复辟称帝，单有孔老二作精神保镖，皇帝仍出不了场，还必须有帝国主义的实力支持。但反动派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不预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代价，也是不可能的。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出来的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三位一体，证明尊孔与媚洋是反动派搞复辟的两件法宝。

还有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蒋介石也是这样。他一面吹捧孔老二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⑨，把尊孔读经当作“为政的基本要道”^⑩；一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⑪，实际是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革命的卖国政策。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次反革命“围剿”，三次反共高潮，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发动侵犯解放区的内战，都是在四书五经的“基本要道”指导下进行的。他从北伐战争时期通过大买办虞洽卿牵线，暗中与帝国主义勾结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断送大半个中国，到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利用帝国主义的金元和大炮，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攘外安内”的产物。直到今天，在台湾省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反动派，奉行的还是这条尊孔卖国的路线。正如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的：“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用什么作为卖国、反共的精神武器呢？就是尊孔。在蒋介石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尊孔、反共与卖国的三位一体。一方面尊孔读经，一方面崇洋卖国；



既是孔老二的信徒，又是洋大人的叭儿狗。这就是中国近代反动派的典型特征。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尊孔读经必然走向投降卖国的道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完全腐朽的社会势力。不尊孔他们自身就失去了凭借，不崇洋他们就没有依傍，所以尊孔和崇洋成了他们的命根子。毛主席在揭露蒋介石等人奉行卖国政策的阶级根源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问题涉及到阶级利益的时候，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就愿意同外国主子勾搭，背叛民族，出卖祖国，这是他们制订阶级政策的规律。清末反动统治者提出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就是一小撮民族败类不惜拿“国耻”换取私利的典型语言。从曾国藩到蒋介石的一串卖国贼，哪一个不把这条卖国政策奉为金科玉律呢？

那末又为什么卖国必尊孔呢？因为孔孟之道可以作为一块粉饰卖国罪行的遮羞布。事实上，近代的反动派无不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卖国的理论根据。曾国藩搬出孔老二的“忠信笃敬”^②，从中引出了对洋主子忠顺厚道的卖国主义理论；李鸿章搬出孔家店的“礼之用，和为贵”，作了适合于卖国政策的解释，作为对帝国主义侵略避战“求和”的理论根据；袁世凯说什么“孔子喜言大同”，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同帝国主义“大同”起来，“几无国界可言”^③；蒋介石根据孔老二的“春秋大义”，制订出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汪精卫引证孔老二“去兵”的说教，鼓吹“和平可以救国”^④。明明是卖国，倒可以说成“救国”，孔学大有用矣！老卖国贼这一套卖国理论被新卖国贼林彪全盘继承下来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是赤裸裸地打出尊孔、反法、卖国的黑旗，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引用孔孟之道，作为自己妄图在苏修新沙皇的“核保护伞”下称儿皇帝的理论根据。

鲁迅早就指出，从孔孟之道里是能够直接引出投降有理、卖国有理的结论来的。他在揭露投降卖国的孔孟之徒时，说这帮家伙“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花边文学·算账》）请看：当年的“洪宪皇帝”袁世凯、独夫民贼蒋介石向帝国主义“俯首”，今天的卖国贼林彪向社会帝国主义“俯首”，不是表现出同样的政治思想特征吗？



尊孔和崇洋的一身二任，决不仅是中国反动派的单相思，它还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卖国贼尊孔，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尊孔，得到了卖国贼的拥护。一个是尊孔卖国，一个是尊孔侵华，中外反动派的里应外合是通过孔老二这具亡灵作媒牵线的。

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后，逐步找到“以华制华”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即在政治上扶植反动势力，在思想上吹捧孔老二。因此，孔老二这尊被历代权势者们吹捧起来的反革命精神偶像，在中国近代更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吹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号称“国外布道英雄”^⑮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旧学”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新学”，比作侵华战车上的两只轮子，说独轮之车固然可以行走，若改以双轮，就可既“稳”且“速”^⑯，畅行无阻了。这就是侵华需要尊孔的奥妙。因此，他们不再把孔老二看作“上帝”的外道，而尊之为可同耶稣基督媲美的天使。再往后，镇压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八国联军在致清政府的联合照会中，竟然指责中国“殊悖万国之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牾”^⑰，俨然以保卫孔孟之道自命。说起来孔孟也真走运，地位可同“万国公法”并列了。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的尊孔更甚于前。一九一二年来到中国的沙俄伯爵盖沙令，教训中国反动派说：“孔教者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只有阐发“孔教”，才不至于“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⑱。这是何等露骨地表明了孔老二可以起到遏制革命力量的灭火机作用。这个盖沙令，在离开东亚前往美国的旅途上还埋怨老牌传教士说：“没有注意到孔子的优点”^⑲。在他看来，如果充分“注意到孔子的优点”，中国不至有那样多的革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李佳白的美国传教士，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出谋献策说：“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他还宣称“孔圣于二千年前已为后世政治界立永久至善之信条”，把孔学抬到了“人类共通之原理”^⑳的吓人高度。

帝国主义侵华好汉们对孔学的妙用，随着侵华的步步深入，也越来越高超了。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宰割中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皇威廉二世竟说：“中国有中国之文化，务当保存。德国学校，应增入孔教。”^㉑说来真妙，洋“儒”主张在外国学校中“增入孔教”，袁世凯同时鼓吹在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中外反动派都唯恐孔教断了香火，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华的强盗行径时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



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个反动联盟的精神纽带，就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尊孔。一个是尊孔和卖国相结合，一个是尊孔和侵华相结合，在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外反动派联合尊孔的罪恶目的，是要使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沦为亡国奴。三十年代大资产阶级尊孔和崇洋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他们一手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宣称为“王道乐土”。在那里，大造孔庙，学校读经，祀孔有歌，“日化”和“圣化”结为一体。这种“圣化”随着“日化”扩大，正如伪晋北政府的《晋北之歌》唱的那样：“尊孔孟，睦善邻，重仁义，尚和平”，活现出了一个直接统治中国国土的外国孔子。当时有些民族败类把帝国主义这类侵华尊孔的丑戏，竟说成为“儒者之泽深且远”^②。这个“深且远”倒是说明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对两千多年后的中外反动派都很有用处。

事实正是这样。最近在世界的某些阴暗角落里，就演出了一幕幕的尊孔闹剧。其中，演得最卖力的，当数苏修新沙皇。人们不禁要问：堂堂“超级大国”的头子，为什么要拜倒在二千多年前的干瘪老头孔老二脚下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恐怕还是鲁迅早就指明了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老调子已经唱完》）苏修新沙皇一直支持刘少奇、林彪这类现代中国的孔家店门徒搞资本主义复辟，其罪恶目的还是沿着老沙皇走过的老路子，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为他们的一块殖民地！

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史的对立面的，是中外反动派尊孔侵华史和尊孔卖国史。尊孔侵华和尊孔卖国，是中外反动派的绝妙双簧！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外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反复地批判了阻碍中国革命前进的孔孟之道，批判了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历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立，配合帝国主义的尊孔侵华搞尊孔卖国，则成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一个重要特点。钻进党内最早的尊孔派陈独秀，在大肆鼓吹孔孟之道的同时，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分子打得火热，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王明对孔



老二高呼“堂堂夫子”，最后卖国改姓，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宠犬。刘少奇一手导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剧，一手炮制了“三和一少”的卖国投降外交路线。林彪更是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的典型代表。他一方面从孔孟之道中拾破烂，铸造复辟倒退的理论武器，一方面又寻求苏修作为他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靠山。林彪反党集团搞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卖国投敌的自白书。他打算象当年袁世凯拿“二十一条”换取皇冠一样，妄图借苏修新沙皇来“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这就有力证明，林彪既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又是苏修新沙皇的可靠走狗。从陈独秀到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们，都鼓吹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正好说明他们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又同外国反动派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林彪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的罪恶活动，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这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妄图借助尊孔卖国派在中国搞颠覆，是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只要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尊孔卖国派就不会绝迹。因此，尊孔崇洋与反尊孔崇洋的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地继续下去。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于外国的文化，古代的文化，我们都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态度，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崇洋，就是“全盘西化”，它抹煞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把一切都说成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好的。

当年主持洋务活动的李鸿章，就是由崇洋走向卖国的黑标本。他曾经无耻地宣称自己“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②，的确，洋务也颇行时了一阵子。媚洋能手李鸿章，不仅在政治上“联各国之好”^③，在军事上购买洋枪洋炮，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乞讨外国资本的叫化子。设备、原料、技术统统靠帝国主义洋大人“恩赐”，办工厂还得雇洋专家主持。总之，一切都“洋”化了。这个家伙最后出海从洋，一头扎进老沙皇的怀抱，成了老沙皇在中国的超级走狗。国内外的事情都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政治上也是不能自主的。苏修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向我们提供了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这个全力建立殖民大帝国的新沙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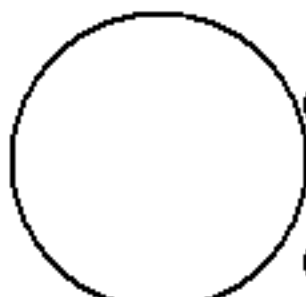
通过什么“经互会”、不等价交换、高利贷款、专家控制等等手段，死死掌握了“大家庭”成员国的经济命脉，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销售市场和附属加工厂。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不过是新沙皇进行弱肉强食，控制、掠夺、剥削“大家庭”成员国的圈套。刘少奇、林彪之流推行的洋奴哲学，实际上也是要把中国的一切都交给“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所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对洋奴哲学的有力批判，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今后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反对洋奴哲学，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看到了尊孔和复辟的联系，逐步看到了尊孔和卖国的联系。因而也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复辟必尊孔，反复辟必反孔；卖国必尊孔，爱国必反孔；侵华反共必尊孔，反帝反修必反孔。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英勇奋斗。中国人民一定会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尊孔、卖国、侵华的中外反动派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发抖吧！

注：

-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 ③ 《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问学》
-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议覆借洋兵剿贼片》
- ⑤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匪檄》
- ⑥ 《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治道》
- ⑦ 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
- ⑧ 袁世凯：《答外交团颂词》
- ⑨ 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1928年6月
- ⑩ 蒋介石：《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1936年3月13日
- ⑪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
- ⑫ 《曾文正公全集》，书牍，《覆李少荃》

- ⑬ 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
- ⑭ 汪精卫：《纪念孔子的意义》，1940年8月27日
- ⑮ 《李提摩太传》封面用语，上海广学会出版
- ⑯ 李提摩太：《新政策》
- ⑰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32页
- ⑱ 盖沙令：《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孔教会杂志》第一号
- ⑲ 盖沙令：《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英译本，一九二五年纽约版
- ⑳ 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 ㉑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记德国名汉学家卫理贤博士》
- ㉒ 转引自鲁迅《儒术》，见《且介亭杂文》
- ㉓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朋僚函稿》卷十六
- ㉔ 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卷一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

钟 达

王充是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者，是公开举起“伐孔”、“刺孟”的战斗旗帜的进步思想家。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时代。

西汉王朝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它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路线，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都是尊法的。到了西汉末期，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世家豪族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土地大量兼并和集中，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激起农民的反抗，到处举起起义的火把。地主阶级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吓破了胆，他们一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乞灵于孔孟之道，大肆提倡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孔孟儒学，主要是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作为麻痹、瓦解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从汉元帝刘奭开始，儒家思想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汉光武帝刘秀依靠世家豪族残酷镇压了绿林、赤眉起义，建立东汉政权以后，对儒学更加大力提倡，竭力宣扬被称为“图讖”的神怪预言。谁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反动迷信的东西稍有怀疑和不敬，就要被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了大规模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加以条理化，儒学的地位也提得更高。

面对这股独尊儒术的逆流，王充挺身而出，不怕讥笑，不怕迫害，写出了《论衡》一书，把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勇敢战斗精神。

在《论衡》一书中，最有光彩的篇章是《问孔》、《刺孟》。在这里，王充以孔



丘、孟轲的代表作《论语》、《孟子》为靶子，从他们的言行中找出“相违”、“相伐”的大量事实，运用形式逻辑，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孔丘不是宣扬“仁义”吗？他口口声声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却很想到佛肸和公山弗扰那里去做官。子路问他，你不是说“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吗？他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一会说是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一会又赤裸裸地宣称，我不是瓠瓜，不能挂着做样子不吃饭。王充指出，孔丘讲话没有准，办事也不会有准。他把自己比做瓠瓜，说做官是为了混饭吃，“何其鄙也”；他同公山弗扰、佛肸等坏人勾勾搭搭，又“何其浊也”。在这里，王充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看出孔丘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实际情况是，公山弗扰和佛肸，当时都是企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叛乱分子，孔丘想到他们那里去做官，乃是为了搞垮鲁国和晋国的革新势力，实现其“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的野心。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对于革新势力是恨之入骨的。涉及到政治问题，他就完全抛掉“仁义”的伪装。以宰予昼寝为例。宰予打瞌睡本来是一件小事，孔丘却摆出一副恶霸脸孔，大骂宰予是“不可雕”的“朽木”，是“粪土之墙”。王充认为，宰予犯了打瞌睡这样的“小过”，孔丘把他比做不堪造就的朽木粪土，是小题大做了，不足以服人。实际上，孔丘骂宰予是事出有因的，是因为宰予政治上同他有分歧，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张。

孔丘不是宣扬“礼”吗？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他哭得好象很伤心。可是，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口外棺的时候，孔丘却马上板起面孔，一口拒绝，说什么“大夫出门不能步行”。还对别人说：“我儿子死也没有给他买外棺。”王充指出，孔丘为了保持大夫身分，不肯卖掉车子为学生和儿子下葬，是贪恋官位，爱摆架子。他质问孔丘：你说“君子杀身以成仁”，为什么不能放弃爵位来坚持“礼”呢？在这里，王充尖锐地揭露了孔老二言行不一及其所宣扬的“礼”的虚伪性。但是，他没有从政治上看到“礼”的反动本质。事实上，孔丘的“礼”是为政治服务的，他鼓吹“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

孔丘不是宣扬“信”吗？其实他的假话是说得最多的。孔丘曾经叫嚷要跑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王充就质问他，你的政治主张在中原还行不通，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怎么能行得通呢？你不是说，那里的事情比中原更难办吗？好办的地方都行



不通，难办的地方就行得通吗？王充正确地指出：孔丘并不是真的想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而是有意撒谎。他骂别人是强嘴利舌的“佞者”，其实他自己正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佞者”，一个伪君子。说假话，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共同特点。他们为了实现其反动政治主张，总是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孟轲就曾经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恰巧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腐朽性和虚弱性。

王充是反儒斗争的战士。他虽然没有从路线上批判孔丘的反动本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这样大胆地指着孔丘鼻子，骂他又鄙、又浊、又贪、又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种尖锐的批判，一直激励着后来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孔斗争，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是深远的。

在《刺孟》篇里，王充对孔丘的继承者孟轲所宣扬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反动观点的批判，是很有光彩的。孟轲说：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王充认为，孟轲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帝喾、尧、舜、禹都是“王者”，他们是“继踵而兴”的，没有隔五百年；由周到孟轲已经过了七百年，也没有兴起“王者”。五百年是上天生“圣人”的期限吗？如果是的话，到了期限，上天为什么不准时生一个“圣王”呢？王充指出，孟轲满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政治野心，由于没有掌握到政治权力而“怀恨”，所以尽说些经不起事实考验的骗人的“浮淫之语”。王充批驳孟轲所发挥的这些思想，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作为封建社会的先进思想家，王充主张革新，反对倒退，因此他敢于向儒家的“天才论”宣战。修正主义的头子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亦步亦趋地跟在孟轲之后，叫嚷“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自己。他这种反动观点，正是王充在一千九百年以前在批判孟轲时就驳斥过了的。当然，王充还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彻底地批判这种反动的“天才论”，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王充的《论衡》，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天命论在汉代的翻版——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把天说成有目的、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把世间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和加以安排的。人如果顺应天的意志，天就降福，



否则就降祸。他还炮制了“君权神授说”，宣扬“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假借“天意”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

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吸收了汉代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形成的，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感觉、目的和意志的物质实体。“天道，自然也，无为”（《谴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安排世界的最高主宰。“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孔丘和儒家的经典动不动就讲天命，其实只是吓唬和愚弄人民罢了。这样，王充就继承和发挥了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王充还针对儒家提出的天能降祸降福以及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的观点，考察了当时所谓灾异，如日月食、地震、雷雨等，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告”。他认为，儒家编造的“谴告”是和“礼”一起搞出来的。上古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谴告”。只有“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疑时至”，即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灾异很多的情况下，才“造谴告之言”。所以他说：“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自然》）就是说，“谴告”的出现，反映了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加深。王充虽然没有揭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谴告”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阶级本质，但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它是同政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当时，这也是很高明的见解。

王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宣传无神论，反对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他提出了关于形体和精神关系的著名论断：“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他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从而否定了一切鬼神的存在，这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有力批判。他的战斗成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王充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吕才、张载、王夫之，都受过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

坚持法家主张革新、前进的观点，反对儒家“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的历史倒退论，也是王充《论衡》一书的鲜明特点。

董仲舒叫嚣“奉天而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大肆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诋毁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象朽木泥墙一样，无法修补，只



有推行孔孟之道即开历史倒车是唯一的出路。王充是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的，认为它取得了“为秦开帝业”的重大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怀有今不如昔、汉不如周的成见的俗儒，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越古越好，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在《宣汉》、《恢国》等篇中，王充高度评价刘邦打败项羽分裂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成就，对汉朝的建立和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措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秦汉之际，功奇行殊”（《齐世》），但被儒家贬低和轻视了。他从各方面把汉代和周代作了比较，指出汉代国土的开辟远远超过了周代；在生产力提高方面，周代的荒野地区到汉代已有很多开成肥沃的田地；汉代在精神文化上也比周代发达。一切都证明“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他还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发展，举出古代的人吃不上五谷，也没有衣服穿，现在却“穿地为井，耕土种谷”，“有布帛之饰”等事实（《齐世》），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他嘲笑儒家说，你们“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齐世》），对古代的东西津津乐道，但对于当代的成就却反而全不看在眼里，“知古不知今”，简直是昏昧透顶！儒家说“汉不及周”，鼓吹一代不如一代，是十足的反动的历史倒退论。王充肯定“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则坚持一代胜过一代，继承了法家的反复古主义的传统。

王充的反儒斗争，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的。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先秦以来的儒法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充反对儒家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对孔孟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主要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孔孟言行的矛盾、言论和事实的矛盾及言论本身的矛盾，没有抓住路线问题。在《非韩》篇中，王充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态度显然和对待儒家的态度不同，但是对韩非的政治主张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指责韩非只讲耕战，不讲礼义；只讲刑，不讲德，认为儒者是代表礼义的，不可缺少，不同意韩非关于儒居于“五蠹”之首的观点。这恰恰暴露了他不能从路线上分析问题。在讲到秦统一六国时，他也没有抓路线问题，只说是“秦以兵强，威无不胜”。至于秦为什么强，他就说不上来了。

为什么王充会写出《非韩》篇呢？



第一，他没有看清法家和儒家是互相对立的政治力量，没有把儒法斗争看成路线斗争。法治还是礼治，这是从先秦到西汉儒法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实质就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制。“复礼”是奴隶制复辟势力抛出来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而“明法”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制的战斗口号。韩非认为“法”是最高的原则，他说：“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韩非子·问辩》），而斥儒家的“礼”是“乱之首”（《韩非子·解老》），观点十分鲜明。王充却企图把这两个对立面调和起来，把它们说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因而指责韩非“废德”“任刑”是走偏了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王充比起韩非来，就后退了。

第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影响。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奴隶制残余势力日益走向妥协，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这时，儒家也将“礼治”改头换面，打扮成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德治”，以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他们吹嘘“德治”，说什么“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强调“德治”有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和欺骗人民的作用。这一转变对东汉前期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桓谭、王符等人都发生了影响，对王充也不例外。尽管王充曾反驳过儒家关于“德治”的吹牛，指责孔老二要人民饿着肚皮谈礼义，但是，他还是受到了“德治”的观点的影响，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历史上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礼治的争论，结果竟得出了与他自己的反儒斗争精神相矛盾的结论。

历史经验表明，儒法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儒，而不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从儒家的阶级本质上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不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的。而这正是为什么王充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儒家的战斗旗帜，但反儒不彻底的关键所在。这个彻底批判儒家思想的历史任务，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就有可能完成过去一切时代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韬晦之计和林彪的复辟阴谋

师 平

在林彪的卧室里，挂着他亲手抄录《三国演义》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死党还在黑笔记里记下林彪口授的话：“韬讳（晦）”“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林彪对这首诗和两句话奉为至宝，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妄图用韬晦之计，“随机应变”地隐蔽其反革命真象，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以实现其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大志”。

用韬晦之计进行阴谋活动，并不新奇。早在殷末周初，奴隶主贵族在《周易》中就提出了“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潜伏不动，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春秋末期，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政治骗子孔丘，为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进行反革命复辟，便苦思焦虑治《周易》，对“潜龙勿用”一类思想作了精心的解释和发挥。他在《易·系辞》里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他以尺蠖爬行和龙蛇冬眠作比喻，告诉奴隶主贵族对屈伸之术要研究得“精义入神”，以便“致用”，达到复辟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目的。此后，儒家之徒不仅互相传习孔丘的屈伸之术，而且在诗文中将其概括为“韬光”或者“韬晦”，竭力加以宣扬和美化。东汉三国时，孔丘的第二十代孙、豪门大族孔融在一首诗里说：“蛇龙之蛰，俾也可忘。玫瑰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离合群姓名字诗》）他在这里自比龙蛇和美玉，妄图把踪迹隐藏起来，把光芒收敛起来，以便进行阴谋活动。西晋时，出身孙吴大士族的陆机，从小“服膺儒术，非礼不动”，吴亡后一度退居旧里，闭门观时，在文章中也以“韬迹匿光”为标榜。宋朝反动道学家朱熹，对孔丘关于“以屈求伸”的几句话，作了详细注解，说什么“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公然把阴谋家的骗术提到了“理”的高度。他还总结历代反动统治经验，用“遵养时晦”（隐居待时）规劝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时机不到的时候，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然后才能一举而“天下大定”。（《诗集传》）朱熹去官以后，退居建阳山中，号称“晦翁”，著书授徒，仍不忘以屈求伸。林彪这个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把历代



反动儒家的这一套屈伸之术继承下来，以韬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充分表明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出关〉的“关”》）以屈求伸，以柔进取，从来是野心家、阴谋家惯用的卑劣伎俩。在历史上，每当革命势盛，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要乞灵于韬晦之计，进行垂死挣扎。在秦王朝建立封建制度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不甘心失败的奴隶主阶级，就曾经使用孔丘的屈伸之术，向新兴力量作拚死的斗争。奴隶主贵族公子虔反对商鞅变法受到惩罚，就八年“杜门不出”，等待时机。秦孝公一死，他立即联合抬了头的复辟势力，残酷地杀害了杰出的法家商鞅和他的全家。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秦国叛将樊于期，怀着“切齿腐心”的仇恨逃到燕国，和麇集在那里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进行阴谋活动，最后割下自己的头颅，让政治流氓荆轲持往秦国，妄图借机刺杀秦始皇。秦朝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原六国没落贵族纷纷“以屈求伸”。孔丘的后代孔鲋隐匿不出。楚将项燕之后项梁“避仇于吴中”。魏国“名士”张耳、陈余被秦通缉，逃到陈地，自称不因“小辱而欲死”，等到陈胜起义后，他们就趁机四出奔走，策划“立六国后”，妄图复辟。在近代，每一次革命高潮来临，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更是力行此道。他们或隐匿不出以“遵养时晦”，或混进革命队伍里投机钻营，无不千方百计地保存自身，积蓄力量，窥测方向，选择时机，以便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置革命于死地。林彪就是接过历史上这些反动派所惯用的手法，向党 and 人民猖狂进攻的。

自古以来的反动派把实行韬晦之计作为一种策略，这是由他们既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而又无力进行公开对抗，这样一种极其反动而又十分虚弱的本质所决定的。林彪所以欣赏《三国演义》里的那首诗，因为他的心是与之相通的。他用这首诗道出了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极端虚弱。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巩固。党政军民坚强团结。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在这种形势下，林彪既要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又怕露出狐狸尾巴，所以他把“忍耐”作为所谓“大度的科学根据”。他时时提醒自己及其死党，要注意“忍耐”，做到“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不要因为“区区小事”，耽误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终身大事”。即使他们反革命的野心已经按捺不住了，也还要借助“韬晦”，不能“说破”。可见，他们是何等的心虚胆怯！

“韬晦”和“忍耐”，都只能是暂时的，最后总要暴露。因为，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虽然说的是什么“忍耐”，其实内心是急不可待。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能和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仇恨，注定了他们一定要自



已跳出来。建国以来，每隔那么几年，总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跌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他们互相来往的密信里，有许多处讲到“忍辱”之术，什么“忍辱负重”、“保存力量”，什么不能“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不能有一点不必要的伤亡”，讲究“忍耐”可谓周密。然而曾几何时，他们自认为时机已到，就声言要“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隐藏在党内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也是按照这个规律，一个个跳出来向党进攻，又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同样，仇恨党、仇恨革命、仇恨人民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林彪反党集团，又怎么能长期“忍耐”呢？他们利令智昏，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仅仅一年的时间，就猖狂地连续发动了两次反革命政变，使自己失败得更惨重，更彻底。这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屈伸之术还没有研究得“精义入神”，而是他们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韬晦之计，实际上也只能是一条失败之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对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的总结，同时也从本质上指出了无产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公开申明，我们党是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事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从来主张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历史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兴的革命阶级，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就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在政治上主张光明磊落，反对阴谋诡诈。他对儒家骗术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指出：“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天论》）

锄了毒草，可以化为肥料。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了，但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那就是它又一次丰富了我们同反革命两面派作斗争的经验，并且留下了一批足以使我们提高革命警惕的反面材料。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研究和批判这些材料，好好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可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沈 思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与之相适应，他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就是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把它当作标榜林彪这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的一根精神支柱，吹得神乎其神，借以招摇撞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批林批孔运动朝着深入、普及、持久方向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彻底批判林彪所谓的“战术原则”，戳穿它的画皮，揭露它的实质，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炮制出笼的。从它出笼的历史背景看，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谈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时，曾经正确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



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在这事关前进还是倒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指出了我们党已经有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全党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了，解放区扩大了，军队发展了，面前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困难不可克服。毛主席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出发，作出了“我必胜蒋必败”的英明论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号召全党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自卫战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主席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要求我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对于东北地区，毛主席全局在胸，高瞻远瞩，于一九四五年秋天，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广泛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同年年底，又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不仅对东北解放战争关系极大，对全国局势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和一系列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军民粉碎蒋介石进攻的信心，指引着我们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全国形势和东北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证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

与毛主席对形势的科学分析相反，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看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为敌人暂时和表面的强大吓破了胆。他害怕战争，幻想和平，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公开宣称“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妄图断送革命，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奉送给蒋介石，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林彪在政治上实行投降主义，决定了他在军事上必然搞右倾保守主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军队开始向东北发动进攻，本应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歼灭。林彪却避而不打，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时机。随后，他又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主力部队放在交通干线，一味与敌人拚消耗，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其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当国民



党不断增兵，大举进攻东北的时候，他又实行逃跑主义。综观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林彪极力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时而搞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打“硬拼仗”、“莽撞仗”；时而搞军事保守主义，不敢斗争，不敢胜利。林彪所谓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炮制出来的。这是他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要害是反对打歼灭战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同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相对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要害是反对打歼灭战，鼓吹打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歼灭战，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消耗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毛主席历来提倡歼灭战，反对打击溃战，反对**“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在人民战争基础上，**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少胜多，转弱为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分不开的。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违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和歼灭战思想背道而驰。早在“一点两面战术”出笼时，毛主席、中央军委就发电询问林彪“一点两面”战法是什么意思？他诡辩说：“‘一点’是打垮敌人，‘两面’是把打垮的敌人消灭”。林彪在这里尽管用了“打垮”、“消灭”的字眼，却掩盖不住他那“一点”把敌人赶跑、“两面”把敌人放走的击溃战本质。毛主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而林彪的“一点两



面”，与毛主席的指示截然相反，抛开战役、战斗总体上我对敌兵力对比要占绝对优势的原则，只搞自己同自己的“点”与“面”的兵力对比，把“九分之八”的力量放在“点”上，把“九分之一”的力量放在“面”上；只在两面部署兵力，反对四面包围，胡说什么采取四面包围会“逼迫敌人作困兽之斗”。按照这样的部署，“点”上貌似集中兵力，实际上头尖尾巴长，使我军在狭窄地段孤军进入，大部分兵力有劲使不上；而在面上由于兵力薄弱，形不成四面包围，又不能断敌退路，敌人想溜掉就可以溜掉。按照这种打法，即使有可能在“点”上把敌人打垮，也不能在“面”上把敌人消灭。“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抽掉了集中兵力、四面包围，也就取消了歼灭战。林彪侈谈“一点两面”是什么“歼灭的战术”，完全是谎言。

毛主席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运动战是转换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是我军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形式。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敌人转入守势，我军转入战略进攻，还需要以阵地战配合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夺取敌占城市。所以，毛主席所讲的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为了打歼灭战。而林彪却用“阵地战”之名，行反对打歼灭战之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军事冒险主义碰壁之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军事保守主义。林彪正是这样干的。不该打阵地战，他“蛮干”、“硬拚”，需要打时他又不肯打。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多次电令林彪迅速攻克锦州，“关门打狗”，他却迟迟不动。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既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的运动战，也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的阵地战，归根结底是反对打歼灭战。

局部服从全局，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保证。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林彪在“六个战术原则”中，公然鼓吹分散主义，说什么“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这样，就把搞好准备与把握战机对立起来，把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机断行事对立起来，把局部与全局对立起来。林彪在“慢”字背后，包藏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统一指挥的祸心。在辽沈战役中，林彪就制造种种所谓没有准备好的“理由”，迟迟不将主力南下北宁线。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去电催问，他一会儿强调“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一会儿借口“全军皆无雨具”不能行动。实际上，林彪强调“准备”是假，消极避战是



真。“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有准备以有胜利把握为前提，任何战役战斗都必须有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的把握就愈大。但是，作战行动不能光看局部的准备情况，而必须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有时全局已经准备好了，为了全局的胜利，局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好，也要克服困难投入战斗。如果以“准备”为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必然造成使本来分散孤立之敌变为集中强大之敌，使运动之敌变为驻止之敌，使立足未稳之敌变为坚守防御之敌，以致最后造成好打之敌变为不好打之敌，使有把握的歼灭战，变为击溃战、消耗战。可见，“四快一慢”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根本错误的。

打歼灭战，还是打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历来是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在作战指导原则上的根本分歧。我们以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武器，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就能击中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要害，把它批深批透。

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认识论根源也正在这里。

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客观实践中产生的，还是凭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这是两种认识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是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离开了战争的实践，就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毛主席是我军的缔造者、指挥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科学地总结了我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法。它来自战争实践，又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完全正确的。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国内外敌人的战斗历程充分说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法去打仗，就无往而不胜。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在抗日战争中，他直接参加作战只有半年。解放战争初期来到东北不到一个月，既不搞调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又不考虑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对部队的作战经验也置若罔闻。仅仅打了一次小规模阻击战，他就炮制出所谓的“一点两面”、“三三制”；



在一次失利的城市攻坚战中，又炮制出所谓的“四快一慢”。林彪不打自招地供认，他的“战术原则”，是今天“想”一个，明天“想”一个，靠他那“特别灵的脑袋”想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因而，必然经不起战争实践的检验。事实也就是这样。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凡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而打的仗，就取得胜利；凡是受林彪“六个战术原则”干扰而打的仗，就使战果受到影响，部队受到损失。

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无论办什么事情，只有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对事物取得规律性的认识。指挥打仗也不例外。离开战争实践，只靠关起门来冥思苦想，是决然发现不了战争奥妙的。我们强调正确作战指导原则对作战实践的依赖性，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要更好地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指挥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同客观相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才能指挥军队多打胜仗，少打败仗。林彪明明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狂热鼓吹者，却恬不知耻地吹嘘他的所谓“战术原则”是“东北作战的根本经验”，他的死党也胡诌什么是“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集中的结果”。革命导师列宁在揭露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时指出：“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林彪一伙正是在“经验”这个字眼下，玩弄鱼目混珠的诡计，妄图把他们那套主观臆造的唯心主义黑货，伪装成为唯物主义的东西抛出来害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战争本身是生动的、发展的、变化的。作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牢牢把握战争胜利的主动权。林彪的一套所谓“战术原则”，完全违背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他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战争，用死数字“编串子”，把这种黑货当成固定不变的“模式”，千古不变的教条。其实，打起仗来，两军对战，情况千变万化，打法多种多样，怎能机械地规定为“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呢？应当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我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去采用适宜的战斗队形和战斗编组，还要不断总结广大指战员在实战中创造的各种经验，怎能刻板地固定为“三三制”、“四组一队”呢？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一个“模式”去硬套，只



能是“限制”自己，有利敌人。林彪搞的这套“数字”游戏，是道道地地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对军事辩证法的否定。

我们承认作战指导原则是可变的，并不否认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本身的相对固定性。“**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就会犯错误。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战场，确实给未来战争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必须看到，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其性质仍然是人民战争，所以，反映人民战争规律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包括十大军事原则，仍然是必须坚决遵循的。只要我们结合新的情况，贯彻这些原则，就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林彪正象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那样，为了欺骗群众，玩弄了种种诡辩的手法。他一会儿说要搞“一点两面”，一会儿又说可以“一点多面”；一会儿说“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一会儿又说“打仗就是要服从命令，不管思想通不通，命令一来就得执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应当从林彪所玩弄的模棱两可的诡辩手法中，看到他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机械论的本质，看到他炮制的所谓“战术原则”，是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特征的，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为篡党夺权造舆论

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早在战争年代就遭到部队的抵制。他曾气急败坏地责备广大指战员对他那一套“视若无睹，听若无闻”。后来所以喧嚣一时，流毒甚广，是林彪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大肆鼓吹、积极兜售的结果。他们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林彪是混进我们党内的反革命两面派。当他窃取权力不久，就赤膊上阵，胡说什么“打仗的问题很多，一定要抓住主要的”，“一点两面”、“三三制”这几项没搞好，“别的东西搞的再多也不起作用”。这是林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无耻吹嘘自己的丑恶表演。其险恶用心，就是妄想把他自己装扮成“天才军事家”，为他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提供根据，进而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林彪及其死党，是一批信奉孔老二“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正名”论者。为了“名正言顺”地篡夺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塞进林彪的私货。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修改条令、条例会上，林彪死党露骨地提出：符合林彪“指示”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删掉，体现不充分的要充实提高。经过修改后的条令、条例，几乎成了“六个战术原则”的注释。林彪大加赞扬地说：这些条令、条例“全部都好”。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妄想实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狼子野心。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加紧进行其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与此相适应，林彪反党集团吹捧“六个战术原则”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加速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政治上坚持设国家主席，理论上鼓吹“天才论”，组织上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军事上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出笼的大毒草《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竭力吹捧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蓄意篡改历史，把毛主席、党中央英明指挥所取得的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颠倒成了林彪“战术原则”的功劳。真是不识人间还有羞耻事！与此同时，林彪反党集团还把林彪过去有关讲述“六个战术原则”的黑文章，编印成黑书，大量出版。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林彪反党集团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一个劲地加印这本黑书，广为散发，并无耻吹嘘说：“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军事学”。毛主席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林彪反党集团也是这样的蠢人。他们著书立说吹捧和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原想大树特树林彪，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服务，谁知弄巧成拙，这些黑文黑书成了我们今天清算林彪篡党夺权罪行的有力证据。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深入地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他的“六个战术原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党支部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对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批判，使大家更加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增强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动政治路线的同时，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前一阶段，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我们连许多干部战士就曾联系林彪破坏我军建设的罪行，揭露和批判他搞复辟倒退的反动实质。这使我们认识到，为了深入批林批孔，必须进一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在各个领域，军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样是以反动的孔孟之道为其重要思想根源的。对它进行深入的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为了使干部战士认清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重要意义，我们组织大家研究了儒法斗争史，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孔老二在政治上要“克己复礼”，在军事上就提出“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主张军队必须为“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著名的法家商鞅，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在军事上就主张“缘法而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在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同时，也相应地推行一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都十分重视彻底清算他们的反动军事路线。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一定的军事路线都是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为其服务的。伴随着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的斗争，也必然有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因此，批判反动的政治路线，同时必须相应地批判其军事路线，清算它在军事上的影响。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极力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利用窃取的权力，拼命地在全军、全国兜售他的黑货。我军广大指战员是坚定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林彪篡军夺权的阴谋终于成了泡影。但是，他的那一套货色，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战士们说：“不彻底清算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不能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好地贯彻落实。”

毛主席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抓住它的实质，联系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对他的种种谬论进行由现象到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样，才能使批判击中要害，在路线上分清是非。例如，在批判林彪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罪行时，我们就引导干部战士把它同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秘密组织反革命“舰队”等阴谋活动联系起来，使大家看清了林彪的反革命用心，就是妄图夺取无产阶级的兵权，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又例如，在批判林彪推行的所谓“四好”、“五好”时，我们就引导大家联系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弄清“好”与“不好”，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林彪一方面讲什么“政治思想好”，一方面却反对部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反对对部队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要人们做复辟倒退的顽固派董仲舒。可见他的“政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所谓“思想”也是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按照他的反革命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军队。这样，把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剖析其实质，大家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正如战士们说的：“打靶要瞄准靶心，打蛇要打中七寸。联系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剖析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实质，就打得准，批得深。”

长期以来，林彪肆意篡改历史，极力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了弄清林彪的军事路线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引导大家联系我军两条路线斗争史，批判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动言论和行动。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受到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积



极追随王明路线，宣扬“短促突击”，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集中兵力和打运动战的正确方针。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并在重大的战略行动上，对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调度和指挥。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一九四〇年，他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地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大家把林彪的种种罪行同当时王明、刘少奇的言行加以对照，就清楚地看到，林彪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是站在机会主义路线一边，都是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干部战士们以历史的铁证，深刻地揭露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

我们还组织大家对我军战史上的典型战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更加看清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性。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我军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抓住决战时机，毅然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主席正确地首先选定了辽沈战役为决战方向，科学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南下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把东北敌人就地歼灭。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又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入关，实行对华北敌人的包围和分割，粉碎敌人逃窜的企图，进行就地歼灭。毛主席关于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然而，林彪以唯心主义估量形势，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看不到决战时机已经成熟，根本没有敢打必胜和打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在辽沈战役中，他顽固地反对毛主席关于东北我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在平津战役中，他拖延入关时间，不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毛主席粉碎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才取得了辽沈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通过分析和批判，大家深刻认识到，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胜利。林彪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反对进行战略决战，实际上就是要给国民党反动派苟延残喘，重整旗鼓，向人民反扑提供机会，阻止和反对革命人民去夺取胜利。

我们在斗争实践中还体会到，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林彪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往往采用以假乱真的手法，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以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剥掉他的伪装，分清路线是非，就要依靠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同时，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内容庞杂，浸透了孔孟之道，充满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理解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才能抓住要害，批深批透。因此，我们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注意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为了批判林彪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对抗毛主席军事路线的罪行，就学习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光辉著作。为了批判林彪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罪行，就选学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论述。这样，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在批判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时，我们选学了马列关于军事问题的论述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批判了所谓“六个战术原则”的反动实质。大家认识到，战术原则是军队作战行动的指导原则，是在一定的战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光辉结晶，它系统地指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其精神实质，就是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打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歼灭战。相反，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则是主张平分兵力，打击溃战和那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他的那一套，违反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作战规律，无视我军在几十年革命战争中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凭主观臆想炮制出来的。大家在批判中认清了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的反动实质，分清了路线是非，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连队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促进了军事训练。

通过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推动了连队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还是初步的，决心继续努力，把它批深批透，使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批林批孔 促进战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六连党支部

我们连队驻守在伟大祖国北部的边疆地区，担负着光荣而繁重的战备任务。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党支部始终抓住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紧密结合战备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及其叛国投修的罪行。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连队的建设有了进一步加强。同志们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决心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站好岗，放好哨，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

我们连队联系战备实际，深入批林批孔，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教育干部战士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牢记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牢固地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一提起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把剥削和压迫的枷锁重新套在劳动人民身上，干部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在开展群众性革命大批判中，我们挑选了七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干部战士，组织巡回批判组，深入到各个哨所、执勤点，用地主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事实，揭露和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有一位副连长，一家四口人被吃人的旧社会夺走了三口，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遭受残酷压迫致死，哥哥也被抓壮丁进了虎口，母亲带着他逃荒要饭，连病带饿悲惨地死去。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解放了他的家乡，才使这个孤儿见到阳光。听了这一桩桩血泪控诉，干部战士愤怒地说：林彪要“复礼”，就是搞复辟，想把我们重新推进火坑，这万万办不到。

在忆苦的基础上，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把对“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批判进一步引向深入。同志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剖析林彪“复礼”的实质，



弄清了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就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维护和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一样，但都是代表着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都是为了开历史倒车，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大家重新学习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联系历史上每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伴随着出现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必须牢记我军的根本职能，紧握枪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坚决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

通过深入批判“克己复礼”，极大地增强了干部战士保工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感。干部热爱自己的战斗岗位，他们说：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万事中的“大事”，我们要把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毕生大事，象守卫珍宝岛的英雄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安心部队工作，和新战士并肩战斗在边疆。今年有四名战士复员，行前晚上还要求党支部让他们在祖国边疆站最后一班岗。这都反映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通过批林批孔的斗争，觉悟空前提高，斗志更加昂扬。

批判林彪卖国投修的罪行，进一步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时刻警惕它们可能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

林彪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无耻地宣称要“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在反革命政变阴谋破产以后，又仓皇逃命，投奔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同志们对林彪这种出卖祖国、投靠苏修的可耻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连同志一致认识到，林彪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是早已被中国人民打倒的反动势力。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党里，林彪及其死党只是一小撮，是极端孤立、极其虚弱的。他们要变天，总是要千方百计同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一个战士说：林彪要“借苏力量”，这正说明他所代表的国内反动阶级力量薄弱；林彪要“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这正说明广大革命人民力量强大。但是，苏修也是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林彪妄想借苏修的“核保护伞”使自己爬上“儿皇帝”的宝座，只能是白日做梦。

为了使全连对国内外阶级敌人互相勾结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我们还组织大家学习了一些儒法斗争史。大家看到，历代儒法两家对待



外敌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筹集国防经费以抗匈奴，儒家则攻击为“废道德”，要废除中央经营盐铁的大权，从经济上摧毁汉朝的抗战能力。近代史上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个个尊孔读经，个个投降卖国。历来的儒家都是顽固的复辟倒退势力的代表，他们往往要同外敌相勾结，以维护其阶级利益。而民族敌人又总是看准这一点，把他们作为侵略扩张的先遣队。七班的同志在研究《盐铁论》时，把贤良、文学们鼓吹的“贵以德而贱用兵”的谬论，同林彪攻击反修斗争的谬论相比较，把贤良、文学鼓吹对匈奴赔款和亲的行为，同林彪阴谋与苏修“秘密谈判”、把中国置于苏修“核保护伞”下的罪行相对照，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尊孔反法罪恶目的之一，就是妄图为他叛国投修制造根据。从这里大家进一步认清，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我国社会上阶级敌人的活动，党内机会主义头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批判中，我们还组织全连认真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从苏修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来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大家列举了苏修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继承老沙皇衣钵，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的大量事实，指出：苏修叛徒集团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看作眼中钉，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卖国投修，正是适应了苏修反华的需要。林彪的下场，也充分说明了一切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行动，都是决不可能得逞的。

深入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坚定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中庸之道”是孔老二为了挽救奴隶制的崩溃，妄图阻挡奴隶造反而抛出的反动哲学，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用以麻痹革命人民，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为了使干部战士深刻认识“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三方面对“中庸之道”进行了剖析：从哲学思想上看，所谓“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是违背“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从政治上看，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是为“复礼”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从实践上看，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完全是骗人，孔丘对奴隶起义和革新派人士的镇压是非常残酷的。三排的同志在批判中说：“中庸之道”否定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否定了人类社会在斗争中前进这一客观规律，是十足的欺人之道，复辟之道，杀人之道。我们革命战士决不能上当，一



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搞折中主义，在原则问题上不搞调和，永远站在阶级斗争和反修斗争的最前列。

弄清了“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我们又组织大家深入批判林彪贩卖“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和罪行。干部战士气愤地说：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宣扬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就是要用“中庸之道”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调和阶级矛盾，麻痹革命人民，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动舆论。大家结合反修斗争的实际，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林彪用反动的“中庸之道”攻击反修斗争的罪行。大家说：林彪攻击我们同苏修的斗争“做绝了”，充分暴露了林彪是新沙皇的“超级间谍”。我们同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林彪妄图利用“中庸之道”，阻挡我们党领导的反修斗争的洪流，是绝对办不到的。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使干部战士进一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观点，更加坚定了将反修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极大地焕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我们党支部注意引导干部战士用这种革命精神加强连队建设，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不仅在精神上做好充分准备，也在物质上、军事技术上积极做好准备。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同志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更加自觉地苦练杀敌本领，利用巡逻、执勤等机会，开展小群练兵活动。到目前为止，每个干部战士对全连配备的多种武器，都能掌握和使用。干部战士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我们连队驻地条件比较艰苦，严冬冰天雪地，寒风透骨；盛夏炎热潮湿，蚊虫繁多。但战士们一想到为伟大祖国站岗放哨的责任，再苦心也甜，在紧张的战备工作中，人人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克服了各种困难。他们以阵地为家，在哨所周围种植树木，在密林深处开辟小块菜地。身在哨所，关心连队；离开哨所，惦记连队。有个战士在千里之外的医院治病，还多次给连队写信，关心连队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战备，充分表现了对边疆的深厚感情。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反修战备教育的最好课堂。我们全连同志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深入批林批孔，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铁打江山。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多年以来，我们连队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日日夜夜、百倍警惕地坚守在祖国海防线上，每个干部、战士都以忠实履行南海哨兵的职责，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干部、战士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警惕性更高，斗志更旺盛。今年一月，我们连队参加了西沙自卫反击战，在兄弟部队和民兵、渔民的有力配合下，迅速登上甘泉岛，全歼了岛上的西贡侵略军，胜利地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集体荣立二等功。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也是我军执行保卫祖国光荣任务，做好战备工作的纲。我们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得深，常备不懈的思想根子就扎得牢。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并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才能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懂得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有自己的军队，人民军队为什么要牢固树立战斗队的思想，才能不断提高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搞好战备，时刻准备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打仗。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林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从思想上解除我军武装，削弱我军战斗力，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因此，在部队的战备教育和战备工作中，是坚持还是反对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一直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我们结合连队实际反复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使干部、战士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根本职能，牢固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有一段时间，连队临时执行生产任务，有的同志随着任务的转换，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对战备工作有些放松。我们就引导大家联系国内外阶级斗争



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又一次反复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对照批判林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谬论,从阶级根源上去认识战争,用阶级斗争观点去看待战备问题。大家进一步懂得,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只要帝、修、反存在,我军就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连队的具体任务变了,但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不能变。有的战士说得好:“革命战士不论执行什么具体任务,心中时刻牢记我军的根本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性。”党的基本路线擦亮了同志们的眼睛,大家绷紧了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在执行生产任务的时候不忘战备,抓紧生产间隙,苦练杀敌本领,夺得了生产、战备双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观察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剖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本质的锐利思想武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颠覆活动,口头上却念着“和平经”,散布什么“持久和平”、“一代人的和平”等骗人鬼话。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我们发动全连同志学习毛主席有关国际形势的论述,分析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努力学会从本质上去观察问题。大家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活动的事实,看清楚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的结果就不断挑起战争。苏修搞“声东击西”,两个超级大国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天天喊“和平”,实际上天天准备发动战争。总之,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就不会有一天安宁,决没有什么“缓和”可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拚命散布这种谎言,只是为了掩盖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进行的剧烈争夺。通过学习和分析,大家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规律,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所惯用的手段,认清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然性,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认清丧失警惕的危险性。进而认识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是决不会停止的。因此,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加强,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同志们说:尽管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在不断改弦换调,但它们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它们越是耍花招,大念“和平经”,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大家对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指示也就理解得更深刻,执行得更自觉。在每个同志的头脑里,都牢



牢树立了“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的常备不懈思想，随时准备消灭敢于入侵的敌人。今年一月十八日，我们连队的战士正分散在几个点上执勤和训练，接到上级战斗命令后，紧急集合号一响，全连干部、战士于极短的时间内齐装满员，待命出发。在较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中，很多同志不顾晕船呕吐，身体疲劳，斗志极为旺盛。当战斗发起后，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冒着炮火，跳下舢板，冲向滩头，迅速全歼了甘泉岛上的西贡侵略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措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人民军队首先要依靠高度的政治觉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掌握熟练的军事技术。这样，才能有效地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提高我军军事艺术，对军事训练问题，有过一系列光辉指示。在井冈山的艰苦、频繁的战斗岁月里，我军在不可能集中时间进行休整训练的情况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军事整顿和政治整顿看成同样重要，学好本领上前线。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解放以后，我军又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多次重要指示，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提高保卫祖国的本领。回顾我军几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搞好军事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林彪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我军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我们以毛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为武器，结合斗争实际，深入批判林彪的反动谬论，分析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部队建设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苦练杀敌本领的自觉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从实战需要出发，加强军事训练。海南气候炎热，为了提高在酷热条件下的行军作战能力，我们全连在三伏天练习全副武装急行军，战士们戴着防毒面具在烈日下练跑步，顶风冒雨练习对海上目标射击，在各种复杂地形上练习战术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连队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西沙自卫反击战中，同志们施展了平时学到的杀敌本领，枪打得准，弹投得远，机动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勇猛、隐蔽地向敌人冲杀。共产党员、



黎族战士吕亚仁，当发现十几米外的草丛里藏着一群西贡伪军，其中有两个家伙把枪口对准他时，临危不惧，熟练地端着机枪，几个箭步冲到敌人面前，用刚学会的越南语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敌人被吕亚仁的大无畏精神和熟练的军事技术吓懵了。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十三名西贡伪军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吕亚仁同志为保卫祖国荣立了一等功。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一向有能文能武的优良传统。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红色江山，既要百倍警惕拿枪的敌人捣乱，也要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风云，积极参加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向不拿枪的敌人冲击，打退修正主义的进攻。只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胜仗，才能尽到保卫祖国的光荣职责。

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投入批林批孔的战斗。当时有的同志对这场伟大的斗争理解不深，对战备具体工作抓得紧，对批林批孔过问少。我们及时组织全连同志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讲述了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事实。从而使大家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打好批林批孔这一仗，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它对于每个革命战士都是十分严肃的战斗任务。同志们说：我们能打武仗，也能打文仗，批林批孔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身在西沙前线，心想国家大事，以战斗的姿态，积极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去。无论是在阵地上，还是在帐篷里，同志们一面紧握钢枪，一面口诛笔伐林彪、孔老二，始终保持十分高涨的革命情绪。

批林批孔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工农兵要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把林彪和孔孟之道的黑货批深批透，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连同志在担负繁重的战备任务情况下，发扬“钉子”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有些战士文化水平低，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们说：不怕文化低，就怕不学习，不怕有困难，就怕不努力。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拿出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劲头来坚持学习和批判。岛上气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蚊虫乱飞。战士们不顾满身汗水和蚊虫咬，在马灯下读书到深



夜。有的战士为写一篇批判稿，查资料，问别人，反复钻研，直到写成方休。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回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同志们认识到，林彪搞“克己复礼”，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开历史的倒车。其阴谋如果得逞，劳动人民就要受二茬罪。革命大批判激发了干部、战士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自觉性。同志们说：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总是要搞“克己复礼”，党内也会出修正主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一定会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作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还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引导大家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认真阅读历史书籍和报刊上有关介绍儒法斗争的文章与资料，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志们认识到，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整个历史时代，儒法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分严酷、激烈的。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始皇、商鞅、李斯等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推动了社会前进。儒家的代表人物孔丘、孟轲、董仲舒之流，则从腐朽没落的阶级利益出发，极力反对革新，大搞复辟活动，妄图阻挡历史前进。大家从法家代表人物少正卯、吴起、商鞅等被杀的严酷事实中，深深地懂得，历史上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搞不好，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复辟。同时，弄清了为什么从古到今，一切没落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机会主义头子，都要尊孔反法，而新的阶级力量、革命人民和主张社会变革的代表人物，则坚持反孔尊法。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后的斗争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持久不懈地进行斗争。

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全连同志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继续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努力作战，政治上垒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军事上筑起防御帝、修、反侵略的铜墙铁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立新功。



发扬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四十七年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指引下，形成了许许多多优良的革命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继承和发扬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就能使我军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官兵一致，是毛主席为我们军队制定的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我们军队所以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连是一九三〇年创建的一个红军连队。几十年来，我们遵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官兵一致的原则，干部和战士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各个革命时期都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连的干部、战士批判了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了林彪破坏我军官兵关系的罪行，提高了干部、战士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使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促进了连队的建设。

我们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结合、而战斗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军队的每一个指挥员，每一个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兵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他们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之分。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官兵关系，完全是由我们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干部和战士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亲密团结，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回顾我军以至我们连在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生活非常艰苦，经常缺乏粮食和油盐，冬天还穿不上棉衣，但是由于官兵政治上、生活上平等，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大家的革命斗志却很旺盛，这对于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深深感到，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



是我们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和其它一切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提高我们军队战斗力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干部和战士之间必须互相尊重，特别是干部一定要尊重战士。这是处理好官兵关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干部更加牢固地树立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从而进一步解决了尊重战士这个根本态度问题。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向战士学习。例如，我们连炊事班有个战士，文化程度低，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够知难而进，认真攻读，刻苦钻研，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写了四十多篇批判文章，对全连批林批孔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我们连队的干部就带头向他学习。在军事训练中，很多战士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有的还有所创造，成绩突出，我们就请他们介绍经验，虚心向他们请教。就是对后进的战士，我们也教育干部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他们的积极性，学习他们的长处。这样，干部同战士在思想上、行动上就真正打成了一片。

毛主席指出：“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愿不能支持。”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指明了方向。我们从连队的历史和当前的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到，实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发扬军内民主，是搞好官兵关系的重要保证。我军内部一向有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就是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民主制度。贯彻执行这些制度，无论在战时和平时，对增强我军内部团结，实行官兵一致，发挥干部和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部队战斗力，都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破坏我军的团结和统一，破坏官兵关系，也总是极力破坏我军的民主制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组织全连干部和战士对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清算了林彪一伙破坏我军民主生活的罪行，使干部、战士进一步认识到，林彪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



图在军队实行法西斯统治，使军队成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大家认清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从而提高了坚持我军民主制度、发扬官兵一致优良传统的自觉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制订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制度。例如，党支部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实行“开门整党”，作为一项制度，列入党的生活；加强了革命军人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每年总结工作时，要充分发动群众提意见；在军事训练中，开展评教评学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进一步活跃了连队的民主生活，密切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连队进一步做到集中统一，使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得到更好的贯彻，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

部队内部发扬民主，关键在于干部要有民主作风，要能够认真听取战士的意见，诚恳接受战士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战士给干部提意见，正是爱护干部的表现。只要干部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虚心听取战士的意见，战士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自己的话都讲出来。今年二月，有三位班长一起给党支部提意见，指出党支部对军事训练抓得不够紧。党支部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吸收这三位班长参加支委会，共同研究加强军事训练的问题，还决定连干部分工深入各排，加强对军事训练的组织领导，使连队军事训练更好地开展起来。战士们感动地说：“干部这样重视我们的意见，我们要更好地关心连队建设。”批林批孔运动中，战士的积极性很高，他们抱着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连里干部和连队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正确的意见，能立即改正的就立即改正。一时没有条件做到的，就做些解释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做到。对于少数不正确、甚至错误的意见，我们一方面教育干部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坚持做好对战士的思想工作，讲清意见错在哪里，怎样认识才对，使战士们也受到了教育。这样，就进一步增强了干部和战士之间的团结，对改进连队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干部和战士之间发生一些矛盾，这是正常现象，是不奇怪的。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就能消除隔阂，使官兵之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真正的团结。这个方法要求我们，要深入细致地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战士之间发生矛盾，一般说来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属



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如果采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往往是压而不服，反而会使矛盾激化。干部、战士的思想是会变化的，但是得有个变化的条件和过程。急于求成，不去做艰苦的、耐心的工作，当有一些矛盾一时得不到解决时，就产生急躁情绪，甚至简单粗暴，这就不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林彪胡说什么领导工作“不求做得细，做得精，就求做得快”，解决思想问题要“雷厉风行”，其实质是妄图取消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军阀主义。通过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注意了在“深入”、“细致”上下功夫。坚持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就及时做工作，不使小矛盾形成大疙瘩；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对一些较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坚持反复、耐心的做工作。这样，我们在解决干部和战士之间的矛盾方面，就感到主动得多了，效果也好得多了。有一位排长，因管理教育方法简单生硬，和排里一个战士发生了矛盾。开始，这个排长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危害性，认为自己动机是好的，就是方法不对关系也不大。后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认识，多次找那个战士谈心，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这个战士深受感动，也主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从此，两个人互相帮助，增强了革命友谊。

我们提倡做思想工作要耐心说服，反对简单粗暴，并不是说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放任不管，而是要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如果对战士的缺点错误不提出批评，不帮助纠正，这是对革命不负责，对战士不关心。我们连党支部经常引导干部、战士认清耐心说服和严格要求的关系，干部都能怀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大胆管理，对战士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批评教育，做到耐心说服和严格要求相结合。实践证明，我们的战士是有觉悟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对于干部的正确批评都是会热情欢迎，对自己的缺点也是能自觉改正的。只要干部对战士的管理严得合理，严得可行，不仅不会影响团结，而且会使干部、战士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深入批判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深入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让我军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不断发扬光大，使连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胜利前进。



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找油找气

中国共产党大港油田委员会

为了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们这支石油勘探队伍，一九六四年从大庆挥师南下，来到大港地区找油找气。

这里是一个断陷盆地^①，在勘探中遇到了我们未曾经历过的非常复杂的地质情况，以及油气运移聚集的许多特殊规律。如何认识断陷盆地找油找气的特点，为祖国找到更多的油气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十年来，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继承和发扬大庆的光荣传统，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断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逐步摸索出一些断陷盆地油气运移聚集的规律，为祖国找到了新的油气田。油田面积不断扩大，原油产量逐年大幅度增长，找油找气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实践证明：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指导石油勘探工作的锐利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抓住主要矛盾，沿着主断层找高产区

勘探开始时，为了尽快地找到油气田，我们着眼整个盆地，在各个不同的构造部位上，打了五排深探井，进行了整体解剖。经过一年的努力，有一口井喜喷了原油。接着，我们在这口井所在的储油构造上，布置了一批探井，想把含油面



积一下子搞清楚，一举拿下这个油田。然而，钻探的初步结果表明，地下的地质情况十分复杂。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断层^②，把地层切割得支离破碎。在钻井过程中，常常因钻遇断层而断缺了含油层，而且出现了油层忽有忽无、忽厚忽薄、忽油忽水，原油忽稠忽稀，产量忽高忽低的“五忽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同志思想上产生了“怕”字，见到断层躲着走，钻遇断层就发愁。有的甚至认为：这里地质情况复杂多变，“不仅象一个打碎的瓷盘子，而且又踢了一脚”，无规可循，没法认识，把复杂的断裂地带视为勘探的“禁区”。

究竟复杂的断裂带是有规可循还是无规可循？是可以认识还是没法认识？这是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毛主席指出：“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实践论》）这就告诉我们，一切客观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都是可以逐步认识的。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确实象个打碎了的瓷盘子，比较复杂，但不存在被什么神秘的力量“踢了一脚”。所谓“踢了一脚”的说法，既否定了油气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也否定了人们认识它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尚未探索的新领域，绝没有永远不可认识的“禁区”，关键问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只要认识路线搞正确了，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对于复杂的地质情况，就可以由不知转变为知、由知之不多转变为知之较多，在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中，逐步获得自由，取得勘探工作的主动权。有的同志说得好：“断层复杂不可怕，就怕缺少唯物辩证法。”

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决心通过实践掌握断陷盆地油气富集高产的规律。我们选择了一个断层比较多的复杂地带作为突破口，反复地做地震细测工作，增加一些必要的探井，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这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油气的分布和断层有密切的关系，油田出现“五忽”现象，主要是断层造成的。因此，要掌握断陷盆地油气分布的规律，认识油田出现的“五忽”现象，就必须认识断层的特性，以及对油气运移聚集的作用。

但是，断层有大有小，不同的断层对油气分布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断层对油气的运移聚集起主导作用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过程



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我们决心在实践中抓住主要矛盾，求得问题的解决。

在某一个构造带的勘探过程中^③，第一口井打在靠近主断层具有圈闭条件的高部位^④，获得了高产，接着在附近打了两口井，也出了油；后来由主断层两侧向外扩张打井，结果是离主断层越远，产量越低。这虽然只是一种现象，但“现象是本质的显现”，（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透过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油气分布是和主断层息息相关的。我们回过头来对另一个地区已打过的探井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的高产井都分布在靠近主断层的两侧，再一次说明，主断层是影响油气运移聚集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个认识是否正确，不能凭主观上的感觉而定，而要依据客观上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于是我们在又一个构造带的主断层两侧的圈闭内布了一批井，靠着主断层打，结果打出的井百分之六十是高产油气井。实践证实了主断层控制着油气的运移与聚集，是形成油气富集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能找到高产。

原来，主断层多分布在构造带的脊部或其一侧，由于主断层的多次活动，在主断层一侧或两侧形成储油层厚，储集油气的圈闭类型多，又是相对的高部位，使得地下分散的油气在主断层两侧或一侧富集起来。这样，我们只要在主断层一侧或两侧圈闭好的地方打井，就可以获得高产。

事实说明，断层的作用也有两重性，它既有造成油田复杂的一面，又有形成油气富集的一面。根据主断层控制油气运移聚集的规律，我们采取沿着主断层找圈闭、打高点、夺高产的办法，找到了一批高产区、高产块，打出了一批高产井，使多年不敢勘探的“禁区”变成了高产区，似乎神秘莫测的“五忽”现象也开始被我们所掌握，大大推动了勘探工作的进展。

运用矛盾转化规律，在秃顶构造上找到油

勘探石油，一般要寻找具有生油层、储集层、盖油层等组合条件的圈闭构造。



在我们探区，广泛分布着缺失生油层的秃顶构造。应该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勘探对象？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在勘探初期的“战略侦察”阶段，我们曾在一个秃顶构造上打过两口井，但没有发现油气显示，再加上它本身缺失生油层，因此，我们就没有把秃顶构造作为一个重要的勘探对象。

然而，实践总是不断地提出许多新问题，启发人们的思考。在某构造对深部原生油藏的钻探过程中^⑤，发现深部的原生油藏已遭到破坏，而在上部缺乏生油条件的浅层，却发现了油气藏。浅层不具备生油条件，为什么会含油呢？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原来是深部原生油藏的油气经过开启断层运移到浅层圈闭，从而形成了浅层次生油气藏^⑥。这个新的发现，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既然在断陷盆地，由于断层的作用没有生油条件的浅层可以由不含油转化为含油，那么，与此类似的秃顶构造是否也可能出现这种转化呢？这个问题一提出，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首先集中在我们曾经勘探过的某秃顶构造上。有的同志认为，秃顶构造和已找到的浅层次生油藏的情况不同，它缺失生油层，深部没有原生油藏，过去又在它上边打过两口干井，因此它不可能含油。但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根据已经获得的经验教训，认为应该立足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矛盾论》）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这个秃顶构造虽然缺失了生油层，深部没有原生油藏，但它是一个长期发育的隆起，周围被生油凹陷所环抱，离油源较近；而且后期断层比较发育，有的直接延伸到周围的生油凹陷，这就使得油气有可能沿断层等通道向秃顶构造运移聚集，在浅层形成次生油气藏，由原来的不含油转变为含油。因此，在它上面找油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于是我们决定第二次上秃顶构造找油。

上去以后，由于我们对秃顶构造含油的特点缺乏认识，第一口井落空了。这时，有些人又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灰心，坐下来冷静地分析了原因。发现这口井和过去两口井一样，都打在次生油藏形成不利的地方。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又重新安排了井位，终于打出了油。接着，我们在其他一些秃顶构造上，也相继发现了油田，大大扩展了在断陷盆地找油找气的领域。现在，秃



顶构造上的油田占我区油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而且一般油气层埋藏浅,钻井周期短,见效快,这对多快好省地发展石油工业有着重要意义。

实践说明,在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中,秃顶构造不含油并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只看到秃顶构造缺失生油层,而看不到周围生油凹陷的油气,可以通过断层等通道向它运移聚集;只看到一两口井没有打出油来,而看不到其他地方具有含油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世界上的事物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我们应该从发展、联系和转化上把握事物,而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只有尊重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才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局部经验上升到一般,认识储油岩类的多样性

我们这个地区的油田,不仅从含油层系上看是深浅不一的,就储油岩类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是断陷盆地油气储集分布与其他类型的盆地不同的又一个特点。

由于我们过去主要是在砂岩储油层中找到油气,多年与砂岩打交道,慢慢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了“只知找砂岩”的框框。来到这个探区以后,也是搞单打一,“找到砂岩喜心头,找不到砂岩皱眉头”。这种“只知找砂岩”的经验主义,象一堵墙一样把我们的主观和客观隔离开来,使我们认识不到这个地区储油岩类的多样性,特别是对生物灰岩这个有利的储油层的认识,走了一段弯路。

在勘探过程中,我们接连在几口探井中发现了生物灰岩,由于“只知找砂岩”的框框的束缚,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又在一口井中发现了生物灰岩,而且见到油气显示,却又根据油质重,把它看成是氧化破坏作用的产物,含油价值不大,没有下套管试油。直到在某井取出了含油饱满的生物灰岩岩心,才下套管试油,结果获得了高产油气流,喷高达几十米,开始破了我们头脑中“只知找砂岩”的框框,认识到生物灰岩在我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储油岩类。

然而,人们对一个新事物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经验主义的屏障也不是一下就能搬掉的,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的发展过程。认识了生物灰岩是一个重要的储油岩类,但是生物灰岩的储油性能怎样呢?当时还不十分清楚。接着,在钻井过程中遇到许多薄层含油生物灰岩,有



些同志仍然套用以往薄层砂岩一般出油不多的框框，没有试油。后来在某井钻探中，全井只找到两个一米厚的薄层含油生物灰岩，要不要试油？争论很激烈。有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生物灰岩和砂岩性质不同的特点，主张试油，结果获得了大量的油气流。实践证明，生物灰岩储油层连通性好，经过酸化处理后，油气产量成倍增加，是一个重要的勘探对象。

生物灰岩储油层的发现，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找砂岩的局部经验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列宁指出：“**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实践中，我们有了找砂岩储油层的经验，这是可贵的，其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各种储油岩类的一般性能提供了感性知识。然而，找砂岩的经验又是有限性的，还必须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什么岩类能够储油，不在于它是砂岩还是生物灰岩，也不在于是沉积岩还是火成岩，而在于它们有无储存油气的孔隙和裂缝。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同时又有油源和油气聚集保存的其他条件，任何岩类都可以储油。断陷盆地由于断裂的多次活动，使得盆地出现多凸多凹，形成多个沉积凹陷，各凹陷沉积环境不同，物源不一，因而能够发育多种不同类型的储油岩类。如果“只知找砂岩”，把找砂岩储油层的经验绝对化，那就不用个别代替了一般，堵塞了我们对断陷盆地储油岩类多样性的认识，使我们不能积极发现新事物，认真研究新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由于我们对断陷盆地储油岩类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克服了“只知找砂岩”的经验主义，这就使我们比较自觉地去寻找各种不同的储油岩类，深入研究尚未认识的领域，很快就在白云质灰岩、泥灰岩、具有裂缝的泥岩以及玄武岩中找到了油气，使我区储油岩类由两种扩大到六种，打开了向多种储油岩类找油找气的广阔道路。一些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搞勘探，只知找砂岩，回头看一看，丢了一大片，不克服经验主义，真是有油也找不到啊！”

着眼全体看部分，实现块块油田连片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我们先后拿下了几个油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已有的几个油田，都是一块一块的油田，分布在地下统一的构造带的几个高点上，彼此间被低洼部位即鞍部所隔开。有的同志根据背斜构造油田的理论^①，认为



现有的油田，油水界面已经探明，油水界面以下的低部位是水，不可能含油，所以，我们的油田已经定型，要想再扩大、连片没有希望了。究竟现有的几个块块油田能不能再扩大、连片？这需要我们在继续实践中加以研究解决。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现有的油田从总体上进行分析，发现我们找到的几个油田的储量，与根据各种方法预算的储量相差很大，这说明地下还有很多油气没有为我们所掌握，油田定型的说法，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事物的全体与部分是对立的统一，全体总是由部分组成的，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立足于全体去认识部分，才能对各断块油田能否连片做出正确的判断。

经过对几年来所掌握的地质情况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各断块油田具有连片的可能性。从局部看，各断块彼此间差异很大，似乎是互不相干的；但从全体上看，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都分布在一个被生油凹陷所环抱、油源十分丰富的统一构造带上，有着共同的发育历史和形成油气藏的条件。因此，各断块都存在着含油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块块油田能够连片组成大油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在把几个油田隔开的各个低洼的鞍部找到新的油气层，发现新的油田。一个断块油田的勘探结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这个油田探边过程中，发现原来的含油层已经不含油了，但在它的油水界面以下，却找到了新的含油层。接着，我们在几个油田之间的鞍部和倾没部位布井，也相继找到了新的含油层，而且有的地方还找到了原来的含油层，终于使彼此分隔的块块油田，扩大连片组成为大油田。为什么低洼的鞍部也有油气藏呢？这是因为断裂的多次活动，使得油气多次运移聚集，开启性断层具有通道作用，往往使油气搬家到上覆地层，封闭性断层总是把油气遮挡在原来的地方，从而形成多套含油层系，多种油藏类型，各套油层的分布，在有的部位呈“楼房式”，有的部位则象屋顶上的“叠瓦”，等等，高部位和低部位都有油气层，投影在地面上表现为一个连片成带的大油田。

事实告诉我们，断陷盆地连片成带的大油田，既具有一般大油田共有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以一个大面积的被生油凹陷所环抱或面临生油凹陷的统一构造带为基础的，这是普遍性；但它是一个由不同的油气层系、不同的油藏类型、不同的油水界面的断块油田连片组成的。在同一断块内，由于有统一



的油气层和统一的油水界面，油水界面以上是油气，以下是水是肯定的，但不同断块之间，含油气的层位和油水界面各不相同。因此，不能套用背斜构造油田的框框，判定高部位是油气，低部位是水，这是它的特殊性。只有掌握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才能对断陷盆地的油田连片，作出正确的判断。只看到特殊性，忽视普遍性，不着眼全体看部分，就会否定断块油田连片的可能性；只看到普遍性，忽视特殊性，不了解组成全体的各个断块的具体特性，也不能取得断块油田如何连片的正确认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制定了着眼整个构造带，立足于多层系找油找气，从多种油气藏类型入手，整体部署，整体解剖的勘探原则，大大加快了油田的勘探步伐，使我们的勘探工作，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恩格斯指出：“**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反杜林论》）总结十年来的勘探历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在石油勘探中，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还是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是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进行石油勘探工作的大问题。油气在地层内部的运动十分复杂，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有着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沿着正确的认识路线，唯物而又辩证地对待它们，才能分清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全体，什么是局部，正确地把握油气运动的规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加快油田勘探的步伐。我们决心在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大鼓干劲，多找油气，为迅速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而努力。

注：

- | | |
|---|---|
| <p>① 断陷盆地：由于断裂活动，使地壳下陷而形成的沉积盆地。</p> <p>② 断层：岩层受力发生破裂后，沿破裂面发生显著位移和错开的地质现象。</p> <p>③⑦ 构造带、背斜构造：由于地壳运动，使岩层形成“馒头状”的隆起叫背斜构造。由许多背斜构造组成的条带状隆起叫构造</p> | <p>带。</p> <p>④ 圈闭：在储油层中能够聚集和保存油气的天然“容器”。</p> <p>⑤ 原生油藏：油气直接从生油层中运移到储油层，聚集起来形成的油藏。</p> <p>⑥ 次生油藏：原生油藏的油气遭到破坏，第二次运移聚集形成的油藏。</p> |
|---|---|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订草案)

(一九七三年九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六月修订)

编者说明：本刊转载上海市嘉定县新泾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可供各地农村干部、群众阅读、参考。这种规划的用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个大队的群众反映：有规划和没有规划大不一样。有一个鼓舞人心而又切合实际的远景规划，就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就有利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就能激发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积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制订出来的规划，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新泾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为着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制订了这个七年规划。

解放以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生产节节高，生活年年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提出的“千斤粮，百斤棉”，“河里蓬蓬蓬（抽水机），田里冒烟囱（拖拉机）”等奋斗目标，现在已经变成现实。我们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提高。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把新泾大队建成一个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作出这个一九七四——一九八〇年发展农业的七年规划，加上每一年的实施计划，可以使大家明确奋斗目标，知道七年中间要干些什么？干到啥样子？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上一步时要为下一步准备些什么？干劲往哪里使？力量该怎样组织？使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各项指标。

毛主席指出：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我们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决心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大队一级的作用，领导和帮助各生产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干部要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年年都要实行开门整风，做到干部群众鱼水亲，社员当家作主人。特别要使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遇到大风大浪脚跟稳，遇到妖风毒雾不迷航，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二、争取粮、棉、油产量达到“二、二、三”。即到一九八〇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三百七十斤增加百分之四十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七十四万斤（平均每人超过一千斤）；皮棉平均亩产达到二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二斤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油菜籽平均亩产达到三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九十八斤增加二倍以上。

三、发展以猪为首的多种经营。到一九八〇年，大队、生产队、社员的生猪饲养量达到四千五百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卖给国家肉猪二千三百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全大队七个水塘变鱼塘，养鱼八千尾。利用畜牧场空地，种果树二千株，葡萄一千五百株。培育蚌珍珠四十斤。种植蘑菇二万平方尺。积极发展养鸡养鸭。一九八〇年副业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变新泾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乡，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



四、实现“四旁”绿化。从一九七四年起，每年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种树三千株和一批杞柳。一九八〇年，实现“村前宅后种香樟，白榆水杉栽路旁，杞柳种在沟边上，条条大路树成行”。

五、建造高产稳产田。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有计划地改造河道，调整水渠，完成新泾、陆泾、横泾、长浜等十一条河浜的填没、疏通、截弯、接通等项水利工程，总共挖（填）土方二十万方。开新河，填老河，增加耕地面积三十亩。

将现有灌溉渠道改成暗渠，埋设地下干渠、支渠一万七千米，其中“平战两用渠”五百米，每个生产队有五十米左右。将现有两个灌区调整为三个灌区，增设一只机口，田间开好垅沟、腰沟、围沟、大明沟四级排水沟。做到沟渠配套，排灌分开，自立门户，互不干扰。

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将全大队一千八百多块大小不等的田块，因地制宜，分别建成面积为二亩、二亩四、二亩五三种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一千三百多块（到今春已建成四百多块）。并逐步调整插花田，平整高亢地，以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

七、增积自然肥料。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养猪积肥，种好绿肥，常年沤肥，建立一个机动船队，到上海市区装运杂肥。增加有机质肥料使用量，改良土壤，达到每亩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质肥料。

八、大队建立种子基地，生产队建立种子田，培育良种。种子以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为主，以调进为辅，重点搞好粮食三熟制高产品种配套，并力争在四、五年内，培育出一两个稳产高产的早稻品种；同时，还要搞好其他品种的稻种提纯复壮，逐步实现良种化。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力争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和控制水稻的螟虫和纹枯病，三麦的粘虫和赤霉病，棉花的红蜘蛛、红铃虫和立枯病等病虫害。大队坚持多点测报，生产队落实“二查二定”防治措施（查病虫发育进度，定防治时间；查病虫发生量，定防治田块）。在一九七四年内做到每五十亩田有一盏高压电网杀虫灯，逐步做到队队建立农药专仓，确保治早、治小、治了，稳、准、狠地消灭病虫害，做到农业产量增上去，用药成本降下来。

十、大队建立“科学种田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一组（科学种田小组）四员（种子员、植保员、栽培员、管水员）”。大队和生产队都要种好试验田，摸索增产规律。定期向社员上农业技术课。组织青年社员学种田，练好农业生产基本功，逐



步扩大土生土长的农业技术队伍。

十一、进一步提高机械化程度，重点解决拔秧、插秧、收割、耘稻“四弯腰”。到一九八〇年，十一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十样机：小型拖拉机、小挂机、拔秧机、插秧机、收割机、耘稻机、开沟机、中耕机、喷雾机、脱粒清扬机等。做到既减轻社员劳动强度，加快生产进度，又做到“季节质量有保证，精耕细作产量增”。

十二、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新筑一条二千六百米长的农机干道贯穿南北，十五条农机通道横贯东西，大小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路上跑农机，路下埋灌渠，便利交通，节省土地。

十三、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在今后七年内，进一步办好队办工厂，增加积累，促进农田基本建设。除现有的镜片加工厂、农机修理组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外，争取再办一个小工厂，承担为大工业服务的零配件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组织多余劳动力办好大队副业。到一九八〇年，大队一级经济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三年的二万元提高到十五万元。

十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员收入。到一九八〇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每人一百七十六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

十五、逐年增加粮食储备。到一九八〇年，全大队确保储备粮食一百二十万斤，足够全体社员吃一年半。经常向社员进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教育，提倡家家户户储备粮食。

十六、办好大队商业。到一九七五年，在大队所在地——新村，开设一个综合性的代销店，进一步办好现有的“五匠组”（泥、竹、木、理发、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十七、逐步改造旧宅基，建立新村庄。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社员家庭住房。

十八、普及中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过去，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一部分贫下中农受不到教育。我们大队目前还有成年文盲一百九十五个。以政治夜校为阵地，采取一教一，一帮一，平时不放松，冬季集中抓的办法，到一九七六年，全部扫除青壮年社员中的文盲。今后新农民普遍达到中学文化水平。

十九、除害灭病，提高社员健康水平。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良好习惯，队队达到“卫生村”水平。普及卫生知识，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家家饮用井水，全大队三百七十四户，平均二户半有一口井。户户粪便入池，全大队三十七只化粪池，都要



提高发酵沉卵水平。坚持反复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加强粪水管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血防成果，不断降低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二十、进一步搞好合作医疗，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的队伍。充分发挥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作用，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勤俭办合作医疗。队队建立卫生室，大队办好卫生所，设立简易病床，逐步减少收费标准，扩大报销范围。到一九八〇年，每人每年交纳合作医疗基金从现在的二元减到一元，报销金额从现在的三十元扩大到六十元。

二十一、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队队办好农忙托儿所，分片办好幼儿园，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假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二、活跃社员业余文体生活。到一九八〇年，逐步实现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文化室，一架电视机，一个篮球场（利用仓库场地）；大队有业余文艺队、体育队、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在内）。

二十三、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一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继续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今后的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千分之十左右。

二十四、培养贫下中农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一九八〇年，每个生产队形成一支五至十人左右不脱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四旧”。

二十五、加强大队民兵连建设。根据“劳武结合”的原则，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集体经济，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胆敢入侵之敌。

二十六、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全年不少于一百二十天。生产队干部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二十七、对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春节前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以利再战。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学大寨 讲路线

——湖北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的调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大队跨了四大步，粮食生产连续四年超《纲要》，总产每年递增四十多万斤。一九七三年亩产达到一千五百多斤，总产比一九六九年将近翻了一番。多种经营也有较大发展，棉花、生猪也连续三年超《纲要》。对国家的贡献、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一九七三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零三万斤，集体储备粮三十二万斤，公共积累五十五万元，社员每人平均纯收入一百一十五元。这个大队的变化又一次生动地说明，学大寨必须讲路线，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方向明，干劲大，继续革命永向前。

以前，这个大队也讲学大寨，但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领导班子内部思想不统一，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有坚决斗争，对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坚决批判，因而方向不明，决心不大，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能迅速开展。一九七〇年，《人民日报》在《农业学大寨》的社论中提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八一大队党支部深受震动。他们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社论和有关文件，揭矛盾，找差距，分析学大寨没有学好的原因。一学一找，触动不小。比大寨，比昔阳，差就差在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不抓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纲，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群众，不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就不可能使农业生产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学大寨的运动就不能迅速展开。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大队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结合实际，揭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大队干部、社员广泛开展三忆三比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比新社会的甜；忆单干时的苦，比走集体化道路的甜；忆受修正主义路线的苦，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进一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贫下中农说：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胜利线、幸福线；回头路走不得，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胡同。干部、群众纷纷投入革命大批判的战斗中去，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一小撮破坏农业学大寨、妄图变天复辟的阶级敌人，批评走回头路的资本主义倾向，激发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年冬季，八一大队兴修了一座蓄水十二万方的水库，扩大水田面积三百多亩。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连续两年粮食总产递增五十多万斤。大家说：“路线对了，人心顺了，步调一致了，学大寨就上路了。”

学大寨讲路线，要认真总结“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一九七二年，八一大队双季稻面积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亩。这年，遇上百日大旱，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天大旱，人大干，全大队十三个生产队有十二个增了产，可是有一个生产队减了产。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开始有人认为是这个生产队插秧季节没抢住、生产技术不过硬。可是后来一查，发现有一个劳改释放犯在自然灾害面前散布“天命论”，鼓吹减产定局，煽动搞副业捞钱，胡说什么，见钱不抓是傻瓜。在敌人煽动下，队上有八部板车在“双抢”大忙季节，轮流外出拉车赚钱，结果误了季节，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个事实说明，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前进、要革命，阶级敌人可不死心，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各个领域向我们进攻，搞破坏，妄图开倒车。这种斗争也会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人民内部也会有思想斗争。比如，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听得进；有人看见敌人破坏生产却认为是技术问题而不过问；有人看不见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有人有懦夫懒汉思想，在自然灾害面前听天由命等等。这些情况，不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解决是不行的。要大干社会主义，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就会走上邪路。

有的人一讲生产，就忘了路线，忘了阶级斗争，一提起治岗改田、改革耕作



制度，就只见到劳力、工具、土石方进度、面积、季节等等，而不注意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教育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这是不对的。八一大队党支部的同志说得好：“搞生产，要大干；大干，就得靠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他们还坚持把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到生产过程，**细致、具体地去做**，经常组织群众在田边地头反复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在革命大批判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形势，辨别风向，分析问题，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就能团结战斗，步伐一致，胜利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一九七二年冬到一九七三年春，八一大队党支部又带领群众改土造田二百七十九亩，修水平梯田二百多亩，开挖排灌渠道二十二条，长七千多米、共完成十多万个土石方。一九七三年，这个大队双季稻扩大到一千八百六十亩，有五个生产队早稻一季上了《纲要》，一九七二年减产的那个生产队，早稻一季过了千斤。社员们说：党的基本路线指引我们大干大增产，大灾也增产。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八一大队在连续四年获得农业丰收的一九七三年，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快学大寨步伐时，有的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说什么这几年批也批了，斗也斗了，人也变了，田也改了，路线教育再抓成了老一套，主张抓几项关键性的技术措施。

斗争赢得了胜利，胜利后要不要继续革命，成为八一大队党支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新课题。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伟大教导，引导干部、群众回顾八一大队在学大寨过程中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和阶级敌人散布的“天命论”斗，和因循守旧、懦夫懒汉思想斗，改天换地赢得四年四大步的战斗历程，从中吸取经验。大家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经常讲，反复讲，好象是老一套，实际上，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不断发展的，每个斗争回合都有新的内容，只要我们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每经过一次实践，对党的基本路线都会有进一步的理解，每经过一次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就会更提高一步。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积极投入战斗，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大家联系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又揭发出八一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孔孟之道毒害青年，破坏农业学大寨，妄图复辟变天的新的罪行，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林彪及其代表的反动阶级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叫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吃二遍苦。我们反复辟，反倒退，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一直斗到共产主义。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为了把批林批孔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大队党支部领导干部、群众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理论联系实际，又掀起了一个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的热潮。他们以政治夜校为阵地，把批林批孔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还举办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展览，办小评论专栏，用土广播、黑板报等宣传阵地，使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经常化、具体化，引导干部、群众遇事划路线，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比如：“是前进还是倒退？”“是为集体还是为私有？”“对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反对？”“是反潮流还是和为贵？”等等，发动干部和群众反复讨论，在学习时结合批判、在批判时坚持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

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发展，八一大队农业学大寨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全大队二千九百六十九亩耕地有百分之八十实现了旱涝保收，双季稻面积从一九六九年的一百一十多亩发展到二千多亩，三分之一的面积实行了三熟制。今年，夏收作物和早稻的产量比去年都有增加，中稻和棉花比过去任何一年长势都好。更可喜的是，全大队出现了一个对修正主义路线有人斗、对资本主义邪气有人顶、对错误倾向有人批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随县委员会宣传部调查组



路线搞对头 生产争上游

——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的调查报告

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使车站的干部和工人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运输生产取得很大成绩。一九七三年提前十一天超额完成全年运输生产任务，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货物发送吨增长一点七倍，装车数提高一点五倍，卸车数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货车平均停留时间压缩了百分之十，日平均待卸车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三点六，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搞好铁路运输和搞好其他各项革命工作一样，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头，工作吃苦头；路线搞对头，生产争上游”，这是桂林北站的干部和工人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体会。铁路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怎样才能当好先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逐步提高、不断加深的。

桂林北站是湘桂线上的一个区段站，担负着二十个县、两个市的物资转运任务，同时还负责向二十多个车站排送空车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到达这个站的物资急剧增长，卸车工作量不断增加，是一个卸大于装的车站。根据这个站的特点，本来更应该贯彻“一卸、二排、三装”的运输原则，抓住卸车这个主要环节，才能取得运输生产的主动权。但是，有一段时间，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的干部认为“装是硬指标，卸是软任务”，重装轻卸，主次倒置，造成待卸的货车积压，货场堵塞，事故多，效率低，“先行官”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这个站曾经多次采取了停装、限装和突击卸车、搬运“大会战”等办法，希望缓和一下矛盾。但是，这些做法，都没有解决问题，货场堵塞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事实证明，要搞好铁路运输生产，必须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对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从路线上解决问题，正确的运输原则就不能得到落实。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桂林



北站通过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揭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铁路运输上的表现和影响，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使车站的经营方向得到端正，于是被动很快地变成了主动，落后变成了先进。

几年来，桂林北站在解决运量大于运能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路内路外一盘棋，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贯彻“一卸、二排、三装”的运输原则，大挖运输潜力，努力当好先行，初步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指标挂帅”，正确处理站内运转、货运、装卸各车间的关系。“一卸、二排、三装”的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整体利益和铁路运输生产高度集中统一、作业连续性的要求。卸、排、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卸车是为了装车；卸好车，才能把空车排出去，保证重点物资的运输。坚持这个原则，才能更好地完成运输任务，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保证国防建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执行这个原则，要求各部门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和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各车间围绕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大目标，拧成一股绳。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去单纯地考虑指标、搞“指标挂帅”，就会助长本位主义，妨碍各车间的团结。比如运转车间担负着运输组织的任务，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运老大”思想，就会片面地认为安全、正点重要，少装卸几车关系不大，该取送的车不及时取送，使装卸车间不能均衡作业，造成人为窝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站的运转车间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谬论，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识到运转车间如果不同货运、装卸车间密切协作，认真执行“一卸、二排、三装”的原则，车卸不下，空车排不出，货装不上，不仅行车安全、正点没有可靠的保证，而且会影响整个运输的全局。于是他们主动提出“为革命，我们宁可千辛万苦，决不使装卸、货运一时为难”的口号，处处抢困难，让方便。除了在取送车作业做到均衡、及时、对准装卸货物位置之外，还在交班之前必定送一批作业车到装卸货物位置上，保证装卸人员一接班就有活干。工人把这叫作“必保活”。装卸、货运车间的工人称赞这种“必保活”，体现了群众的愿望和革命的利益，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提高了运输效率。这个站今年上半年向邻局、邻站排送空车的计划兑现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去年同期比较，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二。这说明要执行“一卸、二排、三装”的原则，不是光靠哪个车间的努力可以办到的，需要车站各个车间的密切配



合才能奏效；也不是简单地规定一些协作的制度就行得通的，而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解决问题。

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努力做好长短途运输衔接工作，加速货位周转。卸车首先要有卸货的位置。货位充裕，才能随到随卸。但是货位究竟是有限的，而货物到站则是源源不断的。要使有限的货位适应源源不断到站的货物卸车的需要，就要把已经卸下的货物迅速搬运出站，腾出货位，加速货位的周转。由于货运量大增，地方短途搬运力一时跟不上，车站卸下的货物往往不能及时搬运出站，货位周转不灵，造成卸车困难。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使桂林北站的干部和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提高。他们认识到，长途运输和短途搬运，是一个统一的运输整体，短途搬运要保证长途运输，长途运输要为短途搬运创造条件，使长短途运输密切衔接，互相配合，才能提高运输效率。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个站同有关部门一起，对桂林市的短途搬运情况，作了多次调查研究，提出以下几个解决办法：第一，发挥收货单位自有车的作用，增强短途搬运能力。第二，就近卸车，减少市内短途搬运的压力。凡是能够就近卸车的，车站就主动把货车送到靠近收货单位的货场和专用线卸车。第三，卸照顾搬，为搬运提高效率创造条件。站内装卸车的规章制度要为短途搬运提供方便。第四，实行大宗散装货物归大堆的办法，变分散的收货单位为一个统一的收货单位，使一个货位顶十几个货位。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桂林北站的货位周转时间，逐年缩短，一九七三年比一九七二年缩短百分之四十，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又缩短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做到了货场畅通，卸车迅速。实践证明，正确处理长短途运输的关系，就是要充分发挥车站、搬运和收货单位三个方面的长处，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挖掘运输潜力，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才能较好地解决货运量大于搬运力的矛盾。

克服“铁老大”思想，加强同专用线企业的协作，提高专用线的卸车能力。桂林北站专用线的卸车量占全站百分之六十以上，抓好专用线的管理很重要。有一段时间，车站有的同志认为“车站是行车的组织者，专用线得听我们的”。在运输业务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老来自居，想卡人家。而专用线企业有的同志也认为“专用线是我们的，装卸快慢，车站管不着”。一个想“卡人家”，一个说“管不着”，思想上闹别扭，工作不主动。结果是经常发生车辆送不进，取不出，卸不下，大量的车在专用线里睡大觉，造成严重压车的现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大讲全国的大好形势，大讲加快卸车速度，加速车辆周转与支援工农业生产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密切关系，把卸车工作提到路线高



度来认识。这就使广大干部和工人的思想境界冲破了本位主义思想的束缚，扩大了视野，认识到社会主义铁路的运输营业线也好，企业的专用线也好，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从铁路来说，铁路运输是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车站的规章制度和铁路干部、工人的思想、作风和态度处处要体现“人民铁路为人民”，不能有半点“铁老大”思想。同时，铁路运输又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具有昼夜运输不停，车辆使用高度统一调度的特点，专用线的厂矿企业又必须适应铁路运输的需要，为铁路畅通无阻大开绿灯。

为了加强同专用线企业的协作，桂林北站的领导人员，经常到专用线企业登门拜访，虚心听取意见，热情宣传铁路运输的特点，互通情报，加强团结，并在制度上破除一些不利于协作的陈规旧例，立有利于协作的新制新风。车站改进了作风，卸车工作得到了专用线企业的大力支持，做到随到随卸。专用线待卸车数在一九七一年占全站待卸车的百分之七十，现在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桂林北站和物资部门搞好协作的事例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企业之间是兄弟企业的关系，只能互相支持，不能互相拆台，更不能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

依靠群众搞技术革新，发挥装卸机器的效能，加快卸车速度。近年来，上级给这个站配备了一些蒸汽吊机、龙门吊机、叉式车等装卸机器，为提高装卸效率创造了条件。但是，过去这些机器只能装卸大型笨重的货物，不能一机多用。有的同志认为这些机器作用不大，碍手碍脚，弄不好还容易发生装卸事故。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中，工人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教导，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现有的装卸机器进行改革。他们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在蒸汽吊机上安装了抓斗，在龙门吊机上配备了砖夹、纸夹、袋夹，使它既可装卸大型笨重的货物，又可以装卸散装货物。近年来，这个站依靠广大工人大搞技术革新，先后改革装卸机械设备十四项共一百七十七件，使机械作业比重迅速提高。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一点一倍，装卸工人减少了七十多名，装卸总工作量提高了百分之五点一。

桂林北站的干部和工人们说，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是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推动起来的。他们表示要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列车通行无阻，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柳州铁路局党委会 联合调查组
柳州铁路分局党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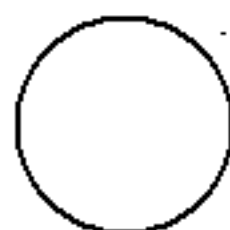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四年 9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 短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5)
- 坚持革命团结 深入批林批孔**.....齐 力 (8)
-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郭 寰 (11)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方 鐸 (16)
-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梁凌益 (22)
- 李自成起义军对二程的批判**.....钟 宙 (32)
- 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
.....天津第二毛纺织厂党委会 (38)
- 我们是怎样开展批林批孔的**
.....北京市第一一二中学党支部 (42)



劳动人民就该做主人

.....山东邹县野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郑成礼 (46)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批判林彪反对党领导军队的罪行.....田 军 (49)

儒家的“以礼治军”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三三二仓库理论小组 (55)

揭穿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某部六连党支部 (59)

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连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63)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湖南岳阳县毛田公社党委会 (67)

执行正确路线 夺取小麦高产

——河南新乡地区的调查报告..... (72)

为革命多出煤.....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党委会 (77)

国际述评：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揭穿苏修所谓“天然盟友”的假面具.....南 景 (82)

☆ 九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



毛主席语录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语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评论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短评)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并同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认真攻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党的政治路线的建设，也是同武装斗争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要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联系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要深入清算林彪的错误的政治路线，也必须相应地清算其军事路线。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他不仅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他的反动面目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锐利



武器。毛主席在我国革命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对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所作的批判，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林彪或包括批判林彪的错误在内的。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名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地批判了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批判，包含了批判林彪的错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大量论述，包括《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则是对林彪追随王明路线，妄图依靠国民党打正规战的有力批判。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以及当时对这两大战役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更是对林彪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我们的批判就能抓住实质，击中要害，真正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可以同批判孔孟之道紧密结合起来。林彪利用了孔孟之道作为其反动思想武器，我们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可以联系到批判儒家在军事上的种种谬论。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大量的论述，许多地方都是对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对孔孟之道那套反动虚伪的仁义道德作了彻底的否定，宣告了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儒家骗人鬼话的破产。毛主席并以宋襄公为例，教育共产党人“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的论述，关于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论述，是对于儒家“以礼治军”的反动纲领的深刻批判。毛主席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了那种认为必须保存反动势力否则就“不合国情”的反动儒家说教。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仁政”观点，指出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只能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决不施仁政。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领会毛主席所深刻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就会更加深刻。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因而它同时也是哲学著作。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但总结了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尤其是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同时，又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



界,指导战争。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就能学到其中包含着的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懂得如何去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如何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何从实际出发去制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这是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不能缺少的。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关于从虚心的调查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中采取恰当措施,以掌握主动权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思想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对于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毛主席在提倡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就说过:**“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对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得好,就可以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对于做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对于继续加强军民团结,都将发生很大的作用。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用以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也是加强战备的重要措施。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对历史上战争的性质、军事的规律、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等等作了大量的论述,为我们研究各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充分的依据。毛主席对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许多优秀的范例。例如,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毛主席就肯定了实行法家路线的军事学家孙武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认为它到今天“**仍是科学的真理**”,并以此批评那种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人,认为他们都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出发,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创造和发展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号召全党“**注意研究军事问题**”。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一次对军事问题的深刻研究。我们必须把学习、批判和总结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使批判更加深入,在批判中更好地学习,同时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现在的新鲜经验,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坚持革命团结 深入批林批孔

齐 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革命团结，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志之一。

革命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政策，可以而且必须团结绝大多数人，包括团结自己的阶级，团结自己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革命的团结，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战斗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坚持了这个原则，并进一步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主席多次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我党五十多年的斗争历史表明：只有团结，革命事业才能前进，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在旧社会，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千疮百孔，民族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工农联盟，紧密地团结了各民族广大人民，共同对敌，驱逐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又领导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粉碎了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粉碎了他们颠覆、侵略、分裂我国的罪恶阴谋。尤其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伟大指示，团结起来，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彻底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实行了革命的大团结。

“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我们党总是把团结大多数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把坚持团结作为胜利旗帜和战斗口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而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此。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搜罗一小撮牛鬼蛇神，拼凑反革命小集团，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拉山头，结死党。在这方面，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充分的表演。他同刘少奇一样，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以我划线”的反动政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地下黑司令部，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分裂我们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正因为这样，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必然遭到彻底的破产。

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运动。林彪反党集团就是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早已垮台，我们要把维护革命团结当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项重要历史经验，在批林批孔中自觉地加以注意。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批林，不批孔，制造谣言，散布小道消息，以此来转移斗争大方向。对于阶级敌人搞分裂



的阴谋活动，我们必须给予彻底揭露和打击。

斗争需要团结，团结进行战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锋芒直指林彪、孔老二，真正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在革命队伍内部，要防止对某些问题纠缠不休而冲淡批林批孔，更不能拉山头，搞分裂，干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因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不利于共同对敌的。在革命队伍内部，即使有些争论的问题，也要通过认真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共同对敌。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在某些问题上认识一时统一不了，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出以公心，顾全大局，从深入搞好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利益出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少数犯有或多或少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并欢迎和鼓励他们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批林批孔大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真正做好团结大多数，这是我们战胜国内外反动派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也是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基本保证。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场伟大斗争中，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讲路线，讲团结，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共同战斗，去夺取批林批孔运动的新胜利。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郭 寰

保护和改善环境，消除工业“三废”污染，是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巩固工农联盟和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有着长远的意义。

毛主席、党中央一贯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解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增强了抗灾能力。对工业建设进行了合理布局，在广阔的内地展开了大规模建设，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镇，初步改变了工业偏集于沿海少数城市的状况。开展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的工作也取得不少的成效。老城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的居住和公共卫生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疾病减少，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

我国环境面貌不断改善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而且环境完全可以不断得到改善，“三废”污染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并且会不会成为社会公害，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实行的路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生产处于严重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环境污染以致成为社会公害是无法避免的。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而且又有一条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有可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处理好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已经出现的某些污染，也一定可以逐步消除。那种认为由于工业的发展“三废”污染“不可避免”的悲观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工业生产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不仅是相互矛盾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只要处理得好，在一定条件下，“三废”污染就可以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用辩证的观点正确认识 and 对待这个问题。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健康，以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是为人民，保护环境也是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这是完全应当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样，消除工业“三废”污染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促进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也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责任，也完全应该做好。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工厂，一方面为国家、为人民生产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听任有害物质危害人民，这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尽管生产任务能够完成，也不能算是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经验证明，如果只顾工业生产，不注意保护环境，到头来，工业生产也搞不上去。比如，带有腐蚀性物质的废水、废气，任其泛滥，会毁坏生产设备和厂房建筑；“三废”污染了水源，败坏了水质，产品质量就要下降，甚至影响某些产品不能生产；“三废”污染危害职工健康，也将影响到生产效率。有一个化工厂，过去由于不重视“三废”治理，曾经造成产品质量没有保证，生产效率下降的后果。后来，他们大搞综合利用，积极治理“三废”，经过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消除了“三废”的污染危害，并且减少了原料、燃料的消耗，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还为国家增产了大批综合利用产品。这个事实说明：发展工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环境保护的问题，同时也增强了保护环境的能力；环境得到了保护和改善，又会给工业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



保护环境，特别要注意保护和改善广大社会主义农村的自然环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发展了，工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因此，保护和改善广大社会主义农村的自然环境，使其不被污染，保证社会主义农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事。各个地区、部门，尤其是工业生产部门，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农村是广大农民进行生产劳动的地方，能否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保护和改善农村自然环境，这又直接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有一个铜冶炼厂，他们起初忽视对二氧化硫烟气的回收处理，影响周围农田作物的生长。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支援农业还是危害农业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厂领导深入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坚持试验，终于制成了一套回收装置，消除了烟害，而且还回收硫酸制造磷肥，从而化害为利，支援了农业生产，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有的人对工业危害农业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有的工厂甚至宁愿年年拿钱赔偿农业损失，而不抓紧认真治理“三废”危害，这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及时防治工业“三废”对农业的危害，并且要通过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生产支农产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是防止污染、保护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工业的合理布局 and 环境的保护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恩格斯指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我们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安排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生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使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发展新兴工业，合理布局很重要。我国工业布局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的精神，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多搞小城镇，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措施，也是解决发展工业和保护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小型城镇具有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样一些特点，对环境保护极为有利。城镇规模小、人口少，工业



和生活的污物比较容易处理。城镇周围有广阔的田野、纵横的河流和茂密的树木，即使排出少量的有害物质，也易于稀释和净化。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大城市建设条件好，总是愿意继续在大城市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使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城市规模大了，用地、水源、住房、交通运输、农副产品供应以及其它公共福利设施等，都会造成许多困难，对建设并不有利。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严格控制现有大城市的规模。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老城市，控制城市人口，对污染环境的工厂分期分批进行治理，不断改善城市的环境。

在工业建设中贯彻实行防治污染的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这是保护环境的一个积极的和有效的做法，是“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工业建设上的具体应用。这样做，就使许多“三废”有害物质被消灭在生产过程中，或一产生出来就立即得到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经验证明，环境的污染往往可以较快形成，而消除这种污染，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产生了污染或污染严重了再去治理，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有的也难于很快取得良好的效果。某些有害物质的危害有时还是潜在的，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因此，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头，在“三废”出现之前就消灭它，为人民除害兴利，为子孙后代造福。

正确地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是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自然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当人们变革某一自然条件的时候，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安排工农业建设的时候，要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避免和克服盲目性。无论是采伐森林、开发矿山、兴建水利工程还是草原、山林的垦殖，都要既看到它收益的一面，又要考虑可能对气象、水文、水生物、水土保持等各个方面的生态条件的影响。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工业建设中，也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如工业企业的厂址选择，不仅要注意原料、动力、水源、交通等条件，也要考虑地质、地形、水文、气



象等条件，加以综合研究，妥善安排，使之不致对居民造成不利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环境保护工作涉及面非常广泛，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搞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国家的环境污染，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关于污染的危害，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秘而不宣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经常向群众宣传环境保护的意义，并且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制订防止和消除污染的措施，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护环境。有些单位的领导不去主动进行这种宣传工作，向群众讲明情况和问题，这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职工，有消除污染、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有治理污染的无穷智慧，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三废”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有一个炼油厂，为了消除钨酸对空气的污染，先是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搞，贪大求洋，花了许多钱，搞了八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树立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土洋结合，修旧利废，没有向国家要投资，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回收装置，消除了污染危害，并回收了钨酸，每年还为国家创造三百多万元财富。许多事实说明，只要群众行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少花钱，多办事，取得多快好省的效果。

消除工业“三废”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路线是根本，关键在领导。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级领导把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认真做好规划，广泛发动群众，大搞综合利用和采取其它治理措施，一定可以做出新的成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要有更大的发展，现在就抓，为时不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而且也一定能够在建设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

方 铎

当前，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研究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并且指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主席明确指示研究历史是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决不是单纯了解一些历史情况，懂得一点历史知识，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为了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同封建制一样，奴隶制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历史上的法家，最初是作为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处于没落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政治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在成千成万奴隶连绵不断举行革命起义的基础上，顺应历史潮流，勇敢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的口号，其中有的不怕谗，不怕压，在同奴隶主阶级的尖锐斗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诚然，地主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同农民阶级存在着对抗的矛盾，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矛盾还是次要的，主要矛盾则是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与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法家的革命作用，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们从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韩非讲法、术、势，而以法为主。他在评论申不害和商鞅时，认为前者“未尽于法”，后者“未尽于术”，各有偏颇；他自己则主张法、术“不可一无”（《韩非子·定法》），同时又必须“抱法处势”（《难势》）。这说明，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和总结经验，地主阶级革命的政治路线已经逐步成熟。经过几年奋战，坚持实行这条革命路线的秦始皇，果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毛主席指出，在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地主阶级这种向反面转化，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就是从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地主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坚持法家路线以外，大部分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革命进取性，转而拣起本阶级先驱者曾经批判过的儒家路线奉为至宝。这样，此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这种斗争或多或少受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激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代表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比较低的阶层，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对压抑、排挤他们的大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作了某些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反动，法家作为这个



阶级一翼的代表,即使能够尖锐地揭露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在政治上却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真正革命的主张。当然,这是不能苛求于个别历史人物本身的,因为他们终究不可能超出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王安石是著名的革新家,他敢于在尊孔反法的潮流十分嚣张时肯定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线。他的变法对大地主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他所采取的革新措施,有利于抵抗辽和西夏贵族集团所发动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但这些改革既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也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对于我们更有启发作用的倒是,王安石即使只是作这样一些改革,也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如此疯狂的反对,宣布他们之间“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奏弹王安石表》)。明末的李贽不满当时的腐败政治,反对孔教,抨击道学,但他已看不到封建社会的任何出路,最后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自刎狱中。这些都说明,封建制度在自身固有矛盾的推动下,已不能和没有力量再认真实行法家路线,正在无可挽救地逐步走向它生命的尽头。代之而起的应当是更新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由于清代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系列侵略,使得正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变得如此软弱,以至要背靠着帝国主义,手扶着封建主义,才能勉强站立起来。它的几个先驱人物在向封建制度发起冲击时,虽一度也表现得相当猛烈,但作为其最后成果的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历史证明,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正确评论法家的进步性的任务,不能由资产阶级自身,而是要由它的对立面中国无产阶级来完成。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取得政权以后,始终保持革命朝气,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是回避、而是紧紧抓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社会矛盾,通过继续革命,推动历史逐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提高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自觉性。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提高我们自觉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批判儒家著作,包括批判处于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为了培养本阶级接班人而炮制出来的通俗性的孔孟读物,如《三字经》之类,评注法家著作,



包括编讲法家人物一些斗争故事，都要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都要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从而使我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在历史上，儒法两家又以坚持分封割据与坚持集权统一相对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古风第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创举对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历代法家代表人物大都对此作过肯定的评价，有的还据此对当时的分裂状态发出了抨击，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一篇代表作。这篇著名的论文，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郡县制优于封建制，目的在于批判唐代握有重兵、反叛中央的藩镇割据势力，提出“善制兵，谨择守”的治国方针，坚决维护国家的集中统一。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总的趋势是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就说明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联合，是全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又是与坚持集中统一的法家代表人物同坚持分封割据的儒家代表人物进行斗争分不开的。在侵略者面前，法家一般都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卖国。在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使得我们的国家，国内各兄弟民族，出现了空前统一、团结的局面。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林彪一伙妄图破坏国家的统一，分裂党的团结，必然会遭到如此可耻的下场，这是因为分裂的行为既不符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联系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一伙搞分裂活动的阴谋，克服妨碍革命队伍统一、团结的思想和行为，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在历史上，法家一开始就是以奴隶制生产关系改造者的面目出现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曾竭力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善平余”等政策，较快地发展了封建主义经济。后来拿着李悝的《法经》，从魏国跑到秦国，辅助秦孝公变法的商鞅，更认为“农战”是“治国之要”，以至官吏的选拔，国风的教化，都必须以这个“要”为基础（《商君书·农战》）。先秦时期的法家，从“初税亩”到“开阡陌”，进行一系列的变革，用封建制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是一次大解放。秦汉以后的法家，虽然不能对封建制生产关系提出根本性的革命措施，但在他们掌握政权或影响所能及的情况下，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调节和改革，使当时的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相对立的儒家，虽然天天穷凶极恶地追求物质享受，但口头上，孔丘“罕言利”（《论语·子罕》），孟轲“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事实上，对于国家、社会的实际问题，国计民生问题，他们也确是一窍不通，以至当有人问起为政之道时，孔丘竟说出“去兵”、“去食”，单留一个虚伪空洞的“信”字去同敌国相对抗这样蠢猪式的谎话来（《论语·颜渊》）。“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李白对于孔孟门徒的批判，可算抓住了一个要害。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全部上层建筑借以确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法家比较注意生产问题，目的还在于建立或维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地主阶级政权，这就决定了法家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下，广大农民群众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束缚。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以后，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求摧毁越来越走向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只是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把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工作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定要坚持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办企业



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动地、不断地调节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进一步发挥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努力把工业生产搞上去，农业生产搞上去，各项事业搞上去，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斗争从来是有紧密联系的。这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解放初期，就有人捧出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的大流氓、大恶丐、大债主、大地主武训，妄图与社会主义潮流相对抗。接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又借西汉搞倒退复辟的吴王刘濞请诛法家代表人物晁错以“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到六十年代初期，在刘少奇的指使下，“三家村”里的人们，又用歪曲历史、抹杀阶级斗争的手法，炮制了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猖狂地要为罢了官的反党头子彭德怀“请命”，要翻党中央庐山会议的案。林彪更是借咒骂秦始皇等法家人物，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经常要利用、歪曲和捏造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为他们的反革命事业开路。而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打败地主资产阶级的进攻，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有千百万群众参加，单靠少数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作为批林批孔主力军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正在意气风发地努力战斗，工农兵理论队伍正在战斗中成长壮大。乘着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我们要重视群众的创造，及时帮助他们搞好经验总结，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一方面要使专业理论队伍同工农兵理论队伍结合起来，同时也要使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学习、批判同广大群众的学习、批判结合起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工作，必将得到更好和更深入的开展，并将在斗争中培养出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

梁凌益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猛将，也是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韩非子》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著作。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要科学地分析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批判地总结法家批孔的历史经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一下《韩非子》，是有益处的。

—

韩非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自春秋末期以来，在强大的奴隶起义的推动下，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到了战国初期和中叶，魏、楚、秦、韩、赵、齐等国已经普遍地出现过变法的高潮。如韩国，任用法家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史记·韩世家》）。在齐国，任用邹忌为相，聘请法家慎到为顾问，“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从战国中期商鞅被害开始，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内，各国掌权的大都是程度不同地信奉儒家思想的奴隶主贵族。只有秦国，从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51年）起，先后任用范雎、蔡泽，驱逐了穰侯魏冉，新兴的地主阶级才夺回了政权。但秦昭王死后不久，吕不韦又窃取了政权，成为战国末期奴隶主和儒家的主要代表，直到秦始皇亲自掌握政权，才粉碎了他的复辟阴谋。战



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走了一个“之”字形，除了秦国外，其他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成效甚少。

为什么地主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却一直没有能够牢固地确立本阶级的统治？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呢？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战胜奴隶主阶级，必须对长期而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出理论上的总结。《韩非子》的问世，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它标志着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逐步趋于成熟。如果说，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在从事变法的过程中，都各自从一个侧面实践和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来不及从理论上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那末，到了战国末期，解决这个问题历史条件成熟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进入了决战阶段。地主阶级面临着最后统一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同时，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总结这些经验，成了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当时，秦国的商鞅学派在秦昭王时代整理、发表了《商君书》。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况，也为地主阶级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但系统地总结地主阶级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最后落到了荀况的学生韩非肩上。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战国初年，韩国曾进行过变法，但后来奴隶主贵族又重新上台，韩国开始由强转弱，并逐步成了秦国的附属国。韩国在当时七国中是最弱的，到韩非时已“事秦三十余年”，正象韩非所指出的，韩对于秦国“与郡县无异”（《存韩》）。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曾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政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挠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韩非在亲身参加韩国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韩非子》一书中的主要作品，如《孤愤》、《说疑》、《五蠹》、《显学》、《忠孝》、《定法》等，都是在韩国写成的。韩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

韩非在建立他的法家学说时，也并没有停留在韩国一国的经验上。他从本国



儒法斗争的实际出发，考察了其他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况，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六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想武器。战国时，齐、楚、魏、赵、燕都曾称霸一时。为什么它们都只能崛起于一时，却又很快衰落下去，而原来落后的秦国却越战越强呢？韩非在总结了七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一条“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他把秦国和魏、赵、韩三国作了比较，指出：“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外储说左上》）魏、赵、韩三国，推行了儒家路线，造成“弱乱”；秦国实行“法治”，路线对头，所以能够强大。但秦国在当时为什么还“未帝”，也就是说，未能统一六国呢？原因还是在于“治未毕”，即法家路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韩非还把秦国和楚国作了对比。楚国和秦都实行过变法，但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很短，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变法也失败了。相反，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的时间久，对反动奴隶主贵族和儒家的打击比较有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和氏》）。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韩非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路线问题，但他在比较了各国对待变法的不同态度后，具体地说明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执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他指出，魏国实行法治时，“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但后来“法慢”，没有认真实行法治，结果“国日削”。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推行法家路线，“人众兵强，辟地齐、燕”，等到赵武灵王死后，“国律慢”，法治不严，同样出现了“国日削”的困境。燕国在燕昭王时法家政治路线一度占优势，“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但等到燕昭王去世，“奉法已亡”，很快“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饰邪》）。不但关东六国如此，秦国也有同样的教训。韩非指出，秦孝公时，由于实行了商鞅变法，“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和氏》），后来奴隶主贵族实行反攻倒算，魏冉当权，秦国就出现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局面（《定法》）。韩非从各国执行法家路线的不同情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推行不同路线的效果如此清楚，而那些国君还不实行法治，那么亡国也不奇怪了。韩非还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在国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关键在于是否实行“法治”，“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相反，如果“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



韩非在总结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中，还认识到，以往各国实行变法往往失败，不仅是因为奴隶主复辟派的破坏，还由于法家路线本身的不完善。他认为商鞅虽然对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实行了坚决镇压，但却没有一套防止奴隶主篡权的斗争策略和组织保证，即“无术以知奸”。因此，“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奴隶主复辟派一度篡夺了政权。他还指出，申不害虽然强调了“术”，但只是从组织上策略上作了防止奴隶主贵族篡权的努力，由于“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社会变革不彻底，对复辟派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同时并存，虽然“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成效不大。因此，他认为商鞅、申不害之法“皆未尽善”（《定法》）。对于以主张“势”著称的慎到一派法家，韩非也有批评，认为单靠“势”是不行的，“势”必须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总之，韩非对前期法家的各种不同思想派别作了具体分析，吸取其长处。韩非正是在亲身参加韩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战国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特别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反儒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出一条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

二

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关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的论述，占有突出的地位。

韩非关于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王充曾认为：“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论衡·对作》）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阶级对立。所谓“智法之士”就是指法家；所谓“当涂之人”，也叫“重人”，是指在韩国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韩非在《孤愤》、《说难》、《说疑》中，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艰难困苦和复杂曲折，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他的《孤愤》篇，集中表达了法家对于篡权的奴隶主贵族的愤怒和批判。韩非控诉了当权的奴隶主贵族对法家人士采取公



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韩国的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正是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韩非认识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孤愤》）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遇到了奴隶主贵族的拚死反抗。韩非从魏、赵、韩等国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钻进政权机构中来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是实行奴隶主复辟的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这是由战国末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当时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奴隶主贵族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来篡夺政权，成了他们复辟的主要途径。当他们窃取了部分权力后，就“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人主》），改变法家路线；一旦时机成熟，就“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现奴隶制复辟。

韩非特别指出识别与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两面派手段的重要性。战国末期，在韩国等国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是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他们“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说疑》），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诡计多端。这些奴隶主贵族的“重人”，不仅有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篡夺政权，就应该粉碎奴隶主复辟集团，清除其死党，即“作斗以散朋党”（《八经》），具体地说，就是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所谓“法”，指的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所谓“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所谓“势”，就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但其中最根本的是“法”。韩非强调“以法为本”（《饰邪》），这是因为“法”具体地体现了法家的政治路线。“术”和“势”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是保证“法”的实施



不可少的条件。韩非认为，如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运用，就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真正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这就是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简明概括。为了实行这条“法治”路线，韩非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和世袭制度，强调“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爱臣》），不允许奴隶主贵族在封邑内搞独立王国，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坚持官吏和军队都必须由地主阶级国家统一管理指挥。

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着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一面，我们要批判地加以分析和鉴别。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而即使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只是当他们的统治受到反动阶级复辟的威胁时，才需要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韩非子》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以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武器的。

韩非对法家同“重人”的斗争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革命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当时有个叫堂谿公的儒家之徒用吴起、商鞅惨遭杀害来威胁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必然也会“危于身而殆于躯”，要韩非“服礼辞让”，放弃斗争。韩非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行法家路线，如果想“避乎死亡之害”，那是“贪鄙之为”（《问田》）。这里，韩非充分表现了进步阶级的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不但不“服礼”，不“辞让”，而且还指出：“礼繁者实心衰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解老》）。儒家鼓吹的“礼”，无论怎样装点门面，也无法改变它衰败的命运。

古往今来，一切尊孔的反动派，对于韩非的理论恨之入骨，对于孔孟的“礼治”百般美化，这并不表明他们强大，而恰好说明他们的“质衰”。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以“克己复礼”为座右铭，妄图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正表明了他同一切日趋没落腐朽的反动派一样不可救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成立以来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管国内外反动派怎样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继续胜利前进。

三

韩非在总结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阴谋的斗争时，还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批奴隶主复辟派还困难得多。在韩非之前，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斗了几百年，没有解决反复辟的问题，除了其他许多原因外，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地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批判。

法家对儒家危害性的认识，是在斗争中逐步加深的。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等，斥之为“六虱”。但商鞅主要是进行变法的实践，没有从思想上对儒家的复辟理论作系统的批判。战国末期，随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批孔成了反对奴隶主复辟的当务之急，荀况从儒家的营垒中冲杀了出来，对嚣张一时的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继承了商鞅的法家思想，认为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学说，都是当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的“奸言”（《荀子·非十二子》），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荀况以来的法家批判孔学的传统，并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复辟斗争的首要地位。在《五蠹》、《显学》、《忠孝》等著作中，韩非以磅礴的气势，横扫了儒家的反动思想。他痛斥了危害地主阶级统治的“五蠹之民”，并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韩非认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明确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难三》）。这样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他尖锐地揭露了孔孟儒家学派利用“私学”进行复辟活动，“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诡使》），把儒家称之为是和当时地主阶级政权两条心的“私学”，指出这种“私学”的特点是“乱上反世”，跟当时地主阶级革命唱反调。总之，韩非认为，要防止这种复辟活动，就必须“息文学而明法度”（《八说》），即必须对儒家之徒实行专政，捍卫法家的政治和思想路线。



为了推动反复辟斗争，韩非强烈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孔孟之徒都是主张倒退的复古迷，疯狂反对任何社会变革。韩非严厉驳斥了儒家“无变古，毋易常”（《南面》）的谬论，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五蠹》），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主张“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的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社会制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不变古者，衰乱之迹”（《南面》）。他无情地嘲笑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主张，如同“守株待兔”那样愚蠢（《五蠹》）；指出孔丘吹捧文王，“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不但颂文王颂错了，对所有古代先王的盲目崇拜都是“愚诬之学”（《显学》）。“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实质上是建立哪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韩非指出：儒家“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称先王之道”，“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动摇人们实行“法治”的决心。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韩非勇敢地批判了儒家吹捧的所谓圣贤，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同时赞美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如果有人今天还去鼓吹尧、舜、汤和周武王的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他坚定地相信：“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韩非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奴隶制本身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但他抬出地主阶级的“新圣”，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到脚下，这在当时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韩非还批判了儒家的“仁政”学说，论证了地主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强调“当今之世”必须“争于气力”，实质上就是肯定战国时代是地主阶级革命的时代。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地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大喊大叫。而面对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落的政治局面，孔孟之流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只能用所谓“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来美化奴隶主专政，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韩非在《外储说右上》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回，孔丘的学生子路熬了一点粥汤给修沟渠



服苦役的奴隶们喝。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马上派了子贡等人去阻止，粥被泼了，粥锅饭碗也被砸了。子路弄得很狼狈，气冲冲地跑去对孔丘说：“我这是行仁义呀！你不是天天教我们讲仁义吗？那为什么熬点粥给他们喝都不可以呢？”这对满嘴讲“仁义”的孔丘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韩非揭穿了孔孟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同时又解剖了“仁义”的危害性。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说疑》）在儒家看来，“仁义”可以“尊主安国”，这是指奴隶主阶级的“主”和“国”；在法家看来，“仁义”必然会“卑主危国”，这是指地主阶级的“主”和“国”。“慈仁听则法制毁”（《八经》），“仁”的后果意味着毁灭地主阶级专政。谁如果受骗上当，真的去实行“仁义”，就会出现“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的局面。韩非的结论是：“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奸劫弑臣》）。归根到底，这是一场革命，来不得半点“仁义爱惠”。这就是韩非对儒家鼓吹“仁义”的回答。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在批判儒家过程中所表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十分重视《老子》的研究，从中吸取了辩证法的因素并加以积极的改造。《解老》、《喻老》这两篇在先秦哲学史上焕发异彩的作品就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的。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道家老聃那里，在唯心论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辩证法的因素被用来为没落的奴隶制辩护，表现为消极的东西；而在法家韩非这里，则完全被用来为新兴的封建制辩护，从而表现为积极的东西。韩非用朴素的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尖锐地驳斥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和中庸之道。他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他用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观察社会历史，得出了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结论，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五蠹》）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事业提供理论根据。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守旧复辟之道，它鼓吹折衷调和，强调保持旧质的稳定性。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折衷调和。他明确地指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强调儒法两家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韩非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为扫荡反动的孔学而终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韩非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他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把历史的发展都说成是“有圣人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的，倒是少数英雄创造的。由于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在《孤愤》等文章中，总是感到自己势孤力薄。他把社会矛盾的出现说成是人口增多造成的，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他企图从经济上去解释社会矛盾，本意是为了否定孔孟的“仁义”说教，但结论却落到了错误的“人口论”上去。这表明韩非的历史观说到底依然是唯心史观。这也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也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特别是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套维护剥削制度永恒性的反动说教，韩非更不可能有丝毫批判。这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只有用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只有科学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类反动观点驳倒。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战而胜之，这个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韩非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自见之谓明”（《喻老》），就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但是，人类要真正认识自己需要经历一条多么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韩非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总结当时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毕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作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结论，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李自成起义军对二程的批判

钟 宙

程颢(公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年)和程颐(公元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年)(合称二程),是北宋时期儒家的代表,反动理学的奠基人。孔孟之道经过他们的加工和阐发,捧得更高,流毒更广。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吹捧二程是“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历代感德铭石以垂后世》)北宋以后的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他们把二程炮制的理学当作维护其日益腐朽的反动统治的至宝。国民党反动派、苏修叛徒集团,都极力吹捧程朱理学。与这些反动派一样,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权复辟,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思想武器,竟然把唯心论的儒学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相反,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痛恨孔老二和鄙视二程的,对他们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批判。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抨击二程及其反动理学的斗争,就是当时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演出的一个场面。他们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他们的壮丽业绩,在中国劳动人民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程颢和程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代。北宋王朝封建统治集团推行的对内扩大兼并、对外屈辱投降的反动路线,造成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如一火”的农民起义,动摇着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二程抛出反动理学,正是为了对抗规模宏大的农民阶级的进攻,加强对农民的镇压,维护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

二程炮制的反动理学,是地主阶级尊儒反法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它是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反革命理论,是地主阶级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日益衰落时期地主阶级的意愿,适应了反动阶级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的政治需要,对于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二程及其反动理学,被后来反动派所尊崇。



特别经过朱熹的发挥，这种反动说教更成为天经地义的封建法典。二程的地位也被抬得越来越高。南宋理宗读了二程的反动著作，感到“启沃良多”，加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为了表明其尊儒反法的立场，还特地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孔庙中撤出来，将二程的牌位搬进去。从此确立了反动理学的儒家正统地位。

到了明代，封建制度更加腐朽、反动了。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及其所激化的各种矛盾，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城乡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在全国各地展开。十六世纪以后的明王朝，犹如一座柱倾梁歪的大厦，支撑不住，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颓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加紧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挥舞起屠刀，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把反动理学规定为统治思想，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程朱理学，进一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农民阶级的专政。基于这种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明代封建统治集团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尊孔崇程的反革命逆流。他们肉麻地吹捧孔丘为“至圣先师”，孟轲为“亚圣”，说二程是“真儒”，论其功绩，“亦当不在孟子下也”。（林应龙：《奉敕重修两程夫子祠碑记》）明朝政府利用政权力量，不断颁赐祭程的制度，拨钱修葺扩建程墓、程祠和二程书院。不仅如此，明代封建统治者还把尊程的范围扩大到二程的后代。公元一四五五年，明代宗赐给二程第十六代孙程克仁“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头衔，世代相袭，并免除一切差徭。公元一四八九年，明孝宗又下令，将程氏后裔，由民籍改为“贤籍”。在明代封建统治者这样庇护、支持下，不但二程的地位被抬到空前的高度，他们的后代也变成享有种种特权的恶贯满盈的大地主。

二

毛主席指出：“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明代封建统治者，是一伙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满以为抬出二程的亡灵，大力表彰二程及其反动理学，就能阻挡农民革命的潮流，使他们免于覆亡。然而，所得的结果，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尽管二程的祠庙里，四时香烟缭绕，却掩盖不住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农民的暴行；被二程反动理学强化的四条绳索，也捆绑不住革命农民的手脚。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二程家乡嵩县和程墓所在地伊川的劳动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反击明代封建统治者掀起的尊孔崇程的逆流。伊川鸣皋地区的人民，抵制重修伊川书院和程家后裔查复伊川书院的田亩



的斗争，使得地主阶级的阴谋不能得逞：“田竟不可问，书院荒圯殆尽”。（汪楫：《重修伊川书院记》）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把农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汇聚在李自成起义军周围的千百万农民群众，冲破束缚他们的罗网，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同地主阶级进行着生死搏斗，还在思想战线上向孔丘和二程展开了进攻，猛烈抨击了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反动理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用“均田”、“免粮”的革命思想批判吃人的理学。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孔丘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把反动孔学发展成理学，抬出“天理”来为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他们大讲什么“富贵由来自有天”，（《二程全书·明道文集》）把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农民受苦受难的原因，说成是天所赋予的、命中注定的。要劳动人民甘心接受他们的统治，不要起来造反。李自成起义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愤怒指出，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天理”的安排，而是由于“朝廷失政”，“岁饥赋重”，“王侯贵人剥穷民”的结果。这就剥开了“天命论”的画皮，揭露了当时农民阶级破产贫困的原因。他们冲破“三畏”的束缚，作《九劝九问》，号召各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反。他们高举“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大旗，明确提出“取天下”，就是要推翻自称“承天应运”的明王朝，变地主阶级的天下为农民阶级的天下。这就从思想上批判了二程之流所一再鼓吹的“天理”的谬论。

二程还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全书·遗书》）的反动政治主张，把吃人的封建制度说成为“至善”的“天理”的体现，把反抗封建统治的言行诬蔑为“万恶”的“私欲”。他们要求人们“克尽己私”，“视听言动，非理不为”，（《河南程氏遗书》）其反动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根除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李自成起义军，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革命传统，根据当时农民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并且发布文告，编制歌谣，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用“均田免粮之说”、“割富济贫之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他们还把“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具体化为政策，力图按照平均、平等的思想，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面貌，向往于建立一个使“贫汉”“大小都欢悦”（计六奇：《明季北略》）的理想社会。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这些革命主张，不但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地主剥削农民的“合理性”，同时也是对维护封建



剥削制度的反动理学的大胆否定，它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用革命暴力横扫理学所维护的封建秩序。

二程竭力鼓吹“等差分别，莫敢逾僭”，（《二程全书》）“天理如此，岂可逆哉”，（《河南程氏遗书》）妄图以此来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李自成起义军，针锋相对，所到之处，“杀富济贫”，“为民除害”，杀了一批血债累累的藩王、宗室、官僚、地主、绅士。他们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被霸占的田产，带领农民没收官府、地主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他们强迫贵族、地主服从革命法规，如有违抗，立即严惩。地主分子惊呼：农民军占领郑州后，“奴隶棍徒，绝无礼体”，“奴（奴隶）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贵家大族“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张桎：《流寇记》）从这些反革命的供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破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猛烈地批判了二程所鼓吹的“等差分别，莫敢逾僭”的反动信条。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程和明代反动统治者竭力用反动理学来强化这四条极大的绳索，而李自成起义军则力图用革命手段推倒“四权”统治。起义军转战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捣毁明朝各级官府，建立农民的革命武装和政权机构，表现了革命农民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捣毁城隍庙，把阎罗天子、城隍老爷以至土地菩萨一个个打翻在地，表示了对神权的大胆否定。他们焚毁宗族祠堂，砸碎各种牌位，深刻地批判了族权。广大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英勇杀上对敌斗争的战场，同阶级兄弟并肩战斗，为农民起义事业而献身，有力地打击了孔丘和二程鼓吹的“男尊女卑”的吃人礼教。这种革命行动，把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这种扫荡，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痛击尊孔崇程逆流。

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朝时期，大力刊行儒家的反动书籍，大规模兴建尊孔崇程的各种建筑物，这是当时反动派为了镇压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反抗，拼命强化思想统治所采取的反革命措施。针对这股尊孔崇程逆流，李自成起义军广泛地开展了焚毁儒家书籍，捣毁尊孔崇程建筑物的斗争。

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尊孔的文庙，把明代反动派奉为“至圣先师”的孔丘的



偶像，打翻在地，踩在脚下。根据刘仲舒的《文庙碑记》的记载：各地文庙的“遗迹鲜有存者”。嵩县的先师庙“颓坏”，祭器乐器“残缺”。澠池、叶县的文庙被焚毁，成了一堆瓦砾。伊阳（今河南汝阳）文庙，“仅存正殿两楹”。（王士侔：《重修大成殿碑记》）起义军对于儒家“经典”，也极端蔑视，他们烧毁了大量的儒家书籍。他们冲进嵩县，把程庙中珍藏的《四书》、《五经》和《二程全书》以及宋明以来孔门信徒表彰二程的石碑，统统毁掉，无有存者。嵩县封建官府保存的“典籍文献”，也被起义军焚毁，“斯灭无存”。（《嵩县志·原叙》）

二程祠庙，是封建统治阶级尊程、祭程的场所。明代地主阶级为二程建造的专祠，在河南至少不下二十余所。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规模宏伟仅次于曲阜孔庙的嵩县程村的二程祠，“庙貌倾圮，俎豆（祭器）沦落”。（《两程祠墓源流》）“制如孔庙”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二程祠，这时也是“颓垣圯壁”，（武攀龙：《重修二程夫子祠堂记》）“荡然为墟”。（董笃行：《重修理学尤夫子祠记》）起义军还捣毁了伊川程墓。明代地主阶级修建的二程书院和程氏义学，也几乎全部被起义农民烧毁。起义农民的这种焚毁儒家反动书籍，捣毁尊孔崇程建筑物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孔丘和二程的极端鄙视，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孔孟儒家传统思想的极端憎恶。历史铁证无情地撕破了一切尊孔派的画皮，有力地回击了苏修鼓吹的“儒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无耻谰言。

第四，诛杀反动儒生和程家博士。

李自成起义军反封建、反孔反程斗争的革命壮举，触动了明代封建统治集团和反动儒生，特别是二程后代的“程家博士”的痛处，激起了他们的疯狂的反扑。为了把他们的反动气焰打下去，起义军采取了诛杀反动儒生和“程家博士”的革命措施。

农民军攻克洛阳，生擒了大官僚地主吕维祺和大贵族福王朱常洵。朱常洵跪倒求饶，吕维祺口诵孔孟之道，企图顽抗，当即被起义军处以死刑。起义军进逼嵩县，程家大地主程宗周伙同官府守城顽抗。公元一六四一年三月，李自成亲自率领农民军攻打嵩县县城，昔日受尽程家大地主剥削和压迫的佃户、庙户，纷纷参加起义行列。“负门板，挟短铍穴城，斫学官古柏为云梯”，（《嵩县志》）军民协力，不到半天时间，就把县城攻占了。程宗周死于炮火之中。农民军乘胜直捣“二程故里”程村，杀进阎王殿，对于横霸乡里、对抗起义、固守祠庙的“程家博士”坚决镇压，诛杀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程佳祚和程接道于九皋山下。起义军



的这种革命行动，吓得程家大地主魂不附体。他们怕捉怕杀，化装易服，仓皇逃命。程家第二十代孙程宗昌心有余悸地说：这时他们“户无安居之所，人鲜糊口之资，弃坟墓而转徙他乡者十有八九”。（董思凝：《记述博士程公字德征懿行碑》）正是由于起义农民对程家大地主采取了这样坚决镇压的革命行动，才迫使他们在半个世纪时期内，不敢强迫向佃户收租，不敢强迫农民纳贡服役，不能修葺尊程的祠庙、坟墓和书院，甚至连每年春秋二祭也不敢进行了。

三

毛主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抨击二程及其反动理学的斗争，是当时条件下劳动人民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威力。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反孔、批孔斗争最积极的力量。

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告诉我们：有尊孔，必有反孔；尊孔愈甚，反孔愈烈。尊孔的只是一小撮反动派。劳动人民要前进，要革命，必须砸烂孔孟之道这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英勇抨击二程的斗争，在我国人民反孔斗争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代替封建生产关系，也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彻底揭露和批判孔学的反动的阶级实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只有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作锐利武器，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批判和战胜孔孟之道。

林彪一伙继承历代反动派的衣钵，祭起尊孔崇儒的破旗，把“克己复礼”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妄图借孔老二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只能遭到彻底的失败。

在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进行战斗，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法家著作，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深入、普及和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把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

天津第二毛纺织厂党委会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切实加强领导，坚持学习制度，组织全厂职工紧密联系批林批孔的斗争实际，**认真看书学习**，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部分干部和工人还学习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通过学习，全厂职工的思想水平和批判能力有了提高，并培养了一支理论队伍。在党委领导下，干部、工人和理论骨干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编写了《儒法斗争史》、《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等讲稿，向厂内外群众宣讲七十多次，评注了商鞅、韩非、柳宗元等法家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进一步批判了《论语》、《中庸》、《孟子》、《三字经》等宣扬孔孟之道的坏书和反动谚语，使批林批孔运动继续深入地向前发展。

在批林批孔中要不要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在斗争中逐步端正认识和正确解决的。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学习马列著作和当前的斗争“结合不紧”，看书学习应当给运动“让让路”。党委及时地进行了讨论，也发动群众开展讨论，大家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靠什么同敌人斗？工人们说得好：“打狼要棒，杀敌要枪，批林批孔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热烈的讨论，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不是坚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理论武器，是能不能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的关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在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的自觉性。

通过学习的实践，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坚持看书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才能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批林批孔开始后，全厂职工



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但有些同志只是就事论事地批，对于林彪搞“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以及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批得不深刻。党委重温毛主席关于“**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的教导，认识到，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个人的经验，不很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抓不住本质，击不中要害。在党委领导下，工人和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要指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批判了“克己复礼”这一反革命纲领。许多工人批判说，从政治上看，“克己复礼”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从思想上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就在于：反对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而前进，坚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而倒退，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无产阶级必定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要战胜资本主义，“克己复礼”根本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一分析，大家心里豁亮了，认识更深了。又如，染整车间补呢工段的工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联系解放前这个厂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起家的罪恶史，对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核心——“仁”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个厂解放前名叫“仁立”，其实是靠残酷剥削我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立”起来的。过去我们工人虽然身受资本家的剥削，但却不知道资本家是如何进行剥削的。马克思主义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事实正是这样。“仁立”建厂仅二十三年，资本家腰包里的总资本就猛增了三十倍，由一个厂发展到几个厂。这充分揭穿了所谓“仁立”完全是骗人的招牌，也彻底暴露了孔老二鼓吹的“仁”完全是为反动没落阶级的丑恶剥削行为作掩饰的。

坚持看书学习，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并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广泛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活动。在研究过程中，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儒法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如何正确评价法家的进步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为什么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等等。有些问题，有时争论不休，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要回答这些问题，



除了掌握必要的历史材料外,更重要的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针、衡量是非的尺子。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正确地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在党委的领导下,广大职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和认识封建制必然代替奴隶制这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奴隶、农民起义与法家进步作用的关系;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运用矛盾转化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的历史必然性,等等。

在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使全厂职工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批林批孔伟大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促进各项工作迅速向前发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厂条染车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组建的一个车间,干部和工人都是从兄弟车间抽调来的。当时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胜利了,主要的应该把生产搞上去,因而放松了抓阶级斗争,隐藏的阶级敌人就乘机兴风作浪,使革命和生产受到影响。车间党支部带领职工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党的基本路线。现在这个车间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深入批林批孔,真抓革命、促生产,成为先进单位。全厂各车间的形势越来越好,革命步步深入,生产蒸蒸日上。今年上半年我厂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点六九;同时还试验成功了精纺巡回操作坐车化、染呢下料自动化等几项大的技术革新项目。事实进一步证明,革命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就能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为了在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我们注意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早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厂的工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组织起哲学小组,涌现了一批工人理论骨干,对全厂干部和工人的学习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批林批孔以来,党委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队伍的建设。党委负责同志亲自抓,以政治业余学校、工人业余理论小组为基地,培养了一批新的理论骨干。现有工人理论骨干一百九十八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左



右，分布在各车间、班组和科室，每个学习小组都有一、二人。他们是带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骨干力量。他们登台讲课、编写辅导材料、解答疑难问题，带动和帮助了群众的学习。在抓紧培养理论骨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抓紧广大工人群众的学习。理论队伍帮助群众学习决不能变成代替群众的学习。批林批孔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只有广大群众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同时还要看到，理论队伍是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产生、成长的。“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理论队伍必须向群众学习，吸取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群众学习搞好了，就会涌现更多的理论骨干。这样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就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在批林批孔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关键在于党委领导。毛主席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我们体会到，加强领导，首先要加强思想领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学习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使大家始终保持饱满的学习热情。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组织工作。基层单位工作头绪多，往往容易因为安排不当而挤掉学习。党委要统筹全局，合理安排各项工作，一定要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对于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要及时地加以总结和推广，把群众的学习不断提高。此外，切实抓好党委自身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党委学得好，对于群众就是有力的动员。党委一旦放松自己的学习，对于群众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就看不清，对于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也就回答不了，对于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就觉得难以深入。这样下去，不仅会丧失领导学习的主动权，而且会丧失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动权。党委为了搞好学习，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党委常委中心学习组扩大，把全体党委委员和总支书记都吸收进来，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二是领导干部定期到车间参加班组学习，把领导干部的学习和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既便于领导向工人学习，又便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群众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使全厂出现了群众促领导，领导带群众，互帮互学，你追我赶的学习新气象。

我们在坚持看书学习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很不够，距离党的要求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还很远。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我们决心和全厂职工一起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我们是怎样开展批林批孔的

北京市第一一二中学党支部



半年多来，我们学校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师生们都说，这是批林批孔的结果。

批林批孔运动初起，有的同志对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对如何开展这场运动不很明确，存在着一些思想顾虑。我们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关系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在学校里，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痛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通过学习，大家也认识到：搞批林批孔，在人民内部，在革命教师里头，主要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学校里存在的“师道尊严”，是反动的孔孟之道在教育界的流毒，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手段，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重要工具。革命师生都是“师道尊严”的受害者。批判“师道尊严”，革命师生应当共同把矛头对准林彪、孔老二。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解除了一些教师的思想顾虑，端正了同学的思想认识。革命师生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怎样根据学校的特点开展批林批孔？我们的体会是：要注意使运动和教学相结合，使学校运动和社会上的运动相结合，使革命大批判和学习马列主义相结合。

批林批孔运动和教学相结合，首先要摆正运动和教学的关系。孔孟的谬论在教育领域影响较大，过去中小学教材中的尊儒反法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批判。因此，要以批林批孔为纲，使批林批孔深入到各科教学的内容中去，推动教



学进一步改革，不能使运动围绕教学转。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各门课程，都要力求教学配合运动，密切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以后，我校数理化各课加强了对林彪、孔老二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改变了过去忽视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片面宣扬个人在科学发明中的作用等错误观点，促进了理论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语文、历史、政治等课对原来的教材进行了改革，删改了尊儒反法的观点，增加了批林批孔的内容，把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活动。低年级结合教学选批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谚语、格言，高年级批判《三字经》、《中庸》等坏书。象《中庸》这样的坏书，文字生涩难懂，充满了唯心论的杂凑、胡说，许多教员都没有读过。但是，高一同学人小志气大，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发扬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争当批林批孔的小闯将，知难而进，与老师并肩战斗，终于攻克了难关，剥开了林彪、孔老二所宣扬的“中庸之道”这个骗人之道、复辟之道的画皮。革命小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敢地向孔孟之道宣战，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作文一千二百多篇，编写儒法斗争故事六十多个，还举办了儒法斗争历史的资料展览，在全校作了六次辅导报告，比较系统地讲了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的儒法斗争史。这些活动不仅没有离开教学，反而使同学们在战斗中提高了学习质量。他们兴奋地说：“两、三周学到的，比过去长时间学到的还多，了解了阶级斗争历史，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我们还在考试制度上作了适当改革，使它同批林批孔运动紧密结合。按照过去的老规矩，考试来临，运动暂停。现在师生们说：在批林批孔中，我们要做革新派，不当保守派；运动不能停，考试要改革。师生们共同研究，大胆革新，把文科考试同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结合起来，要求同学们写一篇评论法家著作或者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分析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问题。这次考试，使广大师生进一步投入了批林批孔斗争。同学们为了批深批透，写好文章，翻字典，查资料，不畏难，不叫苦，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还跑到大学和校外图书馆求教。这样的考试，同学们既紧张又高兴。他们说：这种考法好！把我们从分数底下解放出来了。过去考试是个人奋斗，这次考试是要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这是收获很大的一次考试。

为了搞好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还必须面向社会，把运动和开门办学结合起来。这既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也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需要。开门办学，是



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上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开门办学不能离开批林批孔这个纲。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他们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同阶级敌人斗争最坚决，同传统观念决裂最勇敢。革命师生走出去、请进来，同工农兵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样才能批判得深，提高得快，受教育大。我们一面邀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解放军英雄和革命家长来校作报告；一面还跟邻近的工厂、街道挂钩，每隔一定时间，组织全校师生走出校门同工厂工人、街道居民一起批林批孔。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许多受过旧社会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几重压迫的劳动妇女，愤怒地控诉了儒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反动伦理道德，使同学们受到了生动实际的阶级教育。不少同学过去在课堂上学习鲁迅的《祝福》，光听教员讲解，体会不深。这次听了街道劳动妇女的批判，加深了对孔孟之道的仇恨，再学《祝福》，体会就大不一样了。在同学们编写《〈中庸〉批注》时，原来只是就事论事地批，没有联系它出笼的背景。工农兵看后指出：反动派编坏书都是为了制造反动舆论的，是为它本阶级当时的政治服务的。不讲清时代背景，怎么进一步揭露他们的反动目的？同学们听了很受教育。《〈中庸〉批注》修改后，提高了批判质量。事实证明，只是在学校里搞批判，不容易搞好；开门办学，同工农兵相结合，就能使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深入。

为了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师生们深深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孔孟之道作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要战胜它们、批倒它们，也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批林批孔以来，全校革命师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情很高，各种形式的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小组不断涌现出来，不仅教职员工都参加了，绝大多数同学也都组织起来了。有的小组还把家长包括进来共同学习。这样的学习小组学得生动活泼，学生热心，老师称心，家长放心。在开展群众性的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的活动中，我们在明确了研究儒法斗争史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以后，组织师生共同制定战斗方案，各年级、各班努力做到四定：确定学什么（学习哪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评什么（评论哪个法家人物和著作）、批什么（批判哪些儒家的反动言行、反动故事等），以及在什么时间完成，既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热气腾腾，也要求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搞得扎扎实实。同学们在



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高二(2)班同学根据毛主席关于“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敢想敢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了那个散发孔孟之道臭气的《三字经》。他们结合批判它宣扬的“人性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结合批判它宣扬的“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合批判它宣扬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学习“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结合批判它宣扬的“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观，学习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提高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水平，也提高了同学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些生动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广大青少年能够从小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批判孔老二，这对于他们将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半年多的批林批孔运动，教师在改造世界观、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进步。他们热情赞赏革命小将敢于批判孔老二的革命精神。有的教师说：我过去对学生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估计不够，现在是真正服了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是今胜于昔，学生是一代胜一代。我一定要打掉暮气，焕发朝气。教师们普遍感到：批林批孔，越批，头脑越清醒；越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越强烈，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干劲越大。批林批孔也锻炼了学生，培育了学生。一些后进同学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孔老二的“读书做官”、“变相劳改”和“读书无用”等反动谬论之后，都有了较大转变。一个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比学赶帮的生动局面在同学中出现了。几个月来，全校发展了六十多名团员，还有五百多名同学加入了红卫兵。许多同学纷纷向组织表示决心：毕业后坚决上山下乡，走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距离毛主席、党中央的要求还很远。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多，很艰巨。目前，一个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热潮正在我校兴起。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并把这一任务同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我们决心继续努力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劳动人民就该做主人

山东邹县野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郑成礼

孟轲，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二号圣人，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他有一个反动观点，叫做“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称奴隶主为“君子”，骂奴隶是“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生来就是供养统治者的。这是他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宣扬唯心史观的反动谬论。我们野店，就是孟轲诬蔑的所谓“野人”居住的地方，六百多年前，就成了孟府的佃户村。一提起孟轲这个反动观点，我们贫下中农真是恨得牙根痛。

孟轲提出这个反动观点，是为他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活着的时候，是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阶级斗争很激烈。奴隶们到处造反，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夺权，天下大乱。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法家，坚持革新前进的路线，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耕战政策等进步主张。孟轲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推行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路线，拼命反对社会前进。他咒骂法家是“暴君污吏”、“民贼”、“罪人”，疯狂叫嚣对法家要杀，杀，杀。他提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种谬论，正是和当时法家的主张相对抗，是为了救奴隶主的命，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阻止社会历史发展的。孟轲这个谬论一提出来，就是对历史的反动。后来，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把这个谬论作为欺骗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在孟轲看来，“野人”离不开“君子”，劳动人民离不开统治者。没有他们这伙统治者，地球就不转了，五谷就不长了，六畜就不旺了，劳动人民就没法活了。统治者简直是救民的菩萨，治世的英雄。总之一句话，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这完全是孟轲为了“治”我们劳动人民而编造出来的歪经邪理。

劳动人民不是离开统治者没法活，而是被统治者“治”得没法活。我们野店的贫下中农，解放前，世代代给孟府作佃户，吃够了“君子”“治”我们的苦头，最懂得孟轲所说的“治”是什么东西。他说的“治”，就是政治上的血腥镇压，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思想上的束缚奴役。孟府设有公堂，备有各种刑具。凡是孟府的佃



户、仆役“犯了法”，孟府可以自行传讯、审理、治罪。被抓的百姓，遭受严刑拷打，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孟府的“君子”们，拿着劳动人民根本不当人待。在他们日常开支的流水帐上，总是把佣人的吃食和牲口饲料开列在一起。我们村住着六户“二地主”。他们是孟府的爪牙，掌握着生杀大权，催租逼债，榨取钱财，任意欺压我们贫下中农。我们野店三千七百亩耕地中，孟府的租田就有二千四百亩。租种孟府的土地，无论草地（荒地）苗地，不管丰年歉年，租粮颗粒不能少。交租时，先要交“验色粮”，还要过风车，过大斗。经过层层剥皮，往往一百斤粮食只能顶五、六十斤。人们说：“孟府算盘响，穷人眼泪淌，交租如进鬼门关，一关更比一关难。”孟府耍一个花招，佃户就要去一层皮。有一年，我家砸锅卖铁，东求西借，用能买一头牛的钱做“押金”，租种了孟府六亩半地，全家老少没黑夜没白日地干，第二年小麦长得很好。孟府的“君子”们，眼珠一转，就想出了毒计。在庄稼快上场时，硬把地收回去。退给我们的“押金”，只够买一只鸡。俺四大爷望着金黄的麦子，有理没处说，活活气死了。在孟府的残酷剥削下，我们全村一百九十户佃户，被迫逃荒要饭的一百五十六户，卖儿卖女的四十八户，冻死饿死绝了后代的三十八户。看！这就是孟府这伙“君子”统治我们的惨景！

要说“离不开”的话，那些统治压迫人民的“君子”们，离不开劳动人民的“供养”倒是实情。他们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只知道糟蹋我们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说，他们离开我们劳动人民一天也活不下去。就拿孟府来说吧，孟府霸占着一万七千多亩地，有一分一厘是他们亲手开的吗？没有。他们吃的粮食，有一颗一粒是他们自己种的吗？没有，全是从我们贫下中农手里抢夺的。孟府二百多间房子，“君子”们搬过一砖一瓦吗？没有，全是我们劳动人民给他们建造的。孟府还指派什么庙户、林户、洒扫户、猪羊户、挑水户、推磨户、报风、报雨、报雪户等等，强迫劳动人民给他们纳贡服役。孟轲的第七十四代孙孟凡骥，全家不过十口人，却要四十多个佣人伺候。他经常设宴请客，一桌酒席要上好几道点心，一百多样菜，花的钱不计其数。可以看出，那些“君子”们，都是压迫人民的罪人，是专吸人民鲜血的寄生虫。

但是，几千年来，历史一直被颠倒了。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吃不上，穿不上；一小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却过着清吃坐穿、花天酒地的生活。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在历史上没有地位，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却耀武扬威，称王称霸。这真是天大的不合理！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我们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我们就应该做社会的主



人。“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从春秋末期的奴隶造反，到封建社会的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都是对“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这种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都是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我们邹县一带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明代后期，以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打进了邹县城，横扫了罪恶累累的孟府，杀了孟轲六十代孙孟承光、六十一代孙孟弘略。公元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年间），邹县境内，先后曾有近三十处村寨，组织过大小不同的武装斗争，我们佃户村也竖起了造反大旗。自从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反抗斗争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一九四五年，邹县第一次解放。我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乡农救会长。他带领俺村佃户三百多人，开进孟府，造了这个世袭阎王殿的反，把昔日赫赫扬扬的“君子”们打翻在地。可是孟府的“君子”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勾结国民党土匪，向贫下中农疯狂反扑，我父亲和另外两名村干部惨遭杀害。一九四八年，邹县第二次解放。从此，我们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专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政，跟着毛主席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过去被孟府“治”得贫穷落后的野店，现在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连续八年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社员生活逐年改善，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住上了新瓦房。过去“圣人门前文盲多”，现在全村适龄儿童都上学；全大队有初中生一百一十二人，高中生四十六人。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比起孔孟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劳动人民打倒反动统治者，不但可以生活，而且生活得更好。

我们做主人，是经过斗争得来的。但是，做了主人斗争并没有结束。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鼓吹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不正是孟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种谬论在今天的花样翻新吗？林彪和孟轲，是隔朝隔代不隔心。他拣起孔孟的破烂，作为搞反革命复辟的思想武器，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再拉回到“君子治野人”的黑暗社会。这是白日做梦。我们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批林批孔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批判林彪反对党领导军队的罪行

田 军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反革命的需要，不仅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他极力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反对毛主席历来坚持的党指挥枪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林彪关于枪指挥党的谬论，清算他反对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对于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我军建设，对于继续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和军队的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也不能并列。这是我党我军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基本纲领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任务，党必须建设一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风格的人民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根据党的纲领、任务，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是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绝对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正确执行



党的纲领、路线，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全心全意地为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事业，冲锋陷阵，战斗不息，这是我军唯一的准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持和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辉胜利。林彪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妄图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我军的优良传统，改变我军的性质，这是他背叛党、背叛军队、背叛人民的一大暴露。

是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还是反对党的领导，搞枪指挥党，这历来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建军开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高饶反党联盟，就曾经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作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手段。我党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中指出：高岗“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自认为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并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继高岗之后跳出来反党的彭德怀，也是妄图搞枪指挥党的。林彪鼓吹枪指挥党，制造军队决定党和政权性质、命运的种种谎言，甚至叫嚷缔造者不能指挥，要由他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其罪恶的目的和卑劣的手法同高岗、彭德怀是一脉相承的。现已查明，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我们同林彪围绕着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所进行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主席历来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对反对党领导军队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对于红军，“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井冈山的斗争》），并且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了保证军队正确地执行党所规定的政治任务，毛主席在红军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规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井冈山的斗争》）。毛主席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司令部对外”、“军事领导政治”等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严肃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领导全党批判了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也批判了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



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谆谆告诫“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战争和战略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又重申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曾经多次明确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再次引述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们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

党指挥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这个原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自从产生阶级以来，才有了国家政权、政治派别、政党，也才有了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任何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都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按照自己阶级的纲领、路线建立自己的军队，把军队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论联合政府》）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对这支军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他们掌握着政权，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他们总是通过他们控制的反动武装，实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妄图镇压和消灭这支军队；或者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妄图通过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把革命的武装交给他们。在他们失去政权以后，除了阴谋纠集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进行反革命暴乱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他们混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来破坏、腐蚀我们的党和军队，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林彪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正是代表了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愿望。

毛主席说过，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林彪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推行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正是同他推行“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有什



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路线为其服务。在我国历史上，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老二和孟轲之流，为了推行“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一方面竭力宣扬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的“以礼治军”的反动思想，把军队作为奴隶主阶级“存亡继绝，救乱除害”的反动工具，用以镇压奴隶的武装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反抗，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另一方面又大肆进行所谓“去兵去食”的欺骗宣传，用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实行的“耕战政策”，妄图阻碍新兴地主阶级用革命的武装来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他万事中最大的事，妄图“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灭国”，“继”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举”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逸民”，这是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从反革命的经验中懂得，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推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大障碍。林彪鼓吹枪指挥党，反对党指挥枪，就是妄图改变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同一切反动派的反动行为总是走向其主观愿望的反面一样，林彪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但没有能够改变我党我军的路线和性质，相反，他自己却成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反面教员。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还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对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林彪反革命谬论一针见血的批判。历史的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才是我军的生命，才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排斥毛主席正确路线对红军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长期以来积聚的革命武装丧失百分之九十左右。长征途中，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妄图搞枪指挥党，他分裂红军，实行逃跑主义，最后使一部分红军受到严重损失。而每当我们清算了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全党、全军的团结就大大加强，军队就发展，革命就前进。两条路线，两种结果，有



力地驳斥了林彪的谎言，证明了军队能否发展壮大，以及胜败与存亡，都取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或错误。路线正确，没有兵可以有兵，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不正确，有了枪也会丢掉。四十多年来，我们的军队，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南征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英勇地保卫祖国边防要塞、领海、领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抵制、批判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的军队对于发展党的组织，建设革命政权，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得到发挥的。这同林彪鼓吹的枪指挥党的谬论毫无共同之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始终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正是党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置于我军肩上的政治任务，是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要求的。而这些任务的完成，一刻也不能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指导。正是由于我党我军的广大党员、干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和艰苦卓绝的工作，才使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反动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总是妄图通过武装颠覆或“和平演变”的手段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也永远是一个工作队。它既要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也要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我军要担负起这样繁重的任务，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心明眼亮，斗志昂扬，不被任何拿枪的敌人所压倒，而要压倒一切敌人，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而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先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和广大群众一道，胜利地摧毁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正是由于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结果。林彪在谈军队作用时闭口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不难看出，其用心并不是为了发挥军队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而恰恰是为了取消和破坏这种作用。然而，这不过是林彪的痴心妄想。通过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我军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必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对党的领导，充分暴露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动面目，**暴露了**他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林彪鼓吹枪指挥党，谬论很多，但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要由他来指挥军队、指挥党。他不是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要由他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吗？这就是妄图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他纠合死党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人民，复辟资本主义，并在其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写上要借助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梦想把我国引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林彪的这种反革命野心由来已久。林彪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抗拒改造，抱着立党为私的个人野心，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反对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历来不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在解放战争中，先是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拒不打锦州；后来又对抗毛主席关于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的指示。林彪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脑子里却充满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主义的腐朽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欲望，决定了他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狂热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大肆鼓吹枪指挥党，阴谋篡夺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正是他这种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军历来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林彪反党集团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本不得人心的，是极端孤立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头子曾经千方百计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都想搞垮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得逞。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只落得仓惶逃窜，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通过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批林批孔，我军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更加奋勇地前进！



儒家的“以礼治军”与林彪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三三二仓库理论小组

军事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并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在历史上，儒法两家之间在军事路线上的斗争，总是同当时的政治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利用反革命的暴力开历史倒车，十分重视反革命武装的作用。他们坚持用孔孟之道治理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军队忠于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更有效地担负起屠杀和镇压劳动人民的职能。他们推行的反动军事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以礼治军”。林彪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儒家的“以礼治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看到周朝“礼崩乐坏”，奴隶制摇摇欲坠，心中急如火焚。他制订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挽回这个局面，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为此，孔老二又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开出了“以礼治军”的药方。他鼓吹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主张用“周礼”来治军，使军队成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有力工具。他还反复解释道：“仁者必有勇”，“勇而无礼则乱”。就是说，只有做到“克己复礼”的人，才能为没落奴隶主的利益去作战。如果光有勇，而不以“周礼”为指导，就会“犯上作乱”。把这些反动说教归纳起来，就是：将“周礼”灌输于军队，使军队死心塌地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卖命。

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妄想开历史倒车，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除了在政治上效法孔老二，打起“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破旗外，在军事上也忠实地继承了孔老二“以礼治军”的反动衣钵。他的“以礼治军”，就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腐蚀部队，妄图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对于



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军队工作，就是要抓党的正确路线的学习。林彪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提出什么以“四好为纲”来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使军队为他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他胡说什么：“军队不抓基层不行，抓基层不抓四好不行。”他那个贴着“四好”标签的所谓“一好带三好”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林彪所谓首先要抓的“政治思想好”，根本不讲党的正确路线，反对部队学习马列主义，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把他那个所谓“一整套”，什么解决思想问题要“雷厉风行”、什么“六个战术原则”之类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向部队强行灌输。林彪的死党曾经毫不隐讳地叫嚷：“政治思想好的最高标准”，就是以林彪为“榜样”。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林彪的所谓“政治思想好”的反动实质。这样的“一好带三好”，只能带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林彪满以为他这样一搞，就可以偷天换日，使“军旅有礼”，成就地主资产阶级搞复辟的“武功”了。可是，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照耀下，我军广大指战员始终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胜利前进的，林彪炮制的这一套在广大指战员中是根本通不过的。

毛主席早就告诫全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林彪既然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为“悠悠万事”中的“大事”，效法孔老二“以礼治军”，必然要夺党的兵权，夺人民的兵权。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在东北一再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拥兵自重，向党闹独立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更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争个人的兵权。他授意他的死党，不论担任什么职务，工作多忙，都要把主要精力用来阴谋抓军权。孔老二不是叫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把政令、军令的大权都集中在奴隶主头子的手中吗？林彪正是学着孔老二的样子，在军事上大搞“正名”，炮制缔造者不能指挥的反动谬论，说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由他“直接指挥”，妄想由他和他的死党“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彪还加紧组织反革命大、小“舰队”，以作为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队伍。林彪的这些罪恶活动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野心极大的资产阶级大军阀！

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和儒家重视军事，把军权牢牢抓在手里，目的就是要用反革命的暴力，残酷镇压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维护和复辟旧制度。对这一



点，汉朝的儒生班固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看！他们就是要把刀架在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头上，达到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目的。儒家讲“仁”，讲什么“去兵去食”，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在儒家的言行中，人们很难把“仁”字和“杀”字区别开来。儒家屠杀人民和杀害有进步思想的人士，是很残酷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揭露过：满篇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翻开历史看一看，凡是孔老二及其门徒大唱“仁”字高调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手挥杀人刀，残酷镇压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时候。那个被反动阶级捧为“仁者爱人”的“至圣先师”孔丘，就是儒家屠杀人民的元凶。当郑国的子大叔在“萑苻之泽”把起来造反的奴隶“尽杀之”以后，孔老二立即欣喜若狂地大叫道：好啊！对老百姓太宽了，老百姓就要闹事，闹事就狠狠镇压（“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儒家的“亚圣”孟轲同样是一个刽子手。他平时装得连杀牛羊都不忍心看，可是，一到他看见或听到谁反对“克己复礼”，就马上凶相毕露地力主“征伐”。他竭力鼓吹诸侯一次不来朝见周天子就降低官职，两次不来朝见就削减封地，三次不来朝见就发重兵剿灭。他还叫嚷：“善战者服上刑”，要把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中善于对奴隶主阶级作战的人处死。真是凶残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人民公敌蒋介石在这方面所讲的和所做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诬蔑为“匪”，把发动反革命内战、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说成是“仁”，胡说什么“剿匪就是行仁”。就在这面“仁”字的破旗下，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接着在全国各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革命群众开枪。三、四年内，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

林彪搞“以礼治军”，与党争兵权，其险恶居心就是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为他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林彪不是抽掉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说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吗？今天，我们把他这些黑话同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对照起来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他要解放的是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他要“镇压”的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但是，这只不过是林彪的痴心妄想！“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广大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铁拳砸得粉碎！



儒家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搞“克己复礼”，镇压革命人民，往往要同国外反动派相勾结。“以礼治军”的军事路线，实质上也是一条卖国投降的军事路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就是借助洋枪洋炮屠杀中国人民的卖国贼。在西方列强对我国大肆侵略的时候，他不但不作任何抵抗，而且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屠刀对太平军进行血腥的“讨伐”。他公开说：“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他的门徒李鸿章甚至叫嚷：洋兵“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这是何等无耻，何等疯狂！他们依靠外国侵略军队的淫威，成千成万地杀人。天京被攻陷后，他们自己供认，三天之内就杀了十几万人，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

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搞“以礼治军”，决定他必然要同国外敌人相勾结。他把孟轲的“小国师大国”写成条幅挂在黑窝里，当作座右铭。在《“571工程”纪要》中，他妄图和苏修里应外合，借助苏修的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失败后，又私乘飞机，投奔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实证明，林彪也是为搞复辟倒退走上叛国投敌道路的大卖国贼。如果林彪真的实现了依靠苏修充当儿皇帝的迷梦，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就要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就要重新沦入苦难深渊。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林彪及其死党毕竟是脱离人民的、极端孤立的一小撮反动派，他们的阴谋活动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反对，因而注定不能得逞，其结果，比历史上的反动派失败得更惨。

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由那个阶级掌握枪杆子，用什么政治路线统帅枪杆子，枪杆子为什么政治目的服务的问题。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现在，林彪虽然已经自取灭亡，但是，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并没有彻底肃清，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我们每个革命战士的根本任务。



揭穿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某部六连党支部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开展，我们连队在批判林彪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结合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深入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批判过程中，我们通过剖析林彪的罪恶历史和他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罪行，揭露了林彪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剥掉了他的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为了剥掉林彪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我们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在我军历史上各个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的有关著作和论述，然后翻阅有关资料，找出林彪在这些历史关头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运用对比的方法，弄清毛主席是怎样指示、怎样部署的，林彪是怎么说、怎么干的。这样，就使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一贯右倾的原形毕露。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林彪却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怀疑革命，看不到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之可能，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为此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以后，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通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历史的真象。可是，林彪竟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他没到过三湾，却标榜自己对“三湾改编”有功；明明对革命悲观动摇，却书写“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反动诗词，妄图翻历史的案。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又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写反党文章，吹捧人民公



敌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拥护叛徒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蒋介石有“和平诚意”，声称愿同蒋介石在东北“合作”。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他一再抗拒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战略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林彪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英明决策。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我党对苏修所进行的原则斗争是“做绝了”，妄图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为了加深认识，我们还请了两位老红军作报告，揭发批判了林彪在长征途中伙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的罪行。历史事实不容颠倒。把林彪历史上所犯的右倾错误，同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卖国投修的无耻行径联系起来，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林彪决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道道地地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的历史根本不是什么“常胜将军”的历史，恰恰相反，乃是一部右倾、投降卖国的罪恶史。

为了进一步揭穿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丑恶面目，我们还组织全连同志分析我军战史上的典型战例——辽沈战役，从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角度，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

毛主席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这次战役从准备到结束，一直存在着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在分析这次战役时，我们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然后运用辽沈战役形势图，采取讲课辅导的方法讲解辽沈战役全过程。接着引导大家联系辽沈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

一是从战役前对政治军事形势的不同估量，选定决战时机来分析对比。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全面而精辟的分析，看出了决定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



熟，英明果断地下了同敌人实行战略决战的决心。而林彪却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怕这怕那，顾虑重重，对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很长一段时间将东北我军主力部队徘徊于长春与沈阳之间，拒不南下。这完全暴露了他消极避战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

二是从战略主攻方向的不同选择来分析对比。毛主席根据当时东北战场我军的有利条件，明确指出主攻方向应在北宁线，“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主席提出的我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然后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是东北战场作战唯一正确的方针。而林彪却违背全局利益，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胡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提出首先攻打长春，把我东北主力留在北线作战的荒谬主张。这充分说明他丝毫没有战略头脑，是一个害怕打空前未有的大歼灭战的胆小鬼。

三是从作战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那里来分析对比。毛主席全局在胸，明确指示必须把中心注意力放在锦州作战方面，集中兵力，首先攻克锦州。因为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战场的战略要地，是敌人的致命弱点，拿下了锦州就可以关门打狗，置敌于死地。可是，林彪在辽沈战役的序幕揭开以后，又想避开锦州，一会儿想打山海关，一会儿想回师去打长春。这充分说明林彪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作战方针，看不到先打锦州对全局的重大意义，反而一意孤行，竭力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四是从要不要全歼敌人的问题上来分析对比。当我军攻克锦州切断北宁线以后，营口便成了敌人从海上逃跑的唯一退路。毛主席曾多次急电林彪，命令他派部队堵住残敌退路。而林彪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拒不派兵控制营口，结果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这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打歼灭战、主张打击溃战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有力地说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不是“作战有功”，而是犯下了放敌南逃的大罪。

通过这样的分析对比，同志们更加认识到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正确和毛主席作战指挥的英明，进一步认清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革命的危害。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在斗争实践中体会到，水有源，树有根，要彻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进行分析。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研究儒法两家在政治、思想、军事上斗争的历史经验，深挖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根源，认识到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孔孟之道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毛主席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历史上，儒家宣扬“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谬论，也顽固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这就注定他总是高估反动派的力量，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抗毛主席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陷入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军事科学，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林彪信奉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决定他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林彪鼓吹的所谓战术原则，是形而上学的死板教条，是儒家“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的翻版。他的“六个战术原则”，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完全是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

经过学习和批判，使干部战士深刻地认识到，林彪在政治上效法孔老二，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在军事上必然效法儒家“以礼治军”，妄图用孔孟之道破坏我军建设，改变我军性质。林彪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常胜将军”，是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以达到他改变党的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搞复辟、投降卖国的反动派，决没有好下场，林彪也不例外。

通过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推动了连队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决心继续认真学习，努力作战，把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使连队永远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连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这是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批林批孔运动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连队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过程中，重点批判了林彪这一罪行。

为了掌握好思想武器，我们首先组织全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在这部光辉历史文献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建党建军方面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强调了“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同志们通过忆历史、看现在，深有体会地说：我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战斗历程，就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了无数险滩暗礁，战胜了阶级敌人的反抗和错误路线的干扰，几经曲折，转危为安，直到夺取全国的胜利，靠的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毛主席又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照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灯塔，是全国军民的生命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夺取了党内外一个个斗争的伟大胜利；我军也在这些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和锻炼。斗争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抓党的路线学习和教育。讲路线，就要讲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军建设的头等大事，抓住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就能纲举目张。广大指战员只有在斗争中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真正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在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路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后，我们引导同志们瞄准靶，放好枪，有重点地深入批判了林彪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的谬论。林彪用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胡说什么，进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是地方干部的事情”，“只要两个小时就行了”。这是林彪反对部队进行正确路线教育射出的第一支毒箭。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这是毛主席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所作的科学总结。毛主席把路线斗争、路线教育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反复深入地向广大工农兵和其他革命群众，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十分气愤地批判了林彪的谬论。他们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心中有鬼，最害怕党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群众所掌握。毛主席教导我们对路线问题要经常讲、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却叫嚷“只要两个小时就行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对路线问题要使广大革命群众包括我军广大指战员都知道，而林彪却说“是地方干部的事情”。这完全是别有用心胡说八道！林彪散布这些谬论的实质，就是妄想使我军脱离从古田会议以来毛主席亲自奠定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轨道，妄想把毛主席、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我军路线政策教育，同地方的路线政策教育割裂开来。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去教育部队，就象汽车没有了方向盘，钢枪没有了准星，战士没有了主心骨一样，我军必然会失去无产阶级的革命灵魂，偏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里，林彪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反对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部队的狼子野心。

接着，我们又组织干部战士回顾了连队的成长史，来加深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连队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中，由于经常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贯注于士兵之中，激发了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干部战士有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心明眼亮，英勇善战，在战争中曾经以少胜多，屡立战功，获得了上级党委授予的“能攻能守”，“顽强果敢”等光荣称号。全国胜利以后，我们不断组织全连同志学习古



田会议决议，经常进行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传统的教育，较好地完成了行军、训练、执勤、施工等项任务，受到了人民群众和上级的赞扬。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连同志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战斗，在斗争中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军队性质、建军方向、为谁服务的头等问题。路线觉悟，是革命战士的根本觉悟。有了这种觉悟，就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人民而战，粉身碎骨也心甘！有了这种觉悟，就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不断立新功。

林彪反对用正确路线教育部队，还鼓吹什么“政治教育”要抓“活思想”、“活教育”。这是林彪射出的又一支毒箭。

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著作中强调指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为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体会，部队一定要把进行政治路线的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进一步强调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号召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保证。只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思想政治路线搞正确了，进行各项具体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才能找到正确的办法。林彪猖狂反对部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离开阶级分析去讲抓“活思想”、“活教育”，这就有力地说明他仇视和反对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一方面，他竭力混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界限，否定对各种思想倾向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否定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妄想以突出他那一套资产阶级政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社会主义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又竭力混淆党的路线教育与解决战士具体思想问题的界限，否认政治教育首先应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路线觉悟，妄想以所谓抓“活思想”，来冲



击、代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战士们指出，林彪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在部队思想建设问题上抛出这一套私货，用心十分恶毒。什么抓“活思想”，难道世界上还有死思想？林彪整天“抓”过来，“抓”过去，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部队引到只抓鸡毛蒜皮这些小事的邪路上去，而忘记革命路线这个大事，丢掉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使整个部队的工作提不起纲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是在建军问题上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原则界限，是关系到我军性质的根本问题。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指挥枪”**的原则，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设军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广大指战员中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我军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保持我军无产阶级的性质，使我军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担负起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战士们说得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一直占主导地位，广大指战员同全国人民一样，热爱毛主席，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林彪破坏我军建设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按照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对党员和非党员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这一运动看成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极好时机，把它作为向全连干部战士进行路线教育，提高路线觉悟的最好课堂。党支部成员带头学，带头批，并组织全连同志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奴隶出身的彝族战士，也登上了宣讲儒法斗争史的讲台，全连有五名战士，先后在地方党委和上级机关组织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发了言，战士理论队伍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茁壮成长。党支部的思想、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全连军政素质不断提高，指战员正在能文能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湖南岳阳县毛田公社党委会

我们毛田，解放前叫“茅田”。那时候，“山是剥皮山，水是祸害水，土是挂壁土，田是沙洲滩”。好年景，亩产也不过两、三百斤。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毛田的面貌完全变了样。三万五千亩荒山造上了林，百分之九十八的农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五百多亩沙洲改造成了良田。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倍半，亩产达到一千多斤。集体储备粮不断增多，社员生活逐年提高。多种经营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我们公社，范围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十五个农业大队，有社办企业，还有文教、卫生、财贸等项事业。工作千头万绪，究竟怎么抓，抓什么？我们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坚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有这样，集体经济才能日益壮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不断巩固。我们公社有两个自然条件同样好的大队，过去生产都比较落后。一个大队以大寨为榜样，狠抓两条道路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多斤。而另一个大队却不是这样，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有及时打击，对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坚决批判，而想通过一些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后进面貌迟迟不能改变。事实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农业生产，社队企业，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就抓住了根本，各项工作就能提起纲来。离开了这个根本，不光生产抓不上去，工作做不好，还会偏离正确方向，甚至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毛主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的教导的认识。在各项工作中，我们就比较自觉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们经常组织贫下中农讲家史、村史、队史，进行新旧两个社会制度的对比，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比，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联系农村实际，揭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一九七二年，我们公社遇上百年未有的干旱，一小撮阶级敌人散布什么“人要害人天不肯，天要害人草不生”，“大灾临头，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谬论，煽动资本主义倾向。少数干部也产生了悲观情绪。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依靠集体经济战胜灾害，还是搞歪门邪道？广大贫下中农回答说：“越是困难，我们越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越要坚持斗争哲学”。大家揭露批判阶级敌人破坏抗灾斗争的罪恶阴谋，针锋相对地提出：“斗天斗到天低头，天不低头誓不休”。全公社男女老少齐上阵，斗志昂扬，日夜奋战，大灾之年夺得了丰收，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社员们说：“抗灾斗争的胜利，就是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

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善于引导群众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果不把界限划清楚，就容易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比如说，在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不分清方向、路线，认为只要给群众一些物质利益，就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有的队甚至把集体的地暂时借给社员种油菜，搞“小秋收”。这样做符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提到两条道路



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讨论。大家认为，积极性有两种，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不可能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相反，会腐蚀人们的思想，助长资本主义倾向，削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靠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靠政治思想工作来调动。通过分析讨论，干部划清了是非界限。过去，在农忙季节，有的干部采取提高工分来“刺激”群众积极性；现在生产越忙，越抓紧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近三年来，全公社社员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平整土地一千五百多亩，新建小水库十二个，整修山圪一百二十多个，改修大小排洪圳四千多条，修建排灌渠道一百二十多里，在沙害严重的地方还修筑土、石谷坊三百多个，沉沙池六千多个。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总和的五倍。

深入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界限。我们在政治夜校开设了基本路线教育课，联系本地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实际，编写基本路线教材，向群众宣讲。把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的政策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起来，使基本路线的教育经常化。群众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就有了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标准，就能坚持正确的，抵制错误的。道云大队梅树生产队去年在订种植计划的时候，有人认为药材收入高，种粮不如种药材，提出要压缩粮食生产的面积，多种药材。但是贫下中农不同意，他们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情，都要想到国家，想到社会主义。只图小集体多赚钱，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助长资本主义”。干部群众批判了“以钱为纲”的资本主义倾向，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按照先国家、后集体的原则，落实生产计划，保证了粮食生产面积，同时利用山坡地，适当种了一些药材。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在种植计划上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公社粮食生产的面积扩大了六百多亩，多种经营也增加到二十多个项目。

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还要根据各项工作的特点提出问题。社办企业，是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还是只图赚钱？农村商业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从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需要出发，还是片面追求利润指标？农村教育要不要贫下中农管理，是不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人材？农村卫生工作方



面要不要办合作医疗，是不是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等等。这里都有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界限清，方向明。由于我们发动广大群众划清了这些界限，全公社的各项工作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公社农机厂以修配农机具为主，平时随到随修，农忙组成支农小分队，服务到田间，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商店根据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需要积极组织货源，搞好收购，农忙季节，增加服务项目，延长服务时间，经常出货郎担，送货上门，努力改进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卫生院医务人员深入到生产队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帮助大队培训赤脚医生，发展中草药，为巩固合作医疗贡献力量。学校在贫下中农管理下，实行开门办学，经常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林批孔，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为着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积极发挥作用。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必须重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认为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上边的事，农村干部管不管关系不大，是不对头的。我们和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回顾和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经常利用孔孟之道来进行破坏活动。比如，我们发动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阶级敌人就散布“龙脉”、“风水”一类的迷信思想；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阶级敌人就散布“天命论”，妄图动摇我们战天斗地的决心；在我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时候，阶级敌人就利用“乖人赚钱，蠢人种田”，“人不出门身不贵”等旧观念，煽动劳力外出，搞副业单干，等等。而我们的每一次胜利，正是由于批判了阶级敌人散布的孔孟之道取得的。这就说明，农村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只有坚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揭露和批判了阶级敌人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腐蚀人们思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部群众深入学大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团结战斗，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今年全公社早稻一季平均亩产达到七百



多斤。

为了推动批林批孔深入、持久、普及地进行下去，我们注意发挥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农村学校师生的积极作用，组织他们和贫下中农、农村干部相结合，开展社会调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带动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目前，全公社正在出现一个男女老少齐参战，田头屋场摆战场，队队办大批判专栏，家家写大批判文章的热烈景象。牟楼大队白坳生产队二十多名妇女，在女生产队长的带领下，联系实际召开了二十多次批判会，写了九十多篇批判文章。她们通过批判孔孟之道“男尊女卑”和林彪诬蔑妇女的反动谬论，主人翁的精神大发扬，立志顶起“半边天”。今年来，她们和本队的部分社员、学生一道，垦山造林十多亩，改造了三十多亩冷浸田，新建了一个大山塘，还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开山造田三亩多，用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在群众中涌现出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热情扶植和支持这些新生事物，用新的东西去战胜旧的，代替旧的东西，才能使社会主义思想牢固占领农村阵地。同心大队的青年们针对阶级敌人利用旧小说、旧山歌、旧故事腐蚀社员群众的破坏活动，经常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全大队出现了二十多个故事员。他们在田间地头和政治夜校，通过讲故事宣传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表扬“农业学大寨”中的新人新事，很受社员群众欢迎。我们总结推广同心大队的经验，建立了三十多个革命故事小组。全公社一个用新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思想、旧文化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现在，队队办起了政治夜校，部分生产队还办了图书室，干部群众学政治、学文化，讨论国家大事；群众性的文艺宣传队，利用工余时间活跃在田头屋场，演革命戏，唱革命歌，宣传毛泽东思想，表彰新人新事；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青年、民兵，劳武结合，练思想，练本领；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婚嫁喜庆，不要彩礼，不办酒席，不搞铺张浪费；讲科学，破迷信，不信天命信革命，遇灾害病不求神，队上死了人，开个追悼会。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发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越来越巩固。

在开展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既尝到过甜头，也吃过苦头。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带领广大群众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执行正确路线 夺取小麦高产

——河南新乡地区的调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新乡地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小麦获得了大面积、大幅度增产。今年，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战胜了持续的严重干旱，小麦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近五百万亩小麦，平均亩产四百斤以上，一季跨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单产和总产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都增长近两倍。

新乡地区小麦增产的事实，又一次说明了革命是推动生产的动力。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生产条件就可以得到较快的改变，从而加速农业发展的步伐。

新乡地区是小麦集中产区。历年来小麦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复播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争取小麦增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自然面貌改变不大，小麦亩产长期徘徊在百斤左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黑货，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小麦产量逐年提高，并出现了一批亩产四、五百斤的社、队。这些高产单位的事实，教育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潜力是很大的。既然一个队、一个社的小麦能够高产、稳产，为什么不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平衡增产呢？

但是，在这个问题面前，人们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有的说：“人家的经验好是好，咱没条件学不了”；有的认为，一些社、队的产量高，是因为“风调雨顺”；有的则认为“只要把生产措施学到手，就可以了”。总之，他们认为一个队、一个



社可以办到，一个县、一个地区是难办到的。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地委分析和回顾了全区农业发展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发动各级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联系实际，总结了一些基层单位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实现小麦高产的经验。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认真学大寨、夺取粮棉双高产的事迹，给大家以很大启发。七里营公社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亲临视察过的先进单位。这个公社地处黄河故道，过去是沙荒、盐碱、茅草窝，旱、涝、碱、沙为害严重，多灾低产。建立人民公社后，生产逐年发展，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斗争的信心。十几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寨为榜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针锋相对地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面貌。全公社一万八千亩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八千亩沙岗得到了治理，**开挖整修渠道八百多条**，打成机井近五百眼，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丰收。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超过千斤，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展现出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蓬勃景象。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走毛主席指引的大寨道路，好比吃甘蔗，上楼梯，节节甜，步步高。”七里营公社的经验在全区推广后，广大干部、群众从对比中进一步认识到，发展生产的决定因素不是自然条件，也不是什么生产措施，根本在于是否坚决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要走大寨的道路，就必须从路线上找差距，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

阶级斗争是农村中存在着的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社会主义时期，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始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事实证明，一些小麦高产的社、队所以能够持续前进，就是因为他们比较自觉地抓住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断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些社、队步子迈得不大或长期踏步不前，主要是由于没有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为了使大家清楚地认识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新乡地区地、县两级党委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分期分批组织力量，深入到一些比较落后的社、队进行调



查研究。温县赵堡公社的赵堡大队和西水运大队村连村，地连地，条件差不多，可是赵堡大队亩产小麦九百多斤，西水运大队却只有二百八十斤。是西水运大队条件差吗？不是。社员说：“差就差在路线上。”原来西水运大队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方向道路不明，阶级敌人乘机煽动资本主义倾向，社员对搞好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后来在县委帮助下，对这个队加强了领导，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了干部、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经过几年努力，今年小麦亩产达九百多斤。

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那些步子迈得不大或长期踏步不前的社、队，不是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高，而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还没有肃清，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因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受不到打击，资本主义的活动还有市场。各级党组织在回顾和总结中体会到，过去后进社、队的面貌改变得不快，就是由于没有抓住这个要害。不论抓先进，还是抓后进，都必须紧紧围绕解决方向道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识别、抵制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后进社、队的阶级斗争比较复杂，客观物质条件暂时也差一些，但应该首先看到，这些社、队的贫下中农有着强烈要求改变面貌的愿望，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潜力很大。后进社、队上去了，可以更好地促使先进的更先进，中间的赶先进。近几年来，这个地区各级党组织把抓后进提高到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认识，着重抓了这些单位的转化工作。农忙季节，全区有上万干部深入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劳动。新乡、温县、沁阳等县，近几年抓了一千多个后进队的工作，使先进单位的经验更好地在面上得到推广。这样就使后进面不断缩小，先进面不断扩大，促进了小麦大面积的平衡增产。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抓住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们认为，要大干社会主义，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不行。经过几年奋战，现在全区麦田可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每亩平均施粗肥四方，氮、磷肥七十多斤，百分之九十的麦田进行了深翻改土，基本实现园田化。这些条件为今年小麦一季上《纲要》创造了物质基础。在生产斗争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寨的英雄业绩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靠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干苦干，干出来的。学大寨，就要学路线，就要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大干社会主义，要有敢于做大自然主人的革命英雄气概。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人们头脑中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有的干部总是强调客观困难，缺乏雄心壮志，认为山区土薄石厚缺水源，低洼盐碱地区涝了淹，旱了碱，要想增产难上难。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复批判了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天命论”，广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因循守旧、修修补补，实际上是怕苦怕累的懒汉懦夫世界观的表现。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松松垮垮改变不了面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办好集体经济，就得不靠“天命”靠革命，迎着困难向前闯。

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对自然条件的看法也就大不相同，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山区的干部认为，修水库有山沟，修田垒岸有石头，造水泥、烧石灰，原材料就地有。沙碱地区的干部认为，沙岗植树造林，可以变“银行”，盐碱洼地治碱改土，可以变粮仓。加速改变生产条件成为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许多县、社积极制订了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安排河山的规划。地处山区、丘陵的辉县，在重新安排河山的斗争中，通过反复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罪行，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狠狠批判了阶级敌人在水利建设中散布的“挖断龙筋，一辈子受穷”等反动谬论，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大干部、群众信心百倍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天上掉不下来，别人送不来，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干苦干才能干出来。他们治山治水，采取蓄住天上水，引出沟泉水，挖出地下水，截住潜流水，提水上山岗的办法，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山区每人七分大寨田，今年小麦一季上《纲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经发挥出来，过去较长时间才可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办到。原阳县原武公社，过去是“无雨白茫茫，有雨水汪汪”低洼易涝的重盐碱区。曾经有人断言，除了移民、逃荒、种苇子，没有别的出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干部群众批判了这种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掌握了治碱治水的规律，大干苦干，采取引黄淤灌、改造盐碱、稻麦两熟的办法，使老碱窝变成了米粮仓。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较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了四番。几年来，全区每年冬春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百多万人，四年间共完成土石方两亿三千多万方，使水



浇地面积较文化大革命前扩大了一倍，实现了每人一亩二分水浇田，有力地保证了大面积小麦高产稳产。

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最近几年新乡地区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迅速发展起来的地方“五小”工业，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地方工业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实质上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地方工业的发展，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工农联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才能很好地发挥工业支援农业的作用。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尚未肃清，追求利润和贪大求洋等错误思想经常冒出来干扰。有的机械厂在开始时，坚持修、改、造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比较主动，一旦逐步发展起来，就往往重制造、轻修理，偏离为农业服务的轨道。对这种情况必须警惕。为此，新乡地区抓紧了对工业部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及时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使工业支援农业的自觉性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工厂为支援农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区从制造排灌机械入手，普遍建起三级农机修造厂，为四万八千多眼机井配了套，还发展了水泥工业，保证了打机井，修渠道，建水库的需要。同时，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建起了小钢铁厂和小煤矿；县县还办起了小氮肥厂和小磷肥厂。济源通用机械厂等许多单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生产了大批水利机械供应农村，并经常组织农机检修队，肩挑工具，深入田间、井台检修机具，传授技术。延津、孟县等机械厂为支援农业，甘当“配角”，生产急需的农机配件，为农业机械化服务，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

新乡地区每年种植小麦近五百万亩，现在发展还不很平衡。进一步充分发挥和组织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生产潜力，实现小麦和粮棉更大的增产，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年以来，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对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以及孔孟之道的批判，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总结今年小麦增产经验的同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教导，决心继续前进，为争取小麦更大增产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作出更大努力。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调查组



为革命多出煤

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党委会

我们矿已经开采了半个世纪。一九六二年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断定矿井面临衰亡，全矿的日产水平一年要减少一千吨，进入七十年代就得收尾关矿，结果挫伤了职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煤炭产量逐年下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矿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老矿又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八年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共增产煤炭一百多万吨，相当于一座大型矿井一年的产量。批林批孔又开创了新局面，现在的一个唐家庄矿的产量，已经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两个唐家庄矿了。

回顾几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敌人和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或者用生产来压革命，或者通过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因此，在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在我们唐家庄矿，这种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是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这是检验我们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的一个标志。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是对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的科学总结，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根本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能使革命不断前进，生产步步上升。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比较好，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抓了路线，比较自觉地坚持了这个方针。

几年来，我们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实践中，经常遇到如何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在生产任务紧张、被动时，往往注意抓生产，忽视首先抓革命、用革命来统帅生产；而当政治运动来了，又容易产生忽视用革命促生产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常常反复出现。为了正确理解和处理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我们经常组织干部群众联系实际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九五七年，经过整风反右斗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煤炭生产的迅速发展。经过大跃进，我矿跨入了全国煤炭系统的先进行列。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只管生产，不抓革命，几个党委书记分工抓掘进，抓回采，抓运输，但因为路线不对头，越抓越被动，煤炭产量逐年下降。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端正了办企业的方向，广大职工进一步提高了路线觉悟，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党委注意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及时地组织起来，解决好生产环节问题，使得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革命和生产是对立的统一，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首先把领导的思想路线搞正确，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折衷主义。

列宁在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时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个企业的党组织需要管的事情很多，但是，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革命摆在首位，在形势好、工作顺利的情况下，要注意把革命放在首位；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要坚定不移地把革命抓好。一九七二年底，正当全矿即将完成全年增产计划的时候，开滦煤矿有两个矿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给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带来了很大困难，我矿



广大职工为了保全局，主动提出再增产两万吨。我们按群众的意见修订了增产计划。时间紧，任务重，是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还是放松革命只抓生产呢？当时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及时地用过去不抓革命、生产倒退，抓革命、生产跃进的经验教训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坚持把革命放在首位，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抓大事，促大干，同时，加强对生产的领导，结果，不仅完成了新的增产计划，还超产八千六百吨。

今年以来，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开始有些同志认为运动来势这么猛，声势这样大，担心运动会影响生产，对年初党委制订的提前一年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翻一番的计划，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思想，我们首先组织党委成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使大家明确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必将对经济基础产生深刻的影响。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广大职工的路线觉悟提高了，就能激发出巨大的智慧和力量，生产任务一定会完成得更好。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坚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运动，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广大职工群众的责任感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断增强。在集中精力抓好批林批孔的同时，对生产也进行了统筹安排。研究制订了提前一年实现产量翻一番的具体措施，详细分析了实现产量翻一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发动群众抓大事攻难关，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在批林批孔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工人们说：“林彪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干部群众更加自觉地把提前实现产量翻一番计划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联系起来。大家说：产量翻一番是开滦广大工人和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为了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提出的。林彪一伙越是攻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越要鼓足革命干劲，坚决用大干、苦干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全矿掀起了新的生产热潮，原煤产量创造了我矿早采历史的最高水平，提前一个月达到了翻一番的水平，并



从三月份以来月月巩固住翻一番的水平。工人们说：路线搞对头，生产一步一层楼；煤炭产量实现翻一番，是我们批林批孔的物质成果，也是对林彪、孔老二的有力批判。

我们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实践中，还体会到，抓革命必须紧密联系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联系生产领域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通过抓革命，不断端正办企业的方向路线，解决好发展生产的根本问题。这样才能够抓了革命促了生产。因此，从批林整风以来，我们注意把办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作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靠什么来发展生产，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靠“物质刺激”？这是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重要问题。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对“物质刺激”进行过深入批判，但是，有的同志并没有完全从路线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注意抓住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联系本单位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历史，来解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许多同志说：靠奖励去刺激群众的积极性，这不正是中了孔老二“小人喻于利”的流毒吗？刘少奇和林彪竭力鼓吹“物质刺激”，就是想用金钱腐蚀工人阶级，把我们引向修正主义邪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回击刘少奇、林彪的反动谬论。青年快速掘进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响了快速进尺的硬仗，今年两次实现了单孔全煤月进一千八百米，创造了全国快速进尺的先进水平。工人们豪迈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最高月进尺只有七百零八米，现在我们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掘出了一千八百米，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巨大威力。

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不仅要依靠他们干，更重要的是依靠群众管路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经历一个认识过程的。在老矿挖潜过程中，由于产量不断提高，原有提升能力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始，我们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搞水力提升的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国家调拨一些设备，投资大，见效慢。方案提出以后，我们就想发动群众干，可是群众却贴出了大字报，指出这个方案不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是少慢差费的。他们建议把原来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封闭了的一个提升井恢复起来。这样做的结果，由于利用原有井筒和设备，投资少，见效快，只用二十三



天，花七万元就投入了生产，比我们原设想方案缩短一半时间，少花十几万元，每年加大了三十五万吨提升能力。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大，使我们认识到广大煤矿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常年战斗在煤海里，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的工人说：“党是我的妈，矿是我的家。要听党的话，管好我的家。”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许多老工人二十几年不缺勤、不误点，兢兢业业为革命多采煤；同时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人。广大工人是革命和生产的主力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首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依靠他们把好路线关。从此，我们建立起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组织，经常召开有老工人参加的三结合会议，研究革命和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去年，我们矿一座续建井要投产。按照常规，需要增加一批新工人，当时不能及时补充。是消极等待还是积极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我们发动群众讨论，工人们建议采取兼（兼职）、并（合并同工种）、减（减少辅助工）、代（以弱代强，以女代男）的办法，不仅调整出了新井投产需要的人力，而且进一步调整了劳动组织，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洗煤厂在抽出一部分工人支援新井后，不但没有影响生产，反而促使他们改进了旧的工艺流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为革命抢困难，挑重担，每年都主动要求增加生产任务。群众干劲越大，我们越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要注意抓好安全生产。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安全与生产发生矛盾时，我们首先抓好安全。去年九月份，我矿新投产的一个工作面，地质条件发生变化，威胁着安全生产。我们首先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不安全的问题，克服那些不安全因素，虽然产量暂时受些影响，但随着工作面条件的改善，工人的生产情绪更高，煤炭产量也随着大上。

抓革命，促生产，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广大工人说得好：革命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生产要年年促，月月促，天天促。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努力发展煤炭生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 国际述评 ·

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揭穿苏修所谓“天然盟友”的假面具

南 景

前不久，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歪曲事实，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神话，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给发展中国家“以援助和支持”的方针。但是，听其言，观其行，苏修对第三世界贪得无厌的掠夺与剥削，是任何动听的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苏修头目装腔作势的自我表白，只能是越描越黑，欲盖弥彰。

五十多年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基本特征，指出了垄断资本进行对外扩张的必然性。今天的苏联，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苏修必然要对外争夺原料来源，争夺投资场所，争夺销售市场，争夺世界霸权；决定了它不可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真正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口头上喊“支持”，暗地里搞破坏。苏修的自我暴露，使人们越来越看清楚，它根本不是第三世界的什么“天然盟友”；而是象第三世界的舆论所揭露的，“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是“按照一个超级大国的野心和阴谋行事”的。

苏修为了标榜自己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经常把所谓“援助”挂在嘴边，抓住一切机会来自卖自夸。好象这样一来，就足以掩盖它以强凌弱，以大压小，损人利己，到处伸手的行为，就足以使人相信它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但是，苏修这种所谓“援助”，无论就其目的、手段，还是后果来看，都恰恰证明苏修是一个口蜜腹剑、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外掠夺和剥削的时候指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又是跟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密切联系着的。这就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剥削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对外扩张，而且指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正是为了在地球上瓜分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苏修搞的所谓“援助”，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只不过苏修输出的资本加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标记罢了。

苏修在第三世界搞的所谓“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都是从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的。苏修的“经援”，实际上是利用第三世界国家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枷锁，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通过贷款、投资等方法，对受“援”国进行经济渗透，控制要害经济部门，掠夺自然资源，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把受“援”国变成它的政治、经济附庸，从而加强它在争夺世界霸权中的地位 and 实力。

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罪恶时曾经指出：“**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今日苏修的资本输出，则是用一笔“援助”，进行四层剥削：第一，它从贷款中直接榨取利息，如印度现在每年偿付给苏修的旧债利息和利息的利息，要比它同年获得的新贷款数额高出四分之一。第二，受“援”国必须用贷款高价购买苏修的陈旧设备和积压物资，苏修通过这种资本输出带动的商品输出获取大量的利润。第三，规定“援建”企业建成后，要拿生产的实物或其他廉价原料来偿还贷款，苏修又从压价收购中榨取差价。第四，向受“援”国派出大批苏修的“专家”、“顾问”，索取高额工资和津贴，无理要求享受种种特权，甚至打入受“援”国的要害经济部门，形成“影子内阁”，干涉内政，进行幕后操纵，并用各种手段排挤打击不满苏修的人。苏修的这种“援助”，简直是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四张皮来。不仅如此，苏修还以“国际分工”为名，力图把别国的重要经济部门纳入它的经济“计划”，使受“援”国的经济畸形发展，逐步加深对苏修的依赖，直到变成苏修的原料库和加工厂。

至于苏修的“军援”，更是赤裸裸地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经常吹嘘它的“军援”是什么“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性的鲜明例证”，其实，苏修的“军援”，完全是乘人之危，一面从推销过时武器中大发横财，一面



以“军援”为要挟手段，加紧对受“援”国的控制。谁接受了苏修的“军援”，第一，要高价买进，现金交易，外汇支付。逼得有的受“援”国不得不到欧洲金融市场去借苏修需要的美元。第二，苏修乘出售军火之机，套购受“援”国的重要原料，然后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例如它在中东用军火换石油，再转口到欧洲市场上去高价出售，攫取几倍的超额利润。第三，苏修的军事“顾问”要控制受“援”国的军事指挥、供应和训练，受“援”国还要提供港口、基地的“使用权”等等。象这样的所谓“军援”，那里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气味，它是地地道道的苏修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鲜明例证”。七十年代初期，苏修的军火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军火商。

苏修在“经援”、“军援”之外，近来又积极效法资本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大搞对外直接投资。它在“经济合作”的外衣下，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搞了不少有关贸易、航运、银行、保险、维修、装配的所谓“合股企业”，并且公开要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垄断资本订立同盟，合伙在第三国开办企业。去年，苏修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公然要发展中国家“逐步地、分阶段地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由苏修在这些国家兴办“合股企业”，并且说这是“越来越坚定地提到首位”的“合作的新形式”。苏修津津乐道的这种“新形式”，说穿了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反映了苏修要加紧资本输出的新动向。

苏修在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的卑鄙手段中，与所谓“援助”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还有所谓“平等互利”的贸易。这种贸易其实是不等价交换的代名词。苏修贱买贵卖的算盘，打得比资本帝国主义还“精明”。人所共知，现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关系，本来就是在帝国主义占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本身就存在着不等价的交换，而苏修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价格，比当时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一般还要高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相反，它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却比世界市场的价格还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这就等于在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再来一个不等价交换，这是不折不扣的双重不等价的剥削。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它国际奸商的肮脏嘴脸。

当年，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手段时，就指出帝国主义既搞政治“兼并”，又搞经济“兼并”。所谓经济“兼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控制别国的铁路、矿山、土地等等，使一些国家负债，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于帝国主义国



家，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而这种经济“兼并”，并不破坏被“兼并”国家在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列宁说：“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过去正是这样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由于民愤极大，名声太臭，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更隐蔽更狡猾的**殖民主义新形式**，诸如扶植傀儡，收买打手，组织军事、政治集团，利用“援助”作为控制的诱饵等等，推行新殖民主义。而苏修在“援助”的幌子下，对第三世界进行的经济渗透和控制，就是帝国主义经济“兼并”政策的新变种。

苏修之所以拚命地对外进行扩张和掠夺，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今天在苏联当权的苏修叛徒集团，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本身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利用窃取的国家机器，全面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融合，控制着苏联全国的经济命脉。它比资本帝国主义的私人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资本的集中程度更高，垄断性更强。

垄断资本的特性，就是要独占，要掠夺。国内的垄断资本统治，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和侵略。苏修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转嫁国内危机，维持其反动统治，便到处伸手，兴风作浪。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人肉筵席上，是一个迟到的角色，它所垂涎的许多主要原料和市场，都已被其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占有，因此苏修和美帝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苏修不仅要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而且还要控制那些实力不如它的第二世界的国家。至于对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苏修则更是企图关起门来对那些“家庭”成员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苏修的所作所为，使人日益看清，被伟大十月革命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上台。他们借勃列日涅夫之身，还老沙皇之魂，妄图重续“大斯拉夫帝国”的迷梦，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大帝国。但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帝国主义制度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虽然野心很大，但



力量不够，它内在的虚弱本质和它的侵略政策所激起的种种矛盾，决定了苏修的野心终究是不能实现的。任凭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怎样挣扎，也决然改变不了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处境。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大而虚，凶而弱，这就是苏修这个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本质。苏修貌似庞然大物，张牙舞爪，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如今，苏联在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下，人民日益贫困，广大劳动群众已经成为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奴隶，经常受到解雇和失业的威胁。由于苏修拚命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更使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粮食发生困难；加之日益强化的法西斯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苏修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缓和阶级对抗和民族冲突，力图加紧对外扩张，结果就要进一步扩充军备、增加军费开支，促使财政恶化，经济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更加下降。

苏修越是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它背上的包袱就越背越重，脖子上的绞索就越套越多，它的战线拉得越长，就越暴露出它的虚弱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从实践经验中越来越识破了苏修的真面目，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控制和掠夺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最近，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苏修装作要“承认”二百哩经济区的样子，企图继续推行海洋霸权主义的阴谋，遭到维护海洋资源主权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迎头痛击的事实，再一次反映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日益破产。受苏修控制、掠夺的第二世界一些国家和人民，反控制、反掠夺的斗争正在发展。苏修加紧对外扩张，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到处争夺，使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美苏两霸之间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

苏修既然走着帝国主义的老路，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帝国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它尽管横行霸道，到处乱窜，但是挖空心思也开不出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任何药方。苏修越是声嘶力竭地沿街叫卖它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就恰恰说明它的处境孤立，日子很不好过。毛主席说：“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第三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看穿了苏修新殖民主义的真面目。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谁是第三世界的真正盟友，谁是他们的敌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斗争的洪流，必将彻底摧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堆砌的堤坝，奔腾向前。





红旗

一九七四年第十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十期 目 录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5）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洪 宇（8）

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俞 彤（15）

走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

..... 中国共产党大庆油田委员会（20）

坚持革命 努力前进.....大寨大队党支部（26）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三连党支部（30）

毛主席的光辉照列麦.....西藏隆子县列麦公社党支部（35）

红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我国教育阵地的深刻变革朱 研 (40)

批林批孔与知识分子的进步杨荣国 (46)

军民情意深似海

——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秋 实 (51)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梁 效 (56)

论“黔首”石 仑 (63)

评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洪善思 (71)

工人理论队伍的一个创造

——大连红旗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78)

团 结 起 来 争 取 更 大 的 胜 利

团结是胜利的基本保证甘 戈 (83)

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夏 平 (87)

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吕 真 (92)

☆十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语录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
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
计。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了。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战斗的二十五年，是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二十五年。

在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向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向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和正义斗争给予支持的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五年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主席的话，表达了当家作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对自己祖国前途的坚强信心。二十五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经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都在茁壮成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一个以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



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毛主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也证明了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在长时间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结束。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主席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旧制度和旧思想，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并在实践中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起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群众性的清查工作已经初步告一段落的单位，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深入的关键。要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当前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孔孟之道，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提高路线斗



争觉悟，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要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认真总结和推广那些革命和生产搞得好的先进单位的经验，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充分发挥亿万群众在批林批孔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我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各族劳动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解放军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去处理各种问题，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在欢度国庆的时候，我们对台湾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斗争，推动着世界历史车轮前进。在这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当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加倍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全国的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

洪 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胜利地走过了二十五年的战斗历程。

二十五年来，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经过四次重大路线斗争，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反党阴谋活动，保证了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说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及各项政策的正确性，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反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革命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是在不断克服各种障碍和阻力的过程中前进的。新事物一定要代替旧事物，革命力量一定要战胜反动力量，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列宁曾经对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了形象而又科学的概括：“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卡尔·马克思》）毛主席在许多重要著作中深刻地阐明和发挥了列宁这一光辉思想，指出：“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论持久战》）毛主席在谈到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时还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主席这个教导，既指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革命人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又指出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必然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反革命的捣乱与失败，革命人民的失败与胜利，都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它们的交错出现，正是螺旋式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为什么事物的发展是按螺旋式进行的呢？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就是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而前进的过程。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代替旧事物，不能不遇到旧事物的顽强反抗，只有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新事物才能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事物才能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消灭的东西。所以尽管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前进运动，但不可能是直线式的上升，在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一时的程度不同的曲折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是由于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反革命势力的灭亡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革命力量不可能在旦夕之间把反革命势力彻底打败和消灭。这还由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必须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即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经验。只有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多次比较，才能获得对革命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并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实现革命的任务。

然而，螺旋式的发展只是近似一串圆圈，并不是团团转的永远只是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从表面上看，反复和曲折是走了一段弯路，但每战胜一次曲折，克服一次反复，必然伴随一次胜利和前进，把事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每一新的阶段较之旧的阶段，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决不是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为复杂的螺旋式的运动。直线式的观点否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循环论则否认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它们都是否认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都不能不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走着曲折道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历史。以往的革命，无论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



制度，围绕着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都经历了几十年或几百年反复曲折的斗争。剥削制度之间的更替尚且要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较之以往的任何革命，只能经历更加曲折和长期的斗争，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毛主席早就谆谆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讲的，经过十七年的实践，我们对这一点体会得比过去深刻得多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总是要跳出来破坏和捣乱，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并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作为他们搞复辟的政治代表。另外，由于几千年剥削阶级传统思想的影响，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为艰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国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总是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呼应的。阶级敌人总要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有时机，就会兴风作浪。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繁重任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无产阶级必须在长期反复斗争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最后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二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早在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和国际的主要矛盾，预见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为我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规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规定了基本步骤及各项方针政策。建国初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但也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和恐惧。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



家高岗、饶漱石就结成反党联盟，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分裂我们的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阻止社会主义的前进。毛主席领导全党及时揭露和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九五七年乘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又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这充分说明，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还必须彻底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又一次打退了资产阶级大规模的猖狂进攻，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毛主席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出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大好局面。但是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妄图分裂我们的党，阻止社会主义洪流奔腾向前。毛主席领导全党予以迎头痛击，粉碎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深入，使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猖狂起来了，在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破坏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公开鼓吹和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思想到经济领域，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紧接着，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京剧革命等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革命，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反复和曲折，更是惊心动魄。全党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冲破各种阻力，经过艰苦斗争，才终于粉碎了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暂栖身”于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又跳出来继续刘少奇的反革命事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社会主义新中国



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毛主席洞察一切，领导全党及时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阴谋。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鼓吹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反复斗争中实现的。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和过去一样，仍然要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沿着螺旋式的道路向前发展。

要按照螺旋式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革命斗争形势，就必须克服直线式的形而上学观点。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谈谈辩证法问题》）直线式地看问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或者“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我党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大再次提醒我们要反对和防止这两种片面性。如果不知道斗争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如果不知道联合过程中包含着对反动事物、分裂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斗争，那都是不懂得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论政策》）要领导任何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取得胜利，必须掌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符合螺旋式发展规律的，是我们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各种人的认识总是不齐的，经过批评或斗争，分清路线是非，就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也只有团结起来，正确路线才能得到贯彻，错误路线才能得到克服。否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只讲团结，否认斗争，当然会危害革命事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讲斗争，否认团结；不懂得斗争和团结的辩证关系，看不到革命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同样会危害革命事业。这两种倾向都是直线式看问题的表现，违背了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在我党的历史上，这两种倾向都曾经发生过，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并经常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曾经针对那种不懂得英勇战斗和为了消灭敌人而暂时放弃土地的辩证关系的错误思想，用吃饭和睡觉这些很平常的例子深刻地阐明了



辩证法的道理。毛主席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论持久战》）直线式地看问题，实际上就是那种“只吃饭不拉屎”、“只睡觉不起床”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用这种思想方法观察问题，必然会分不清什么是本质和现象，什么是主流和支流；哪是局部，哪是整体。这样，当革命顺利发展时，就盲目乐观，丧失警惕；当革命遇到困难、出现曲折时，就束手无策，悲观失望。运用螺旋式的辩证观点去看问题，才能既看到革命发展过程中反复和曲折的必然性，又从曲折发展中看到胜利的必然性，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认清方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

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具有两重性。它给革命带来了一时的困难，又为革命事业的更大成功准备着条件。革命人民总要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锻炼。斗争中的反复和曲折，恰恰可以从反面教育和锻炼我们，经过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就为争取革命事业更大胜利准备了条件。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使我们懂得了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把中国革命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历史经验是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毛主席经常要党的干部记取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就是教育我们要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和对待革命道路上出现的反复和曲折，懂得曲折是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我们研究历史上反动阶级复辟的种种事实，新的社会制度的巩固所经历的曲折斗争过程，就可以更加懂得今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了。

革命道路上出现反复和曲折，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或大或小的漩涡，没有什么了不起。从历史的全过程看，前进、上升总是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而曲折、倒退则是事物的支流和暂时的现象。无产阶级必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必定战胜修正主义，这是已经确定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毛主席指出：“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关于重庆谈判》）任何反复和曲折，甚至一时的倒退和历史重演，只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既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也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古往今来，历史发展的反复和曲折多如牛毛，从孔老二到袁世凯、蒋介石，从陈独



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家伙，有哪一个能使历史车轮倒转呢？不但没有，而且一个个都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走向自取灭亡的绝路。

我们坚信任何反复和曲折都不能阻挡革命事业的前进，是建立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任何时候，人民总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群众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极大的积极性。我们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那就任何反复和曲折都能克服，任何困难都能战胜。一切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企图利用我们革命事业前进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来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但都没有得逞，就是因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坚信任何反复和曲折都不能阻挡革命事业的前进，还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争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从没有枪变为有枪，从没有政权变为有政权，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全是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错误路线统治下，斗争中出现反复和曲折，给革命事业总是造成严重的危害，甚至导致革命的失败；当正确路线占领导地位之后，斗争中出现反复和曲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不难克服的。因此，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形势总是大好的。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空前巩固的。只要我们加强革命团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促使大好的革命形势变得更好。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总结无数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并为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在批林批孔中，我们应该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

俞 彤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走过二十五年了。在这二十五年中，我国人民所走的是一条坚持反修防修斗争的革命道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向。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它要逐步地达到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直到最后消灭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夺取政权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任务还在后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路线的指引下，建国以来，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同资产阶级及其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使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些斗争，实质上，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经过多次较量之后的又一次大的较量，是亿万人民群众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思想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我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事实充分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先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隐患，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千百万人民共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等等，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现状和历史，把远大的目标、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斗争联系起来，使自己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上层建筑中若干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部分，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广大人民群众以冲天的干劲，不断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种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危机严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成了鲜明的对照。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根据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化变质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事实，断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变成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这种谬论的破产。它的基本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直接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可以说，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广泛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这样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充分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色,充分说明我们的政权忠实代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它同人民群众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如果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因此,一切剥削阶级都把革命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当作洪水猛兽而深恶痛绝。这也就是为什么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叛徒、卖国贼林彪,从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地、富、反、坏、右,都极力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夺取政权,要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巩固政权,反修防修,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要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最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广大人民群众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只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和艰苦奋斗,夺取了政权,才翻身得到解放,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建国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又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斗争。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因为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是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力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是反修防修的可靠主力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提高识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演习,反对修正主义上台的一次大练兵。亿万人民群众在这场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受到教育,得到锻炼。有些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发动亿万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很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



心主义的，不懂得和不承认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反修防修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用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主要收获就在于此。

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自于它的革命团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是依靠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大团结，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排除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和错误思潮的干扰，取得了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无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天起，就从来强调革命队伍的团结，把革命团结作为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团结自己的阶级，团结自己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不讲革命团结，不维护革命团结，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阶级敌人最害怕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团结起来，总是挖空心思挑拨离间，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分裂。刘少奇、林彪搞了许许多多反革命的策略和阴谋活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妄图分裂党，分裂群众，破坏我们的革命团结，以利于他们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必须对阶级敌人破坏团结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要团结，不要分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粉碎阶级敌人复辟阴谋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人们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大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犯有或多或少错误的同志，广泛地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了许多同志政治上的进步。文化大革命使很多人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认识上的分歧，如何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特别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使大家深刻地懂得了路线的重要性，懂得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因而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在各项工作中较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今后的反修防修斗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人民群众中筑起了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这对世界人民是有益的。历史已经记载了一条沉痛的教训：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修正主义上台，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在国外，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极力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解放运动，干尽了坏事丑事。中国是近八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对中国人民是深重的灾难，对世界人民也是祸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新事物。这个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记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人民群众都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才能把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才能进一步搞好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使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亿万人民群众的直接参加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走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大庆油田委员会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祖国一片欣欣向荣。大庆油田和全国一样，欣欣向荣，到处是一派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庆油田广大职工、家属，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开展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进一步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两论”起家有了新的发展，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命团结进一步增强。这一切，推动着油田生产建设迅速向前发展，使开发十几年的油区出现了新面貌，新油区打出了新水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八年，大庆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一的速度持续跃进。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出现了革命和生产全面发展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一至八月原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目前的日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日产量的五倍。从产量来讲，今天的一个大庆等于原来的五个大庆。

大庆油田的发展，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的缩影。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大闹“能源危机”，而我国石油工业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间却成百倍地增长；从解放前百分之九十的用油依赖进口，到现在石油完全自给，还略有出口。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胜利。

大庆油田的开发，依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庆油田的发展，也是依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们体会最深的一点。当初，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他们的石油“专家”，企图卡我们的脖子。那时上马的大庆油田遇到了种



种困难，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给了我们同帝修反较量的巨大力量，是《实践论》、《矛盾论》给了我们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锐利武器。以“铁人”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豪迈地提出：“不靠外国油，不走洋人路，自己动手建油田！”就这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勘探、开发油田，仅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大庆油田的面积和储量，三年就拿下了大庆油田，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自力更生地进行勘探、开发和建设大型油田的路子，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提供了一些经验。

我们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才能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自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而且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刘少奇、林彪一伙反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坚持不坚持这个方针，不单是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从路线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违反这个方针的各种错误思想，才能保证这个方针得到正确的贯彻。

前几年，在发展大庆的过程中，我们就遇到在新的条件下，要不要继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问题。例如，有的同志曾经认为，大庆生产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成绩很大，现在可以松口气了。有人还举出这样的“论据”，说什么油田稳产高产已经这许多年了，按照石油生产的规律，往后产量只会递减，再大幅度增产是不可能的。由于存在这种错误思想，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使油田地下的一些矛盾没有能够及时得到解决，生产一度出现被动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召开了上千人的各级领导成员和老工人参加的会议，展开讨论。同时发动全油田的职工大鸣大放，揭矛盾，摆问题。广大群众贴出几十万张大字报，揭



露了油田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事实，以大量生动的实例说明，大庆油田才开发不过十来年，潜力还很大，在开采中又采取了合理注水、合理开发的先进工艺，面临的问题是要继续革命，使石油多快好省地开采出来，而不是什么“递减”问题。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对油田潜力的认识问题，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发展了，还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成绩大了，还要不要继续艰苦奋斗？因此，是一个方针问题、路线问题。正象工人群众讲的那样：“地下的问题在地上，地上的问题在领导，领导的问题在路线。”石油生产是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我国石油工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对石油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速发展石油工业，才能满足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

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带领群众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克服了“艰苦奋斗过时”等错误思想，增强了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自觉性，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几年来，广大群众对数千口油井，逐个地进行调查研究，逐个地摸索增产规律。在分析研究几百万个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大搞技术革新，提出了大量增产措施，使整个油田出现了“老井稳产高产，新井不断增产，全油田不断超产”的局面。

自力更生的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必须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十几年来，在油田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注意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不论是油田开发、油田建设、油田管理中的问题，还是重大科学技术问题，都交给群众，发动大家进行广泛的讨论，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在油田开发上，我们把方案交给群众，进行大鸣大放辩论，使方案更加符合实际。在科学技术上，坚持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实行“七嘴八舌摆意见，七手八脚搞试验”，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油田建设上，把工程项目交给广大群众，依靠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设计，使工程更加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我们体会到，只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党的方针、



政策，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以及生产上的具体矛盾和困难，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有事与群众商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人心齐，泰山移。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就会齐心来做。群众心齐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劲鼓起来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一九七三年开始的新油田会战，时间紧，任务急，而材料、设备、人力又都不足。是等设备，等人力，依靠其他单位的支援，还是自力更生地依靠自己现有的力量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广大群众一听说要会战，士气高涨，纷纷表示：任务越重越有劲头，目标越高越有干头。不能等、靠、要，而要坚持干、闯、造。钻井队伍在一个月之内，就把百里以外的数十部钻机，日夜兼程，全部拉到新区，很快打出新成绩。油建战线接到任务后，在四十小时内，两千多名职工带着上千吨设备器材，分别从四、五十里外各施工点迅速开到会战工地。运输设备不足，大家就用马车、牛车、毛驴车、自行车、手推车，人拉肩扛，一齐上。全体群众、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奋战，使新油区的开发，当年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要依靠群众，从道理上讲，谁也知道是对的。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口头上依靠群众，还是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有的同志在局部工作上，能依靠群众，在关系到全局问题上，就不肯相信群众。有的同志在生产上能依靠群众，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就不能依靠群众。有的同志平时能够依靠群众，但在工作中遇到一大堆困难、矛盾时，就往往忘记群众。在这方面，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在新油田的建设中，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但使油田的开发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而且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许多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这些新工艺、新流程，结构简单，经济合理，操作管理方便，可以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采用后，除为国家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外，还会对油田的长期稳产高产起重要作用。但在油田的另一项工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工程进度缓慢，长时间上不去。事实又一次教育我们，相信和依靠群众，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只贯彻在一部分工作中，而必须时刻牢记群众，事事相信群众。任何时候都要看到，群众中蕴藏



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是他们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并且正确地组织和调动这种积极性，社会主义企业才能办好，革命和生产才能不断攀登新高峰。

我们还体会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必须有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铁人”式的革命队伍。大庆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王进喜同志，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也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模范。十几年来，我们不断组织广大职工开展学“铁人”活动，引导广大职工以“铁人”为榜样，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工人群众说：过去开发大庆，靠的是“两论”起家，今天发展大庆，更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使大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认真看书学习的迫切和重要，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看书学习的积极分子，理论学习小组遍布油田。这些年来，油田的各级党委特别注意对广大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管生产多忙，任务多重，始终把这项工作放在首位。党的十大以来，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全油田又一次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们运用忆阶级苦和革命大批判相结合的方法，把林彪、孔老二和地主资产阶级联在一起批。老工人用自己在旧社会的亲身遭遇，新工人用自己的血泪家史，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对林彪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深仇大恨，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这几年，老工人不断调出支援新油田建设，大批青年工人陆续参加到大庆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这些青年工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朝气蓬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靠他们接班，大庆红旗要靠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建设“铁人”式的革命队伍，要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油田各级党委除了让这些青年工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之外，还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结合大庆实际，认真对他们进行大庆会战传统的教育。每当新工人入厂、进队，都首先做好“三件事”：第一件，发“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毛主席的其它著作，教育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学“两论”，用“两论”，牢记“两论”起家不忘本。第二件，讲队



史、会战史，教育他们懂得，大庆是反潮流的产物，要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第三件，参观“铁人”会战初期打的第一口油井，教育他们自力更生长志气，艰苦奋斗创新路。这三件事，工人叫做“三件宝”。青年工人们说：“三件宝”记心中，继续革命方向明。现在，讲路线，学“两论”，继承“铁人”精神，发扬会战传统，已经在油田形成风气，使油田成为革命化的大熔炉，千万个“铁人”正在茁壮成长。

培养革命的队伍，教育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十分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队伍的好作风是干部带出来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和不以身作则大不一样。这些年来，我们不断教育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同贪图安逸的思想作斗争，坚持“三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五到现场”（政治工作到现场，生产指挥到现场，设计工作到现场，后勤供应到现场，生活服务到现场）和“干部住队”、“顶岗劳动”等革命作风和制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第一线，吃苦耐劳走在前，艰苦奋斗干在前。去年在开发新油区和改造老油区的会战中，各级领导机关成立了八个前线指挥所，到现场办公，二十四小时指挥生产。上千名干部，背上行李，下到基层，在第一线做群众工作，在生产中指挥生产。钻井指挥部一年之内搬了两次家，指挥靠前了还要再靠前。油田各级党委不断教育干部，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也一定做到，同群众同甘共苦。工人群众住在集体宿舍，睡在工地，各级领导也住在办公室或集体宿舍。广大基层干部坚持常年住队，常年顶岗劳动，坚持“四同”，坚持夜间查铺盖被，下伙房帮厨，给病号送药，家访以及个别谈心等制度。许多同志经常是那里最困难，就顶在那里。因此，他们能够带动队伍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作风。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感到非常亲切。大庆工人说得好：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我们应当象登山运动员那样，把脚印留在后面，不断向新的奋斗目标前进。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增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革命团结，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坚持革命 努力前进

大寨大队党支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庆节来临了。我们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曾经指出：“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我国人民二十五年的斗争实践，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贫穷、落后、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我们这个旧大寨，也变成了新大寨。二十五年前离开大寨的人，如果今天再回来，那他一定会找不到当年的路，看不见当年的村，上山不见当年的田，进村不见当年的房了。在这短短的二十五年里，我们大寨和全国广大城乡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二十五年里，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旧社会的旧大寨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现在是看山山青，看地地平，看村村新，处处新面貌。我们依靠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完成了十年造地规划，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之后，我们又继续革命，在新的基础上再跨大步，在“海绵田”上闹革命，推倒山包，填平深沟，建成了“人造平原”。从前八百多亩耕地有四千七百多块，最大的



不过三亩，现在变成了两千多块，出现了十亩、二十亩的大块平地。二十五年，松溪河水流上了虎头山，渠道穿山越沟，连通了七沟八梁。二十五年，完全手工劳动的农业向机械化大步前进，运输索道凌空飞架，拖拉机开进了狼窝掌。二十五年，科学种田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年两作，两年五作，种粗粮变种细粮的试验正在胜利进行。

生产条件的巨变，增强了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论大灾小灾，我们都保持了高产稳产。解放初期，每亩地的产量只有一百多斤，一九五三年是合作化头一年，亩产上到二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亩产又上到五百四十斤，过了“黄河”；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我们，当年亩产达到了八百零九斤，过了“长江”；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一九七一年亩产跨过了一千斤。二十五年中，我们遇到过大洪灾、大风灾、大雹灾，近三年又遇到了大旱灾，灾害压不倒我们的革命意志，灾害挡不住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我们没有因灾减过产，而是大灾保丰产。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加。合作化前的大寨，是没有交售余粮或很少交售余粮的，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我们每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都在二十四万斤以上。一九七二年是个大灾年，但是，这一年我们交售余粮四十万斤，开创了大寨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使旧大寨贫穷落后的生活永远成为过去了。旧社会的旧大寨有“五多”：赶牛放羊的多，扛长工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新中国的新大寨是“八多”：粮食打得多，林、牧、副收入多，新房新窑多，农业机械多，卖给国家的余粮多，集体储备粮多，社员口粮多，群众存款多。

在二十五年里，大寨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正在逐步地占领大寨的思想文化阵地。现在的大寨，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成风，讲革命故事成风，演唱革命样板戏成风。干部党员攻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正在攻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正在成长。文艺宣传队平时化整



为零，在田间、工地演唱；革命纪念日、新年、春节时，舞台有小戏，街头有歌舞。创作组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快板、故事和其他演唱节目，满腔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并表扬本大队的模范人物和英雄事迹。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正在努力学习和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我们动员了各种宣传力量，运用演唱、讲故事、幻灯等形式，进行批林批孔的宣传，巩固、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促进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和革命化。

二十五年来，大寨的山变了，地变了，村变了，更重要的是，过去被束缚在私有制度下的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经和正在变成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这一代农民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农民；是从千百年私有制所造成的种种传统观念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农民；是对于一切阶级敌人、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旧社会留下来的穷山恶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农民；是能够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农民；是眼望全中国，胸怀全世界，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的农民。一切剥削阶级的“常理”、“人情”，已经和正在被我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规律性的认识所批判，所代替。这是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最重要的标志。

大寨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在农村的所有制变革以后，党的组织必须继续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头了，就有了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二十五年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带领大寨群众，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和阶级敌人斗，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和各种错误思想斗，和大自然斗，斗出了大寨的革命变化。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们办互助组，办农业社，战胜了刘少奇提倡的“三牛一犁”富农经济的道路和大砍合作社的黑风，迎来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条基本路线中，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从而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推行“桃园经验”，气势汹汹地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看出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下定决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在斗争中又一次经受了锻炼。我们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狠地批，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从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我们认识到，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都经过那么长期激烈的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今天，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就必然要经历更为长期，更为激烈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继续革命，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斗争，已经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看看过去，成绩伟大，展望未来，前程万里。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使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大寨贫下中农，正在这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进一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增强革命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教导，继续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地把成绩当作新的起点，向全国各地的先进单位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而继续奋斗！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三连党支部

我们连队驻守在祖国北方的一个海岛上。二十多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搞好军民团结，实行军民一致原则的教导，在思想上、行动上同驻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军民亲密无间，共同保卫着祖国的神圣海疆。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以来，全连干部战士，在深批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他破坏军民团结和军民一致原则的罪行，从而大大加强了干部战士搞好军民团结的自觉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实行军民一致的原则，是这条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坚持军民团结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还是破坏军民团结和军民一致的原则，历来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十年来，我军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指引下，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同心同德，团结战斗，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外凶恶的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集中地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它是指引我军胜利前进的灯塔，也是加强军民团结，实行军民一致原则的共同基础。

早在我军创建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斗争任务有了新的变化，我军所面临的情况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但是，我军仍然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的任务并没有变。我军在社会主义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宣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祖国，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犯颠覆活动，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就象毛主席教导我们那样：“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这样做了，人民群众就拥护我们，就能从根本上达到军民团结一致。林彪千方百计地妄图反对和取消我军的群众工作，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割裂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我军引上脱离群众的邪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深入批判了林彪散布的“群众落后”的谬论，批判了他破坏军民团结和军民一致的罪行，回顾了几年来我们连队做群众工作的实践，深深感到：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指针，我们必须从基本路线的高度，去认识做好群众工作对于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民一致性的重要性。

有一段时间，由于阶级敌人的暗中挑动，在我们连队驻地后口大队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间，造成了隔阂。有一名大队领导干部，受到群众的批评后，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们觉得，帮助大队领导干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对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问题。于是，我们就和大队党总支领导成员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忆苦思甜，并先后几十次找那个大队领导干部谈心，帮助他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使他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主动地找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谈心，虚心听取意见，作自我批评。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很快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这个大队以渔业生产为主。以前，每年都要到外地修船，不但要花费十几万元，而且常常耽误渔汛，影响生产。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队领导干部和广大贫下中渔提出要自力更生建造一个修船厂。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破坏捣乱。少数干部和群众也担心投资大，技术条件差，建不起来，有些动摇。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和大队干部一起，组织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揭露和批判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坚定了干部群众自力更生修建船厂的信心。同时，我们派人帮助大队进行勘察、设计，担负水下爆破，组织干部战士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



间参加施工劳动。在县和公社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全村广大贫下中渔的共同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修船厂，做到渔船一般修理不出大队。几年来对发展渔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一派新气象。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大队举办了政治夜校，培养了贫下中渔的理论队伍。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一九七三年渔农业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一点四倍，公共积累达二百余万元。

社会主义时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搞好民兵建设。后口大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战争年代，曾经派出许多民兵和船只参加支前运输队，随军南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荣获“支前模范村”的光荣称号。为了加强民兵建设，我们经常同大队党总支、民兵连的同志一起，回忆过去的光荣传统，帮助他们充分认识民兵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常派出干部战士帮助民兵搞好军事训练，使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杀敌本领。这个大队的民兵配合部队，多次打击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连续四年被评为县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先进单位。

加强军民团结，密切军民关系，在我们连队也有一个认识和提高的过程。我们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是要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毛主席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因为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尊重人民群众，虚心学习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又进一步组织全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批判林彪破坏我军谦虚谨慎的光荣传统的罪行，使干部战士进一步端正了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提高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我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走出营房，进行社会调查，以渔村为课堂，拜群众为老师，开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活动；经常请后口大队的干部、老党员、老贫渔来连队作报告，讲传统；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村里干部群众的批评意见。通过这些活动，虚心学习人民群众的高贵品质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后口大队有个干部是个复员军人，他身残志坚，



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走在前头，带领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个老党员，在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为我军送弹药，不怕流血牺牲，荣立了一等功。近几年来，他虽然年老体弱，仍然保持战争年代那股劲，不居功，不骄傲，坚持出海打鱼，带领青年一代常年战斗在海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担任大队保管的一个老贫渔，在管理集体财产中，处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对集体的一个玻璃泡，一段尼龙绳，一块船板，都精心爱护，贫下中渔称他是“人老心红的老保管”。人民群众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使干部战士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是一个世界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只有牢固地树立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深入批判林彪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才能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群众拥护我们，热爱我们，给了我们很大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谦虚谨慎，处处尊重人民群众，虚心学习人民群众。林彪竭力破坏我军谦虚谨慎的光荣传统，妄图使我军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走向军阀主义的道路，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加强军民团结，实行军民一致的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急人民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九七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场十级暴风雪突然袭来，后口大队停在海湾里的五十多只渔船，眼看就要被撞碎或被风浪卷走，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海边抢险。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全连紧急集合，迅速赶到现场。同志们发扬我军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同群众一起投入了战斗。战士们被刺骨的海水冻得手脚麻木，不叫一声苦；有的战士脚被划破了，忍着疼痛，仍然坚持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把渔船都拉上了岸。这个大队有户老贫渔，唯一的儿子在海上捕鱼时，为保护集体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家里只剩下两位老人。我们感到，贫下中渔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于是，战士们经常去为老人挑水、拾柴、扫院子；为了让两位老人吃上蔬菜，战士们在他家院子里开了一小块菜地；每逢过年过节，战士们就



去热情看望；老人生了病，战士们四处寻方找药，把熬好的药亲自送到床前。这样做，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党的政策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模范地执行各项政策和纪律，是爱人民、为人民，搞好军民团结的具体体现。我们经常针对干部战士的现实思想进行政策和纪律的教育，以不断提高干部战士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的自觉性。同志们坚持做到：在执行紧急战备任务时，牢记为人民搞战备，战备不忘为人民，不以战备需要为借口而违犯群众纪律；在受到群众拥护时，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拥护不特殊，不因为人民感谢我们而违犯群众纪律；在为人民做好事的过程中，牢记做好事为人民，为人民不掺半点假，不因为给群众做了好事而违犯群众纪律。一次，后口大队养殖的海带受到了台风的袭击，干部战士冒着狂风巨浪，把眼看就要被海浪冲走的海带抢收了回来。在抢收过程中，战士不慎碰破了五个玻璃泡。事后，我们按价去给大队赔偿，贫下中渔说：“你们抢收回来的海带，能买成千上万个玻璃泡，还赔什么？”我们觉得东西虽少，但它是人民的财产，严格执行纪律是爱人民、为人民的原则问题，坚持按价作了赔偿。

由于我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地为群众谋利益，后口大队广大贫下中渔也把我们看成自己的子弟兵，各方面对我们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连队执行战备任务，他们积极参加，主动配合；连队施工，他们派人支援；连队遇到困难，他们全力帮助。一九七二年夏天，我们连的前沿炮阵地被台风卷起的巨浪冲坏了，上级指示我们一个月修好。大队党组织和民兵连知道后，就组织全村群众赶来支援，同我们一起抬土运石，垒堰填坑。在群众的大力帮助下，提前修好了炮阵地。有一段时间，连队到另一个小岛上临时执行施工任务，后口大队的贫下中渔和民兵不但主动帮助我们运送蔬菜，还配合留守的同志，共同担负起连队的守备任务。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批林批孔运动朝着普及、深入、持久方向发展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加强战备的同时，把拥政爱民的工作做得更好。



毛主席的光辉照列麦

西藏隆子县列麦公社党支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光辉战斗历程。二十五年来历史表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照耀我们胜利前进的“金灯”。今年国庆佳节，也是我们列麦人民公社建社七周年的大喜日子。展望全国大好形势，我们无比兴奋；回顾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列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

在那乌云滚滚的旧西藏，列麦是一座人间地狱。三大领主象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列麦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全被他们霸占，劳动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受尽了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捐税本来已经多如牛毛，农奴主还制造种种借口，巧立名目，盘剥人民。什么生死税、冒烟税、头发税、耳朵税，无奇不有。民主改革前，全乡一百八十三户人家中，就有一百二十八户借农奴主的高利贷，借贷总数折粮近百万斤。农奴毫无人身自由，被当作“会说话的牲口”，干活、走路不准看农奴主腰带以上，还经常遭受骇人听闻的迫害。农奴们牛马般的劳动，换来的却是“上半截空着肚子，下半截露着膝盖”的悲惨生活。民主改革前的四、五十年间，全乡就有五十五人被迫逃亡、讨乞，许多人冻饿而死，十八人惨遭农奴主的杀害。那时候，列麦充满了农奴的血和泪。

一九五九年，万里高原掀起了红色风暴。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百万农奴砸碎了千年铁锁链，彻底埋葬最反动、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列麦也换了人间。

列麦，座落在祖国的喜马拉雅山区，原来是一个“山高沟深耕地少、缺粮缺水又缺草”的穷山窝。民主改革前，全乡只有耕地一千一百八十二克，每人平均只有一克十五升（二十升为一克，一克相当于一亩），每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三十三万斤左右，各种牲畜只有四千零六十五头（只）。现在，耕地扩大到二千三百零五克，比过去增加近一倍；粮食单产上《纲要》，一九七三年总产七十九万六千多



斤，比过去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一；牲畜达到一万一千二百头(只)，比过去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同时，林业、副业也有较大发展。办社以来，公共积累已有五万一千多元，集体储备粮四万五千多斤，并先后向国家出售余粮七十四万多斤。

旧西藏技术十分落后，那时我们连个螺丝钉都没有见过，四把破旧的十字镐，是民主改革前乡里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如今，我们除拥有大批大小农具外，还有五台大小拖拉机、七台七行播种机、五台动力脱谷机和柴油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祖祖辈辈靠油菜秆照明的翻身农奴，正在兴建一座装机容量一百一十瓩的小型水电站。我们公社许多人会开拖拉机，有些人学会了放映电影，小型电站的技术人员也正在培养中。

“糌粑拌白糖——又香又甜”，这是翻身农奴们对自己生活的形容。去年，全社平均每人实分口粮五百七十三斤，酥油十二斤，食肉羊一只，羊毛四斤四两，奶渣三斤二两，还有一部分现金。全社二百一十六户社员中，现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有储备粮，百分之八十有存款。生产发展，人口兴旺，全社人口由民主改革时的六百六十九人，增加到八百九十人，增长百分之三十三。民主改革以来，已有八十户翻身农奴盖了新房。民主改革前，农奴根本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现在，十六岁以上的社员中识字的已达百分之七十三。从一九五九年起，我们乡里就有了民办小学和政治文化夜校，如今社办、队办小学发展为四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读书。许多青年上了中学，今年我们还选了一名青年翻身农奴到祖国内地去上大学。旧社会，农奴生了病，小病抗，大病躺，根本得不到医治，现在，公社有赤脚医生和卫生室，社员们都享受着国家的免费治疗。

站起来的翻身农奴，成了国家的主人。民主改革以来，已有二十七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二名先进青年加入共青团。社、队干部全是过去的农奴，其中女干部占百分之四十三。在公社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公社革委会和贫协、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我们的民兵连，牢记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劳武结合，能文能武，和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开展军民联防，为保卫祖国的边防站岗放哨。全体翻身农奴扬眉吐气，斗志昂扬，热爱祖国、关心集体蔚然成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先后建立了业余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电影放映组和阶级教育展览馆、农村广播网。文化上得到翻身解放的农奴们，正在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牢固地占领农村



阵地。

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列麦人民在一首新民歌中唱道：“毛主席的光辉照列麦，翻身农奴笑开怀；沿着革命路线走，冰雪溶解鲜花开。”是的，这一切变化，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列麦的今天。毛主席的恩情比天大、比海深，我们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民主改革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这是列麦面貌能得到较快改变的根本原因。但这条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列麦有领(地)、富分子，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有叛匪头子达赖的母亲亲信，还有钻进乡政权中的坏分子。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连做梦都想着变天、复辟。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我们手捧“金灯”积极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阶级敌人惊慌失措，那个钻进乡政权中的坏分子四处奔走、蛊惑人心，胡说什么“办了社，磨的糌粑不香，酒也不象现在这样好喝了”。他利用职权威胁群众：“办公社，要条件，每户一匹马，每人五百五十个大洋，拿得出来吗？”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党支部领导贫下中农以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为锐利武器，和阶级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贫下中农一致表示：山再高，挡不住太阳的光辉；路再险，动摇不了我们办社的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风吹浪打不回头！经过激烈斗争，那个坏分子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群众把他从乡政权中清除出去，一百六十一户贫下中农和七户生产上确有困难的中农首批入社，列麦人民公社在大风大浪中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胜利诞生了。

公社在前进，斗争在继续。阴谋搞垮公社的反动势力又变换手法，拼凑了一个班子，提出“秋后打下粮食看”，要和我们开展“生产竞赛”。贫下中农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学习毛主席对《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两文的按语。“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毛主席的指示，再一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清楚地懂得了这既是一场经济仗，更是一场政治仗。在“竞赛”中，贫下中农政治挂帅，艰苦奋斗。送粪时，畜力不足靠人背；犁地时，耕牛不够用锨翻。田间管理期间，农活繁忙，许多女社员为节省往返走路的时间，干脆搭起帐



篷，吃、住在田边地头。“穷棒子”精神威力无穷；奋战两个年头，我们连续取得大丰收。跟着反动势力跑了一阵子的富裕中农，认识到“鸡与鹰比翅膀，只有落个摔死或摔伤的下场”，纷纷向贫下中农靠拢，一九六九年，我们乡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公社成立以后，我们持续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教导，决心通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改变列麦的面貌。根据列麦地少缺水和产量不高的实际情况，几年来，我们抓住几项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干苦干，并且一抓到底。在滴水成冰的严冬，贫下中农登上海拔四千二百米的桑钦坝，向千古荒原进军，向荒山秃岭要粮。一年多时间，垦荒七百六十克，使耕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为解决缺水的困难，干部群众攀上悬崖陡壁，用钢钎、土炸药，挖山不止。几年间，修凿盘山水渠八条，共长三十一里，扩大水浇地八百一十克。许多土地贫瘠，大家就在封建庄园的废墟上“掘地三尺”，加厚这些地块的土层。有些土地不平，跑水、跑土、跑肥，大家就修筑梯田、修建园田。几年来，已改良土壤八百多克，修筑梯田二百七十多克，修建园田一百多克。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全体党员、干部坚持战斗在最前线，吃大苦耐大劳，带领群众前进。列麦的自然条件较差，全部耕地在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其中三分之一的耕地还在海拔四千二百米以上，全年无霜期只有一百天左右。为摸索高寒地区高产稳产规律，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去年以来，我们又建立了科学种田小组，种高产稳产田、种子田和试验田，大搞科学试验。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战天斗地的过程，也是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过程。当我们战严寒，破冻土，开垦桑钦坝的时候，阶级敌人胡说什么那里是“菩萨护法神的养马场”，是“日月对照的吉祥之地”，“无论如何开垦不得，得罪了神，灾祸无穷”。当我们在修筑莫拉水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又幸灾乐祸地说：“你们不是天天学愚公吗？这个地方还是请愚公来修吧！”他们还把我们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诬蔑为“山裂了拿上绳子捆”。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贫下中农不信神，不信鬼，天不怕，地不怕，坚持和阶级敌人斗，和大自然斗，毫不动摇。他们豪迈地回答：“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是活愚公！”“山裂了就是要用绳子捆！”“大寨贫下中农靠毛泽东思想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向大寨学习，荒一定开得成，渠也一定修得通！”

向大自然开战，还会碰到人民内部一些保守思想的干扰。在开荒、修渠和修



筑梯田、修建电站的紧张战斗中，有人说：土地少，口粮不够，请国家帮助是应该的。还有人觉得现在“步子迈得太大”，希望“慢慢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进行教育。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民主改革以来，国家在物资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单纯地等、靠、要，这是不对的。只有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对个别怕苦怕累的人，我们还运用忆苦思甜、回忆对比的方法，帮助他们提高艰苦奋斗的自觉性。贫下中农说得好：工作就是斗争。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们不出力，让谁出力！认识统一了，大家干劲倍增，为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无论是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战天斗地、改造自然，都是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的。只有象大寨大队那样，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一九六三年，我们乡建立党的组织以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就开始了。十多年来，干部群众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指路明灯，坚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就是在农活最繁忙的季节，也要抓紧学习。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孔孟之道和达赖叛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得到进一步开展，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今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的开展，我们又建立起一支由二十二人参加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其中有六十岁的老贫农，也有十五岁的小姑娘。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刻苦攻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带领广大群众一道攀登理论山。“毛泽东思想扎下根，人新地新山水新。”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列麦的一切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这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列麦的变化，新列麦的成绩，都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林彪要复辟，我们要前进。今后，我们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向前，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国教育阵地的深刻变革

朱 研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展望教育战线，一派团结胜利、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经过二十五年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教育事业的面貌，同旧中国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教育极端落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实行最反动最黑暗的文化专制主义。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了身。他们不仅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而且已经把教育事业掌握到自己手中，正在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以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同解放前的最高数额相比，小学生增长了五倍，中学生增长了二十三倍。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村、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尤为显著。有些少数民族解放前连文字也没有，现在不但有了小学、中学，而且有了自己的大学生。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教育更是蓬勃发展。早在一九四〇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庄严号召：“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今天，这一伟大目标正在实现。

教育革命的胜利，是经过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而取得的。二十五年中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指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毛主席又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进一步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照耀下，教育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掀起的一场教育革命，是对旧教育制度的一次有力冲击。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一伙篡夺了教育阵地的领导权，疯狂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改革教育的努力总是受到压制和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专政。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开创了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工农劳动群众亲自参加领导、管理、改造学校的新局面。从此，无产阶级真正夺取了教育的领导权，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的斗争开始了。千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青年上山下乡，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同“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各级学校按《五·七指示》的方向开门办学，校办工厂、农场，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旧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关门读书，看不到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的状况。工农兵上讲台，成为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极大地促进了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师生同工农兵紧密结合，学校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教育制度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认真而广泛的试验。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批林批孔运动使我国的教育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展了。通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清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影响，广大群众提高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进一步认清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增强了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自觉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一系列变革和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经过反复的斗争，在大多数单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迈出了新的步伐。孔



孟之道影响很深的教育阵地，正在变为批判孔孟之道的重要战场。广大革命师生同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工农兵相结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战斗，作出了贡献。中、小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敢于批判孔老二，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大学工农兵学员破除迷信，知难而进，成为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广大革命教师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有些过去很尊孔的老教师，在党的教育下，也反戈一击，参加战斗，努力跟上亿万工农兵前进的步伐。对各个学科中盘根错节的尊儒反法思想和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正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正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重新进行科学的研究；大、中、小学的教材，正在进一步改革。对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所宣扬的旧的反动的教育思想，正在从政治路线、思想基础、历史根源上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算。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阵地的伟大进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革命的这些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是全国亿万工农兵和教育战线的广大群众团结战斗所取得的胜利。

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还仅仅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阵地完全占领下来，改造过来，单靠一代、两代人的努力是不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坚持奋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总结我们的胜利，总结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就能更加自觉地迎接新的斗争，夺取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有鲜明的阶级性。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要使教育摆脱剥削阶级的影响。列宁进一步强调，在国民教育方面，要**“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导我们，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教育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重要战场。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他们在教育领域的长期垄断所造成的传统势力，把这个领域作为进行复辟活动的温床。无产阶级则应当把这个领域变为反对资本主



义复辟的斗争前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显示了这个领域的斗争在阶级斗争全局中的突出地位，表明了坚持教育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刘少奇、林彪一伙极力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宣称“学校就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鼓吹“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目的是为了掩盖和实行他们利用教育阵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我们的一些同志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迷失方向，就是由于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在教育的阶级性这个根本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教育阵地的阶级斗争形势，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从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高度、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深入开展教育革命。

当前，必须以搞好批林批孔来推动教育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在教育阵地，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除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批林批孔不但是教育革命的强大动力，它所提出的许多战斗任务，又是教育革命的重要课题。很多情况说明，那个单位批林批孔搞好了，那个单位教育革命就很有生气；那个单位教育革命搞不上去，首先是批林批孔没有真正搞好。把批林批孔与教育革命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抓教育革命，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抓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不搞好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就会走偏方向。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这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任何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为了巩固本阶级的专政，都要紧紧地把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孔老二杀少正卯，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为了把教育大权夺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历史上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对教育领导权的争夺尚且如此激烈，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要把教育这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专政的工具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围绕教育领导权的斗争，必然要更激烈。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造学校，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造成无产阶级力量的优势。没有工农兵的直接参加，就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那里的工人阶级领导削弱了，教育革命就必然出现反复。教育战线两个阶级反复较量的经验表明，这个阵地上无产阶级力量还比较薄弱。工人、贫下中农



开进学校，工农兵学员也自觉地担负起改造教育、改造学校的任务，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近年来的实践清楚地显示出它的深远意义。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学校一切工作，都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内的团结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团结，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学校。

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搞好教育革命的又一项重要经验。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校中学生、教师、工人、干部、工宣队员、贫管会成员，各部分人相互之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是搞好教育革命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团结得越多越好。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阻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破坏同工农的团结。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受到了教育，政治思想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要鼓励他们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充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好地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团结在斗争中增强，胜利要团结起来争取。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团结，就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人民内部，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就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以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即使对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也要区别情况，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顽固派。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任务，需要继续努力完成。二十五年中在这方面几经反复。刘少奇一伙公然主张教育制度“基本照旧”，林彪一伙也是如此。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他们总是伺机反攻倒算，力图使旧的东西复辟。总结斗争经验，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向；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组织教学过程；坚持要变革的思想，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大力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要为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百折不挠，“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立足于改革，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大胆的实践和试验。在改革原有学校体制和教学体系方面大有文章可做。比如：大学结合现实阶级斗争中的战斗任务和生产、科研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为工农兵举办各种短训班、进修班和函授教育，实行送学上门，就地办学；中学适应上山下乡、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改革学制和课程，设置专业课和专业训练班；城市中学到附近农村办分校；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等等，我们都要热情而细心地加以扶植，促使其健康成长。同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不能仅仅着眼于原有的学校。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造成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新部队，单靠教育部门办学校是不成的。必须大力发展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农民政治夜校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全面地形成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需要全党作极大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把改革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等一系列教导，为我们规划了改造社会和改革教育的宏伟蓝图。教育革命搞好了，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有很重大的意义。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来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教育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都来了解我国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都来关心、支持、监督、参与教育革命，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纵览人类教育史，封建阶级的教育搞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搞了几百年。今天，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教育如同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看看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刚几年就出现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真是“虎踞龙盘今胜昔”，我们充满了自豪感。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到，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艰巨的工程还在后头。新生事物有待在实践中继续完善，我们工作中也还有缺点需要克服。奋战在教育战线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广大的学生、教师、干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加倍努力作战，去谱写无产阶级教育史上更新更美的篇章！



批林批孔与知识分子的进步

杨 荣 国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开展。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普及、深入、持久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工作者应该在已经取得初步战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作战，向运动的主力军工农兵学习，在战斗中改造世界观，不断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必须批孔，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孔孟之道，这是有深刻的阶级的历史的原因的。中国近代由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非常软弱，甚至没有自己完整的独立思想体系。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私利而必须寻求思想武器，它除宣扬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外，也大肆鼓吹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思想。在台湾省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至今还大搞祭孔尊儒活动，妄图借助孔孟之道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修正主义者妄想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动的孔学正投合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所以从苏修叛徒集团到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无不尊儒反法，拚命宣扬孔孟之道。林彪这个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继承历代反动派的衣钵，更是不遗余力地吹捧孔老二，攻击法家，以孔孟之道作为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所以，我们在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时候，紧密结合批判孔孟之道，揭露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和现实斗争中的反动作用，才能进一步深



刻认识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

由于历代反动派尊儒反法，“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孔孟之道流毒很深。儒家的反动说教被编成《三字经》、《千字文》、《女儿经》、《幼学诗》等，在社会上广泛推行。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中不偏，庸不易”，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什么“三从”“四德”等等，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奴役、毒害人们思想的。孔孟之道是两千多年来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直到今天，它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仍然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这些旧思想、旧传统的顽固抗拒。不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加强都会遇到妨碍。《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我们中国，最反动的传统观念就是孔孟之道。我们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非彻底砸碎孔孟之道这具精神枷锁不可。

学术思想工作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清除孔孟之道对学术思想工作的流毒和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解放以前，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对学术界影响很大，这自不必说；解放后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教工作中又起了支配地位的作用，因此孔孟之道没有受到深入的批判和清理，学术思想工作中充斥着儒家反动思想的毒素和尊儒反法思潮，严重地阻碍着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学术思想工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在文教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替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打破了学术界许多“清规戒律”，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扫清道路。工农兵登上讲台宣讲儒法斗争史，和专业理论工作者一起彻底批判儒家、正确评价法家，这和以前的许多尊孔会议，例如一九六二年召开的那个乌烟瘴气的祭孔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是对这些会议的鲜明的批判。



今天，我们学术工作者得到参加这个彻底批判孔学的伟大运动的机会，确实是莫大的幸福。在我们面前还有大量的批林批孔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再接再厉，积极投入斗争，为进一步清除孔孟之道的流毒，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奋勇战斗。

我们要充分认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特别要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认识孔孟之道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批林批孔的伟大意义，认识批林批孔是和现实斗争密切联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不会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以批林批孔为中心去组织和带动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的工作，去推动教育革命和各门学科体系的改革，而不会摆不正批林批孔与其他任务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批林批孔的锐利武器，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刻苦学习钻研。要深入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研究并且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当然要详细占有资料，做到有根有据。但是，光满足于掌握充分的资料还是不行的，更重要的，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资料。毛主席教导我们：“**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应该牢记这个教导，不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克服历史研究中那种分割零碎、见树不见林的严重缺点，这样才能在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研究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如何在战斗中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这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



就还相差很远”。从我们学术工作者来说，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旧社会来的，长期受过旧的教育，受孔孟之道的毒害比较深。就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那部分同志，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也受过孔孟之道的毒害。今天，我们学术工作者肩负着繁重的任务。对我们来说，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更加显得重要。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决心。历史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知识分子队伍，很快就起了分化。鲁迅能够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改造世界观，因此他能够一直站在批孔斗争的前列，终于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另外一些人则忽视自己的思想改造，逐渐落伍、消极了。我们应当学习鲁迅勇于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精神，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在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深刻地批判天命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这对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是有很大作用的。儒法两家代表着两条对立的思想政治路线。儒家尊天命而法家反天命；儒家宣扬什么“先知先觉”的“上智”和天才，轻视生产实践，鄙视劳动人民，而法家却认为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才能使人“由愚而智”（见《荀子·儒效》），这都是针锋相对的。儒家的一套反动观点，由孔丘、思孟学派到董仲舒、朱熹等人，一脉相传，以至成为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的根据。我们学术工作者过去曾受到这些儒家反动观点的毒害。反映在学术观点上，比如文科就存在“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讲成帝王将相的家谱；理、工等科存在着埋头从洋本本中寻找文献数据，而对我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反而置之不顾的问题。彻底批判天命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将会大大加强我们实践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转变立足点。批判儒家否认真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鼓吹“闭门修养”的唯心主义谬论，就能进一步从世界观上认识刘少奇的黑《修养》和林彪关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论点的反动性，就会更热烈赞颂开门办学、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

孔学的中庸之道，也是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起着重大的阻碍作用的，必须深入



地批判，使我们自己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敢于革命，敢于前进。孔学毒害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清除很不容易。我们要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就一定要坚持斗争哲学，决不能调和矛盾，逃避战斗。同时，对待这样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又必须严肃谨慎，不应轻率武断。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要展开争鸣，提倡共产党人旗帜鲜明的战斗风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位朋友和我谈到，他总结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体会，发现自己往往主观片面，左右摇摆，一下把法家的进步作用估计太高，一下又片面强调法家的局限性。在讨论问题时，或是调和折中，当“和事老”，或是主观武断，坚持己见。他说：“问题在于有个怕字：怕犯错误，怕落后，又怕过头，还怕在青年人面前丢了面子。怕是逃避斗争的表现，是受中庸之道毒害的恶果。我要向工农兵实事求是的战斗风格学习，认真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位朋友是找到了自己世界观上的原因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暴露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只有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更好地参加斗争。

党和人民对我们学术工作者寄予热切的期望，对知识分子在批林批孔中改造世界观的点滴成就都加以充分的肯定和欢迎。过去曾经尊过孔，现在“觉今是而昨非”，反戈一击，积极参加批孔斗争的，更受到很大的鼓励。就是思想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的人，党和人民也还是耐心等待和帮助。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法家的代表人物批判孔孟之道，也做过很多工作，达到了他们那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是，他们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这个历史任务，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服从真理，改正错误，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凡是能够屏除私见、出以公心的人，必定会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深远意义，自觉地投入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我自己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还是肤浅的，愿意在今后的战斗中向工农兵学习，继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与学术界的同志们共同勉励，共同前进。



军民情意深似海

——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

秋 实

在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和全国其它革命老根据地一样，每个高耸的山峰，都铭刻着军民团结斗顽敌的丰功伟绩，每个英雄的村庄，都传颂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佳话。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从深厚的革命斗争生活土壤里，提炼、概括出英嫂以乳汁救伤员的典型事件，塑造了英嫂这个光辉的英雄典型，谱写了感人肺腑的拥军爱民的颂歌。

戏剧把我们带到了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年代，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指引下，为争取新的胜利主动转移。排长方铁军在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以后，负了重伤晕倒在红云岗上，伤势严重，滴水未进，口渴已极，危急万分。在这紧急关头，英嫂用自己的乳汁救了方铁军，并对他精心护理，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从这个普通劳动妇女身上和这个典型事件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反映了人民军队深厚的阶级基础。

以乳汁救伤员的典型情节，有着动人的意境，深刻的寓意。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和人民子弟兵的血肉关系。人民子弟兵是武装了的工农，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战士身上衣，人民手中线，战士囊中粮，人民滴滴汗，解放军步步胜利征程远，哪一步也离不开人民支援。”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上全力支援人民子弟兵，而且给予自己的军队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英嫂以乳汁救伤员这一英雄行为，象征着人民群众哺育了自己的军队。从本质意义上说，人民军队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哺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待亲人解放军，比自己的家，比自己的命都贵重”？为什么英嫂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不怕它火焚家舍，刺刀对胸，也要救出子弟兵”？就是因为这支军队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受到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原因。

《红云岗》是写军民关系的。它写了军爱民、民拥军，而侧重点是反映民拥军这个方面。这个重大主题，是通过英嫂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体现的。英嫂是革命老根据地一个劳动妇女的艺术典型，在她身上集中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共同遭遇和斗争经历。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有一本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血泪帐，有一部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求解放的斗争史。反动统治阶级夺去了她父母的生命，她自己也被逼抵债，“皮鞭下度日月难熬难挨”，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把她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党的教育和培养，使她懂得了革命的真理，具有了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正因为如此，当她在无意中遇到负伤的人民解放军排长方铁军时，便不顾一切地去救护。她遇到伤员是偶然的，无意的，但救护伤员却是完全自觉的，是出自对“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求解放靠的是武装斗争”这一革命真理的深刻认识，出自“一心只向共产党”的坚定阶级立场。

英嫂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的光辉代表。她对旧世界和阶级敌人怀有深仇大恨，对人民军队无限热爱，对毛主席战略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她想得深，看得远，为消灭反动派，不怕打破“几个坛坛罐罐”，“纵然是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我们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纵横驰骋，克敌制胜，就是因为有千百万象英嫂这样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的支持。有了这样的英雄人民，就能够建立起真正的铜墙铁壁，就能够取得进行人民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叛徒林彪，总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竟胡说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基础薄



弱”，污蔑劳动人民“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这是他反动的唯心史观的大暴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英嫂的优秀品质和英雄行为，就是对林彪这种无耻谰言的有力驳斥。英嫂还不是一个党员，也还不是一个干部，她的身份是普通的，但是她做出的动人心魄的英雄业绩是不平常的，她的思想境界是崇高的。对革命人民这种伟大的胸怀，林彪之流是不愿意看到也不可能理解的，这就注定了他们是不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心的，必然落一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红云岗》在塑造英嫂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时，把她放在一定时代的斗争环境中，紧紧抓住她对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无限热爱这一主要思想特征，深入开掘，细致刻画，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场《抢救亲人》，从英嫂发现伤员到救护伤员，处理得很细致，很有层次。这场戏，敌人没有出场，但戏剧通过剧本所提供的内容和演员的细腻表演，烘托了一个情况险恶、事关紧急的特定环境，使英嫂抢救伤员的过程成为一个紧张的战斗过程。英嫂在剜野菜时，蓦然发现菜上有血迹，使她非常惊讶，于是顺着血迹寻找，发现了解放军的伤员。当伤员在昏迷中轻轻地呼唤要水时，英嫂发现水壶已空，想到河边取水，但“冷水不能救伤员”，如果回家烧水“路太远，又怕碰见还乡团”。在这特定的条件下，英嫂急中生智，意识到用自己的乳汁可以救伤员，便当机立断，毅然用乳汁抢救伤员。血，水，奶，这三个层次，脉络清晰，细腻深刻。细腻的描绘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英嫂找野菜、剜野菜，然后甩掉野菜上的土，这些熟练而细腻的动作，正是为了突出英嫂这个苦水里泡大的贫农女儿的阶级素质。特别是英嫂在灭血迹时那段舞蹈动作，既有浓郁的战斗气息，又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把英嫂对人民子弟兵的阶级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剧情的层层递进，英嫂对人民军队的阶级情意步步深化。为了使方铁军迅速恢复健康，英嫂把家中仅有的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杀掉，在“平日里只煮过粗茶淡饭”的炉灶上，“为亲人细熬鸡汤”。红彤彤的炉火，烘托出英嫂对子弟兵的火热心肠。她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多少心里话，要对亲人讲”。以〔慢板〕起



调的那套〔二黄〕净场唱段，生动地表达了英嫂对子弟兵的无限关切，“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这一锅“非同寻常”的鸡汤，倾注着多少乡亲们的心意，那一把把蒙山柴，一瓢瓢沂河水，凝聚着多少乡亲们的期望，盼亲人“早日里身强壮重返战场，踏平原越山林去打豺狼”；酣畅地抒发了英嫂的革命理想，“迎来个新中国地久天长”。这一切表明，为了支援人民子弟兵，人民群众做出任何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

英嫂的英雄性格，不是平面铺叙的，而是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的。英嫂面对的敌人刁鬼，是一个狡猾、奸诈、残忍、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地头蛇，要在他的眼皮下养护伤员是极其困难的。但是，阻力越大，就越能使英嫂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迸发出光和热。毛主席革命路线使她无私无畏，给她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第四场英嫂和刁鬼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刁鬼为了搜捕解放军伤员，以突然袭击方式闯进英嫂家门进行盘问，旁敲侧击，明讹暗诈，妄图找到进攻的空隙。英嫂早已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坦然自若，应对自如，使他无懈可击。刁鬼以其反革命嗅觉，察觉到一锅鸡汤不平常：“不逢年，不过节，熬鸡炖肉的？”“下蛋的鸡也舍得给别人吃？”他满以为从这里抓到了把柄，但他却没料到英嫂转守为攻，反唇相讥：“怎么舍不得，给别人吃了，也比让黄鼠狼子拉了去好！”在这场智斗中，刁鬼陷于无可奈何、狼狈不堪的境地，而英嫂机智灵活、沉着干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敌人在一个个阴谋诡计落空以后，便妄图在英嫂的丈夫郑英田身上打开缺口。由于郑英田胆小怕事，在敌人的压力下，思想出了问题，对英嫂救护伤员很不利，因此，争取和教育郑英田便成了英嫂整个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郑英田的思想性格，是由他的中农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他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解放军有一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也有一定的理解，但是，他和英嫂相比，就有很大的差距。第二场的那双军鞋，就是衡量他们夫妻阶级觉悟差异的标尺。“紧要关头分高下，夫妻处事不相同”。英嫂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女儿，对人民军队爱得深切，为救护伤员必然奋不顾身。而郑英田虽然也愿意救伤员，但还不能做到全心全意。剧本在突出敌我斗争的前提下，定准郑英田的思想基调，



大胆展开、激化夫妻之间的矛盾。第六场《一心向党》中，英嫂对郑英田晓之以革命大义，动之以阶级之情，教育团结了郑英田，使他成为救护伤员、打击敌人的重要助手。这场戏中的夫妻对唱，更丰富了英嫂的光辉形象。

“战场上多少英雄献生命，才换得解放区水甜山秀万里晴。”戏剧既集中体现了民拥军的深刻思想，也表现了军爱民的生动情景。戏剧所塑造的人民解放军英雄排长方铁军的形象，体现了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他在战斗中英勇负伤，仍然忍着伤痛追赶部队，他在山林养伤，心里却时刻挂念在敌人的蹂躏下遭受苦难的乡亲，盼望着早日跃马挥戈，痛把敌歼。他为了减轻英嫂和群众的负担，自己剜野菜充饥。在第七场，戏剧矛盾发展到了最高潮，敌人发现了方铁军的隐蔽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英嫂拧哭了自己的孩子，把敌人引向自己。穷凶极恶的刁鬼要把英嫂的孩子摔死，这时，方铁军挺身而出，从敌人手中救出了孩子。一个为掩护伤员，不顾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一个把人民的后代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英嫂和方铁军这两个英雄人物的忘我牺牲精神交相辉映，使拥军爱民的主题得到了高度升华。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这一伟大真理，在我们的革命斗争史上已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并将继续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斗争中得到更有力的证明。可以深信，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胆敢对我们发动反革命战争，千万个英嫂会顶天立地地站出来，同人民子弟兵并肩战斗，全歼来犯之敌。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是在一九六四年演出剧目《红嫂》的基础上加工修改的。十年来，在它诞生、成长的过程中，充满着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革命文艺战士在学习已发表的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对这个戏不断加工锤炼，力求达到玲珑剔透，使它以新的面貌登上社会主义文艺舞台。这是京剧革命的一个新成果。斗争实践又一次表明，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敢于斗争，勇于实践，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就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逐步深入，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正在广泛开展对于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研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来研究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是第一次。这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任务时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论修改党纲》）为了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在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仅要善于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且要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研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建立起无产阶级专



政。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这种完整意义的社会变革，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外，实际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那一次。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那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都把孔孟之道作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儒反法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竟然把孔孟说成“先圣”，把马列说成“后圣”，极力鼓吹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观点，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代，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儒家，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如果更早一些，从鲁国实行“初税亩”算起，则经过了三百七十多年。在这几百年中间，新兴地主阶级几度夺得政权，又几度失去政权。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从秦王朝建立，一直到西汉王朝灭亡，将近二百五十年中间，尽管奴隶主复辟势力逐步削弱，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

正是这整整一个时代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斗争，给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它带有我国社会历史特有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来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斗争服务。

儒法斗争史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先进阶级必须通过对反动路线、反动思潮的批判，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革命的路线，为下一步的战斗作好准备。新兴地主阶级在战国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全面进军，变法的热潮席卷了各诸侯国。其中商鞅变法以其变革的彻底性在各国引起了普遍的震动。围绕着否定还是肯定这场社会变革，儒法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儒家代表人物孟轲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提出了一套鼓吹“仁政”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否定和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复辟奴隶主专政。法家代表人物荀况、



韩非坚决驳斥了孟轲的“仁政”的谬论，指出所谓“仁义”之说不过是“愚诬之学”，是反对变法革新的复辟理论，从而对各国的变法作了热情的辩护。这场论战，扩大到关于社会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广泛领域，推动法家路线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秦始皇坚决实践了法家路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是那场大论战中法家批判儒家学说的直接成果。

秦王朝建立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在这里，秦王朝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以古非今，向秦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方百计地要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秦始皇坚决采取了“焚书坑儒”等革命措施，粉碎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进攻，坚持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坚持了法家路线。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深刻地总结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秦始皇也不例外。正当他多少有点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这段历史表明，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奴隶主复辟势力无论进行公开的斗争，还是进行隐蔽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改变中央政权的法家路线。路线一旦改变，复辟也就打开了大门。因此，夺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必须把路线问题放在首位，对于反动阶级改变革命路线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坚持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记取儒法斗争史上这一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曾在他的黑窝里咬牙切齿地写下：“忍忿法——立大谋。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九等九忍一狠”。林彪立的是什么“大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



资本主义。他采用“等”、“忍”、“狠”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

赵高篡权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表明，新兴地主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的，反复辟的主要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只是占少数。他们与广大农民处于对抗的地位，当然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复辟的斗争。这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不可避免的弱点。赵高篡权，地主阶级政治家束手无策。但是农民起义一爆发，局面立即改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在打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同时，不到三年就把赵高复辟政权送进了坟墓。恩格斯在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普鲁士“危机”》）同样，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反对奴隶制复辟的主要力量，也是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尚未转化为农民的奴隶。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奴隶制一旦复辟，首先意味着广大农民将重新回到最悲惨的奴隶地位。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任何一次反复辟斗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依靠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教导，以及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教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扫荡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的西汉王朝诞生了。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某些领域的力量仍然要比新兴地主阶级更为强大，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斗争经验也比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更为丰富。他们必然要利用这些来同新兴地主阶级作反复的较量。西汉初期，有一批大工商奴隶主，利用当时的经济困难，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些大工商奴隶主同地主阶级中出现的保守派，也就是那些各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在一起，大搞独立王国。他们纠集了大批儒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复辟舆论。他们利用手中的军事实力，发动武装叛乱。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勾结中国境内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企



图用两面夹攻的方法来颠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西汉时期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西汉的前期和中期，斗争就在这几条战线上激烈地进行着。经过汉景帝时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再经过汉武帝时对奴隶主商人进行全面反击，以及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才算稳定下来。这说明，即使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中，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并且是在各个领域中的进行的。被推翻的阶级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总要进行复辟的尝试。阶级斗争的这种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说过：“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在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史时，重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历史经验总结，感受就更深刻了。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敌人存在。

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坚持了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同样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显然和秦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有关，和汉初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不可否认，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人物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那些奴隶主复辟势力才把中央机构中的法家领导集团看作它们进行复辟的最大障碍。吴王刘濞提出“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搞掉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从而根本改变整个西汉政权的法家路线。毛主席总结了儒法斗争史上的这一重要经验，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



个衣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根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也往往采用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不就是叫嚣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打击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吗？“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我们要善于识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一直到西汉的前期和中期，封建统治者实行的还是法家路线。但是，地主阶级反复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不可能再给自己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了。汉初的曹参在继肖何当了丞相后曾对惠帝说：“高帝与肖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个事实，就是这时的地主阶级虽然仍坚持法家路线，但已不象阶级斗争狂飙时期的法家那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气息了。它的革命性在逐步消退。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成为过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法家思想已经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恶，而经过适当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则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这种转化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只有在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中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封建社会中后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法家则失去了新兴阶级代表的资格，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法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所提出的某些改革的主张，他们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张，他们对于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利



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为封建制度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批判孔孟之道,但是不愿或不敢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甚至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他们虽然进行斗争,但是在斗争中已经不再象西汉以前的法家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因此法家也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压制、打击和迫害。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被看作是洪水猛兽,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无限惊恐,立即加以扼杀;任何一点新的思想,也都被封建统治者当作是异端邪说,千方百计地加以扑灭。整个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表明,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势力的利益,这种思潮始终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如果不用极大的力量来批判这种反动思潮,革命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

历史上的法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而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能够认识和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进行彻底的革命。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虽然我们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不断胜利前进。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锤炼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作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前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论 “黔首”

石 仑

一九七三年夏，山东省文登县简山公社在当地发掘出一只秦代的铁权。这只铁权重三十二公斤，略呈扁圆形，顶上铸半圆形的鼻，权旁镶一块铜诏版，铜版上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文，内容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①

这篇短短四十字的诏文，不仅说明了秦王朝在当时统一度量衡的努力，而且从中可以获得当时社会大变动的证明。“黔首大安”这句话，对我们正确评价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研究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公元前二二一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朝统一六国后，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更名民曰黔首”^②，就是将“民”改名为“黔首”。这项法令公布后，天下“大酺”^③，即“天下欢乐大饮酒也”^④。成千上万“黔首”饮酒欢呼，庆祝这一改变名称的措施。

为什么秦王朝这样重视对“黔首”的政策？为什么“更名民曰黔首”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要正确理解这一命名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揭示先秦时代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民”是伴随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即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后出现的阶级概念，是对奴隶的称呼，又写作“氓”或“氓”。在商代甲骨文中，“民”字的形象就是被刺瞎了一只眼睛的戴着镣铐的奴隶。在商、周时代，“民”可以被任意赏赐或买卖，也可以被任意屠杀，被当作奴隶主的殉葬品。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在《论语》中，绝大多数的“民”是作为同“人”相对立的被奴役、被统治的阶级，即奴隶阶级而出现的。孔丘对“人”即奴隶主贵族讲“爱”，对“民”则从不讲“爱”，只讲“使”。如《泰伯》篇中说：“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宪问》篇中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孔丘眼中，“民”是被“人”使用的工具，永远只配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这说明了，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列宁：《论国家》）。

但是，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发展，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包括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到“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阶级内容上来。从春秋时期以来，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产生了新的阶级，这就是地主和农民。当时，波澜壮阔的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原来可杀可卖的“民”，逐步地争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而成为农民，极少数的还逐步进入到地主阶级的行列。而奴隶主中的一部分则日益破产，丧失了原来的尊贵身份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地主阶级掌权的地方，则变为失去了权力的被统治、被专政的对象，时刻梦想复辟，成为所谓的“逸民”。

在这个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面前，儒法两家实行的是两条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因而对“民”所反映的实际的阶级内容，也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要求“正名”，反对奴隶的解放，妄图恢复“民”原有的阶级内容，取消地主阶级和农民已经争得的社会地位，重新确立“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⑤的奴隶主专政，回到“使民战栗”^⑥的西周奴隶社会中去；同时力图使那些下降为“逸民”的奴隶主恢复已经丧失了的地位，这就叫“举逸民”。“举”包含有上升、选拔的意思，要使“逸民”重新上升为统治阶级，正是为了使地主阶级下降为被统治阶级，使农民重新变为奴隶。战国时期，孟轲发展了孔丘“正名”的反动学说，鼓吹什么“民为贵”^⑦，这里的“民”显然不是指广大的农民或奴隶，而是指已经没落的降低了社会地位的奴隶主。他实质上是企图依靠降为“逸民”的奴隶主，作为复辟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他咒骂新兴地主阶级是“贼民”^⑧，咒骂劳动人民是同“禽兽”一样的“庶民”^⑨。

法家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路线，强调打击造成国家“田荒而兵弱”的“五民”，如“诗书、谈说之士”和“商贾之士”等^⑩。这些人韩非称之为“五蠹之民”^⑪，主要是指儒家之徒以及工商奴隶主等。法家从建立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出发，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坚决主张提高“农战之民”^⑫即地主和农民的社会地位。



法家的路线适应了战国时期“农战之民”兴起的局面，合乎历史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农战之民”逐渐取得了“黔首”的称呼。

“黔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的产物，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出现的名称，就象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称为“第三等级”一样。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广大农民是劳动者。据先秦时代的记载，“黔首”一词最早大约出现在战国中期^⑬。战国末年，《吕氏春秋》、《韩非子》、《礼记》以及李斯的文章，都讲到了“黔首”。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已比较壮大，“民”这个名称的阶级成份比过去更加复杂了。客观的社会需要，推动着人们在习惯上逐步称地主和农民为“黔首”，以区别于社会地位下降为“逸民”的奴隶主。后来，这一名称传进了秦国，随着秦国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和巩固，“黔首”的称呼也日益流行开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用“黔首”作为人民的定名，并颁行天下。因此，清代学者王念孙说：“黔首”“旧有此称，而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⑭。

“黔首”一词，最初是根据农民的特征而来的。据《广雅》解说：“黔首，氓民也。”^⑮《说文》认为：“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⑯在西周时代，“氓民”就是“黎民”，也叫“人鬲”，指的都是奴隶。为什么称奴隶为“黎民”和“人鬲”？黎有黑的意思。鬲就是一种用于煮饭烧水的器具，经常受烟熏火燎，当然也是一片黑色。奴隶成年累月在野外劳动，脸色是黑黑的。奴隶主称他们是“黎民”或“人鬲”，含有侮辱和轻视的意思。“黔首”同奴隶不同，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占“黔首”中最大多数的农民同奴隶确实具有渊源关系。黔同黎一样，也有黑色的意思。应劭说：“黔亦黎，黑也。”^⑰朱熹也承认“黔首”和“黎民”得名于黑色，但又把他们说成是满头黑发的“少壮之人”^⑱，这就完全抹杀了“黔首”和“黎民”的阶级内容。据《吕氏春秋》，“黔首”的特征是“颜色黎黑”^⑲。农民同奴隶一样，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沉重的野外劳动使他们的面色晒得黑黝黝的，并且不准戴冠冕，只能用“卑贱者所服”^⑳的黑色头巾缠头，因而获得了“黔首”这一名称。

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过程中，“黔首”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了提高。这是他们同奴隶主阶级长期战斗的成果。“黔首”中的不同社会成份，在消灭奴隶制的过



程中起着很不相同的历史作用。地主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是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的领导者，而广大农民则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民的前身就是奴隶。千百万奴隶的起义和反抗，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春秋末年的柳下跖起义，就显示了巨大的革命威力。章太炎说，柳下跖“其道甚大，而违于周法”，对于奴隶制统治来说，“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诞妄”，“非跖无以弹其淫名”，“非跖则不均平通达”^①。广大奴隶挣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而上升为农民后，构成了“农战之民”即“黔首”的主要部分。他们要求彻底摧毁奴隶制度，决定了奴隶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地主阶级正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战胜奴隶主阶级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秦国的商鞅在变法中就提出了奖励“耕战”的政策，明确地认为：“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②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广大奴隶要求摆脱奴隶制的强烈愿望，主张“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③，即给他们一小块土地，免除三世的赋役，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各以差次名田宅”^④，即坚持封建土地所有制，部分地满足奴隶的土地要求，从而使他们变成农民，并且“劝民耕农利土”^⑤，急剧地提高了秦国封建政权的经济力量。正是在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农战之民”的基础上，秦国才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⑥。

“黔首”中包含着不同的革命阶级。奴隶制度越是走向灭亡，“黔首”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战国末年，“黔首”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秦国取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那个“富贵极矣”的秦国丞相李斯，就自称是“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⑦。至于“黔首”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其社会地位显然要低得多。李斯说道：“苦形劳神”，“则是黔首之役”^⑧。这个“黔首”，指的就是劳动人民，他们仍然是受剥削的对象，但他们的地位和状况，特别是自耕农，毕竟要比奴隶高些。李斯自称“黔首”，就说明了这一称呼在当时已不再是一个侮辱的称呼，而是个颇值得自豪的称号。这种状况，反映了“黔首”中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社会向前推进，都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儒法两家，都竭力争夺“黔首”中的广大农民群众。儒家为了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奴隶主反动统治，就装出一副同情农民疾苦的姿态，向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反攻倒算。吕不韦就猫哭老鼠假慈悲地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⑨。在吕不韦看来，造成“黔首之苦”的根源是由于象征奴隶制度



的周天子垮了台，所谓“贤者”即奴隶主贵族失了势，而地主阶级的“世主”却神气起来了。其实，造成“黔首”中广大农民当时遭受灾难的根本原因，正是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他们用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只能使“黔首”中的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奴隶。同吕不韦之流相反，法家认为必须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韩非明确地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②①}“民萌”即“民氓”，同“众庶”一起，当时都属于“黔首”。李斯也说：“王者不却众庶”，不能“弃黔首以资敌国”^{②②}。这些话表明，法家为了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非常注意争取“黔首”中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使他们脱离了奴隶状态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因而他们在当时是支持这条法家的政治路线的。

然而，直到战国末年，“黔首”的社会地位还是不稳定的。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是当时分裂和混战的根源，给“黔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因此，广大“黔首”迫切要求进一步彻底摧毁奴隶制度，结束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秦始皇提出了“烹灭强暴，振救黔首”^{②③}的口号，发动了统一战争。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得到了“黔首”们的普遍支持。人民是统一战争的主力，他们为国家的统一造成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力量，他们为国家的统一浴血奋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这是秦始皇能够迅速统一六国的根本原因。汉代的法家晁错说：在秦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六国失败的根源是由于“民不用”，即人民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而秦国所以“能兼六国，立为天子”，是由于“财用足，民利战”^{②④}。人民的支持，决定了统一战争的必然胜利。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②⑤}的条件。汉代的严安说：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②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制，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其中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更名民曰黔首”，肯定了“黔首”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社会地位。几百年来，“黔首”的社会地位由低到高，作为“黔首”特征的黑色也由贬义转变为褒义。秦始皇接受和改造了战国末年流行起来的“五德相胜”说，认为周代奴隶社会是火德，秦王朝以水德克服了火德。水德呈黑色，秦王朝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上



黑”^{③⑥}，黑色成了象征秦王朝政权的颜色标志，在当时是最高尚的颜色。因此，称“民”为“黔首”，无疑是对当时人民的尊称。秦始皇用“以水胜火”的观点来证明秦王朝建立的合理性，这固然是一种历史唯心论。但它的实际内容，却反映了封建制战胜奴隶制、“黔首”战胜奴隶主阶级的客观现实。“更名民曰黔首”，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总结。它从法律上肯定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肯定了劳动人民不再是奴隶。后来，秦始皇进一步取消了没有功勋的宗室贵族的特权，“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③⑦}。这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帝族无功”者，“与布衣黔首等”^{③⑧}。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二世在被杀前曾说：“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③⑨}可见，秦始皇时，确实执行了使宗室子女为“黔首”的政策。

“更名民曰黔首”，是进一步摧毁奴隶制度、巩固封建制度的一项比较彻底的政策。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阶级关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它标志着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阶级关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而封建的社会阶级关系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了。列宁指出：“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论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更名民曰黔首”的进步历史作用。

在确立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秦始皇又宣布“忧恤黔首”，保护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实行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④⑩}的政策，打击工商奴隶主，稳定和改善“黔首”的经济地位。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根据商鞅“各以差次名田宅”的政策，“使黔首自实田”^{④⑪}，即下令“黔首”各人自报所占田亩数，承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并相应地进行赋税的征收。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它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秦代农民负担的徭役并不是很重。当时，“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④⑫}，而徭役则从“间右”开始，首先征发因不执行法家路线而犯了罪的吏、工商奴隶主，接着是征发豪富，当然也征发贫苦农民即“间左”服役，但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秦王朝建立以后，仍然面临着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威胁。尤其是那些反动的儒生，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④⑬}，竭力用“颂古非今”的手段，欺骗“黔首”，以便于复辟奴隶制度。在这些反动儒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④⑭}的情



况下，地主阶级仅仅依靠本阶级的力量是无法防止奴隶主复辟的。因此，秦王朝在保护“黔首”的政策中，包含了承认农民从奴隶制下摆脱出来后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内容，以争取劳动人民对新建立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持。正是由于秦始皇采取了提高“黔首”地位的法家路线和政策，才粉碎了反动儒生“惑乱黔首”的阴谋，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王朝。

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秦始皇虽然坚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派，复辟的逆流暂时被压了下去，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直接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奴隶主复辟的措施，反复辟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全国各地埋藏着一大批旧贵族分子，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到了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刻发动反革命政变，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黔首”的地位急剧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和法家遭到沉重的打击，劳动人民受到了血腥的阶级报复。社会上笼罩着一片“黔首振恐”的气氛，同秦始皇在世时“黔首安宁”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世信赵高之计”的结果，“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⑤。在赵高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咸阳城里，“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⑥。伴随着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赵高为头子的奴隶主复辟政权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徭役的规模空前扩大，大批原来服役较轻的“间左”遭到了无休止的征发。铁的事实证明，反革命复辟一旦得逞，人民就要遭殃，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灾难尤其深重。林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不也就是要把亿万劳动人民打入血泊之中吗！

但是，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并没有能使“黔首”屈服。陈胜、吴广领导的革命农民首先发难，举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迅速推翻了赵高的反动统治，显示了革命农民在摧毁奴隶主复辟的斗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一胜利果实，后来为地主阶级所利用，这就是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刘邦正是在“黔首”支持下，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打败了项羽为代表的奴隶主势力。“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⑦，继续执行了秦始皇尊重“黔首”的政策。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秦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结果，为地主阶级取得反复辟的胜利扫清了道路；而对农民自己，则是用新的封建制枷锁代替了旧的奴隶制枷锁。

“黔首”的产生及其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的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



取政权的历史，劳动人民从奴隶转变为农民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封建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劳动人民从奴隶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在其革命时期，在其反对奴隶制这一点上，能够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但是，农民在封建社会中仍然要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归根到底，地主阶级领导的革命，同一切剥削阶级领导的革命一样，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最先进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阶级斗争其中包括儒法斗争的历史，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逐步地实现在地球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注：

- | | |
|--|---|
| <p>① 引自一九七四年第七期《文物》杂志。这类饕餮纹版的铁权，一九五七年在山西省左云县也曾发现过一件，所刻诏文与本文一样。此诏文也见于《全秦文》。</p> <p>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史记·秦始皇本纪》</p> <p>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p> <p>⑤ 《论语·子路》</p> <p>⑥ 《论语·八佾》</p> <p>⑦ 《孟子·尽心下》</p> <p>⑧ 《孟子·离娄上》</p> <p>⑨ 《孟子·离娄下》</p> <p>⑩ 《商君书·算地》</p> <p>⑪ 《韩非子·五蠹》</p> <p>⑫ 《商君书·农战》</p> <p>⑬ 《战国策·魏二》</p> <p>⑭⑮ 《广雅疏正·释诂》</p> <p>⑯ 《说文解字》卷十上</p> <p>⑰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p> | <p>⑱ 《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上》</p> <p>⑲ 《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p> <p>⑳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〇《巾幘考》</p> <p>㉑ 章太炎：《检论·儒侠》</p> <p>㉒㉓ 《商君书·徠民》</p> <p>㉔ 《史记·商君列传》</p> <p>㉕㉖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p> <p>㉗㉘㉙㉚ 《史记·李斯列传》</p> <p>㉛ 《吕氏春秋·孟秋纪·振乱》</p> <p>㉜ 《韩非子·问田》</p> <p>㉝ 《汉书·晁错传》</p> <p>㉞ 《汉书·严安传》</p> <p>㉟ 章太炎：《秦政记》</p> <p>㊱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p> <p>㊲ 《史记·陈涉世家》案隐</p> <p>㊳ 《盐铁论·诏圣》</p> <p>㊴ 《盐铁论·周秦》</p> <p>㊵ 《史记·张丞相列传》</p> |
|--|---|



评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

洪善思

白虎观是东汉皇帝与儒生们在洛阳北宫讲学的地方。白虎观会议是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举行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由官方出面组织的一次研究注释儒家经书的会议，也是一次尊孔复礼的宗教神学会议。班固撰集的《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则是这次会议的书面总结。东汉统治者通过研究注释“五经”，以封建国家法律的形式，大肆吹捧和抬高孔丘，并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对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一书进行揭露和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当前注释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重大意义。

（一）

白虎观会议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它是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之后，日趋保守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对农民阶级实行专政的产物，是西汉以来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的继续和发展。

西汉中期，虽然奴隶制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但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巩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也日益尖锐。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董仲舒迎合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要求，他在《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继承了孔孟的“天人合一”思想，并吸收了神秘的阴阳五行灾异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的经书。他提出了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论证了封建统治者及其统治秩序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西汉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农民起义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完全走上了尊儒反法的道路。于是，在董仲舒反动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一种



把儒家经典和宗教迷信进一步结合起来的反动思想——谶（音趁）纬学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

“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它以神的启示的方式进行宣传。“纬”是对“经”而言的，就是假托神意，用图谶的观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把经学神学化。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都乞灵于谶纬，妄想假借神意，欺骗人民，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迷信的预言和天命思想，并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厄运。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而且在思想上有力地冲击了尊孔逆流。他们冲入皇宫，杀死了大搞复古倒退而自命为“真命天子”的王莽，戳穿了“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话。他们建立政权，发号施令，把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踏在脚下，打破了“三纲五常”的教条。他们毁经书，捉儒生，使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孔孟之徒闻风丧胆，纷纷“怀协图书，遁逃林藪”。（《后汉书·儒林列传》）到东汉王朝建立时，呈现在地主阶级面前的，已经是一片“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局面。

在残酷镇压了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豪族大地主为支柱的反动政权。东汉初年，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在各地不断发生，有时甚至直接威胁到东汉的中央政权。面对这种形势，东汉统治者除了继续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外，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这样，在西汉后期出现的谶纬学就被东汉统治者视为至宝，奉为儒家思想的正宗。刘秀早在他即位的祝词里，就引用了《赤伏符》上的两句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即“刘”字）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他假借“天命”做了皇帝。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他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正式确定谶纬学为儒家的正统，谶纬以外的思想，则被斥为异端邪说。由于皇帝的大力提倡，一般儒生为了献媚主上，以干求禄位，除了研读儒家的经书以外，大都兼习谶纬，于是谶纬学大为流行；但也遭到了地主阶级中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例如桓谭一再上疏反对谶纬，他认为图书谶记，都是一些“巧慧小才伎数之人”伪造的，“以欺惑贪邪”，（《后汉书·桓谭传》）应该抛弃它。刘秀大为恼火，说他“非圣无法”，要杀他的头，



结果他被贬为六安郡丞，死在半途。由此可见，当时思想界的斗争是极为激烈的。

东汉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排除异端，统一思想，以加强对农民的思想统治，校书郎杨终上疏章帝，建议召集群儒，论定五经，“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亲自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物，其中多数属于今文经学派，也有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儒家内部的两个学派。原来先秦儒家的著作，经过秦朝焚书后大都烧毁散失。西汉初，由一些儒生口授，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经”。西汉末年，又发现一部分儒家经典，是用战国时代的古文字——篆文写成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为了争夺和保持各自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一直是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参加这次白虎观会议的一些经学大师，不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在宣扬谶纬迷信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例如丁鸿，他是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白虎观会议上高谈阔论，自我吹嘘。后来他在上和帝的疏中极力鼓吹“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的“天人感应”说。其实丁鸿的这一套，完全是掇拾董仲舒的牙慧，没有什么新鲜的玩艺。但在当时他却被认为是“论难最明”的“高才”。贾逵是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也同样提倡谶纬以投皇帝之所好，结果受到提拔重用。撰集《白虎通》的班固，也是一个迷于“世纷”的古文经学家。他曾根据图谶纬书，写了一篇历史论文《典引篇》，从开天辟地，讲到白虎观会议，完全用荒唐的宗教呓语，说明天命汉继尧统；并胡诌章帝召开这次会议，也是受天之命。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物，为了贪图利禄，望风承旨，堕落到何等庸俗、无耻的地步。他们哪里是讲解什么经学，分明是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依据，为自己拚命捞取政治地位。

（二）

白虎观会议讨论的范围极为广泛，从自然界到各种社会现象，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都作了解释和说明。作为会议结论的《白虎通》是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之后，进一步把儒家经学同阴阳五行和谶纬糅合在一起，把孔丘神圣化，把孔丘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尊孔的一部法典。



《白虎通》宣扬的中心内容是尊孔复礼，“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孔丘本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在白虎观会议上，却被一些反动儒生利用谶纬迷信打扮成一个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人。《白虎通》给“圣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又说：“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意思就是说，圣人是无所不通的。圣人所以有丰富的先验的知识，能预知未来，能与天神相通，就是因为圣人是天生的。而孔丘就是这样的天生圣人，和凡人不同。《白虎通》不仅神化孔丘，而且也神化了他的著作，说孔丘写的经书，都是受天之命而制作的，是“永为后世则”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任何人不能有所非议。

“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白虎通》极力吹捧孔老二这个历史亡灵，正如它自己所说，孔丘制作经书的目的，是专为汉帝立法的。立法就是“复礼”。《白虎通》给“礼”作了这样的解释：“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侯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它认为有了这样的“礼”，才能有贵贱，有亲疏，有长幼，宣扬“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可见它的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和巩固被绿林、赤眉农民战争打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

《白虎通》“复礼”的理论根据，就是从孔丘到董仲舒一脉相传的“天命论”或“天人合一”说。这一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象一条黑线一样贯串在《白虎通》全书中。《白虎通》用了很大篇幅，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天是“居高理下”的能支配人间一切的神。“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他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他有过失时，上天会降下灾异，给他劝告，让他改过为善；他有功劳时，上天也会给他降下符瑞，以示奖励。这样就给地上的王权披上了一层天上的神权外衣，肯定了封建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地位。

《白虎通》为了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它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结合得更为紧密，大加比附。例如它说：“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又说：“子顺父、臣顺君、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这样就把君权、父权、夫权以及师



道尊严的封建统治秩序，说成是天经地义的。《白虎通》还把“君有众民”，比作“天有众星”；把人眼所看到的“日行迟，月行疾”的自然现象，比喻为“君舒臣劳”，以表示君统治人民以及君逸臣劳这一人为的不平等关系，是符合上天意志的，和日月星辰一样，都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白虎通》“复礼”的基本内容，就是所谓“三纲”“六纪”。“三纲”的思想，在孔丘的“正名”学说中已经有了。董仲舒根据他的神学的“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君、父、夫比附为阳，臣、子、妻比附为阴，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尊卑主从关系讲得更加明确了。《白虎通》则把“三纲”作为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正式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君权、父权、夫权更进一步绝对化了。

《白虎通》对“三纲”的论述，既不是平列，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君权、父权、夫权这“三纲”看成是统一的有机体，并把“君为臣纲”提到“三纲”的首位。

子事父和臣事君是一致的。《白虎通》提出“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它所以要树立父权的尊严，正是为了奠定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伦理基础。而父权又是同族权相联系的。《白虎通》所以反复强调尊祖敬宗，“纪理族人”，正是为了通过千支万系的宗族组织，以巩固封建国家政权。东汉的大地主往往兼有宗族长的身份，隶属于他的农民则多半是宗族成员。因此，族权实质上是在温情脉脉的宗族外衣掩盖下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贫苦农民的统治权。

《白虎通》还大肆宣扬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本不承认妇女的独立人格。例如它说“妇人因夫而成”，妇女必须依附于丈夫才能存在。还说什么“妇者，服也”，妇女生来就是为了服侍丈夫的。妇女“阴卑无外事”，不得参与社会活动。它还明确提出，妇女“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子可以利用种种借口“休妻”，而女子即使“夫有恶行”，也无权提出离婚，因为“地无去天之义也”。这就从理论上把妇女置于被统治的最底层，即除了受神权、政权、族权的压迫外，还要加上夫权的束缚。

至于“六纪”，《白虎通》解释说：“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它讲的这一切社会关系，也和“三纲”一样，都是尊卑上下等级关系，是“三纲”的延伸和扩大，并为“三纲”服务的。所以《白虎通》解释纲纪说：“何谓



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它为了把这种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圣化，又根据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的理论，从而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六纪”提到了神圣不可侵犯和宇宙法则同等的地位。

总之，《白虎通》是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双重思想指导下撰集的一部完整的反动的封建法典。它用儒家唯心主义神学世界观，来解释封建社会的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以论证封建统治的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要使“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后汉书·儒林列传》）其实质就是要用这四种权力作为束缚农民的四条绳索，维持地主阶级的专政。

（三）

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的任务，就是对孔丘的儒家思想进一步改造加工，使它更紧密地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

儒家思想由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思想转变成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思想，中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白虎观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西汉的董仲舒，虽然早已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儒家的独尊地位，直到白虎观会议以后才正式确定下来。白虎观会议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把孔丘神圣化，把儒家思想法典化，而法家和其他进步思想则一律被斥为“异端邪说”。鲁迅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我之节烈观》）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意味着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里，地主阶级加强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同时，也表明地主阶级进一步走向保守反动。

从孔丘到董仲舒再到白虎观会议，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条十分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也是一条反对革新坚持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这条路线不仅适应了东汉大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了汉代以后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需要。宋代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朱熹，就是根据这条唯心主义路线，创立了一个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理学。他以白虎观会议为榜样，以《白虎通》的观点为依据，搞了一套《四书集注》，极力宣扬：“三纲”“六纪”是“至善”的“天理”；“君



臣父子，定位不易”。这反映了这个时期地主阶级顽固地维护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所作的绝望挣扎。近代曾国藩、蒋介石这类极端凶恶的刽子手，也从《白虎通》中寻找思想武器。曾国藩叫嚷什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讨粤匪檄》）蒋介石吹捧孔丘的经书经过“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之命运》）他们利用“三纲”“六纪”来反对和镇压人民革命。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紧步历史上反动派的后尘，狂热地仿效白虎观会议大搞尊孔复礼。六十年代初，在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实质上就是当代的“白虎观会议”。林彪反党集团也躲在阴暗角落里编“四书集句”，为他们篡权复辟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宣扬的“天才论”，就是白虎观会议所鼓吹的“天命论”和“天人合一”说。他们贩卖的“受于天”的反动谬论，也是原封不动地从《白虎通》抄袭来的。《白虎通》利用谶纬迷信神化孔老二，林彪自封“天才”、“超天才”，就是要把他自己打扮成象孔老二那样的天生“圣人”。所以林彪鼓吹的那套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先天就有的“天才论”，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且带有很浓厚的宗教神学的色彩。他们妄图以此欺骗人民群众，篡党夺权，建立林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借助历史这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林彪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到作为白虎观会议总结的《白虎通》，从朱熹的《四书集注》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四书集句”，对儒家经书注了又注，疏上加疏，都是企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编辑工作，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这个历史事实深刻地说明：注释工作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单纯的文字解释或编辑几本书的问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当前，全国正在开展对法家著作的注释和研究，这是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深入的具体表现，也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包括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工人理论队伍的一个创造

——大连红旗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斗争中，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大连红旗造船厂的工人理论队伍广泛开展了分科理论研究活动。工人同志的这一个创造，有力地推动了全厂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这个厂工人理论队伍的分科研究活动，是在群众性学习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九大”以后，这个厂就涌现出一些工人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开展了群众性的业余理论学习活动，逐渐形成了一支工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他们带动群众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全厂出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水涨船高”，随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和群众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对工人理论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才能使工人理论队伍更好地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红旗造船厂党委和广大职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工具车间业余理论小组，在批判林彪鼓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时，大家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可是，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在道理上一时还说不清楚。业余理论小组的同志就着重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从一百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提高了对假社会主义的识别和批判能力，进一步戳穿了林彪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假乱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狼子野心。认识到林彪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得臭不可闻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假共产主义是一路货色。

工具车间的经验，给了这个厂的党委一个启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其反动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涉及和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无产阶级必须在



斗争中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才能从根本上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于是，他们尊重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因势利导，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作出了“关于努力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决定”，提出了工人理论队伍要在进一步开展群众性学习、批判的基础上，向分科研究的方向发展。接着，建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自然辩证法等十个研究小组。今年以来，在全国批林批孔斗争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已经发展到三十九个研究小组。一年来，他们根据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提出和研究了三十五个课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文章，举办了十余次读书报告会，为全厂职工上了一千五百六十多次理论辅导课。此外，一些研究小组的工人还走向社会，登上大学讲台和旅大市图书馆的讲座，有的还被大学聘请为兼职教师。

实践证明，工人理论队伍开展分科研究的好处很多。主要是：

第一、通过分科研究，可以使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在广泛学习和研究的同时，有一门重点，从而便于比较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提高全厂职工的理论水平，掌握批林批孔的武器。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从去年七月以来，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罪行时，他们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调查了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情况。例如，当时的大连文田铁工所加工直径六十毫米的钢球，把原材料消耗、机器磨损等生产费用和工人工资全部扣除，资本家每天从一个工人身上净剥削四十八元。而工人一天的工资不超过五角钱，吃的是苞米、橡子混合面的窝窝头和咸菜疙瘩。他们从这四十八元和五角的对比，也即高额的剩余价值率中，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以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批判，使广大群众既激发了无产阶级的义愤，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最近，他们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研究桓宽的《盐铁论》，剖析西汉中期没落奴隶主复辟势力及其代言人贤良、文学们叫嚷“罢盐铁，退权利”的反动实质，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杰出法家桑弘羊对他们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借鉴两千年前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深入批判林彪打着“民富国强”的旗号，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大家感到，开展分科研究，就每个小组的成员来说，研究的范围更集中了，有利于朝“一专多能”的方向前进；从全厂来看，研究的范围更广了，可以更快地提高理论水平。

第二、通过分科研究，可以更好地解决群众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提出的思想理论问题，使理论研究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批林批孔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运动每深入一步，都会遇到一些新问题。各分科研究小组活跃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上，注意分析动向，研究问题，并能从各个角度给予研究、解决。例如，工人群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时，听到了一个说法：“儒法斗争，特别是中后期的儒法斗争，完全是剥削阶级内部饱狗与饿狗的斗争。”阀门车间哲学史研究小组、船体车间儒法斗争史研究小组和动力科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的同志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因此，他们以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为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研究，认识到即使是中后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仍然包含着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只有突出地抓住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评价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在厂召开的读书报告会上，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读法家著作，批儒家的书，研究儒法斗争史。先后在厂和车间的大小会上宣讲的，达七百余人。只有三年文化的老工人刘显，用十四个晚上，研究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写出了自己的讲稿，在厂内外宣讲。他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批判了林彪和一切中外反动派咒骂秦始皇的险恶用心，观点鲜明，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很受工人群众欢迎。一次，他宣讲完后，有个工人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刘师傅，讲得真好，我们工人阶级登上史学讲台，就应该这样讲！”

第三、开展分科研究活动，可以本着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原则，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把工人理论队伍分为几个方面军，向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进军。这个厂的《红楼梦》研究小组，是成立较早的一个组，一九七二年九月，就曾在旅大市图书馆组织的读书报告会上，作了三次读《红楼梦》的辅导报告，批驳了地主资产阶级“红学家”们的种种谬论，强调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此外，文艺创作组编演了批林批孔的表演唱、锣鼓快板、山东快书、对口剧等节目，上船台，下车间，去职工宿舍进行广泛宣传，并组织广大职工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旧



戏。美术创作组创作了一百多幅反映造船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画、版画，定期在画廊里展出，其中有十八幅，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工人画展。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的同志，从去年九月以来，坚持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部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在发展造船工业上积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无模爆炸加工新技术》、《铆工工艺》、《钳工工艺》等书，已经或正由出版社出版。

红旗造船厂工人理论队伍的分科研究活动，所以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下去，除了全厂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使分科研究活动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推动批林批孔运动以外，还注意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开展分科理论研究活动，要坚持领导干部、理论研究骨干与群众三结合。毛主席教导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个厂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注意加强自己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积极领导和参与分科研究活动，同时，工人理论队伍的分科研究和群众的学习，对各级领导干部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工人理论队伍始终立足基层，面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原则。各研究小组的成员，都积极参加群众的学习、批判活动，一方面分析群众学习、批判中的难点，提出分科研究的重点题目，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的道理，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讲，变成大家的收获；另一方面，又注意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轮机车间研究小组的同志，在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学习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有关军事著作，并且走访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工人，请他们回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虚心学习，同时又帮助他们进一步掌握批判的武器，一起分析整个东北战场的形势，给他们提供了有关辽沈战役的资料。大家进一步领会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批判林彪破坏东北解放战争的罪行，戳穿了林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的画皮**，写出了《从林彪的军事保守主义看他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文章。

二是分科研究工作要坚持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小组的成员要不脱离生产，



努力做到“能文能武”，既要当理论学习的模范，批林批孔的尖兵，又要做生产上的闯将。分科研究工作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个厂的分科研究小组的成员，认识到他们的工作是受本阶级的委托，为实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而战斗，在自觉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发扬“钉子”精神，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刻苦钻研革命理论。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工人队伍开展分科研究活动，阀门车间机械六班有两名工人参加理论研究工作，有时占用一些工作时间，工人们抢着把任务接过来，大家齐心协力，做到减人增产。这两位同志深受感动，回组后加倍努力。这个车间的研究小组的成员，百分之七十五是先进生产者。工人们赞扬说：“我们的理论队伍，不光马列学得好，干起活来也是一把手。”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红旗造船厂工人理论队伍开展分科研究活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群众学习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刻苦读书，认真钻研，联系实际，知难而进，已经形成风气，对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因而也推动了全厂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焕发出更大的革命干劲，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推进器车间理论研究小组和广大群众运用《实践论》，试验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大型推进器叶面无余量压铸新工艺；铜工车间理论研究小组运用《矛盾论》的思想和群众一起搞成了管路“综合放样”。这个厂在最近建造我国第一艘二万四千吨油轮“大庆六十一号”的过程中，研究了尊孔与崇洋的必然联系，深入批判了林彪、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谬论作了进一步批判，结果，只用八个月时间就建成了，比过去的造船速度大大加快。到八月底，这个厂已经完成全年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六，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八点四。

红旗造船厂的工人理论队伍和广大职工认为，他们开展分科研究还只是迈开了第一步。他们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努力攀登理论高峰，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

中共旅大市委调查组 《辽宁日报》记者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是胜利的基本保证

甘 戈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地走过了二十五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二十五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不仅要加强本阶级的团结，而且必须同广大的革命人民结成广泛的战斗联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恩格斯说：“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它能够把千百万人动员起来，吸引他们投身到斗争的行列中。因此，无产阶级需要而且完全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

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不甘心的。他们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所经历的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都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因



为我们的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伟大的人民，所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妄图搞分裂的阴谋，都没有得逞，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通过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

巩固和加强全党的团结，并且经过全党的团结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这是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加强革命团结的基础。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团结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而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也要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列宁指出：“**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无论是为了尽快地实现最终目标，或是为了在现存的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都是绝对必要的**”。离开党的团结，离开人民群众的团结，党的正确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坚持革命路线和坚持革命团结是联系着的。毛主席历来总是把团结问题作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提到全党的面前。在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以后，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危害党的团结就是危害党的生命。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中，第一条就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毛主席指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引导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对敌。在摧毁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后，毛主席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把“**要团结，不要分裂**”作为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一个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斗争实践说明，当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巩固和加强革命团结的时候，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就能十倍百倍地增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能顺利贯彻和执行，从而推动革命和生产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一旦革命团结削弱了，革



命队伍的战斗力就要受到影响，阶级敌人就会乘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党的路线和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革命和生产就要受到损失。

团结问题，首先是一个分清敌我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个专政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就是以工农兵为主力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才能落实到每个基层。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这样做，是为了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团结是通过斗争实现的。要不断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就必须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清除一切腐蚀革命队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政治上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修正主义存在一天，分裂的危险就存在一天。刘少奇、林彪鼓吹“党内和平论”和“中庸之道”，就是要我们放弃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以便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铲除分裂主义的根源，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人们维护革命团结的自觉性，才能增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充分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以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划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界限，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修正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在我们国家里，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政策界限，慎重地加以对待。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团结同志，打击敌人。毛主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



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应当采用民主的方法，讨论、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属于思想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有看法不一致的地方，这是正常的现象，应当通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逐步地统一起来。即使某些认识一时统一不了，也应当从革命大局的利益出发，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团结对敌，深入搞好批林批孔。如果纠缠于某些细小问题而不注意大的路线问题，甚至放松了批林批孔，或者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采用了错误的不得当的方法，都会给阶级敌人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团结以可乘之机，这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不利的。

几十年来，我们党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对于在路线斗争中犯有或多或少错误的同志，要认真地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原则性，体现了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负责精神和深切爱护**。毛主席指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应当抱着满腔热情、一看二帮的态度，给他们以检查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当然，惩前才能毖后，治病才能救人。群众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对群众的批评耿耿于怀，甚至借机挑动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那是完全错误的。每个同志都应当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注意加强革命团结，更好地批林批孔。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毛主席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夏 平

在国内国际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豪情，热烈庆祝各族人民团结胜利的光辉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劳动人民历来就有团结统一的强烈愿望和优良传统。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经常受到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只有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各族劳动人民的心愿才得以真正实现。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肩并肩，手拉手，经过民主改革，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由于各族人民二十五年的团结战斗，社会主义事业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国家被四分五裂、人民受欺侮凌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革命的团结更加发展，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非常重视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毛主席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提出革命任务的同时，总是要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同时，总是要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宝贵经验；并为我党制定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毛主席还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要团结，不要分裂”作为我们必须坚持的三条基本原则之一，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各族人民革命团结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建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夺取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就是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历史。曾经压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是靠什么力量推翻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缔造起来的？是依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依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力量。正是由于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进而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个胜利，也都是由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发挥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我们依靠这个力量，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也不会有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个团结，就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民族问题上，是坚持团结，还是大搞分裂，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



线的激烈斗争。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为了维护剥削制度和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反动统治，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离间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要不要团结和统一，正是我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曾经妄图瓜分我国的各国帝国主义者，无不采取“分而治之”的反革命策略，来分裂各族人民的团结。社会帝国主义把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当作妄图分裂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手段。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搞分裂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也是这样干的。他们懂得，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是他们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搞倒退、复辟、投降卖国的大障碍。因此，他们把破坏党的团结、革命队伍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个分裂党、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是，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反动力量所破坏不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被粉碎，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可以预料，通过批林批孔，通过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革命团结，这是符合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民族都是划分为阶级的，资本家、地主、奴隶主总是少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工人、农民、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同是阶级兄弟，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讲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就是要把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把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敌，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在批林批孔中，对各族人民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对于搞好民族团结，是十分重要的。经验证明，提高路线觉悟，是增强革命团结的根本途径。路线清，方向明。通过路线教育，广大群众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就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样，就能心明眼亮，识破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抵制一切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就能有效地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各地发动各族人民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两条路线对比，共同忆苦思甜，共同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判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罪行。大家从旧社会的共同遭遇和新社会的共同幸福中，从两条路线、两样结果的对比中，认识各族人民“苦同根、甜同源，民族不同、阶级同”，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遇事能从阶级上划清界限，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能够顾全大局，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有效地加强了民族团结。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了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需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时制定了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是我国革命斗争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些方针、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我国各个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体现了各族人民加强团结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又照顾到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是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取得发展的有力武器。许多事实证明，那个地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那个地区就能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发展生产。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党委，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民族政策，总结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经验，这是值得提倡的。

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许多同志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相信和依靠大多数人。我国少数民族的广大劳



动人民，在旧社会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靠力量。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要结合少数民族的特点，依靠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凡是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培养得多、成长得快的地方，那里的民族团结就搞得越好，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特别是要注意在少数民族的青年和妇女中选拔和培养共产主义干部，发展共产党员。要把在批林批孔和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解放以来，党派了大量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他们是加强民族团结、做好革命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汉族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主动地和少数民族干部搞好团结，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工作，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各族干部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模范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加强民族团结上起带头作用。对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问题，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不同意见，要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反复进行讨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毛主席号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深信，在当前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下，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各民族的革命团结必将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吕 真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主席总结我们党内斗争历史经验所提出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这个方针，对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是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正确处理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犯路线错误的人中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例如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混进党内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他们是极少数，是很难改悔的，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是我们队伍内部的同志，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了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些人是多数，是能够改正或者可能改正的，他们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严格区分并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则应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是体现了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有效的方法，是我们党用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毛主席领导下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毛主席的总结倡导，我们党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了。正如



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延安整风，这个方法又进一步推广到了党外，按照它来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达到了全党和革命队伍的更大团结，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运用这个方法，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了错误并且愿意改正的同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促使错误向正确转化，增强人民内部团结，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科学方法。它概括了团结和斗争这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这样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在人民内部，在革命队伍中间，正确克服错误，错误向正确转化，也必须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不能含糊敷衍，不能调和折中。但是，我们批评犯错误的同志，就象医生治病是要救人一样，完全是为了把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讲政策，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那就势必把事情搞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只有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公式去做，才能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就要热情、严肃地帮助他们。要创造条件让犯错误的同志做自我批评，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同志做思想工作，要做得耐心、细致、充分，欢迎和帮助他们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革命。只要他们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予帮助。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大多数，共同对敌，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好。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



重要条件；但是，要同错误的东西彻底决裂，决定的因素还是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的同志，要严于解剖自己，做认真的自我批评。要把群众的批评看作是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动力，真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帮助。自己有了错误，群众起来揭一揭，这是必要的，很好的；错误揭出来了，才能够认识它。如果讳疾忌医，护短怕揭，不肯把错误摆出来，怎么谈得上认识错误呢？因此，对于群众的批评，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决不能采取拒绝的态度，更不允许打击报复。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刻地懂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来说，认识错误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更加重要的一半还是改正错误。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是如此，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同样也是如此。我们认识错误，就是要弄清楚错误的内容，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及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要弄清楚，目的完全在于让犯错误的同志从中吸取教训，真正在行动上改正错误，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看一个同志是不是真正认识了错误，不能光看他检讨得如何，关键是看他在行动上改正得怎样。有错误改了就好。认识了错误并真正在实践中改正过来，这样就有希望变成好同志。假如只是检查错误而改正错误的行动却甚少，这种态度对革命对自己都很有害，也说明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至于林彪及其死党那种当面做“检讨”、背后耍阴谋的两面派行为，则是另一类问题了，这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却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他们团结过来，继续革命，这充分证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的强大。坚持这个方针，就能不断加强和发展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陷于最大限度的孤立。当前，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这个方针，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搞好批林批孔，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红旗

一九七四年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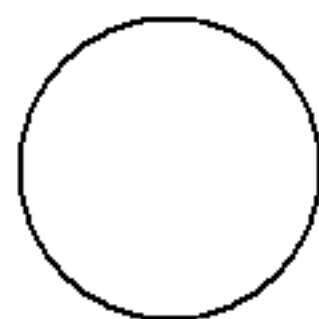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目 录

思想评论



- 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池 恒 (5)
-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薛 仑 (9)
- 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黎 新 (14)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一点体会.....武振轩 (18)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罗思鼎 (25)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燕 枫 (34)

《三字经》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剖析《三字经》的两个增补版本

.....合肥市杏花村公社 方玉荣 李 敬 (40)



批“半部《论语》治天下”.....卞石中 (43)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风庆”轮党支部 (49)

关键在于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调查报告..... (56)

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夏力之 (60)

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祝新运 (65)

搞好技术革新 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

发展工业一定要开展技术革新.....宫效闻 (67)

技术革新必须依靠工人群众

.....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会 (73)

新厂也需要搞技术革新.....天津市第一石油化工厂党委会 (77)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81)

杂文: 呖语.....阳 戈 (86)

☆十一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主席语录

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毛主席语录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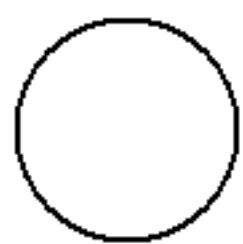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思想评论

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



池 恒

一分为二，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在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继续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必须善于具体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且要看到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要搞两点论，不要搞一点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某些现象，看不见或抹杀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否认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些都是同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毛主席还提出，要在党的各级地方



委员会上谈一分为二的问题，使大家逐步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对于毛主席这些指示的领会也越来越深刻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凡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凡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违背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我们就要犯错误。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说明：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毛主席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一分为二，就能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不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政治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反修防修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长期性，这决不会因为进行一次或几次大的斗争，阶级斗争就可以结束。如果不这样认识问题，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有张有弛、曲折前进的。它象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阶级斗争高一阵的时候，并不表明阶级敌人力量的强大；阶级斗争低一阵的时候，并不表明阶级斗争的熄灭。如果不注意到阶级斗争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形式，就是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不断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加深对它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便适合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开历史倒车，搞反革命复辟，总是要尊儒反法，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动的思想武器。有尊孔必有反孔，反孔总是同尊孔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开展对修正主义、对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是我们当前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大任务，也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坚持一分为二，我们要从整个民族文化遗产中剔除孔孟之道的糟粕，彻底批判儒家复古、倒退、卖国的反动路线，同时，要



对法家的著作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分析，肯定法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作用，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研究历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搞形而上学，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古为今用的方针。我们要使法家著作的研究，使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研究，真正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拥护。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只是一小撮。这种分析和估计，符合实际情况，是我们需要而且能够团结大多数的客观基础。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加以正确处理。对自己，对同志，都要一分为二。这样，才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绝大多数人的觉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刘少奇、林彪的分裂主义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人们懂得维护团结的重要性，运动中的许多经验也反复证明了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大多数，就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讲团结并不是否认斗争。团结是从斗争中来的。如果不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就不可能分清路线是非，弄清思想，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也不可能今天的的大好形势。对少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或多或少犯有错误的人，把他们的问题搞清楚，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有利于他们的进步，有利于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团结的重要而否定对错误路线、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斗争的必要，也不能因为这种斗争的必要而否定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我们必须防止类似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者“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掌握一分为二，才能正确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的基本路线，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持“鞍钢宪法”的各项内容，纠正不正之风。这些都包含着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斗争。阶级敌人往往妄图通过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以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从反面说明，我们必须搞好批林批孔，认真加强对生产的领导。抓革命、促生产，还必须正确处理好生产领域内的各种发展关系。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好生产计划，既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农业发展了，轻工业发展了，就会有更多的生活品，更多的积累，就可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外，如大、中、小，农、林、牧、副、渔，等等，它们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对立、互相促进的，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都必须具备对于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这个两分法的辩证思想，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看到革命的大好形势，肯定工作中的成绩，这对于我们坚定必胜的信心是非常必要的。解放以来，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用歪曲和抹杀大好形势的手法，妄图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此我们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还要看到前进中还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继续革命，继续前进。

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不很难，关键在于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实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到处都有辩证法，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从理论上提高自觉性，对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就会视而不见，更谈不上自觉地运用一分为二解决实际问题。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必然会歪曲辩证法。所以，学习唯物辩证法还必须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真正变为自己手中的武器，使它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强大的威力，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薛 仑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对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进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是进一步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八年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党内的极大隐患。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党的各级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进一步增强。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一片大好。为了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把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只有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地、稳步地去夺取新的胜利。

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了实现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任务，必须用统一的纪律把全党组织起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因为有一条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同时，也是与全党坚决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保证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分不开的。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加强党



的一元化领导，要进一步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要做到全党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愿望，全体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的组织都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尤其要这样做。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曾经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于我们警惕上述现象的产生，自觉地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非常必要。

进一步发挥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方面。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机关以及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是党根据革命斗争需要而建立的，又是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桥梁。在这些部门和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和革命分子，是党派去工作的，要自觉地把自己所管辖的单位，包括自己的一切行动，严格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任何部门、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向党闹独立性，不能离开党委另搞一套，更不允许凌驾于党委之上。如果否认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把二者的关系看成是平行的，甚至颠倒过来，那就势必削弱以至取消党的一元化领导，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危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竭力颠倒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伙大搞多中心即无中心，在他们把持的部门大搞独立王国，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时刻摆正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

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来实现的。在一个地区，要由那个地区的党委会对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这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



的党的委员会”。在一个地区，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委会，是那个地区领导一切的指挥部。没有各级党委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因此，各个部门，各种组织，都要自觉地维护地方各级党委会的正确领导，不能以任何借口割裂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会的关系。党委也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发挥党员和所属党组织的作用。当然，地方各级党委会的工作，也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积极地实事求是地帮助党委会改正错误，以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切真正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必须从思想上牢固地树立党的观念。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二十五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反复证明了一条真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摆正党同各个方面的关系，摆正党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能得到顺利贯彻，革命就发展，斗争就胜利；削弱或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受到干扰，革命就要遭受挫折，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也可能丧失掉。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以无限信任我们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正是基于这一铁的事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的威信更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党的观念进一步增强了。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竭力破坏党的领导的流毒的影响，以及社会上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同志没有树立坚强的党的观念。在少数党员中，还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向党闹独立性，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群众路线，或者对党的政策、决议、指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等情况。这些由缺乏党的观念而出现的错误倾向，都在必须克服之列。我们应该向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增强党的观念的教育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教育，使大家都牢固地树立党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使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自觉地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各级党委会本身来说，要求形成一个坚强而统一的领导核心，建立起一个团结一致的、坚持原则的党的委员会。没有这一条，一



元化领导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党委会内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也是完全适用的。党委会作为党的某一级领导机构，要想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朝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去战斗，去建设，就必须保持本身的高度集中统一，使党委“一班人”动作整齐，步调一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党委会内部，不论书记或委员，都要自觉地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反对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党委会“一班人”是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按照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被选进党的领导机构的。尽管他们来自各个方面，党龄有长有短，斗争经历各有不同，一经参加了党委的领导班子，担任党所分配的一定的领导工作，就更要以党的利益作为衡量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唯—标准。要用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对自己担负的工作必须坚守岗位，努力做好，对阶级敌人分裂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阴谋，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为了使党委会能够步调一致地去实行一元化领导，书记和委员之间互通情报，交流情况，取得共同的语言，并在工作中相互谅解，相互支持，主动承担责任，这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实践说明，党委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意见分歧，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彼此都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出以公心，完全可以及时解决，从而使党委会的战斗力的提高一步。在这方面，书记应当带头做出榜样。在党委会内部，某些同志在工作中可能犯过错误甚至犯过大的错误，不要嫌他们，而要团结他们共同工作。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不是坚持错误而是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宝贵传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必须同一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倾向作斗争。党委会要敢于坚持原则，反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否则就是放弃了领导责任。我们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又要坚持党的原则，不倦地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来自下级机关和群众的意见，凡属正确的，要积极支持，热情鼓励，认真提倡；凡属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批评教育。对于阶级敌人的进攻，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揭露出来。**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实行这个原则，是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它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完全一致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实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进一步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在前进道路上即使出现一些缺点或错误，也不难纠正。各级党委会必须把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来抓，抓紧抓好。一定要象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善于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学会这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广大群众和干部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焕发出来的冲天革命干劲，投入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中去。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按照党的章程，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我们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去发展大好形势，发展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



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黎 新

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这是革命的大局，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继续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以及各条战线的革命同志，都必须继续提高路线觉悟，为维护和加强革命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毛主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分显示了革命团结的巨大威力，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刘少奇、林彪搞分裂主义的危害性，体会到维护革命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团结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团结起来，才能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起来，才能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我们正在进行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伟大事业。这全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干社会主义，除了党的领导和路线正确之外，动员群众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讲团结，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干得好。

团结离不开斗争。革命团结是在党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中实现的，是在同错误路线、错误思想和分裂倾向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就不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就不能组织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们要又讲斗争，又讲团结，把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处理好。

在我们的社会里，拥护和热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群众是大多数，而敌视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则是极少数。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战胜国内外的敌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自己的阶级，团



结自己的同盟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建国以来，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伟大斗争，特别是进行了四次重大路线斗争，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分裂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每一次斗争都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团结了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使党更加纯洁，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搞分裂、不搞团结，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因为它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团结，反对分裂，团结起来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我们要自觉地坚持团结自己、打击敌人这个基本原则，把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不给阶级敌人有任何分裂革命队伍的可乘之机。

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深刻地概括了人民内部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并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由于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的不同，党内、革命队伍内部思想上行动上总会有矛盾，永远不会绝对一致，永远需要批评和斗争。“无差别境界”是永远不存在的。我们的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人民内部矛盾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加以具体分析。有的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歧，是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例如，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等。对这种争论，必须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和斗争，分清路线是非，矛盾才能得到解决。看不到人民内部存在着这种原则分歧，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路线问题上搞调和折中，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至于群众中对某些问题的争论和分歧，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抓住枝节问题纠缠不放，以至无限上纲。有些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也应以革命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在不损害马克思主义重大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大家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对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或多或少犯了错误的同志，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



关系，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大多数的重要问题。这些同志犯了错误是不利于革命，不利于社会主义，但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又是可以或可能改正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既要有团结的愿望，又要有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开展必要的斗争，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毛主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包含着团结和斗争这两个方面，我们应当认真执行。

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在问题基本弄清以后，站出来重新投入新的工作，这有利于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继续改造自己，也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他们的错误的批评和斗争的否定，恰恰相反，正说明了这种批评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同志就会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在这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和斗争，才把他们从修正主义的泥坑中挽救出来，使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正如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明了他们继续革命的方向，是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批评与斗争去掉了他们身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灰尘。这种体会能够转变成继续革命的动力。我们只要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就能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新的战斗中为党为人民立新功。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单位、地区的群众在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揭发和批判了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以及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这是很好的事情。各级领导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是处理好团结和斗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对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是他们的权利，反映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体现了他们对领导的关心和爱护。对各级领导同志来说，自己有了缺点、错误，群众起来揭一揭，有什么不好呢？这可以帮助我们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热情欢迎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他们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要着重从思想上、路线上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广大群众，一定要做好革命团结的工作，对不良倾向要敢于和善于提出意见，不能放任不管，更不能支持一部分群众，压制另一部分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分裂革命队伍，这个教训应该深刻记取。每个



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特别是正确对待给自己提出过批评的群众，坚决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决不允许打击报复。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要坚持两点论，不搞一点论。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的统一，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种片面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我们党反对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又产生了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样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我们党反对和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到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又回到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那里去了。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所推行的一套，都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根本对立的。在对待党内斗争的问题上，刘少奇、林彪一方面鼓吹“党内和平论”、“中庸之道”，一方面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本对立的。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指出：“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我们要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还要注意到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只讲斗争，否认团结，或者只讲团结，否认斗争，这两种倾向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是把团结和斗争这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割裂开来，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其结果是殊途同归，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不利于革命团结，不利于党的任务的实现。

能不能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坚持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切实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朝气蓬勃地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一点体会

武振轩

虚心调查研究，正确估计客观情况，采取恰当措施，以掌握主动权，这是毛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中反复阐明过的光辉思想。毛主席这一思想，把战争的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努力领会和掌握毛主席这一思想，对于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刻揭露其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如何估计客观情况，处理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党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常斗争的一个问题。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不懂得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战略战术的方针原则，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毛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里，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时，总是要说明这些原则同客观情况的辩证关系，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和危害。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吸取经验，要“虚心



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从战略的方针到战役的部署，乃至每次战斗的进攻或退却的时机、地点，兵力的配备，预备队的使用，突击方向的选择等等处置措施，都要适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不仅要学习毛主席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要学习毛主席在制定原则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分析客观情况，并努力应用于自己的行动中。

虚心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运用这一原理来指导革命和战争，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还制定了各项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略防御中的“诱敌深入”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战略上的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和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的具体方针；解放战争时期，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从正确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和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力人心、地域条件等客观情况中产生的。这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建立在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具体应用和重大发展。

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主席这一段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正确的部署产生的认识过程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不但对于任何一个正确的军事部署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正确的政治、经济部署和其他工作的部署，也是必要的。历次机会主义



者用于战争中的所谓战略战术原则，之所以是错误的，不免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认识情况的过程，陷入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路线的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就是这种唯心论和机械论相结合的产物。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林彪的所谓战略战术，诸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对革命前途右倾悲观，反对建立红色政权，主张实行流寇主义式的“流动游击”，后来又追随王明路线，主张以堡垒对堡垒的所谓“短促突击”，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打硬拼硬的正规战的所谓“教训”和“经验”，以及解放战争初期，提出同毛主席军事路线相对抗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其基本特点也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这些东西不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而是凭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因而完全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些所谓“战术原则”，是凭他“联想力强”和“编串子习惯”，今天“想”一个，明天“想”一个，所“想”出来的。这是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自我暴露。

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主要的是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包括与各方相联系的各种情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虚心地考察和研究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的内部联系，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做出正确的估量，由此而制定出适合这些情况的方针、计划和战略战术，并运用这些于自己的行动，这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和胜利，力避被动和失败。主动和胜利从何而来呢？“**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凡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即使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只要能够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那么，“**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相反，如果对客观情况作了悲观的估计而采取了消极的处置，或者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而采取了冒险的处置，即使处于优势和主动，也不免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遭受挫折乃至失败。中国革命战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历过主动和被动、胜利和挫折的锻炼和考验。艰难曲折的战争道路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了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战争就胜利，革命就发



展；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不符合客观情况的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那么战争就失败，革命就受损失。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经过艰难曲折而终于取得了胜利，正是由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采取了适合客观情况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正确的战略和战术的原则。

为什么有些本来可以打胜的仗，结果打败了，本来可以做好的工作，结果做坏了？究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主观指导不适合客观情况。两军相争，一胜一败。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得当；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所谓指挥得当，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决心以及对各种情况变化的处置，都比较地合乎彼己双方的情况，都比较有利于己而不利於彼。毛主席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这就需要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并根据情况采取恰当的处置。打仗是这样，做工作也是这样。渔人撒网，要看清水的深浅、水流的速度和有无障碍；农民种庄稼，要根据土质、种子的性能、季节的变化等情况采取措施。我们指导革命运动，从事革命工作，也必须了解这个运动、这项工作的实际情况，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来确定工作方针。总之一句话，工作要求比较地会做，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主席指出：在我军战争史上，“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这两种偏向都是没有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前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敌人，而后者，则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革命力量。毛主席历来提倡要当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智勇双全，就是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时度势，处理问题，既不被其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也不为自己一时的顺利而轻敌，能够“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之所以不免碰壁，是因为他们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站在



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尊重客观，不从实际出发，不知道和不愿意对敌情进行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思索，而是把自己的计划和行动建立在主观主义的基础之上。其结果或者一开始就搞右倾投降主义，或者从冒险主义走向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最后归于悲观者一路。这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过证明的。林彪鼓吹“不要怕情况不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打猛冲”，甚至胡说什么“完蛋就完蛋”。这正是冒险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无知妄说，是毛主席所批判过的那种**“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做法的最后结果，必然是陷入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要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使主观符合客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战争情况包括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也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条件，不同的作战对象都有其不同的情形，构成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实际，就要研究这些不同的情况，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战争的特殊情形和特殊的性质。这样，才能够采取和战争情况相适应的政治和军事处置，实施正确的指导。**“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拒绝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不从具体情况中间找出具体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如果用于指导工作，就会使工作做坏，用于指导战争，就会要打败仗。这是为历史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战争形态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军之所以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疯狂“围剿”，而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其原因就在于前四次是在毛主席的领导或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影响下，采取了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战略战术原则，而第五次则是机会主义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采取了不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处置措施。毛主席不仅具体地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既不同于古今中外一般战争，也不同于苏联革命战争和中国北伐战争的四个特点，制定了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的正确战略方针和原则，而且在各个战役指挥上也是针对不同情况，依据不同的敌势、我



势、地势，采取了不同的作战方法。因而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机会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统治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王明路线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林彪追随王明路线的“短促突击”，都是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军队改变其军事原则的情况下，王明路线却不因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相反却回到一般正规战争的“老套”上去，采取所谓“全线出击”、“分兵抵御”、“处处设防”、“短促突击”，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正好符合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需要，帮了敌人的大忙。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只有对矛盾的双方的依赖关系、斗争的情况，以及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发展及其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把握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的办法。在抗日战争中，为什么要执行战略上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战役或战斗上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为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通过对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的强弱，国度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社会政治的进步退步，国际上的多助寡助等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为我们作出了科学的解答。“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看不到中日双方各自都存在诸种长处和短处这种互相矛盾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亡国论”者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或不愿意看见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以及日本的退步和寡助，只提强弱一点，并把它夸大为全体，“速胜论”者则不敢承认敌强我弱的事实，或把我之长处夸大到离开了真实的情况，都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经验，包括解放区的扩大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证明了毛主席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宣告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彻底破产。

能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在我党的历史上，对于客观情况的分析和阶级力量的估量，为什么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结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问题的方法就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结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就不一样。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最有远见的阶级。只有



站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用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使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从而得出正确的估量。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对于敌我形势的分析，对于发展趋势的预见，之所以是正确的，并由此而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因为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机会主义者之所以对革命形势产生消极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估计，并由此而提出右的或“左”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决定的。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林彪总是过高地估计反革命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一贯右倾。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了王明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战争上，同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呼应，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毛主席作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伟大部署的时候，林彪还是看不到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局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显著变化和东北战场的大好形势，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反对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敢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这是林彪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和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曾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样，就能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就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科学分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和特点，不断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因势利导，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就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好革命工作，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 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罗 思 鼎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儒法两家不仅在守旧还是革新的问题上，而且在面对我国北方辽和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发动的掠夺性侵略战争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坚持了爱国主义的路线，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儒家则挂起了卖国主义的降旗。可是，从宋代以来的道学家，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歪曲历史事实，吹捧司马光卖国有功，攻击王安石爱国有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这对于划清历史的和现实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界限，彻底批判林彪的卖国主义路线，是完全必要的。

—

北宋中叶，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次变法证明，王安石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毛主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在北宋的历史条件下，划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界限，就看他面对我国北方的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的侵略威胁，是主张抵抗还是实行投降。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特别是北方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和西北部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对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辽和西夏的人民后来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國疆域的巩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在当时，辽和西夏是带有严重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军事政权，它们不断向中原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北宋的劳动人民，他们既受到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常遭到契丹贵族集团的武装掠夺，在这双重压迫下，过着水



深火热的生活。正如王安石所形容的：“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①因此，北宋广大劳动人民坚决主张抵抗。“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②他们是何等地蔑视辽和西夏的武装侵略，表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立场出发，也坚决主张反抗辽和西夏的侵略。他愤怒地指出，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③！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这是宋真宗时期大地主阶级屈辱投降政策的产物。一〇〇四年寇准领导的宋军，在抗辽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大地主投降派却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规定每年向辽统治集团交纳大量财物，并规定宋王朝称辽太后为叔母。王安石反对这种可耻的投降路线，他坚决主张反侵略，加强国防。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贫”和“弱”只是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宋仁宗时，辽的威胁未除，西夏之侵扰又来。但大地主腐朽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在侵略者面前“若小侯之事大国，无敢不从”^④，而对内却肆无忌惮地实行“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⑤。这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宋王朝面临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⑥的严重局面。

对外政策是和对内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在内政上实行一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能坚持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的。王安石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批判儒家思想，从客观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没落。他是著名的革新家。他的变法对内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对外反对向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集团投降。他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企图在打击大地主兼并势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赋税收入，同时改革宋王朝落后的军事制度，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他指出：“偷安与受给，自古有亡国。”^⑦他坚决主张抛弃大地主投降派的“祖宗之法”，希望通过变法“救国家积弱之势，振累世因循苟且之习”^⑧。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使宋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显著加强。他所采取的反对大地主兼并的理财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增加了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据记载，十多年后，同辽对峙的河北“边防大计，仓廩充实”^⑨，“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⑩。军队战斗力有所加



强。“军器监”制造的大批武器，“可足数十年之用”^①。这些材料即使可能有夸大，也反映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无法完全抹煞变法的积极成果。变法期间，在王安石主持下，宋王朝任用了法家沈括和名将王韶、宗谔负责抗击西夏的武装侵略，率军收复了河湟地区长期失陷的大片领土。

王安石爱国主义的变法路线，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王安石总结了历史上法家路线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和经验，对商鞅、吴起、桑弘羊等作了高度的评价，公开要求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他曾经当着宋神宗的面赞扬吴起变法，要求宋神宗认真学习“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②。北宋变法前夕，冗兵总数已从宋初二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万，维持这支军队的费用，占去了全国赋税收入的六分之五。但在对辽和西夏的军事斗争中却屡战屡败，毫无战斗能力。王安石认为，这种雇佣兵制度是“五代乱亡之遗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③，如果不进行改革，“则中国无富强之理”^④。因此，王安石根据商鞅的“什伍之法”的精神，提出要鼓舞“州民使习兵战”^⑤，以便为逐步用征兵制度代替雇佣兵制度准备条件。王安石实行的这些军事措施，当然也具有加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面，但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造成一支足以抵抗侵略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使遭受侵略的当地人民能够奋起自卫，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侵略者面前是主张抵抗还是宣扬投降，这是北宋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复古倒退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搞妥协投降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反动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大搞尊孔复古，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正义斗争，甚至不惜卖身求荣，充当民族的败类。王安石变法后不久，辽反动统治集团害怕北宋变法成功后“中国安强，有窥幽燕之计”^⑥，企图趁宋“未强之时，先扰中国”^⑦，派兵进行武装威胁。王安石面对这种侵略战争，坚决主张抵抗，认为：“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⑧他看穿了契丹贵族集团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认为如果对他们“示弱太甚”^⑨，一味退让、妥协，只会助长他们的侵略野心。他根据宋朝变法后的人力物力，准备出兵恢复被辽长期侵占的幽燕之地。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之徒在辽举兵入侵的事实面前，则采取了投降卖国的政策。有一次，宋神宗问范纯仁能否带兵出征，范纯仁吓黄了脸，急忙说：“臣儒家，未尝学兵法”^⑩。富弼等人一听说宋神宗要亲征，就“心陨胆落”^⑪。韩琦公开主张“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彼疑”^⑫。他们把坚决主张抗敌的王安石看成是眼中钉、



肉中刺，倾巢而出围攻之。他们否定抗敌的必要性，胡说什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②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回答：“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③，只有国家强盛，坚持反侵略斗争，才能不受欺凌。

大地主顽固派对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的攻击，暴露了他们的卖国主义立场。司马光等人历来畏敌如虎，生怕变法图强触怒了辽和西夏侵略集团，轻描淡写地把侵略者武装掠夺说成是“边鄙小事，何足介意”^④！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把宋王朝每年向侵略者奉献“百万之财”，美化成“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⑤，甚至打肿了脸充胖子，叫嚣：“人主爱民物，心无彼此情。约欢同一国，蒙福徧群生。”^⑥在司马光这批孔孟之徒身上，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呢？他们拿人民的血汗去供养侵略者，换得大地主顽固派的一时苟安，这就叫做“爱民”；而把人民的灾难说成是“蒙福”。他们同侵略者“约欢”，亲热到不分“彼此”，这就叫做“仁”。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编造的这些奇妙的逻辑，不只是活生生地勾画出他们自己的丑恶嘴脸，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就是投降有理、爱国有罪的理论根据。

北宋大地主反动集团推行卖国主义的路线，有其深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王安石变法前夕，一小撮大地主垄断了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⑦。大地主顽固派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他们害怕进行反侵略斗争会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动摇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他们宁愿向侵略者屈膝投降，而不愿进行反侵略斗争。在他们的眼中，“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⑧。他们认为跪在辽和西夏侵略者面前，还可以保住脑袋；如果被人民推翻，那就一切全完蛋了。因此，大地主顽固派的投降卖国是必然的。

毛主席在批判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卖国主义时指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从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投降卖国还是抗战爱国的斗争中，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只有广大的革命阶级、革命的人民，以及剥削阶级中主张进步、革新的集团和派别，才能够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对侵略者坚持抗战，而坚持倒退、守旧的反动派，总是要投降或想投降的。王明、刘少奇、陈伯达、周扬之流宣传过的“国防文学”，其实是卖国文学。林彪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他卖国投敌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

二

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它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安石变法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然而北宋以后的道学家却妄图把王安石变法说成是北宋灭亡的原因。北宋灭亡前夕，道学家杨时首先出来叫嚣：“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②后来，有人还挖空心思地炮制了话本《拗相公》，说什么“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③。但是，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南宋初年，有人就驳斥道学家杨时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④。北宋的灭亡，决不是王安石变法路线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由于司马光的儒家路线推翻和取消了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路线而造成的。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在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支持下重新登台掌权，他们把卖国主义的理论变成了行动，对于变法的一切措施，他们是罢，罢，罢，一罢到底；对于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他们是让，让，让，一让到底。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王朝抵抗西夏的武装侵略，取得了很大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时，司马光却唱着“宁为百姓屈己”^⑤的卖国调子，主张抛弃变法期间收复的土地。在司马光的带头下，顽固派发出了一片“弃地”的嚷嚷声，什么“不可不弃”^⑥啊，什么“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⑦啊。文彦博甚至奴颜婢膝地说，如果及早自弃，西夏就会“感带（戴）恩德，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⑧！这伙顽固派“弃领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黷武”^⑨，把变法期间收复的一大部分土地、特别是陕北的米脂等四个边防军事要塞拱手送给了西夏的反动政权，结果“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防受害”^⑩，种下了北宋王朝迅速灭亡的祸根。顽固派的屈膝投降行径，适应了辽和西夏反动统治的需要，怪不得司马光重新上台时，在辽的反动统治者中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叫喊“中国相司马矣”^⑪！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北宋王朝灭亡前夕，金统治者大兵压境，大地主顽固派却还在热衷于“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⑫，鼓吹尊孔反法，实行反攻倒算。正如当时的民谣所描绘的，“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秋”指金兵在秋天的进犯），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灭宋的金右副元帅斡离不的封号），却管舒王（王安石死后封号）”^⑬。这首民谣，活活刻画出这一小撮顽固派尊儒反法、投降卖国的嘴脸。他



们置亡国之祸于脑后，热衷于尊孔崇儒，镇压抗战派，怎么能不亡国呢？鲁迅说得好：“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卖国主义的“老调子”。谁唱起了这种“老调子”，谁就是在宣扬卖国主义路线。但是，不管南宋反动的道学家们如何颠倒历史，王安石将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载入史册，司马光一伙顽固派则永远作为卖国主义者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叛徒、卖国贼林彪学着道学家的腔调，大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充分暴露了他妄图充当苏修的“儿皇帝”，把中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丑恶嘴脸。

从王安石变法这桩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家路线同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家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进步学派，决定了它是同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挑起民族矛盾的都是各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无论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压迫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或者其他民族反动统治者侵扰汉族劳动人民，都是一律应该反对的。王安石坚持革新、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路线，不仅对宋朝人民有好处，对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压迫下的人民也有好处。因此，这是一条爱国主义的路线。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生，反对任何变革，坚持复古倒退。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本质，但即使是这样，司马光也仍然不能容忍，把它当作洪水猛兽镇压下去。他们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必然结果。尊孔必然卖国，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对内进行反革命统治、对外实行卖国主义的理论根据。正如鲁迅指出的：“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花边文学·算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我们今天讲的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爱国主义，它必然要受到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王



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在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原地区从事农业为主的汉民族同我国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之间，曾出现过一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发生过民族冲突和战争。对这种民族战争应该作具体分析，看到有正义与非正义、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区别。当这种民族之间的压迫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时，反对民族压迫，“**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便是爱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历史上这种在反对民族压迫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儒法两家在对待民族压迫与掠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所决定的。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后，同我国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就突出起来。秦始皇曾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击败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设置九原郡，移民垦边。相反，那些反动儒生则叫嚷“亡秦者，胡也”^{④②}，幻想依靠匈奴侵略者推翻秦王朝，实现奴隶制复辟的迷梦。当时，有一批奴隶主贵族为了逃避地主阶级专政，亡命投奔匈奴。直到汉武帝时，他们的子孙还自称“秦人”，帮助匈奴侵略者同汉王朝作对^{④③}。

汉代初期，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几十个小邦。据记载，“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④④}。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朝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反对侵略还是屈膝投降，成为汉初儒法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汉朝内部那些大搞分裂割据、破坏国家统一的同姓王和异姓王，都“事穷智困，卒赴匈奴”^{④⑤}。例如，韩王信在阴谋叛乱前，就“与匈奴约共攻汉”^{④⑥}。燕王卢绾在发动叛乱失败后，“将其众亡入匈奴”^{④⑦}。吴楚七国之乱同匈奴侵略势力也同样有密切的联系。吴王濞写给各诸侯王的信中公开宣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④⑧}，暴露了他们阴谋勾引匈奴侵略者推翻封建中央集权的汉王朝的罪恶计划。匈奴奴隶主贵族也跃跃欲试，准备“与赵合谋入边”^{④⑨}。由于这次叛乱被迅速地镇压下去，这一阴谋才没有实现。相反，法家都是主张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入侵的爱国主义者。晁错根据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抗击匈奴的具



体措施。桑弘羊根据同匈奴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经验指出，“事不豫辨(办)，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⑤，事先不做好反侵略的战备，就对付不了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打败匈奴，就是因为按照“商君之遗谋，备饰素循”^⑥的缘故。而反动儒生却公开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⑦，妄图对匈奴奴隶主贵族开门揖盗，自毁长城。大量事实说明，一切搞分裂割据的反动派，总要勾结外来的侵略势力，而一旦他们的阴谋破产，就必然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汉代以后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儒家的卖国主义本质。五代十国时，后晋的石敬瑭为了换得“儿皇帝”的地位，甘心情愿“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⑧，把幽云十六州出卖给了契丹侵略者。这个四十五岁的卖国贼，竟然无耻地称三十四岁的“契丹主为‘父皇帝’”^⑨。在宋代，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顽固派，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卖国主义者的衣钵，而且发展了儒家的卖国主义理论。南宋的道学家们继承了北宋道学家的卖国主义衣钵，汉奸、卖国贼秦桧就以儒家正统自居，攻击主张反侵略的人是“未纯乎儒术”^⑩，无耻地叫喊“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⑪。道学家朱熹比较狡猾，他偶尔也空喊几声“抗金”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大肆攻击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攻击一切真正的抗战派，暴露了他假抵抗真投降的卖国贼面貌。正如陈亮在当时揭露的，朱熹之流道学家“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⑫。近代以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之流，也都披着儒家的袈裟，演出了一幕幕卖国主义的丑剧。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投奔苏修，也决不是偶然的。他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必然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汉族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论是那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不论是汉、满、蒙、回、藏、壮、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世代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伟大祖国。而古今中外的反动派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一切进步的改革，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的统



一和独立，歪曲和污蔑中国历史上进步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因此，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

注

- | | |
|--|---|
| <p>① 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一：《河北民》</p> <p>② 《欧阳永叔集》卷五：诗《边户》</p> <p>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p> <p>④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八</p> <p>⑤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p> <p>⑥ 《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p> <p>⑦ 《临川先生文集》卷一〇：诗《同昌叔赋雁奴》</p> <p>⑧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p> <p>⑨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七</p> <p>⑩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p> <p>⑪ 吕陶：《净德集》卷四：《奏乞罢军器冗作状》</p> <p>⑫ 转引自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三：《论道门》</p> <p>⑬⑭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p> <p>⑯⑰⑱ 《宋史·兵志·保甲》</p> <p>⑲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p> <p>⑳⑲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p> <p>㉑ 《续资治通鉴》卷七〇</p> <p>㉒⑳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三：《北边劄子》</p> <p>㉓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代叔礼作使北诗》</p> <p>㉔ 《欧阳永叔集》奏议集卷四：《再论置兵御</p> | <p>贼劄子》</p> <p>㉕ 《宋史·宋绶传》</p> <p>㉖ 《宋史·杨时传》</p> <p>㉗ 《宋元话本集·拗相公》</p> <p>㉘ 转引自《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四</p> <p>㉙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劄子》</p> <p>㉚ 《宋史·范纯粹传》</p> <p>㉛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p> <p>㉜ 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二六：《论西边事》</p> <p>㉝⑳ 转引自《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一</p> <p>㉞ 《续资治通鉴》卷八〇</p> <p>㉟ 《宋史·钦宗纪》</p> <p>㊱ 李璩：《阅史邻视》卷三</p> <p>㊲ 《史记·秦始皇本纪》</p> <p>㊳ 《汉书·匈奴传》</p> <p>㊴⑳ 《史记·匈奴列传》</p> <p>㊵⑳⑳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p> <p>㊶ 《汉书·荆燕吴传》</p> <p>㊷⑳ 《盐铁论·世务》</p> <p>㊸ 《盐铁论·非鞅》</p> <p>㊹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p> <p>㊺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p> <p>㊻ 叶昌炽：《语石》卷八</p> <p>㊼ 《宋史·秦桧传》</p> <p>㊽ 《宋史·陈亮传》</p> |
|--|---|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燕 枫

怎样从本质上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 建立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 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概括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理, 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一九五七年, 毛主席在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时, 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 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 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 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 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 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 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 如果我们不重视它, 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几十年来, 我国人民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遵照这一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 在整体上,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在每一个局部上, 又善于斗争, 讲究斗争艺术。因而能够打败国内外强大的敌人, 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并且紧接着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 改造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使一个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变成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 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思想, 也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 他们被阶级敌人的暂时的表面的强大



吓破了胆。在战略上，他们总是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甚至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双手交给敌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在战术上，他们又往往不重视敌人，采取轻率莽撞的态度，致使革命遭受损失。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这样，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也是这样。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就曾经一再暴露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林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唯心的反动世界观出发，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提出了所谓“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主席针对林彪的错误，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严厉地批判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信中，毛主席全面地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的发展，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指出国内形势处于**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并且形象地描写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主席对于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外喧嚣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毛主席指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在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并且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路线。林彪却和王明相呼应，顽固地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抗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作战方针，不相信全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公然鼓吹阶级投降主义，无耻地吹捧蒋介石。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抗



日战争刚刚胜利，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一种，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种，是由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扑灭中国革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两种命运决战的关头，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藐视有美帝国主义撑腰的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来对付蒋介石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因此，“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并且告诫全党：“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而林彪却紧紧追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叫嚷什么“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当毛主席毅然决定首先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发起辽沈战役的时候，林彪又跳出来竭力反对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毛主席及时地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武装起来，很快地夺取了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战略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无产阶级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是从对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辩证法，无产阶级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的正确反映。



毛主席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表面上弱小但是正在生长中的事物，一定要战胜表面上强大但是已经腐朽的事物。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向前发展的。一切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革命力量，总是要战胜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反动力量。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可见，新兴的地主阶级代替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产阶级肩负着最后埋葬剥削制度的历史使命，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斗争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它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切剥削阶级，所以必然要化为反动派，化为纸老虎，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推翻，是因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他们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处于对立的地位。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本质，不要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现象上看，反动派有时显得颇为“强大”，样子有点可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革命人民。经过顽强持久的斗争，人民一定会战胜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充分相信人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长了人民志气，灭了敌人威风，使革命人民树立起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它，决不意味着在战术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在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可以不重视它。这是因为，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对立的统一。不从战术上重视敌人，不善于斗争，即使具有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还是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



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说反动派是真老虎，是因为它们暂时还有力量，手里拿着刀，武装到牙齿，为了维护反动阶级利益而进行垂死挣扎，成百万成千万地吃人。为此，革命人民在同它们作殊死斗争时，必须做到在战术上、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把夺取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如果不是这样，在战术上采取冒险主义、轻举妄动的态度，必然会犯错误，危害革命。同样，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认真对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策略、措施去解决，也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预期成功。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在军事上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同战术上重视敌人高度统一起来的典范。一方面，毛主席深入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全党全军明确宣布，蒋介石必须而且一定能够被我们打败。在十大军事原则中，贯串着无产阶级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指出，蒋介石还暂时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为了彻底消灭它，必须采取慎重态度，执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十大军事原则中，也贯串着这种**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的思想。

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出发，总要顽固地对抗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资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在战略问题上他们总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林彪就是这样。而这正是导致他一贯右倾动摇，畏敌如虎，最后堕落为叛徒、卖国贼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彻底胜利，也必须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



不了的。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活动不要怕，对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不要怕，对党内出修正主义不要怕。它们都是腐朽的势力。它们的破坏和捣乱，是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不表明它们力量的强大，而是说明它们的虚弱，其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当然，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可能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我们要有正确的估计，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讲究斗争策略，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其间难免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我们在战略上必须藐视困难，不要在困难面前一叶障目，畏葸不前；在战术上又必须重视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困难。这就是说，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当前，世界形势一派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提高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多次阐明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指出：“**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同时，毛主席又指出，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还要采取正确路线，讲究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反帝力量。只要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坚持斗争，世界革命人民就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光辉思想，把它作为我们批判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作为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根本战略战术思想，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三字经》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剖析《三字经》的两个增补版本

合肥市杏花村公社 方玉荣 李 敬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儒生王应麟编纂的。当时，南宋王朝不断受到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处在朝不虑夕、风雨飘摇的境地。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一面动之以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人民；一面“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妄图用虚伪的儒家说教来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三字经》的出笼，正是适应了南宋统治者这种反动的政治需要。

由于《三字经》通篇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南宋之后，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把它定为“首诵”的“启蒙”读物，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增补和修订，使它更加直接地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历代反动派增补和修订《三字经》所留下的种种痕迹，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也清楚地说明了《三字经》这本小册子的反动作用。

根据我们看到的史料，南宋之后孔孟之徒对《三字经》的增补、修订，主要是在叙述历代的历史部分。清代道光年间，在儒生贺兴思注解的《三字经注解备要》中，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记述，共二十四句。增补者把明王朝的灭亡说成是“神器焚”，为它大唱挽歌；相反，却诬蔑明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是“寇如林”，发泄了对农民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在注解中，更明目张胆地攻击李自成是“李贼”，并且捏造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之前，给李自成



留下一首“血诗”，要他“不可损黎民”，给地主阶级头子披上一件“爱民”的外衣，无耻地美化腐朽透顶的封建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进入清代，已经到了末世。特别是在所谓“康乾盛世”以后，更是危机四伏。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的斗争浪潮此伏彼起，几乎不曾间断过。新兴的市民阶层与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发展。《三字经》增补者所处的嘉庆、道光时期，封建统治更是濒于崩溃，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为了支撑自己的反动统治，清王朝只有用虚妄的“天命论”来说明自己反动统治的“合理性”，大肆散布诸如清统治者的祖先“为天女所生”，“以定国乱”之类的谎话。清世宗胤禛就曾一再宣称，清王朝的统治是“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清版《三字经》的增补者，就是按照反动统治者的这种旨意，在《三字经》里增加了“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四句话，极力伪造历史，借以粉饰太平，吹嘘清王朝的所谓“文治”“武功”，妄图要人民群众相信清统治者是“受命于天”的，并且屈从于他们的反动统治。这就是清王朝修订、增补《三字经》的罪恶用心。

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宏大善书局刊行的《三字经》版本，又修订、增补了清代和所谓“民国”时期的一段历史，计三十二句。其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动性，较清本更为露骨。这个版本一方面把清代雍正、乾隆、嘉庆等封建统治都吹嘘为“民安富，治绩夸”；另一方面却诬蔑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什么“继粤匪，创天理，民遭殃，如汤沸”。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血腥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增补者则别有用心地说成是“开海禁，交互市”；最后，还心怀叵测地加上了“愿同胞，勿操戈”两句。这一番增补，也是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的。

我们知道，一九二五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为标志，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反动统治。地主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之流，混在革命阵营内部，大耍反革命两



面派手法，表面上伪装革命，暗中却和帝国主义勾结，伺机向革命人民发动进攻。《三字经》增补版本中那些咒骂太平天国革命的切齿之声，正是寓藏着蒋介石之流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极端仇视和万分恐惧。其中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肆意美化，也是为蒋介石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制造舆论的。当时，蒋介石之流为了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还到处散布“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等谬论。所谓“愿同胞，勿操戈”，实际上就是给蒋介石在暗地磨刀霍霍、伺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施放烟幕，妄图把革命人民屠杀于无准备之中。在这个增补版本出笼的前一年，出过一本解释《三字经》的《蒙养释义》，它把《三字经》称作“辅国家政教所不及”的“善书”，并且说什么：“世风浇薄，非善书不能挽回”。这就明确地道出了国民党右派修补《三字经》的政治目的。直到今天，苟延残喘的蒋介石集团还把《三字经》作为加强反动思想统治的工具，大加宣扬、吹捧，恶毒咒骂对《三字经》的革命批判，竭力维护孔孟之道，妄图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可见，一本小小的一千来字的《三字经》，何等敏锐地反映着阶级斗争的风雨，表达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事实充分说明，《三字经》完全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而编纂，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的。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于《三字经》的反动作用，也是竭力加以利用的。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为配合其反革命复辟活动，曾经把《三字经》改头换面，重新出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直接地按照《三字经》中“我教子，唯一经”的反动说教，公然鼓吹“教子读经”，要他的儿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去承受孔孟的复辟之经、倒退之道，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然而，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他们在《三字经》上所花费的苦心，只能为自己制造一纸妄想，为革命人民留下一部反面教材。



批“半部《论语》治天下”

卞石中

南宋以来，中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反动而又荒谬的论调。历代反动派把它当作治国的法宝，大肆吹捧。钻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把它当作经典，津津乐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的同伙就把“半部《论语》”作为他们“夜话”的一个话题，用来破坏学习马列主义的群众运动。在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影响下，有人还曾把“半部《论语》治天下”抄在袖珍笔记本上，当作座右铭。

历史上果真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吗？

据查，这句话源出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一条记载：宋朝初年的赵普，当过两朝宰相，却读书不多。当时有人讽刺他“所读者止《论语》”。这话传到了当朝皇帝宋太宗的耳中，宋太宗问赵普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普回答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其实，罗大经也知道赵普的话不符合事实，不得不承认：“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为了吹捧《论语》，却把赵普的话说成是“天下之至言”。《鹤林玉露》的记事，是“偶据传闻，不复考核”的，本不足信。可是后世儒生却因缘附会，口笔相传，搞成了一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把孔孟之道吹上了天。

事实上，赵普辅佐赵匡胤兄弟平治天下，靠的并不是什么《论语》。唐代以后，中国在几十年间处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状态。军阀混战，部族相侵，人民惨遭杀戮，生产力受到破坏。渴望统一，渴望平定，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反映了



历史发展的趋势。赵匡胤在这种局面下，取后周而代之，又在赵普协助下，进行了十几年的统一战争。为了巩固统治，赵普吸取过去“节镇太重，主弱臣强”的历史教训，为赵匡胤提出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免除了藩镇割据的威胁。所有这些，与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路线和忠孝仁义的说教都是对立的。可见，关于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南宋儒生们借以骗人的谎言。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谬论，所以起于南宋而又附会在赵普身上，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宋朝以后，已走向没落。即使比较有作为的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也不敢公开打出反儒的旗帜，而是一面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一面又挂起儒学的招牌来作掩饰。赵匡胤即位后的头一个月，就“命葺修先圣庙，并励武人读书”，赵普就在劝读之列。此后，他又提出“作相须读书人”，并“大重儒者”。可见，儒学到了宋朝，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不敢须臾离开的欺骗工具了。

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烧。官僚大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特权，迫切需要强化反动的思想统治，以便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欺骗、镇压。于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孔孟之道，得到了宋儒的进一步加工、修补，形成了极端反动的思想体系，即程、朱的“理学”或“道学”。这个时候，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特别时髦，《论语》也从“小儿学问”一下子跃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腐儒们为要抬高《论语》的身价，就把开国元臣、当过两朝宰相、又用苦读《论语》装点过门面的赵普，当作鼓吹“半部《论语》”也可以“治天下”的典型。与罗大经同时代的王应麟，还把“赵中令，读鲁论”编在《三字经》里，欺骗老百姓。后来，元人修《宋史》时，又添油加醋，说赵普晚年苦读《论语》，“手不释卷”，“读之竟日”，以至于“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把孔孟之道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论语》假如真有这么大的妙用，宋朝的统治岂不是可以巩固下去，长治久安了吗？而事实却如鲁迅所说：“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



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宋朝灭亡的事实，对“半部《论语》治天下”实在是一个无情的讽刺。

尽管如此，历代反动派仍然热衷于鼓吹“《论语》治天下”。因为《论语》记录着孔老二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言行，是极端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关头，奴隶主阶级用它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地主阶级顽固派又用它来反对革新、镇压农民。

没落奴隶主贵族鼓吹用“儒学”治天下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孔老二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所谓的“礼”、“仁”、“德”统统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武器。在“礼”、“仁”、“德”的掩盖下，奴隶主贵族任意残杀奴隶；又以不“仁”、无“德”为罪名对法家进行疯狂的攻击和残酷的迫害。历史上多少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惨死于儒者之手，多少次人民革命遭到儒家的镇压。这就是儒家以“礼”、“仁”、“德”治天下的真实含义。

地主阶级顽固派鼓吹用《论语》治天下，则是为了反对革命、镇压人民，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明朝的王阳明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当他举起屠刀向人民砍去时，嘴里还喊着：“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当人民向刽子手们讨还血债时，他又恐吓说：杀了人，“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清朝的杀人魔王曾国藩拚命叫嚣：“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他疯狂屠杀太平天国革命军，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天命”所支配的封建秩序。曾国藩洋洋得意地说：“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从曾国藩搞“克己复礼”，“用兵执政”的事实中，可以充分看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反动性。鲁迅说：孔夫子的治国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真是一语道破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阶级实质。

没落奴隶主贵族以“儒学”治天下的结果，是奴隶制的灭亡和封建制的胜



利。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以《论语》治天下的结果，则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封建王朝的灭亡。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代表袁世凯，一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就通令“尊崇孔圣”，发布《祭孔令》，穿起“古怪的祭服”，俨然摆出以《论语》治天下的架势。一番吹吹打打之后，“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但是，《论语》并不能帮他的忙，洪宪皇帝的复辟丑剧只演了短短八十三天，就宣告收场了。

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也妄图用《论语》来阻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蒋介石高喊：“四书五经”，“是为政的基本要道”，“是永久不变的原则”。他靠着这些“要道”和“原则”，在“剿匪就是行仁”的反动口号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可是“围剿”的结果如何呢？其积极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蒋介石的“行仁”，就是以对人民的疯狂屠杀，换取帝国主义的信任。然而，“半部《论语》”或“四书五经”都不能保住蒋家王朝的天下，中国的大地上终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事实表明，历代反动派愈是临近灭亡，就愈是狂热地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因为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挣扎，还要作复辟的迷梦。但是，他们终究逃脱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命运。

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们不断进行批判《论语》、反对孔学的斗争。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把儒家的谬论统统斥之为乱世的“妖言”，把儒生斥之为有害于社会的“蠹虫”。他们认为，“治天下之柄”在于“立法术，设度数”。要想治出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必须靠“法治”。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不批判儒家路线，法家路线就贯彻不下去。这是法家同儒家斗争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秦始皇能够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天



下，就因为他击败了吕不韦的复辟倒退路线，粉碎了吕、嫪集团的政变阴谋，果断地实行了“焚书坑儒”，保证了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

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由效法秦始皇到攻击秦始皇，表明地主阶级已由革命转向反动。这时候，坚持法家路线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地主阶级的没落，决定了他们变法的必然失败，法家的阶级局限，注定他们开不出解决封建社会根本矛盾的药方。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反动，儒家路线的思想统治日益加强，主张革新、进步的法家，在反对儒家的斗争中，实践革新主张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劳动人民向来是反孔斗争的基本力量。与孔老二同时代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断然宣布：“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是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否定。最早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孔丘的“天命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太平天国的革命农民把封建皇帝斥之为“阎罗妖”，把儒家的“经书”宣布为“妖书”，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认识到批判孔孟之道与推翻反动统治的必然联系，提出把孔孟之道的“妖书邪说”“尽行焚除”。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规模空前的批孔斗争浪潮，使曾国藩之流惊呼：“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并说这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连孔丘、孟轲也得“痛哭于九原”。总之，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否定。革命农民把反孔批儒作为革命的舆论准备和革命的重要内容，并以他们革命造反的实际行动，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动派仍然妄图用孔孟之道来进行复辟活动。林彪一伙多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拚命摘抄“四书集句”，恪守着《论语》中“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反革命策略，恶狠狠地写出他的“忍忿法——立大谋。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九等九忍一狠。”这一切都说明，阶级敌人多么渴望以孔学《论语》来变天！我们同林彪一伙的斗争，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治天



下，还是用孔孟之道治天下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取得的伟大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而林彪一伙，吹捧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妄图用孔孟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用孔老二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来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林彪象历史上一切蠢人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半部《论语》”不仅没有给他治出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天下，连他自己也变成了齑粉。

纵观革命人民批判《论语》，批判儒家路线的整个历史过程，就可以认清“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尽管古今的反动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死抱住孔孟之道的亡灵不放，不断变换方式，演出反对人民革命的新场面；而革命者也不断总结经验，掌握和运用革命的思想武器，揭露他们的阴谋，打退他们的进攻。但是在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批孔斗争不可能彻底。资产阶级也只上阵打了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太平天国的革命家们虽曾豪迈地提出：“且观今世之江山，竟是谁家之天下！……倘得真心实力，众志成城，何难亲见太平景象，而成为千古英雄，复见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夫！”但终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以失败告终。今天，我们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成了我们的一项极其严肃、极其艰巨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要团结起来，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深批透孔孟之道，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鬼话，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

“风庆”轮党支部

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风庆”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祖国人民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下，完成了历时一百五十天，往返三万二千哩，运载货物二万二千吨的远航任务，胜利地返回了上海港。



“风庆”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它出厂后首次航行就跑地中海，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穿越七个海峡，先后两次绕过好望角，四次通过赤道，全程等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象这样国产的万吨轮远航欧洲，在我国航运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风庆”轮全体同志，肩负党和阶级的嘱托，行驶这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远航，而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是对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能力的一次检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但又充满信心。我们出航的船员虽然只有六十一个人，而“护航”的却是包括广大造船工人在内的亿万祖国人民。万吨轮载着万颗心，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路上，任凭风浪高，暗礁险，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风庆”号始终英姿飒爽，昂首向前。三万二千哩航行，是不平凡的三万二千哩，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是大长无产阶级志气的三万二千哩。它鼓舞着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给了那一小撮反华小丑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风庆”轮的胜利远航，为我国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们国家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起，就有了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制造这种远洋货轮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单单上海就造了二十余艘。为什么国产船直到今天才远航地中海？是因为以前的船质量都不好吗？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造船工人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船越造越多，而且越造越好。许多船是完全具备远航条件的。那末，是不是我们的海员不想驾驶自己的国产船去远航呢？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许多老海员尝过帝国主义压迫欺侮的味道，受过外国轮船资本家的气，日夜都盼望迅速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那有一个爱国的船员不愿意驾驶国产的船跨洋过海！国产的万吨轮所以没有及早远航，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阻力。有那么一



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他们迷信外国的船，而对于国产的船总是百般挑剔，说这也不行，那也不灵。他们散布种种怪论调，说“国产船只能跑近海，不好跑远洋”，说“国产的万匹机不可靠”。有些人甚至作出荒谬的结论：外国机的质量有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的质量出毛病是必然的。因此，明明可以航行到世界各个港口的国产万吨轮，却一艘艘被卡住不能去远航。今年年初，人们对于这种状况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论。这艘万吨轮经过三百个小时的试航，证明主机、船体、导航仪器、水密装置以及舵机的性能都可靠。可是，有些人却偏偏扭住某些问题进行多方刁难，致使交船的日期一再拖延。江南造船厂的工人首先对这个问题贴出大字报，尖锐地指出：不是船有问题，而是某些人的脑子有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炮轰得好，轰得大快人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广大海员工人和造船工人并肩作战，批判了林彪投降卖国、复辟倒退的罪行和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船的船员同“国产船不能远航”的怪论进行了斗争，贴出了一张题为《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的大字报。许多船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第一条航线也是人开辟出来的，国产船远航我们一定要实现。有些人议论讥笑我们，说我们要驾驶“风庆”号去远航是想出风头，“风庆”号要改名为“风头”号。船员们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们不出个人的风头，我们是为自己的阶级争气！万吨轮、万匹机的制造成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争国产船的远航权，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怕前面有千层恶浪，我们驾驶“风庆”轮远航的决心是下定了的。

“风庆”轮的远航，正象广大造船工人和船员说的，是批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没有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一次远航。这件事，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重要性。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形形色色的崇洋迷外思想就会抬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得不到很好贯彻；抓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歪风压下去，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革命精神大振，好多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办到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加快前进了。“风庆”轮远航的胜利，正是批林批孔这一场上层建筑领域



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有些人总是瞧不起国产的东西。这次“风庆”轮远航，有人就曾经散布说，“风庆”轮可以远航，不过要把船上的雷达、电罗经等五件国产的仪器设备换成进口的。革命的海员工人和上海产业工人一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说换吗？可以！船上还有测向仪、超高频无线电话和尼龙缆绳这三件是进口货，要换上国产的。我们要全部用上自己国产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我们主张排外吗？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是一概拒绝外国的东西。船上用一点外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外国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要加以研究，作为借鉴。问题是立足点放在什么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换”，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掉，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上，这不单纯是技术业务问题，而是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感情、世界观，是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一艘万吨级的货轮，好比一个流动工业展览会，反映着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世界上能造万吨轮的国家，一艘船里全部用国产装备的**也不多**。有的只造一只船壳，舵机、主机、辅机、导航设备等，往往是用几个国家的产品装配起来的。我们的“风庆”轮，从机器设备到船员的生活设施，全部是国产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次“风庆”轮航行三万二千哩，停靠八个国家的港口，每到一处，人们问起我们船的一切，我们总是扬眉吐气地回答：都是中国造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东西！当我们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的胜利而喜悦，为祖国的日益富强而自豪！

有的人也许会说，他不是不喜欢国产的东西，而是担心它的质量不可靠。一艘远洋轮，跨重洋，过大海，要经过无数惊涛骇浪，航行设备的质量当然不能忽



视。但是，对质量问题，不同的立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产品不使用，就实现不了使用价值，质量是高是低也无从考核。在使用中提高，在使用中完善，生产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如此。不是十全十美就拒绝使用，那就会把一种产品扼杀。产品质量的完善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翻开世界造船和船用柴油机的历史，从制造二十五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到比较稳定可靠的万匹机，资本主义国家就花了整整七十年。难道现在他们的产品就那么十全十美了吗？我们船的一位船长就有过亲身的经历。一九七二年，他先后驾驶过两艘从国外买来的远洋轮，都出过重大事故，分别在海上漂了八个小时之多，而损坏的主机正是所谓信得过的“名牌货”。我们的远洋轮的质量怎样？事实是最好的见证。这一次的三万二千浬航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珊瑚礁密集的地区，波涛汹涌的海峡，狭窄的港湾，都经历过了。好望角，人们称之为“天无三日晴，海无三日宁，好望不好过”的地方，我们的船两次安全通过。一次风达八级，浪高四米，有条外国船高挂黑球两只，表示已经失去控制能力，而我们“风庆”轮却笑迎狂风黑浪，胜似闲庭信步。整个航程，主机运转了二千三百小时，在南非两岸先后两次连续运转十六天以上，性能很好。一路上，经受了春夏秋冬四季，大风、巨浪、迷雾、暴雨、低气压等各种气候条件的考验。有人不是信不过我们国产的雷达、电罗经、发报机等五大件吗？事实上，正是这些国产的设备，保证了我们的万吨轮安全航行。我们年轻的造船工业和船用设备配套工业，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轮已经具备远航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提高远洋轮的质量，不光是造船工人的事，我们海员工人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经过一次远航，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建设海上铁路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断地远航，就可以不断地积累资料，我们的远洋轮也就可以不断地完善。造船工人和海员共同努力，我们的造船工业和航海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发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群众振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象大洋的水，载得起千条万条船，力量大无边。“风庆”轮这次远航，是在批林批孔的革命高潮中开始的。通过批林批孔，提高了海员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激发了大家的革



命责任感。出航前，大家一边搞革命大批判，一边紧张地开展学习掌握新船性能的活动，做到技术上精益求精。船员说：造船工人为祖国造出这样好的争气机、争气船，我们一定要做争气人，开好争气船。全程三万二千哩，无论到那个港口，我们的船外面漂漂亮亮，里面清清爽爽，外国朋友称赞我们，海外侨胞夸奖我们，都说我们的船不仅质量好，而且保养得也好。有的外国人到机舱参观，看到那么整洁，惊讶地说：“啊，这里简直可以供我们跳舞。”若问我们船员的责任感究竟怎样，只要举一举货物保养这件事就够了。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运往罗马尼亚的是一万一千吨大米。大米，是货物中比较“娇”的东西。放在货舱里两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两次经过赤道，大舱气温高达四十度。海上遇大风，巨浪淹没甲板，冲刷着整个舱盖。为了使大米不受损失，大副带领护粮小组的船员，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闷热的夏日，始终每天三五次地检查货舱，使舱温、米温和空气的湿度保持适当。从上海到康斯坦萨港的近两个月时间，米温始终没有超过三十度。到了罗马尼亚，一万一千吨大米，无霉无蛀，完好无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好评。从上海到罗马尼亚，又从罗马尼亚回上海，历时一百五十天，举船上下，团结战斗。全体船员一路上写诗写文，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风庆”轮远航三万二千哩，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有的同志说，这次是光荣地开出去，胜利地开回来。我们说，正是这样。不过，还得加上几个字：是斗争中光荣地开出去，斗争中胜利地开回来，斗争并没有结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既然是长期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反对崇洋迷外，也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崇洋迷外的思想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留下来的破烂货，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思想总会一再冒出来。彻底地扫除这些垃圾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指望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就完全解决问题。

不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风庆”轮远航的前前后后，种种扣人心弦的事迹，使我们



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这艘船和船上的设备是经过上海和全国五百多个协作单位造出来的。这些单位的工人用的是怎样的精神呢？造船体和主机的是江南造船厂。他们造的第一台主机，是在船体车间旁边的一个空地上，搭起芦席棚安装的。为了保证主机的质量，下雨时，工人用自己的衣服盖在机器上，免受损坏；天热时，工人整天在机器旁观察阳光直射带来的影响。他们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汗水浇出高质量的争气机。船上的尼龙缆绳是一家二百五十人的弄堂小厂——红卫绳带厂造的。厂房低矮，场地狭小，工人们挖地六尺，装起自己设计的机器，造出高质量的争气绳。在我们准备远航的期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协作厂的工人上船来，帮助我们熟悉各种新设备的性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备品备件，千叮咛万嘱咐，祝我们远航胜利。所有这一切，说明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着坚定的信念，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海外，我们遇到过不少侨胞，他们以热切的目光望着我们的“风庆”轮，有的把上一次甲板比作踏上一次自己的国土而感到高兴。毛里求斯有一位老华侨，有子女九人，“风庆”轮一靠岸，就扶老携幼上船来参观。老人从船头到船尾，从驾驶台到机舱，细细看，轻轻摸，看到样样是国产品，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华侨的报纸以最醒目的标题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这艘国产的万吨轮。我们离港时，侨胞们赶来不断地招手，含着热泪高声地喊着：“祖国的船，不断地来啊！”这种动人的场面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不仅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都热烈地希望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取得更大成就，以更好地完成我们担负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

“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结束了。但是，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长风，破万里浪，不断奔向胜利的前方！



关键在于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调查报告

四川汽车制造厂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设起来的新厂。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这个厂曾经处于后进状态。今年以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厂的党委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增强了革命团结，很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全厂职工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提前三个月超额完成了今年国家规定的汽车生产计划。

为什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工厂的面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厂的党委深深体会到，关键在于要抓好批林批孔，不断端正领导思想和政治路线。

厂党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提高的。原来，厂党委对本厂存在的问题缺乏正确的分析。职工不团结，生产上不去，原因在那里？党委内部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怨上级不支持，有的怨工人不听话，就是没有到工人群众中去认真听取批评意见，并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分析问题。由于没有抓住路线这个纲，企业的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深深触动了厂党委“一班人”的思想。在上级领导的帮助和全厂职工的促进下，党委首先在领导成员中间反复组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论述，紧密联系本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和在自己思想上的反映，开展对林彪、孔老二的革命大批判。通过初步学习和批判，他们进一步看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要改变企业的落后面貌，根本问题在路线，而执行什么路线的关键又在领导。在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党委成员的路线觉悟如何，执行什么路线，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面貌。在此基础上，他们又遵循毛主席关于“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教导，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找出党委领导成员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清本厂争论较大的一些



问题的路线是非，促进大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真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原来在党委领导成员中，有的同志过去在执行路线、政策上犯过错误，但是有错不认错，硬是顶着；有的同志纠缠历史旧帐，计较个人恩怨，不能团结反对过自己的干部和群众；有的同志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群众的批判，在思想深处不认帐，不服气；有的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等等，这些错误倾向不仅影响领导班子的团结，而且直接影响到群众之间的团结。批林批孔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自觉性。本着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勇敢地揭露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倾向，自觉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清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大局和无产阶级革命大团结的原则，斗不利于职工队伍团结的思想言行；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清除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党委主要成员主动到群众中作自我批评，取得了广大职工的谅解和欢迎。工人同志们说：“对于认真改正错误，积极领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干部，我们就是要支持。”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但端正了党委领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增强了党委“一班人”的团结，而且为广大职工的团结树立了榜样。

厂党委通过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进一步认识到，要把全厂职工团结起来，根本问题在于抓好批林批孔。他们向全厂职工认真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积极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批，带头联，带头作自我批评，同群众一起战斗，推动批林批孔运动从一个车间迅速发展在全厂，又由车间深入到班组。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因势利导，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了四次批林批孔的战役，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批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狠批孔孟之道。革命大批判，激发了广大职工对党、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比仇恨。大家认识到，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破坏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总祸根，我们工人有千条万条理由搞团结，没有任何一点理由搞分裂。如果我们搞资产阶级派性，闹不团结，那就正中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革命大批判，使广大职工在工厂争论的主要问题，分清了敌我，分清了路线是非，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团结。

要搞好全厂职工的革命团结，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组织起一支坚强的骨



干队伍。今年以来，厂党委以批林批孔、分清路线是非、增强革命团结为中心，先后举办了四期学习班，把党委、革委会的成员，中层干部，班组长，群众代表基本轮训了一遍。随着革命、生产的发展，他们又不断以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积极分子来充实这支骨干队伍。象滚雪球那样，骨干队伍越来越大，由开初的一百多人，逐步发展到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批骨干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他们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带头批林批孔，带头斗私批修，带头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带头做好团结工作，带头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搞好革命团结，发展工厂大好形势的重要力量。

要搞好革命团结，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动员大家都来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同时要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厂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依靠骨干，先后在全厂掀起了四次批分裂，促团结，开展群众性谈心活动的热潮。党委主要成员带头走家串户，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作自我批评，纠正偏差，承担责任。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启发和教育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对待同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正确对待自己，把仇恨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广大职工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精神，互相走访，有些车间的同志几乎走访了所有家庭。铸钢车间有两个同志，过去是“一对崩”。通过批林批孔，两个人手拉着手，交心谈心，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说：“过去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你当敌人看待，伤害了同志。”一个说：“过去我把被错整的帐记在你身上。现在清楚了，分裂我们的是林彪。我们都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林彪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现在，他们俩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成了“一对亲”。经过这样几次群众性的谈心活动，影响群众之间团结的各种“疙瘩”解开了。全厂出现了群众性的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共同批林批孔的新局面。

搞好革命团结的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正当这个厂的干部、群众，通过抓批林批孔，抓路线，使革命团结不断增强的时候，有人吹起了一股“冷风”，说什么这个厂的党委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火药味不浓”，“划框框，定调调”；说什么促进革命团结是搞“中庸之道”。是听任这些错误思想泛滥，还是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原则，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呢？这对厂党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时，厂党委重温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教导和指示，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来分析观察问题。他们连续几次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和骨干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大家在讨论中，联系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批判了所谓“火药味不浓”，“划框框，定调调”等论调，认为它是缺乏阶级分析和背离批林批孔大方向的。究竟对谁该用“火药味”呢？林彪、孔老二是我们的敌人，对他们的批判就是要有“火药味”，越浓越好。对我们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敌人，还是同志，这个框框我们就是要划，这个调调我们就是要定。不然就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损害我们的团结。至于有些过去曾存在对立情绪的同志，经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同“中庸之道”更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这个厂的党委及时组织干部、群众排除了妨害革命团结的各种干扰，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赞扬和支持。事实证明，坚决地抵制和批评各种错误思想，是保证批林批孔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需要。这样做，从根本上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对那些有错误观点的人也是一个教育。

批林批孔是搞好革命团结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团结的进一步增强，广大职工革命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广大工人群众表示：“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于社会主义。一定要把被修正主义路线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怎样把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呢？厂党委重新学习了“鞍钢宪法”，学习大庆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今年以来，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连续组织了三次生产战役，每次都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口号。全厂职工总动员，上班坚守生产岗位，努力突破生产关键；业余时间开批判会，写批判稿，批林批孔，走访谈心，促进革命团结。领导干部和科室人员也分别到生产第一线，和工人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在批林批孔的带动下，生产步步上升，造成了革命和生产持续高涨的生动局面，各个车间都涌现出一批坚持革命团结，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无产阶级的正气大大发扬，广大职工中以先进为荣、争当先进的好风气越来越浓，革命和生产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实践又一次说明：一些所谓“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的。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搞好批林批孔，搞好革命团结，群众就会积极行动起来，克服一切困难，改变企业落后面貌，为国家多作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调查组



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

夏力之

当前，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失业大量增加的经济危机，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日子都很不好过。这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际形势的一种表现。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危机重重而无法摆脱的衰败景象截然相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早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通货膨胀，财政金融日益巩固，人民币的币值长期保持稳定，是世界上少有的稳定的货币。在货币制度上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生动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个国家的币值稳定不稳定，主要的标志，是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保持长期稳定。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币的购买力，长期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发生过什么波动。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布、食盐、煤炭等，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有一些日用工业品的价格，还在稳定中逐步有所下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目前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但由于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我们人民币的币值长期稳定，人民的生活是安定的，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的。城乡人民的储蓄存款稳步增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同时，币值的稳定，也有利于实行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扩大城乡联系，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我国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汇价水平，长期以来也始终保持了稳定，人民币既没有贬值，也没有升值。它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高的信誉。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中，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对于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对外经济往来，以及排除资本主义金融货币危机的干



扰，起了重要作用。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物价上涨，币值下跌，通货膨胀，金融货币危机接连爆发。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多年来，通货膨胀持续发展，货币购买力不断下跌，市场物价节节上涨。特别是最近几年，境况更加恶化。今年上半年，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比一九六七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在金融货币危机的猛烈冲击下，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先后两次被迫宣布货币贬值，美元威信急剧下降。最近，国际自由市场用美元购买黄金的价格，比官定价格高出三倍。所谓的“金元帝国”早已宣告破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金融货币状况也很不妙，国内市场供应紧张，黑市猖獗，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不断下跌。据统计，苏修六十九种主要消费品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格，一九七〇年比一九六三年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左右。自由市场的价格，比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格还高得多，有的甚至高出一倍到几倍。苏联卢布的对外币值，在一九六一年兑换新卢布时贬低了百分之五十五。卢布早已越来越不值钱了。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金融货币危机，是它们政治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反映，也是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对外扩张，转嫁危机，推行掠夺、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美帝国主义为了缓和与摆脱经济危机，长期以来，对内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军费预算，盲目刺激生产，制造虚假繁荣；对外增加国外军事开支，大搞资本输出，争夺原料市场。其结果，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际收支连年发生逆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三年二十多年中，有十八年发生财政赤字，累计赤字数额达一千五百多亿美元；有二十一年发生国际收支逆差，累计逆差数额达八百八十多亿美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便增加税收，发行公债，滥发货币，造成债台高筑，物价飞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日益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它大搞资本主义经营，追求高额利润，盲目进行生产，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它疯狂扩军备战，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据各方面的材料计算，目前苏修的实际军事费用，每年已达六、七百亿美元。其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美国。它野心很大，力量不足，对内赖债，对外乞讨。到一九七一年，苏修所欠的国内公债已达到二百八十四亿卢布，并把已到期的经济公债二百五十八亿卢布，推迟到一九七四年以后，分二十年偿还。苏修所欠的外



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四月，累计已达八十五亿美元。这个自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已堕落到伸手乞讨过日子的窘境。

美苏两霸为了转嫁危机，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竭力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剥削和掠夺发展中的国家。它们大做军火买卖，牟取暴利，成了世界军火商。它们还在国际金融货币方面推行霸权主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在自己所谓的“大家庭”中，强行使用“汇兑卢布”，把本国卢布变成“国际货币”，妄图控制“大家庭”成员国的经济；另一个则大量输出美元，抵付国际收支逆差，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危机。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些行径，已经激起了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国际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也激起了其他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就反过来加深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两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行为一样，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预见到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说：“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我们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手里，他们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盲目发展生产，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被竭力限制在最低限度范围内，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同时，由于战后亚非拉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国际市场。生产的发展同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国家已发展得越来越突出，使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频繁的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之中。结果是国内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失业人数增加，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国外，它们的掠夺、侵略政策不断遭到破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原料和市场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并且受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经济危机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矛



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之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则不存在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在我国，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指导方针。所有这些，就为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金融货币方面，我们早就铲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的毒害，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人民币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经受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考验，经受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不断扰乱破坏的考验。在多次风浪面前，人民币都能够顶得住，始终保持稳定，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货币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我国人民币所以能够长期稳定，主要靠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商品，并且按照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物资雄厚了，国家手中掌握的商品充裕了，并且坚持按照稳定的价格供应市场，就能够保持币值的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供应市场的吃、穿、用等各类商品大大增加。一九七三年全国商品收购总额和零售总额，比解放初期增加六倍以上。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不断增加，今年六月底，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比一九六五年同期增加将近一倍。现在，我国每发行一元货币，都有几元的商品作保证。这就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同商品的供应量能够相适应，从而保证了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做好社会主义制度下稳固的、收支平衡的国家预算，也是人民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要“**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



的稳定”。财政收支能不能平衡，直接关系到货币的发行与币值的稳定。“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不允许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增加财政开支。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一般总是收入超过支出，略有结余，国家的后备力量不断充实。在遇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是靠增产节约和国家的后备力量，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以丰补歉，保证收支平衡，而绝不靠借债，更不靠增发货币来解决。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我国财政的巩固和平衡，使得货币的发行能够控制在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的需要范围之内，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的状况。

人民币的长期稳定，还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货币的发行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并对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有计划地进行调节。人民币是我国唯一流通的货币，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和集中管理。银行投放出去的货币，主要是靠有计划地供应商品来组织回笼。国家每年支付多少工资，采购多少农副产品，需要投放多少货币，相应地要供应多少商品，都由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安排。这就使货币能够按照计划的渠道发出去、收回来，保证货币的正常流通。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事先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局部的暂时的不平衡，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计划进行调节，以求达到新的平衡。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民币保持长期稳定，归根到底，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成果。刘少奇、林彪一伙曾经鼓吹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反动主张，妄图抓住金融货币这个联结整个国民经济的纽带，打开一个缺口，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们的这种破坏活动，及时受到了抵制，没有能够得逞。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现在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包括金融货币制度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日益巩固，前景无限美好。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

祝 新 运

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后,大家都很关心我,也都很想知道我是怎样演小冬子的。其实,我还很不懂事,只是在解放军叔叔、阿姨的帮助下,一边向冬子学习,一边演冬子的。

去年进八一厂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一听说要我演小冬子,还是主角,我真害怕,不知道该怎么演。一次,领导上把我们几个找到一块,对我们说:“这次找你们来拍电影,是党交给你们的战斗任务,你们都要象小冬子那样,听党的话,努力把任务完成好。”接着给我们讲了小冬子的故事,又找了连环画《闪闪的红星》给我们看。慢慢儿地,我知道了冬子是个了不起的小英雄,我想,如果能把冬子演好,让许多小朋友都来学冬子,象冬子一样,做党的好孩子,这有多好哇!

我特别喜爱小冬子,一心想把他演好。但是一演起来,可不容易。冬子生在旧社会,是农村的孩子,他会砍柴、爬树,还要给米店老板劈柴、干活儿;我生在新社会,长在北京城,又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什么活儿都不会干。怎么办?向冬子学!冬子是儿童团员,我是红小兵,我们都是党的孩子,他能干的,我一定要学着干。

我的第一课是学劈柴。导演告诉我:“砍刀是冬子跟敌人作斗争的武器,你一定要会劈,还要劈得有劲儿。”我照着叔叔、阿姨教的样子,对着树墩,使劲地劈。劈了十几分钟,我的手臂又麻又疼,叔叔阿姨都让我歇会儿。我想,冬子是不怕苦的,他跟红军叔叔在山上,连吃盐都很困难,吴大叔问他苦不苦,他说:“苦,可我不怕!”我学冬子,也不能怕苦!就这样,我每天在太阳底下(因为我太白,可以晒黑一些),坚持劈呀,练呀,终于学会了。

为了学习砍柴、挑柴,叔叔伯伯经常带着我们下乡,向农村的小朋友学。农村小朋友每人能挑两大捆,可我挑两小捆都很费劲。一根扁担压在肩上,前后晃荡,两只手使劲抓都抓不住。挑一趟,肩膀上就压一道血印。但是,一想到冬子不怕苦,我也什么都不怕了。在学爬树、上竹排和到很远的地方去拍外景的时候,我也是不断地鼓励自己:要象冬子一样不怕苦!

电影就要开拍了,又碰到一件难事——我太胖了。小冬子是旧社会穷人的孩



子，吃得不好，又干那么多活儿；我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长得很胖，不象冬子的样子。摄影叔叔说：“演冬子，就一定要瘦一点。”怎么才能瘦呢？听大人们说，不吃肉就可以瘦。但是我特别爱吃肉，不吃吧，有点难受；吃吧，就瘦不了啦。怎么办？还是向冬子学！冬子原先不是想跟着吴大叔去打游击吗？可他能听党的话，跟宋大爹一块下山给游击队弄盐，后来又去米店当“学徒”。他说：“我是党的孩子”，“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是党的孩子，也要象冬子那样听党的话，拍电影需要我瘦，我就一定要瘦下去！从那以后，在拍电影的半年中，我就一直没吃过肉。

学习冬子的动作、样子是难，但要学习他的感情就更难啦！因为我没受过冬子那样的苦，开始演的时候，总是没有感情。比如第一场，演到冬子第一次见到红军叔叔的时候，我只会笑，因为我喜爱解放军叔叔，平时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就想笑。还有“妈妈牺牲”那一场戏，导演和辅导员阿姨启发我哭，可是我对着摄影机怎么也哭不起来。下来后，摄制组的叔叔阿姨都说我的感情没有进到戏中去。后来，他们给我讲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启发我理解小冬子的感情。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懂得了冬子的心情：如果不是红军来到柳溪，小冬子就会被胡汉三活活打死；所以，当红军吴大叔砍断吊绑“我”的绳子后，我滚着热泪扑到吴大叔的怀里，再也不是笑了。同样，在“妈妈牺牲”那一场戏中，我知道了如果不是妈妈掩护群众，好多群众会被胡汉三和白狗子打死打伤，妈妈是党的人，是好妈妈，但是她被胡汉三烧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了，怎么能不使“我”心里难受呢！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有多少个这样的好妈妈英勇牺牲了，想到这里，我好象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当说出“妈妈是党的人，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时候，我眼睛里不知不觉就冒出泪水，也射出仇恨的火花。

每拍一个镜头，我就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拍完电影之后，我更加懂得应该爱谁、恨谁，明白了是谁给了我们幸福，应该跟谁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柳溪人民解放了，冬子一家翻了身。柳溪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在今天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红小兵要跟全国人民一样，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让胡汉三这些坏蛋再跑出来搞反革命复辟。

演冬子，学冬子，演完了冬子还要学冬子。电影上映以后，很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给我写来了祝贺信。我是一个普通的红小兵，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就受到了党和人民这样的关怀和保护。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走冬子的道路，做党的好孩子。



搞好技术革新 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

发展工业一定要开展技术革新

宫效闻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深刻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我们永远只能在西方科学技术后面爬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贾桂思想，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科学技术人员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发展。

开展技术革新，是充分挖掘现有企业内部潜力、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的可靠途径，也是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途径。在生产技术领域，坚持革命，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重视不重视技术革新，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要不要变革，这是区别是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具体表现。当前，广大工人群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革命干劲高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技术革新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有些同志一讲到要增加生产，往往就向上伸手，要厂房，要设备，要人。他们认为：“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要使产值加倍，就要厂房加倍，劳动力加倍，设备加倍。似乎没有后面几个“加倍”，生产就不能“加倍”。这是妨碍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的一种思想障碍。当然，发展生产，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厂房、劳动力，不能都说是不要的。但是，有些工厂目前的生产水平，对比同行业的先进单位，还有不小的差距。只要把这些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可以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能办事。何况，不论现在或将来，国家的建设资金总是有限的，工业劳动力不可能也不允许脱离农业这个基础无限制地增加，如果一有困难，就只想到向上伸手，“等、靠、要”，其结果，必然会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越等心越散，越靠人越懒，越要志越短”。受这种思想支配的单位和部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便成为一句空话。

资金、设备等等“加”上去以后，是不是生产就一定能够那样增加上去呢？也不尽然。许多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路线不端正，缺乏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广大群众的手脚被束缚住了，钱再多，设备再多，生产也不一定上去；路线对头了，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技术革新广泛开展起来了，即使不增加或少增加劳动力和设备，生产也会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前，上海钢铁工业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多年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还是那么几个厂子，人员也基本上没有增加，由于路线对头了，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大搞技术革新，转炉采用吹氧新工艺，使炼钢能力比原设计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五十吨的老平炉改造后产量扩大一倍，五吨的小电炉，装入量不断增加，达到十五吨，全市一九七三年的钢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就说明，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的道路是无限广阔的。认为“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不增加设备、厂房、劳动力，生产就搞不上去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这也说明，要在生产技术领域内坚持变革，使生产迅速向前发展，首先还是要解决思想和路线问题。只有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



解决思想上政治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才能够更好地解决生产技术领域里革新和守旧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单位技术革新开展不起来呢？有的同志说：“我们这里群众干劲大，任务增加一点照样能完成，不搞技术革新也过得去。”还有的同志说：“生产任务这样忙，哪来的功夫搞革新。”这是开展技术革新的又一种思想障碍。群众干劲大，任务加重一点也能够完成，这是好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生产任务会越来越重，如果不搞技术革新，只靠群众拚体力去完成生产任务，是不能持久的，现在“过得去”，将来也过不去。群众干劲大，这是开展技术革新的根本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把生产任务完成得更好。至于生产任务重，是不是就不能搞革新呢？也不是。压力可以变动力。许多重大的技术革新恰恰是在生产任务很重的时候“逼”出来的。许多生产任务比较重的单位的工人提出：“三人任务两人顶，抽出一人搞革新”，不仅使技术革新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生产，而且使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可见，生产任务重，不是不能搞革新，恰恰相反，更需要大搞技术革新，使生产和技术革新相互促进。技术革新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下去。那种强调困难、得过且过的说法，实际上都是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思想在作怪。

毛主席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安于现状还是坚持变革，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其他一切革命斗争一样，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比之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变革生产条件的结果。一句话，是靠斗争取得的。没有变革就没有发展。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随着生产的发展，新的矛盾还会出现，又需要我们去解决，守旧总是守不住的。修正主义者则认为，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只能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他们脑子里只有西



方资产阶级，没有东方无产阶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压制工业战线和科学技术战线的新生事物，他们固步自封，反对变革，实际上意味着停滞、倒退和复辟。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也是长期的。

历史上代表新兴阶级的法家，主张前进，要求变革，打出“不法古，不修今”的旗帜，向着腐朽、落后的旧的生产关系猛烈冲击，在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儒家鼓吹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说教，则是禁锢劳动人民变革生产条件的精神枷锁。林彪效法孔老二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宣扬“天命论”、“顶峰论”，也是适应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复辟、倒退的需要。因此，在生产技术领域，前进还是倒退，变革还是守旧，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的尖锐斗争。无产阶级就是要革旧世界、旧事物的命，在思想上政治上，要同代表剥削阶级的反动势力及其影响作斗争；在生产技术上，也要同一切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思想斗，同胸无大志的懦夫懒汉思想斗，勇于变革，敢于创新。上海标准件行业，小厂多，设备差，任务重，过去有人认为没有条件搞技术革新。但是工人们说：“不怕难，只怕懒，不怕条件差，只怕没志气”。他们冲破保守思想，大干大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几次改革，没有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全行业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机床实现了半自动化、自动化，并且创造了一批自动化联合机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全行业职工人数减少了百分之十八，产值增加了一倍多。可见，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变革，也不在于有没有困难，只要人们的思想从传统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打开技术革新的新天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还有些同志认为：“要搞技术革新，就要搞得象个样。”这些同志所说的“象样”，不过是贪大求洋的代名词。在这些同志看来，只有照搬那些上了“洋书”，或者洋人已经做过的东西，才算“象样”，而对广大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土生土长的革新创造，却一概看不起，说它们“不象样”，这也“不正规”，那也“靠不住”。如果技术革新要象他们那个“样”，就只能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只会扼杀群众的革新创造，给群众头上泼冷水。要使技术革新广泛开展起来，必须克服这种盲目



崇洋、妄自菲薄、轻视群众的思想。

广大群众从简易入手，土法上马的革新创造，是不是“不正规”、“靠不住”呢？完全不是。群众的这些革新创造，是他们根据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总结自己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因地制宜地创造出来的，不仅具有花钱少、上马快、收效大的优点，而且用起来得心应手，容易在生产上使用推广，在群众中生根开花。它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群众简易上马的革新创造，经过不断提高，从点滴的改进发展到整个工艺的改变，从某个机件的改革发展到整个设备的更新，从一种工序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到形成自动生产流水线，以至促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生产技术面貌的根本改观，其中不少项目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它们不是照搬照抄，产品样式和技术方法都是中国式的，这样就能开拓出一条适合我国条件的多快好省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采取简易办法，土法上马，不但不会排斥洋法，还可以使洋法与土法紧密结合，“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使洋为中用，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羊毛衫行业，在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为了追求“象样”，靠少数人关门搞自动化，搞了几年，一直搞不出来。去年，有个羊毛衫厂的两个青年电工，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简易上马，仅花了七十二元，创造了一种“光电控制箱”，使四种操作实现了自动化。由于花钱少，收效快，工人十分欢迎，半年时间，就在全行业一千五百台织机上迅速推广，使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十五以上。今年以来，这种简易程序控制又在全市轧钢、锻压、金属切削、橡胶等二十个行业逐步推广使用。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群众简易上马的革新创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简易办法的威风显现出来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途径也就越走越宽广。工人说得好：“简易简易，要坚定不移。”因为这是符合技术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简易是同复杂相比较而存在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这对矛盾永远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要搞简易上马，就是将来生产技术条件更好了，我们还是要简易上马，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不



过那时的“简易”，比现在的“简易”更高一级罢了。

当然，开展技术革新，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实效，注意将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技术革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往往要牵涉到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搞不好的。许多技术革新开展得好的单位的经验证明：在技术革新过程中，既要充分发动群众，注意总结群众的先进经验，又要注重调查研究和反复进行科学试验。这样，就可以少走弯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收到比较大的效果。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工业部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正在向前发展，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大干大变。经济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积极带领群众前进，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组织起来，主动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善于利用上层建筑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技术革新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毛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凡是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一切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而坚决反对刘少奇、林彪卖国主义路线的革命者，都是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现有工业基础已不断得到增强，开展技术革新的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优越得多，只要我们按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树立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扎扎实实地做出艰苦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一切工业部门要订出自己的长远规划，明确今后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并从当前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加强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想长远，抓当前，争取做到在生产技术上一年有一个小变化，积几年又有一个大的变化，不断变革，不断前进。同时，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大力发扬先进，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认真做好技术革新项目的巩固提高工作，使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浪高一浪地发展，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



技术革新必须依靠工人群众

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会

我厂是一个生产铣床的老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产量一直在一千台左右徘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全厂团结战斗，朝气蓬勃。革命的大好形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九年，第一次突破设计水平。一九七〇年，产量翻了一番。去年，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比，产量提高了三点二倍，其中大型机床产量增长八倍；产值提高三点九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二点二倍。

我们厂的生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几年以来，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认真抓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促进了生产的持续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生产斗争和技术革新运动中，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还是靠几个人冷冷清清地干，甚至搞“专家治厂”，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工人搞一项革新，要经过二十几道手续，就连在机器上打个眼，也得经总机械师批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破“专家治厂”，立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思想；破“洋奴哲学”，立自力更生的方针；破“贪大求洋”，立“土洋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焕发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群众敢想、敢说、敢干，主动找生产中的矛盾，研究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千方百计地在挖掘企业潜力上动脑子，促进了技术



革新的蓬勃发展。从一九六九年到今年九月，共实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项目三千六百项，其中自制设备四百八十二台，使热加工的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冷加工广泛采用以铣代刨等新技术，并出现了一些机械化、自动化的单机和流水线，为挖掘企业潜力，持续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在技术革新中，不单各生产部门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成倍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就连辅助部门的清扫工、汽车司机也都参加战斗。进厂不到半年的学员，制成粉末冶金自动称料器，基建工人制成预应力空心楼板，备料工人制成砸铁流水线，维修工人制成三十六米跨度的吊车，炊事员制成切肉机、切菜机，等等。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

开展技术革新，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好革新和生产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生产任务重、时间紧，革新没法搞；另一种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越忙越要搞革新。我们坚持了后一种态度，不赞成前一种态度。因为前一种态度，见物不见人，没有真正认识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实，任务越忙，越能看清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技术革新就越有搞头。群众最聪明，最有实践经验，那里最需要革新，怎样革新，革新成果怎样发展，他们最了解、最清楚。群众起来了，办法就有了。革新项目一经实现，就可以克服薄弱环节，使生产前进一步。我厂中型铣床大件加工，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是生产中的“短线”，月产一百多台，是我厂进一步提高产量的薄弱环节。一九七〇年，加一车间的职工，发扬“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改工艺、改工具、向大洋设备开刀，实现了以铣代刨等革新，在基本上不增人、不增设备的情况下，中型铣床大件加工达到月产五百台的水平。这个单位主动了，我们又重点发动其他单位大搞革新。先进促落后，一环推一环。就这样，抓住一点，带动一片，推动了全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发展。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纷纷投入技术革新的战斗。但是，技术革新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是等别人给创造条件，还是学习大庆的革命精神，没有条件尽可能自己创造条件，这是技术革新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应该具备的，外援也要积极去争取，但是，改变生产技术面貌，首先



要靠群众自己起来革命。广大职工说得好：“一要二等三落空，一想二千三成功”，必须主动地去创造条件，改变条件。

要把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落实到基层，必须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信工人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材料不足，就挖企业内部潜力，清仓查库，充分利用多余、废旧物资，或将产品改革节省下来的材料用于革新项目。没有厂房，就在原有厂房基础上，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配套件不够，就组织厂内外协作，互相调剂支援。设备紧张，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或利用星期天和夜班借空余床子干。技术力量薄弱，就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在费用方面，则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做到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木模工段过去主要使用手工工具。在品种发展、产量翻番以后，木模的制造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木模工人克服了“木模工只会吃木头，吃钢铁没咒念”的想法，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边学边干，在兄弟单位支援下，先后自制大型木工龙门铣、齐头机、拼缝机等设备二十六台，在不增人的情况下，满足了生产需要。为了支持群众革新技术的战斗，我们要求有关科室对技术革新所需要的物资，尽力给予满足，为群众性技术革新积极创造条件。这样，就使广大群众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几年来，设备有改有创，革新由小到大，队伍由弱到强，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变革旧的生产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的过程，是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体现。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过艰难曲折。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中，有的成功了，也有的失败了；有的顺利一些，也有的走了许多弯路；有的效果很理想，也有的开始很不完善，甚至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革新一次成功，不许失败，没有反复，这不是科学态度。这样，必然会对新生事物泼冷水，压制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发展。在新和旧、变革和保守、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领导必须态度鲜明，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才有利于推动技术革新群众运动的开展。过去，我厂万能铣的主轴一直是用钢材锻造的，为了节约钢材，工人群众提出改用球墨铸铁，我们热情支持了群众的倡议。新材料投产后，有一段时间，质量不稳定，影响到生产任



务的完成。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动摇，要求恢复旧材料。我们认为，改用新材料方向是对头的，应当坚决支持，但它需要一个掌握和巩固的过程。于是，积极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团结攻关，并取得有关研究机关的大力帮助，反复进行科学试验，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每年可节约钢材一百五十吨。加二车间的职工为了提高精密铸造的效率，一九七一年自制压蜡机代替手工作业，但是没有成功。一九七三年又设计制造一台卧式压蜡机，也失败了。这时有人吹冷风，认为是白浪费。我们认为，通过实践可以取得经验，不能怕交“学费”，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节约，反对浪费，但决不能把群众技术革新中交的“学费”当作“浪费”来反对。毛主席在谈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曾指出：“**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全局的问题是这样，局部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要争取少交一些“学费”，但一点不交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领导承担了责任，鼓励群众总结经验，坚持革新，一九七四年，终于制成了十二工位自动压蜡机，生产效率提高三倍。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开展起来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运动持久地发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体会是：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三结合革新队伍的作用，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与专业队伍的技术革新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总结群众的经验，使技术革新成龙配套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又可以更好地培养一支技术革新的队伍。装配车间三结合革新小组总结群众经验，一九六九年以来，全面规划，自制了二十一台导轨磨等专用设备，使万能铣五十九个精加工面全部采用精磨、精刨、精铣，代替了手工刮研，减轻了劳动强度，效率提高三、四倍。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是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个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就一定能更快地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贡献。



新厂也需要搞技术革新

天津市第一石油化工厂党委会

我们厂是一九七〇年建成投产的。四年来，我们这个新厂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工人阶级，在新设备上实现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一百五十多项，炼油能力从原设计的年产三十万吨提高到四十五万吨。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又实现重大技术改造十二项，炼油能力提高到六十万吨，产量翻了一番。四年来，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品种由五种增加到十一种，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建设四个相当于我厂现在规模的炼油厂。我们体会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广大工人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这是推动技术革新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我们企业领导必须不断端正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智慧更好地组织起来，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我们厂的技术革新是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的。

一九七〇年，我厂常减压炼油装置投产，当年就达到了设计能力。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在三十万吨上停步，还是从设计能力的框子中迈出去？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前进，向技术革新要油，为国家多作贡献。但也有的同志认为，新装置刚投产、新设备刚运转、新工艺刚掌握，搞革新得等些年。为了统一认识，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



都是错误的。”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科学地概括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是我们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新设备就不能够变吗？就不需要搞技术革新吗？不是。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对于新设备也要用发展的观点看。设备，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时候，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没有变革，也就无从区别新和旧。从这个意义来说，昨天的新，是今天的旧；而今天的新，明天也会变成旧。新设备的不断改造，是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那种认为新设备不用革新和改造了，不能再发展了，是一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厂的设备能力的发挥，也正是在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大家回顾建厂初期，就曾经对原设计作过很多局部的修改。比如，仪表工人修改过空压站信号电缆的设计，泵房操作工人修改过排水管道的设计，等等。投产后不久，有的车间又对加热炉等设备进行了改造。原来加热炉有两套燃料系统，一套和蒸汽锅炉同用，互相影响，不易操作；一套用减压塔底的燃料油，由于油位高低不稳，塔底泵容易抽空，造成炉子熄火，操作波动很大。后来，革新了工艺，搞了一套自备燃料系统，从而平稳了生产操作，增大了设备效能，提高了炼量收率。这些设备经过改革，比原设计更加符合生产实际，更加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

这些事实对大家启发很大。它说明了，新设备是需要改造的，也是完全能够改造的。只要从思想政治路线上端正认识，把敢于改革的雄心壮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让新设备遮住眼，挡住道，就能发现新设备同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的薄弱环节，不断进行技术革新。

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我们厂老工人少，新工人多，充分发挥青年工人的智慧和力量，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同志认为：“青年工人现在能顶好岗位就不错了，搞革新、搞改造还不到时候。”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



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我们看青年工人，首先就要看到这个突出的本质特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一味强调青年工人不稳当、经验少、技术差，不相信他们能够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我们厂的情况看，建厂初期，就组织青年工人到大庆实习，受到了大庆精神的教育，从思想上打下了一个好底子。随后，他们又亲身参加了艰苦的建厂劳动，在老工人带领下，安装了绝大部分仪表和机泵，不仅体会到创业的艰难，而且对新设备的性能也有一定的认识。投产以后，他们整天战斗在生产岗位上，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党委在抓好路线教育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技术教育。由于他们肯学习，在短短一两年里进步很快，已成了革命和生产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过程中，青年工人富有创造性，敢想敢干，提出了许多好的革新建议，对工艺和设备进行了许多革新和改造。仪表车间两个青年女工，在老工人帮助下，克服了技术资料缺乏等困难，完成了水场仪表盘配线敷设任务。他们安装的仪表盘同苏修的仪表盘相比，既省料，又美观适用。油品车间沥青工段百分之九十是一九七〇届初中毕业的青年。这个工段原是手工操作，生产效率较低。他们同机修工人密切配合，自己动手，大搞革新，把单釜氧化改成了双釜连续氧化，推车扒桶改成了成型包装机械化，使沥青产量由原设计的年产七千吨提高到两万五千吨。在设备改造会战中，青年工人提出了不少革新建议，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炼制车间青年工人改进柴油碱洗工艺的基础上，油品车间的青年工人，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采用了鼓风加速沉降的方法，基本上解决了柴油透明度的问题。原来，轻柴油要在罐里沉降二十多天还不能合格出厂。现在，最多沉降一、两天就可以合格出厂，扭转了生产上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

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是一项复杂的艰苦劳动，对于新工艺、新设备的革新和改造尤其如此。要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学会和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在开始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时，我们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从哪里下手？我



们从实践中体会到，要集中力量抓好关键部件、关键工艺的改革。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也是这样。每套设备、每个工艺流程，都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但其中必有一个是最主要的薄弱环节，也就是“卡脖”的地方。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能带动整个设备、整个工艺的改造，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一九七一年我们进行提高炼量的试验，新设备暴露了许多矛盾：有些设备超过了负荷，有的热源不足，某些加工工序提不上去，等等。这么多的矛盾先解决哪个好？全厂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分析，抓住了初馏塔控制温度低、常压炉负荷大这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大家一齐动手，出主意，想办法，相应地改革了工艺，降低了常压炉的负荷，解决了热源的问题。改造后，初馏塔顶拔出率提高一倍，使原油的日加工量提高了一百多吨。

解决了“卡脖”的矛盾，是不是就“一锤定音”，完成了革新和改造的任务呢？不，不是这样。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因而旧的改造过程结束了，新的改造过程又开始了。一九七一年改造常压炉之后，又发现减压炉成为进一步增产的障碍，紧接着我们又着手改造减压炉，并对系统装置进行了革新和调整。经过不断革新和改造，使炼油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这时有人认为热源用尽，潜力挖尽，产量不好再提高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冲破了这种思想阻力，继续努力，调整了冷换设备，改造了炼塔结构，挖掘了热源，结果炼油能力又由四十五万吨进一步提高到六十万吨。

事实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任何时候，设备上、工艺上都会有矛盾，都会有效能差别，都会有不平衡，因此设备的改造、技术的革新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新厂搞技术革新具有广阔的前程，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团结全厂职工，进一步搞好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使炼油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贡献。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上海中国电工厂是一个专业生产漆包线的工厂。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没有要国家投资，没有靠建新厂房和向国家要新设备，而是立足于现有基础，自己动手，开展技术革新，在全国二十多个兄弟工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协作下，今年三月份以来，自己设计、制造出十五台催化燃烧漆包机，将原有的漆包车间改造成为全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新车间。催化燃烧漆包，在国外是六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这个厂制造的新设备，有多层、多线轴、高速的特点，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新车间投产后，可使漆包线的产量，在比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增长三倍的基础上再增长一倍，质量进一步提高，并节约用电百分之六十以上。采用新技术后，漆包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废气也可回收燃烧，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三废处理问题。过去有人曾计算过，单设计一台新式漆包机，需要半年，如果改造一个车间，至少要三、四年。而这个厂只花了半年时间，就把新车间建立起来了。它说明，毛主席制定的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最能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最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群众掌握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会在技术革新中迅速改变生产技术面貌，创造出又一个奇迹来。

批林批孔 长自力更生的志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批判和清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开展技术革新的强大动力。

漆包线是机电、仪表等工业不可缺少的材料，被称为“电机的血管”、“仪表的



神经”。原来的漆包机，是在铜线上涂绝缘漆，再用电热烘干，耗电量大，是有名的“电老虎”。烘干时，溶剂中的苯、酚等有害气体大量散发，污染环境。过去，广大工人也曾要求改革技术，试验和制造催化燃烧新技术、新设备，可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只靠少数技术专家关门查文献资料，计算数据，一无结果。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我国工业生产和科研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对漆包线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且对质量、品种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但是，产量、品种上去了，耗电量也大量增加，有害废气增多，成了生产发展中的尖锐矛盾。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工人批判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要把过去没有搞成的催化燃烧漆包新技术攻下来，并且组织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验小组。开始，有的人不相信工人能够造出先进的漆包机，热衷于要从国外进口设备。厂里有的领导干部也担心，这种新技术很复杂，能不能攻得下来。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后生产已翻了几番，达到了先进水平，眼前还过得去，因此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技术革新进展不快。

广大群众要求革新技术，但洋奴哲学的修正主义影响造成了严重的阻力；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思想又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只有用自力更生的思想武装群众，才能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广大工人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进一步认清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大大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听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封锁、垄断新技术，而且还用高价、专利权卡我们，进口一台催化燃烧漆包机的价格，就等于这个厂固定资产的一半。大家憋着一肚子气，坚决表示，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自力更生，开展技术革新，造出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争气机”。他们在学习和批判中，还回顾这个厂的发展史，总结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成就，把洋奴哲学批得无处藏身。这个厂原是由十七个小厂合并起来的。起初，生产漆包线全靠手工操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工人们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跳出仿造外国设备的框框，造出一百二十一台成套的简易拉丝机、漆包机，工人叫它“跃进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走进电工厂，遍地土设备，大的象楼房，小的桌上放，配套又成龙，土法显威风。”工人说：“过去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改变了生产的落后面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物质条件改善了，更应该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掌握最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家总结出一条基



本经验：满足现状，畏难保守，迷信洋人，搞爬行主义，就会灭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只有自己动手，用新技术、新设备武装自己，才能大长工人阶级的志气。通过学习、批判，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大发扬，搞技术革新的信心越来越足。

敢闯敢创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任何新技术，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它的发展规律，也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才能认识它，掌握它。敢不敢闯，敢不敢创？这是能不能把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技术革新活动中，发挥出巨大威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催化燃烧漆包机，包括催化燃烧和热风循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即通过催化剂使绝缘漆中蒸发出来的大量有机溶剂加快燃烧，同时把燃烧时产生的巨大热量通过循环系统来烘干漆包线。这样既可以节约用电，又可以通过燃烧把有害气体变成无害的水和二氧化碳，避免污染。但怎样催化，怎样燃烧？燃烧后又怎样把热量收集起来，重新送到漆包烘炉里，生产出高质量的漆包线？这中间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一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有盲目崇洋思想的人，被这一系列的难题难住了，动也不敢动。可是，中国电工厂的工人认为：催化燃烧技术规律既然是客观存在，只要敢于去碰它，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总是可以掌握的。工人们从搞小样开始，再搞模拟试验，先后经过八十六次试验，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剥去了这门新技术的神秘外衣。例如，催化燃烧区是催化燃烧漆包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搞模拟试验时，催化区烧了一会就不烧了，有害气体从出口处冒了出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开始，他们用鼓风机把出口封住，想把冒出来的烟压回去，可是越压，烟冒得越厉害。工人们毫不气馁，总结经验再干，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打开催化燃烧秘密的钥匙。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这个辩证思想启发了工人。要不冒烟，不能压，而要“放”。燃烧是氧化反应，要有新鲜空气。他们撤掉了出口的鼓风机，并加大了进口鼓风机的风量，催化区的新鲜空气多了，反应充分了，越烧越旺，有害气体基本上都烧掉了，就自然不冒烟了。这个厂的工人就是这样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于逐步掌握了这项新技术。

国外有先进技术，我们也有先进技术。发展新技术，要从我们的生产实际出



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中国式的新技术、新设备，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电工厂试制催化燃烧漆包机，开始是两层烘箱、十六个线轴，生产效率还不高。而这个厂在大跃进中创制的电热漆包机，有七层烘箱、五、六十个线轴，效率较高。能不能把现在掌握的催化燃烧新技术和过去自己创造的多层、多线轴、高速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制造出有七层烘箱、五十个线轴的催化燃烧漆包机呢？当时，有人吹冷风，说这种漆包机国外还没有，要想造这种技术更复杂、要求更高的机器，简直是空想。工人们回答：国外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才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工人群众的建议，党总支召开了有几十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议”，一连开了三天三夜，讨论技术方案。会上，七嘴八舌，献计献策。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发挥出来了，一个个技术难题解决了，这种催化燃烧漆包机也就造出来了。目前，国外一种被称为先进的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结构非常复杂，形态也很笨重，工人笑它是“笨头笨脑，张牙舞爪”。中国电工厂的工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使用了新的冷却方法，大大简化了机器结构，只使用五个电动机，三个鼓风机，四个阀门。如果按照国外的设计、用料，仿造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需要二、三十万元，而中国电工厂制造的同样一台机器只要四万多元，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还要立足于本国的资源条件。催化燃烧漆包机的一种关键材料，是催化剂。国外采用白金和其它贵金属，价格昂贵。如果采用这种催化剂，就是整个设备搞成功了，也难以推广。这个厂的工人决心把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底，不搞半截子革命。他们到处访问求教，进行各种试验，找到一种新的担体催化剂，这种催化剂我国资源丰富，价格很低。在用料方面，工人们也打破洋框框。为了适应高温，国外制造这种设备都用不锈钢材。中国电工厂工人经过测定分析，除在催化区使用不锈钢材外，其他部件都用普通钢材，仍然可以达到技术要求，使不锈钢材的用量只及国外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为推广这种新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事例说明，广大工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的方针打开了这个丰富的宝藏，就使他们的智慧放出更大的光彩。

争取时间 使技术革新之花迅速结果

通过批林批孔，自力更生方针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技术革新活动也就热气腾腾，进展迅速。原来，这个厂的领导计划今



年国庆节前试制出新的催化燃烧漆包机，明年再逐步推广。可是，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坚决要求大干、快上，把技术革新成果早日用于生产，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他们说：争气就要争在时间上。我们不仅要造出几台样机，而且要用新技术、新设备，改变整个车间的面貌。

“批了林彪和孔丘，革命干劲估不透”。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有十吨重，四层楼房高，仅制造就需要一千六百多人工。改造漆包车间，要把原来十二台老设备拆掉，换上十五台新设备，需要二、三万个人工。而整个机修部门能够投入的人力只有八十多人，一年也干不完。设备、场地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多困难。可是，用自力更生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有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迎着困难上。担任设计绘图的原来是个钣金工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认识到造的是“争气机”，打的是政治仗，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主动到现场去，和工人们一起商量，在大家帮助下，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就画好了平常需要四个月才能画好的全部图纸。制造设备没有场地，工人们在车间外面的走廊、过道里，用油布搭起十几处临时工作棚，到处摆开了战场。劳动力不足，各车间主动抽出生产工人支援，并且打破工种界限，人人学做多面手，钣金工人能做电焊工，研磨工人能做车工，连泥木工也上了机床。生产工人下班后也纷纷参加义务劳动，全厂几乎每个人都为技术革新出了一把力。设备能力不足，工人们简易上马，想出许多穷办法、巧办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们接连打了三仗，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第一仗，以四十七天时间，造出一台卧式七层烘箱的催化燃烧漆包机；第二仗，八天八夜，造出了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第三仗，又以三个多月时间，建设成功一个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车间，使生产技术面貌焕然一新。九月底，大部分新设备开动起来了，不仅把脱下的任务补上，完成了九月份的生产任务，而且比原计划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从中国电工厂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能把生产技术不断推向更高的水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调查组



· 杂 文 ·

呾 语

阳 戈

最近，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又发出了反华叫嚣。除了重弹中国走上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按：应当加上帝国二字，即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的老调之外，还用了一个新词，叫做要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页历史“翻过去”（见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其真实用意，就是煽动一小撮反动分子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这不过是勃列日涅夫的呾语。想当初，苏修叛徒集团曾寄希望于刘少奇，想通过他的手，把中国社会主义“翻过去”。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迷梦破灭了。这件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大好事，在勃列日涅夫面前成了“大悲剧”。后来，又寄希望于林彪，想通过他的手，把中国社会主义“翻过去”。这个“超级间谍”没来得及说出“决定性的话”，就一个筋斗翻在温都尔汗，迷梦又一次破灭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强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是翻不过去的。谁要想“翻”，谁就要变为齑粉。苏修叛徒集团是反动派；他们对事情的估量，一向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接受这些历史教训，也不会因此就改弦更张。他们依然做梦也想把中国社会主义“翻过去”。果不其然，这次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勃列日涅夫的呾语，对我们也有点用处。他再一次从反面告诉我们，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总想在我国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要捣乱到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我们切不可因为胜利了而丧失警惕。

勃列日涅夫的呾语，正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的处境。苏修叛徒集团，不但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在国内，他们也正坐在反对修正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火山口上。它熔岩欲出，随时都可能爆发。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会把修正主义统治的黑暗的一页彻底“翻过去”。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红旗

一九七四年 1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池 恒 (3)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吕 真 (8)

加强革命团结 争取更大胜利.....郑 实 (12)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昆 骏 (15)

儒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吴 畅 (20)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魏 理 (26)

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理论小组 (33)

正义战争必然胜利
——批判《盐铁论》中儒家的军事投降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九舰理论小组 (38)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

..... 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43)

小厂也能造出四百吨大平板车

..... 河北沧州市交通局四〇〇小组 (52)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 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党支部 (57)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得很

..... 中国共产党辉县委员会 (62)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 办好社会主义农业

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赵丰年 (67)

总结抗旱经验 促进农业发展 贺建农 (72)

学大寨就要抓路线 宁江 (78)

科 学 史 研 究

对人体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 金卫 (84)

☆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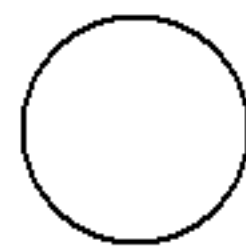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
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
校。**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
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
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思想评论

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池 恒

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夺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更大胜利，以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其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涌现出或进一步发展了大批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例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加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普及，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壮大，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的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亿万群众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各级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培养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以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方面的许多先进单位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许多发明创造，等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重要标志。它们的出现，说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它们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毛主席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生事物不断战胜资本主义的腐朽的旧事物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同新生事物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抱着满腔热情的态度，并把支持和扶植新生事物的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的革命任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于新生事物的支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热烈地赞扬了河北省三户贫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科学的预言。在各个时期的各条战线上，毛主席都发现和支持一批代表新生事物的典型，为广大革命群众指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和政策界限。今天，我们注意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它们迅速发展壮大，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使社会主义事业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它尽管会遇到许多艰难和曲折，革命的群众运动总是朝着这个基本方向前进，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以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先导。毛主席说：“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这些新的东西，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利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它们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意味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也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在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要经历若干发



展阶段，我们必须注意发现和积极扶植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在破坏旧的东西的同时，“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让它们尽快地成长，占领各个方面的阵地。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出现的，它们的发展壮大同样需要经过斗争。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从这种幻想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是直线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新事物刚刚诞生的一段时间内，旧事物总是比新事物强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只有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得到锻炼和发展。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产阶级为了复辟旧制度，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些人受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会有意无意地压抑它们。有的时候，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积极地进行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对于阶级敌人攻击、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革命言论和行动，要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决不能容许他们兴风作浪。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则要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使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自己的工作，辨别正确和错误，识别先进和后进，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它们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不然没有矛盾怎么发展呢？我们对这些新的问题要积极慎重地加以解决，不能轻率处理，更不能因为有了问题就把新生事物否定了。新生事物有缺点，有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地满腔热情地帮助它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使之更好地成长。应该看到，当前的大好形势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不等于在发展新生事物的问题



上就不存在斗争了，新生事物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了，相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对新生事物不闻不问，任其自流，那是错误的，有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最根本的还是靠正确的路线。新生事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产物，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发展新生事物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蓬蓬勃勃地发展；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干扰和破坏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受到压抑和摧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曾经出现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后来由于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有一些竟然被砍掉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迅速成长。但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对和破坏，某些地方也一度出现了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致使有些新生事物的发展又受到了影响。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清算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提高了路线觉悟，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又得到迅猛发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忘记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是新事物发展壮大的严重障碍。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深刻批判那种坚持倒退，反对革命，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想，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开辟道路。例如，毛主席一再倡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我们在实行这个制度的过程中，为什么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阻力呢？主要的就是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一些陈腐的观念在起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广大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最近，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干部参加劳动更出现了新的气象。这就充分说明，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须深入批判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就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本身来说，要使之发展壮大，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使它逐步提高和逐步完善；一个是进一步普及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又互相联系着。任何新生事物都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要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完善，而且只有不断地发展完善，才能充分显示其不同于旧事物的优越性，从而更加有利于推广；一经推广开来，达到了普及，实践的经验更多了，它就会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从而更快地完善起来。这里，关键就在于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当前我们国家正在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般都有几年的历史了，它们不论是在自身的发展中还是在普及的过程中，都已经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有些新生事物则是以前就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迅速发展提高，它们的历史更长，经验更丰富。即使是象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这样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虽然时间不很长，但是由于发展很迅速，很普遍，也有了不少的先进经验。对于这些经验，都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地加以总结，积极地予以推广。哪怕是初步的经验，也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这是满腔热情地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切实地把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就可以促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迅速发展壮大。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斗批改的丰富经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迅速发展不仅具备了可能性，而且是具备了必然性。我们要跟上这个形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努力工作。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

吕 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发动和引导广大群众、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以夺取各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多年的实践表明，认真抓好学习和批判，这对于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团结大大加强，各条战线的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为了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坚持下去，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抓好学习和批判的经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同志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得多了。但是，由于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在学习的自觉性和坚韧性方面，就会有不少差别。比如，有的同志总是把学习看作可紧可缓、可多可少的事情；有的同志则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愿意下苦功夫，遇到困难，就产生畏难情绪；也有同志认为，批林批孔搞得差不多了，学习和批判可以松松劲了，或者可以放在次要的地位，不必那么用力去抓了。诸如此类的想法，都阻碍着我们进一步搞好学习和批判。

学习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是同党的路线，同党的建设，同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学习问题，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只有借助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够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才能够使我们比较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做好革命工作。正如列宁



所说：“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正因为学习问题对全党是这么重要，所以，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总是反复教育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这些教导，都是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要重视和深刻体会这些历史经验，把学习问题提到“**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高度，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克服那种不认真学习、不坚持学习的错误倾向，把学习作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紧抓好。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紧紧地把握这个本质特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继续搞好批林批孔。学习和批判是辩证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认真搞好大批判，通过对香花和毒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鉴别，就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只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真正搞好大批判，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

革命的大批判，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有力武器，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重要方法。我们要自觉地运用这个武器，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主席曾经多次尖锐批评了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但却丧失了批判能力，甚至向反动思想投降的共产党员，批评了那些口称相信马克思主义，却不重视批判资产阶级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渗透在各个领域，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批判的武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倾向，来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个领域的胜利。可以说，是不是敢于和善于使用批判的武器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批林批孔运动，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给我们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锻炼批判能力的极好条件，对提高广大群众、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好处。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任何松劲情绪都是错误的。

在进一步开展学习和批判中，要强调注意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办法。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了解革命导师对各种问题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要学习革命导师观察和解决各种问题的立场和办法,使我们能够逐步做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问题,能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对我们学习得好不好的一个检验,也是我们犯不犯错误的一个界限。例如,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个革命团结,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去发展这个革命团结。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捣乱,因此我们又应当经常警惕阶级敌人搞分裂搞破坏搞颠覆的阴谋。对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的行径,要及时揭露、坚决斗争。在我们人民内部,如果有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利于革命团结的言行,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加强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如果一讲团结,就忘了斗争,或一讲斗争,就忘了团结,这都会犯错误,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又例如,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生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革命,抓好阶级斗争,才能促进生产。搞好批林批孔,提高了人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发挥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结果。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带领广大干部,纷纷奔赴各条战线,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调查研究问题,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这也是抓革命促生产在一个方面的生动体现。毛主席曾指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发动群众和留有余地,这也是对立的统一,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恰当地加以掌握。总之,这类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常分析具体情况,力求解决得比较正确。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也就是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我们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如果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学习和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不可能真正改造客观世界。毛主席提出的“要斗私，批修”，是我们应当经常牢记的纲领。在继续深入开展的学习和批判中，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我们要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剖自己的思想、世界观，对于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作风，都要自觉地加以纠正。这样，我们就能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前进。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一定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走在运动的前头。既要做好学习和批判的领导工作，又要带头学习，带头批判，把学习和批判不断引向深入。要正确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要认真办好各种形式的读书班。除了读书班这种形式外，更大量的还是要靠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学习。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应该是多数干部和群众的主要办法。只要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了问题，又按照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安排，那么，学习和批判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开展起来，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为了抓好学习和批判，我们要继续加强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理论队伍的骨干作用。各级领导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学习、提高，改造世界观。我们的理论队伍应当是无产阶级坚强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除了研究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积极关心和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两霸的争夺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问题。这对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都是有帮助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所开创出来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和批判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干部，积累了搞好学习和批判的丰富经验，例如：党委加强学习和批判的思想、组织领导的经验，搞好党委中心学习组的经验，学习和批判密切联系实际、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经验，建立和巩固理论队伍的经验，办好政治夜校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搞好学习和批判，是很有好处的。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这些经验。各级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推广在学习和批判中出现的先进经验，解决在学习和批判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深信，随着广大群众、干部学习和批判广泛、深入的开展，必然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的到来。



加强革命团结 争取更大胜利

郑 实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一步茁壮成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精神面貌更加振奋。最近干部参加劳动的热潮，就是这种革命的精神面貌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全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都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抓好批林批孔，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贯彻，革命就胜利，就前进；什么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干扰，革命就遭受挫折。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这条路线而奋斗。路线指导团结。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了团结的基础和共同努力的目



标，实现革命的大团结才有可能。团结实现路线。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团结起来，肩负着领导革命重任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工人阶级同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产生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完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把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任务。革命团结搞得不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落实得好；相反，团结涣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革命事业就会受损失。这同样是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在国内只代表一小撮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国际只代表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因而他们是极端孤立的，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因而它能够动员亿万人民去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胜利，又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团结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创造了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我们需要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毛主席指出：“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首先是要保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证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中国共产党章程》）。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要使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要在批林批孔的带动下，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继续加强战备，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阴



谋。这些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搞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这是革命的大局。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只要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进一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为了加强革命的团结，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干部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我们对于少数犯了或多或少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这些同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种种必要的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促进了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严于解剖自己，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这种态度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我们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坚持这样做，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更加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会更加兴旺，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都将继续遭到破产。

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多次妄图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国家，都没有得逞。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始终不懈地坚持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

昆 骏

中国革命战争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当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战术原则和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战略战术原则的核心，也是我们从事革命和建设工作应该掌握的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正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人民军队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它正确地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略战术原则上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同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但是，能够而且应当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动性，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作战双方为了夺取胜利，都力争主动。不过，这种“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是达到歼灭敌人争取主动的主要的物质条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于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完全有把握、有信心



打败他们。但是，敌强我弱，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只有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认真对待敌人，讲究斗争艺术，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这就要求不论在战役的部署方面，还是在战术的部署方面，都必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用几个师对付敌人一个师，用几万人对付敌人一万人，用几路兵力对付敌人的一路，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样，就把战争的胜利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革命战争指导上的具体运用。它告诉我们如何运用事物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去认识敌人，对付敌人，如何正确看待敌强我弱的形势并实现其转化，如何按照量变质变的规律，去从根本上改变敌我态势，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万事万物无不存在着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以分割的。大和小，是对立的统一。一个大的事物可以分割成许多小的部分，而小的还可以分割为更小。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敌人，虽然是拥有雄厚军力的反动派，有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是武装到牙齿的庞然大物。但它的庞大是由一个个小的部分组成的，也是可以分割的。蒋介石曾经拥有几百万军队，其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分割为许多小的部分，予以各个歼灭。我们懂得用分割的观点去看待敌人，就能够采取分而歼之的办法对付敌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全部敌人都消灭，但却可以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基础上，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把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战争中的双方也都具有两重性。敌人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我们有弱的一面，也有强的一面。敌人是走向没落中的强，是要转化为弱的；我们是走向发展壮大中的弱，是要转化为强的。但



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个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我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决不是凭借“弱”来取胜，而是依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力量对比的转化，使自己变为强者。“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善于集中兵力，一个一个地拣弱的打，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战役或战斗上，保证我同敌兵力对比的绝对或相对的优势，这样就可以使全局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在局部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使我军全局上的弱者的地位，改变为局部上强者的地位。以我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对付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局部上战役或战斗的胜利。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们正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去正确认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去改变这种形势，使敌从全局上的强变为局部上的弱，我从全局上的弱变为局部上的强，从而实现全局上的强弱关系的转化。

事物的矛盾运动有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完全质变的过程。由于量的变化积累起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质的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体现了在革命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从量的积累转化为质的飞跃这一辩证发展过程。毛主席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开始，我军的力量是弱小的，在战略上处于暂时的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但是，我们正确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战役或战斗上尽可能实行歼灭战，使敌人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师少一师，促进敌我力量的消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发展变化。集合许多大小的歼灭战，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使我们的力量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地位；敌人的力量由大变小，逐步地被歼灭。由于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质变到全部质变的发展，这对于指导整个的战局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紧紧抓住改变敌我有生力量对比这一关键，对每一个阶段我军歼敌的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推动了全国战局的发展，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战争的头八个月，我军就歼敌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军开始在一些地区转入战略性的反攻。经过一年作战，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毛主席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任务，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



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解放战争的第三年，由于敌军从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人减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由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转变了我军在数量上长期居于劣势的状况，这是中国解放战争中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提出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方针。经过毛主席亲自决策和指挥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就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是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军队才能掌握和运用，只有在人民战争中，才能发挥出它的巨大威力。敌人虽然熟知我们这一作战方法，但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其战争的性质是反人民的，决定了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和实行这一战法。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也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这归根到底是个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不要坚持这个作战原则，说到底，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问题。**“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一些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唯心主义者。他们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百般反对毛主席的作战原则。他们或者根本上否认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轻敌盲动，四面出击，用“两个拳头打人”；或者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畏敌如虎，不敢进攻。其共同点都是孤立地、片面地、凝固地看问题，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者。叛徒、卖国贼林彪，一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大搞军事平均主义，反对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竭力鼓吹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搞什么“短促突击”。在解放战争中和全国胜利以后，又公开兜售其主观臆造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对抗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用什么“一点两面战术”，反对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林彪的所谓战术原则，是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是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的典型。



在打仗的问题上，我们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做其它工作也应该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起打仗来，就另一种意义来说，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我们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困难要克服，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工作、困难和问题虽然很多，我们也应该象打仗一样，抓住主要矛盾，选好主攻方向，正确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要抓好典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要紧紧抓住那些最需要、最薄弱、但影响很大的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以达到“一能全歼；二能速决”的目的。如果分散力量，齐头并进，其结果将是“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许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执行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许多巨大的建设工程，许多具有先进水平的产品，正是依靠广大群众，集中力量，各方支援，采取会战、协作的方法建成或制造出来的。深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于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夺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贯彻执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原则的根本保证。不集中，不协调，不统一，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要自觉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才能在各项工作中，实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才能步调一致地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路线战胜王明、林彪一伙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果。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觉悟，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儒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吴 畅

儒家本来就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们残酷地杀害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事实，真是罄竹难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过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是两个字：吃人。可是，历代反动派却无耻地吹捧儒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不嗜杀人”，（《孟子·梁惠王上》）恶毒攻击法家“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乐以刑杀为威”。（《史记·秦始皇本纪》）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操着同一个腔调，攻击法家是“罚家”，“焚书坑儒”，杀人多。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还儒家以刽子手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儒家以及林彪尊儒反法的反动本质，有助于深入进行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之一。

毛主席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原则。春秋末期，在以儒法两家为代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一开始，就暴露了儒家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制度而凶残杀人的狰狞面目。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标榜自己爱人而不杀人，恰恰是他代行鲁国宰相不到三个月，就杀害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并暴尸三天，用罪恶的屠刀挑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为其后一系列的残害法家事件开创了先例。到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儒家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一旦复辟上台，他们对人民和法家的屠杀就更加疯狂，反革命的报复就更加残暴。这个时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大都惨遭儒家的毒手。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就被发动武装叛乱的奴隶主贵族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那些被撵下台的儒家之徒，长期“杜门不出”，却暗



中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秦孝公刚死，他们就破门而出，发动反革命政变，车裂商鞅，并杀害了商鞅全家。骨子里崇奉儒家的赵高，在阴谋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后，迅速地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革命人民和法家进行血腥的报复，李斯惨遭腰斩，并被“夷三族”，大将蒙恬、蒙毅被杀害，将军冯劫被逼死，秦始皇时代的法家人物几乎都死于他的屠刀之下。以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就是妄图用这样的一套反革命大屠杀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儒家的杀人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这班屠夫却满口仁义道德。他们杀了法家，还制造一些借口，证明他们杀得有“理”。孔老二强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即所谓“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就是为残杀革新派人士而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少正卯被孔老二所加在头上的几条“罪状”，实质上就是这位法家的先驱者面临着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主张变法革新，宣传封建制度的优越，揭露奴隶制的罪恶，为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大喊大叫。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可是，孔老二把少正卯的革命宣传和主张，视若洪水猛兽，叫嚷：“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这充分表现了这位儒家“圣人”的恶霸行为和法西斯主义作风。他杀了自己的政敌少正卯，但又不敢把这宗血案公之于世，还是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才最早地把它揭露出来。后来儒家诛异己、杀政敌，有的就援引孔老二所谓少正卯的“五大罪状”作为他们的依据。北宋时期吕诲之流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干的。后来有人甚至叫嚷如果王安石落在孔老二的手里，“必膺少正卯之诛”。可见，孔老二杀的不只是一个少正卯的问题，而是“自孔氏演此丑剧，于是后世虽无孔氏，而所诛之少正卯遍天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封建制度建立后，地主阶级逐步地从革命转化为反动。曾经是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的儒家，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依据孔老二当年在支持郑国奴隶主贵族血腥镇压奴隶起义时，立下的所谓民“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的那一套办法，来屠杀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历史倒车的儒家看来，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叫做“犯



上作乱”，叫做“盗贼藏奸”，该列入杀无赦的“九刑”。这样，儒家又成了残杀农民和其他革命人民最凶狠的“屠伯”和“苍鹰”。东汉末年，被吹捧为“海内大儒”的卢植，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和另一个“好诗书”的孔孟之徒皇甫嵩，疯狂地镇压黄巾起义。前后半年，直接死在他们屠刀之下的农民，有明确记载的就达几十万。连已经病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他们也不放过，实行“剖棺戮尸”。（《后汉书·皇甫嵩传》）一次，他们还把被他们屠杀掉的十万农民的尸体垒成小山，以示威风，真是残忍到了极点。这充分暴露出象卢植这样的一贯伪装成对于“女倡歌舞”，“积年，未尝转眄”（《后汉书·卢植传》）的正人君子，却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魔鬼。

随着封建统治日益走向腐朽没落，儒家杀人就更加狠毒。这从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和明朝的王守仁屠杀农民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朱熹这个自称继承儒家道统，在孔孟之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儒，就竭力鼓吹对人民“当杀则杀之”，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子语类辑略》）他在做地方官时，竟抢在新皇帝即位、实行“大赦”之前，拉出“囚徒”十八人，立即杀掉。他还以所谓“谕以某日，不俘以来，将斩汝”，胁迫他的部将田升残酷地镇压潭州瑶民起义。可见这个言必称“诚”、“敬”，口不离“中和”的大儒，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屠杀人民的机会。王守仁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告谕渊头剿贼》）但当他挥着屠刀残杀起义农民时，却毫不心慈手软。他镇压江西、福建的农民起义，所过之处，“曾无完土，荒村僻坞，不遗片瓦尺椽”；（《地方紧急用人疏》）不到两年，被他屠杀的农民有一万八千多人，被他纵火烧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同时，他还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邀功取宠，自鸣得意地说：“贼无出路，烧死数多，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以此难取首级。”（《南赣擒斩功次疏》）他镇压广西八寨、断藤峡瑶民起义，一次入山搜杀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致使“远近岩洞之中，林木之下，堆迭死者”，“臭恶熏蒸，不可复前”。（《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竟然口中还念念有词，讲什么“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告谕渊头剿贼》）这活灵活现地自我勾画出儒家一边吃人、一边流泪的鳄鱼本相。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由于这个时期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极端虚弱，仅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对付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的力量，这



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帝国主义。而反动统治者历来崇奉的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尊孔必然卖国，卖国必然尊孔，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近代中国，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大搞尊孔，不仅带有封建性，而且带有买办性。他们崇洋卖国，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这正是他们作为近代儒家区别于以往儒家杀人的一个特点。“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的曾国藩，从孔老二的“忠信笃敬”中，引出了一套对帝国主义要做到所谓“以德报怨”的卖国主义理论，无耻地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有德于我”。（《日记·治道》）按照这条卖国主义路线，曾国藩实行“借洋兵以助剿”（《议复借洋兵剿贼片》）的方针，从他的外国主子那里，请来洋兵，运来洋枪洋炮，血腥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据估计，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反动派屠杀的人民约有二千五百万。明令以孔孟之道为“国纪”的袁世凯，不惜向日本帝国主义拍卖整个中国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他大杀革命者和坚持爱国的人民。当时袁世凯杀人的恐怖情景，正如鲁迅所描写的：“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杀错了人》异议）继袁世凯之后，登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更是一个“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叫嚷以“曾文正公”为榜样，嘴上喊叫着“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手里却抡着大刀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头上砍去。他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两三年间，他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在他统治时期，被他屠杀的人民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这个家伙，还学着孔老二、曾国藩等人的腔调，咒骂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匪”，把他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行为叫做“行仁”，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的“仁”是一种什么货色了。

应当指出，儒家不仅拿着钢刀子杀人，而且还用软刀子杀人。儒家的纲常名教，程朱理学，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两把杀人的刀子，相互补充，各有妙用。按孔老二的说法，“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既要发挥刽子手的职能，又要发挥牧师的职能，以维持反动阶级的统治。朱熹则鼓吹“明天理，灭人欲”，要从精神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思想，使他们变成任压迫阶级驱使的会说话的工具。王守仁说得更露骨：“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



心髓入微处用力”。(《与黄宗贤》)可见他们的“为学”，无非是研究杀人之道。历代封建法律明文规定：有乖纲常、干犯名教者，杀！凡所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被定为杀无赦的“十恶”。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受封建纲常名教的迫害最深。按照儒家的“三从”、“四德”，她们要从一而终，如果一旦死了丈夫，就只有一死：再嫁则“失节”，“守节”则饿死。清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揭露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儒家以纲常名教之“理”杀人，是血案中不见血迹的杀人手段，其毒辣，其残酷，有时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两千多年来，死于儒家钢刀下的人民，固然不计其数，而死在儒家软刀子下的人民，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历史上，法家也杀过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家杀人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法家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曾经镇压了一批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这是进步的革命的措施，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他们对反革命的镇压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进行的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老奸巨猾的儒家后来搞复辟时，杀起人来比法家的镇压反革命厉害得多。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有的法家镇压过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污点，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在历史上，为什么儒家杀人总是比法家更厉害，更毒辣呢？这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儒家本来就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列宁：《论国家》)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屠杀奴隶，可以拿奴隶当祭祀和殉葬的牺牲品。在儒家经典里，明文记载的就有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酷刑，孔老二之流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明这些酷刑都是用来对付奴隶的。奴隶主阶级的这种极端残忍的本性，就集中反映在儒家思想里。反动的剥削阶级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他们感到末日的来临，必然失去一切理智。他们总是按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反动逻辑办事，妄图通过对于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与血腥屠杀，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儒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行的守旧、倒退、复辟、投降的反动路线，正是这种没落阶级本性的表现。因此，儒家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在大部分时间居于掌权的地位，而法家



则处于被排斥、被压迫的地位。毛主席说：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起来造反，儒家总是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动用军队、法庭、监狱等作为镇压和屠杀起义农民的工具。儒家还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权势，“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谁敢违反，谁就会被当作“乱臣贼子”而遭到他们的屠杀。正是由于儒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就能够把孔孟的吃人之道同封建的反动政权结合起来，从肉体上、精神上屠杀人民。

叛徒、卖国贼林彪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歪曲历史事实，吹捧杀人如麻的儒家“以仁爱之心待人”，攻击法家杀人多，其罪恶目的是借以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咬牙切齿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暴政”，什么“绞肉机”。这种恶毒的咒骂，是渊源于孔孟之道的“仁政”。对此，毛主席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对于阶级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无产阶级政策，是儒家和一切反动派所决不可能有的。一切反动派从来就没有对人民施过仁政，相反，他们是靠杀人上台并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动派杀人愈多，人民的反抗就愈烈，革命力量就愈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总结自己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深深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护身法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尊儒反法，借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林彪一伙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魏 理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不但在政治路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尖锐的斗争，研究这种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入批林批孔，是有益处的。

—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拥护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日趋腐朽没落，走向崩溃，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汹涌澎湃，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度。对待这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暴力行动和革命战争，是反对还是拥护，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必然要作出抉择，表明自己的态度。

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顽固派。他们对奴隶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惊恐万状，把当时正在兴起的进步的正义战争视为洪水猛兽，攻击奴隶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是没有“仁义”，是“犯上作乱”。孟轲疯狂地叫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①，并恶毒攻击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说什么要使“善战者服上刑”^②。

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公开主张要革新变法，就要采用暴力，就要用兵。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秦国变法的实践者商鞅主张耕战，并提出“以战去战”的著名论点，实际上就是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针对孔孟之流的谬论，公开申明，“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正）”^③。在这里，荀况虽然也讲到“义”、“仁”，但完全赋予了新的内容。他的用革命暴力消灭反革命暴力的主张，是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的号



召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也说：能够实行法治，对已有灭亡征兆的诸侯国君，采取急风暴雨般的暴力行动，就能推翻其统治，统一天下^④。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都是法家或者倾向于法家的。吴起、孙武和孙臆不仅重视革命战争，而且总结作战经验，留下了《吴子》、《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论兵的专著。孙臆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经提出了“举兵绳之”^⑤，即以战争解决问题的著名论点。

儒法两家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是由他们当时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要求，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是得人心的，因此敢于公开提倡正义战争。当时，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矛盾已经激化，要确立和巩固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用战争来解决这些矛盾。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法家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与此相反，儒家维护的是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反动的，是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因此不敢公开申明他们的战争观点，而是用“仁义”这些虚伪的反动说教，来掩盖其反对进步战争、坚持反动战争的实质。他们口头上叫嚷“去兵”、“去食”，实际上疯狂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去兵”、“去食”是假，反对进步战争是真；“仁义”是假，坚持反革命战争是真，他们时刻都在妄图用反革命战争实现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⑥的迷梦。孔丘口里哼着“焉用杀”，但当他听到郑国奴隶主头子派兵对萑苻耕奴起义进行残酷镇压的消息时，就手舞足蹈，口称“善哉”，为这类反革命战争叫好，并且总结了郑国统治者镇压奴隶起义的反革命经验，提出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⑦，即镇压和欺骗相结合的反革命策略。当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成子杀死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得了齐国政权，孔丘竟如丧考妣，立即斋戒沐浴，急忙朝见鲁哀公，要求出兵干涉，妄图扑灭新兴的革命势力。这充分暴露了他反对、破坏正义战争，策动、支持非正义战争的反动嘴脸。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反对正义战争、支持非正义战争的。苏修叛徒集团一面扩军备战，加紧同美帝争夺，并进行核讹诈，一面又大肆渲染战争的恐怖，实际上是为了争夺霸权，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苏修叛徒集团的腔调，散布战争恐怖，重复儒家“大军之后，累世不复”^⑧之类的无耻



调言。这说明林彪也是抹煞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竭力反对正义战争的。他的反动说教，完全是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的。

儒家制造“去兵”、“去食”的舆论，并不是他们不重视军队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作用。恰恰相反，反动派历来看军队如生命，牢牢地把军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孔丘不是鼓吹“征伐自天子出”吗？就是主张，军权只能归奴隶主阶级所独有，而不准其它阶级拥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这样。他为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面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恃力者亡”，一面却躲在阴暗角落里，拚命抓军权。在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更狂妄叫嚣，要全国武装力量服从他们“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谁反对就“严厉镇压”。但是，这只是林彪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广大指战员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林彪这个大军阀，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只能落个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的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二

实行“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这是儒法两家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斗争的焦点。

儒家推行的是“以礼治军”的路线。所谓“礼”，就是周礼，就是奴隶制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也就是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孔丘要“克己复礼”，要拚命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在他们看来，用“礼”那一套教育士兵是最合适不过了。所以，他们拚命宣扬“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⑨，用所谓仁义礼智信之类的鬼话作为治军的信条，借以欺骗士兵听从奴隶主的指挥，服服帖帖地为他们去效劳。孔丘说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⑩，就是说，军队以“礼”作为指导，就能打胜仗。孟轲也叫嚣：“仁者无敌”^⑪，甚至说，只要有了“仁”，“就是使用棍棒也能抗击秦国楚国的精锐部队”^⑫。总之，在他们看来，只要以“仁”、“礼”等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于军队，就能“无敌”、“功成”。“仁”、“礼”简直成了挽救奴隶制灭亡的灵丹妙药。

法家对儒家的这种“以礼治军”的反动说教是反对的。商鞅曾经针锋相对地指出：“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⑬，他辛辣地讽刺“仁义”、“礼乐”等为“六虱”，



把儒术归为十害，说“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⑭。韩非也尖锐地指出：“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⑮。法家实行一条“以法治军”的路线，公开提出要“以法为教”^⑯、“缘法而治”^⑰。他们认为，要想使士兵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变法革新思想教育士兵。按照法治的原则治理军队，才能使士兵懂得为革新变法路线而战斗、而牺牲是光荣的。

“以法治军”，首先是把战争和新制度的建立联系起来。法家公开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战争目的告诉士兵，让士兵懂得，“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⑱。“农”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战”就是进行用新兴的封建制度统一各国的战争。并且指出：“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⑲。这也就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走的道路。

其次，他们注意发挥“民”在战争中的作用。荀子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⑳。意思就是说，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统一人民。地主阶级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但是，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够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去作战。

再次，法家为了动员人民参战，鼓励士兵勇敢打仗，主张“按功而赏”^㉑、“法不阿贵”^㉒。按照军功的大小确定爵位，奴隶有军功也可免除奴隶身份；奴隶主贵族没有军功的人，不得有高贵的爵禄。这就有利于鼓励士兵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而战。同时，对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以上可以看出，法家“以法治军”的思想，就是把坚持变革、坚持前进的政治主张贯注于军队之中，以达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目的。

儒法两家治军思想不同，用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儒家是没落阶级利益的代表，在选将用人上必然推行一条任人唯亲的路线。他们所选的人不是宗族贵戚，就是所谓“忠孝仁义”之徒。法家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选将用人上主张“使法择人”^㉓、“称能而官事”^㉔，就是按照法治的政治标准挑选官吏将帅，衡量人的才能授予官职。他们还提倡“猛将必发于卒伍”^㉕，认为只有选拔那些在军队基层经受过锻炼、有实践经验的人担任指挥，才能把军队治理好。这对“不战而荣，无爵而尊”^㉖，世世为官的奴隶主贵族，也是一种打击。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在用人上都主张选贤任能、量才录用。刘邦用的武将很多出身贫贱，樊哙是个屠户，周勃当过吹鼓手，灌婴是绸贩。刘彻则把奴隶出身的卫青提拔为大将



军。曹操在用人问题上也主张“唯才是举”，要选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②7}的人治理国家，管理军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在军队建设上，他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也效法儒家“以礼治军”。他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他的所谓“突出政治”，实际上是突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就是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我军的灵魂，改变我军的性质。他还妄图以“四好为纲”代替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他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还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疯狂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他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林家世袭王朝，在军队中拉山头，搞宗派，任人唯亲，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甚至发展到纠集反革命力量，组织大小“联合舰队”，妄图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是任何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所破坏不了的。林彪及其死党妄想推行“以礼治军”的路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结果，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只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三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儒法两家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把天命观作为精神支柱，极力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借以麻醉和欺骗人民。这种思想反映在战争问题上，就是把战争的胜负归之于“天命”。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奴隶主头子出师前先对“天”祈祷，把自己的胜利完全寄托于“老天爷”的保佑。法家则反对唯心论的天命观，主张战争胜负决定于人，要按照客观情况来指导战争。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指出：“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②8}。就是说，打仗不能靠祈祷鬼神，必须善于通过人了解敌情。法家的这种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相对地说，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国势大振，对外作战不断取得胜利。荀况亲自到秦国作了考察，认为秦国所以能取得胜利，“非幸也，数也”^{②9}，即不是靠运气，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能够提出这种看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儒家所处的反动没落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战争的客观



规律，总是用唯心主义来指导战争。与儒家相反，法家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注意分析和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强调调查研究。孙武认为，战争胜负首先决定于客观条件，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办事。他详细分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孙臆进一步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强调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知民心，外知敌情”^⑩，并且提出“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⑪，主张根据敌我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来指挥打仗。对于法家这些先进思想，毛主席给予了很高评价。毛主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并且说，它“仍是科学的真理”。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儒家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在战略战术上必然机械呆板，墨守陈规。这种机械呆板战术的典型可算是儒家宋襄公了。公元前六三八年，楚国与宋国在泓水（河南柘城县北）交战，宋军本来处于有利形势，但是，由于宋襄公主张“不鼓不成列”^⑫，一直到楚军准备好了以后，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身负重伤，几乎当了俘虏。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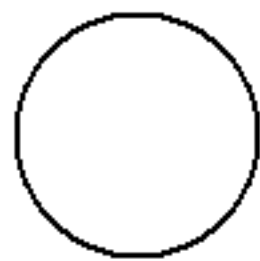
和儒家相反，法家从战争的客观情况出发，提出了一套比较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孙武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强调“因敌变化而取胜”。在战术上法家主张，要以多胜少，即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⑬，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⑭，“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⑮，“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⑯，即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过失，避开敌人主力，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设法调动敌人，力求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他们曾运用这些战法，打过一些有名的胜仗。马陵之战就是突出的一例。公元前三四〇年，魏国和赵国进攻韩国，齐国的田忌带兵救韩，孙臆针对魏兵勇悍但骄傲轻敌的弱点，避开正面作战，假装败退，将太子申和庞涓率领的十万魏军诱至马陵，以伏击的手段，打得魏军大败，俘虏了太子申，使庞涓兵败自杀，魏军几乎全军覆灭。

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儒家的后尘，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代替客观规律，胡说什么“下意识都能指挥好”，打仗凭“一念之对”，就“可以代替几个军的作用”。在作战方法上林彪也继承了儒家的衣钵，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的方针，不顾条件，鼓吹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他无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根本目的，极力鼓吹拚命主义，胡说什么“十万人上战场，准备打掉五万”。他对抗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 and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公然鼓吹打击溃战，把复杂多变的战术，简单地机械地规定为什么“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所谓“六个战术原则”。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是地地道道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林彪搞的这一套黑货，与历史上儒家代表人物所炮制的机械、呆板、模式化战术，完全是一路货色。

毛主席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我国两千多年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上，随着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战略战术也不断发生变化。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深刻总结了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为我军制定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是指引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形势下，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总结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就可以进一步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从而使我军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注：

- | | |
|----------------------|------------------|
| ①② 《孟子·离娄》 | ①⑦①⑧ 《商君书·君臣》 |
| ③ 《荀子·臣道》 | ①⑨ 《管子·治国》 |
| ④①⑥ 《韩非子·亡征》 | ②①②④ 《荀子·议兵》 |
| ⑤③⑤ 引自一九七四年第三期《文物》杂志 | ②②③ 《韩非子·有度》 |
| ⑥ 《论语·尧曰》 | ②④ 《韩非子·人主》 |
| ⑦ 《左传·昭公二十年》 | ②⑤ 《韩非子·显学》 |
| ⑧ 《盐铁论·未通》 | ②⑦ 《曹操集·举贤勿拘品行令》 |
| ⑨ 《礼记·儒行》 | ②⑧ 《孙子·用间》 |
| ⑩ 《礼记·仲尼燕居》 | ③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 ⑪⑫ 《孟子·梁惠王》 | ③②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
| ⑬⑲ 《商君书·画策》 | ③③ 《孙子·谋攻》 |
| ⑭⑮ 《商君书·农战》 | ③④③⑥ 《孙子·军争》 |
| ⑯ 《韩非子·五蠹》 | |



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理论小组

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过去我们批判“清官”论，和今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是矛盾的？肯定法家同歌颂“清官”，是不是一回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清是非，给予明确的回答。

一九六五年，围绕着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对于“清官”问题的讨论和批判，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发展为对“三家村”的批判，矛头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时间过了将近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重新接触“清官”问题，不仅清楚地看到法家与“清官”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能够站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高度，更深刻地认清和批判“清官”论的尊儒反法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

“清官”与法家并不是一个概念，相反，它是儒家炮制出来用以欺骗毒害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东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有所谓“义”、“利”之争。孔老二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轲对梁惠王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们把维护奴隶制和有利于奴隶主剥削压迫的行为叫做求“义”，而把奴隶们求生存、反抗剥削压迫的行为叫做求“利”。到了汉朝，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把封建的纲常、道德等等，概括为一个“道”字，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说“求财利”是应该鄙视的“小人”的事，“求仁义”才是崇高的“君子”的事，并且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到了宋朝，二程、朱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儒家的这种所谓重义轻利的叫喊，不过是他们维护封建制度、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道德说教而已。封建统治阶级以超阶级的“清”和“贪”来划分官吏，其思想渊源就是儒家的



义利观和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清官”，实际上就是儒家道统在政治上的人格化身。“清官”如同“孝子”、“节妇”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等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的样板。

历代封建统治者树立了一批象“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典型，并给他们加封什么“孝肃”、“忠介”一类的名号，把他们捧上了天，吹得神乎其神。其目的无非是借助他们宣扬“德治”、“仁义”、“三纲五常”那一套孔孟之道，以此“治人”、“化民”，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吹捧“清官”与吹捧儒家是一致的。如同孔老二的身份越抬越高一样，“清官”论也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越叫越响。宋明以后，通过史书、笔记、戏曲、小说广为提倡和渲染，明清之际，尤为盛行。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也是越到接近灭亡的晚期，“清官”论越叫得厉害。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同封建社会的没落、某一王朝的衰亡相联系的，是同阶级斗争的激化相联系的。以前有句话，叫做“乱世出清官”。其实，哪里是“出”，纯粹是“喊”，越“乱”越“喊”。这个“公案”，那个“公案”，这个“清官”，那个“青天”，喊得越响，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情况越是不妙。但是，不管喊出多少“清官”大老爷，到头来也挽救不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法家并不是儒家所说的“清官”。他们在历史上是新兴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法家一出现，就同儒家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们在不同时期，都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批判了孔孟之道，特别是揭露、批判了儒家鼓吹的“德治”、“仁义”“忠孝”等说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战国时期，法家商鞅把这一套比作咬人吃血的虱子，认为不去掉这些虱子而任其泛滥，国家“必弱”。法家韩非指出，这套反动说教是“愚诬之学”，“亡国之言”。西汉法家桑弘羊针对儒家攻击他“贪利”，反驳说，正因为“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盐铁论·非鞅》），才使国家由弱变强。他痛斥那些口称“仁义”的儒家是一帮“危不能安，乱不能治”（《盐铁论·殊路》）、“洁言污行”、“鸡廉狼吞”（《盐铁论·褒贤》）的巧伪人。宋朝法家王安石，针对孔老二鼓吹的“三畏”，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并且以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宋史·王安石传》）明朝法家李贽，尖锐地揭露儒家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这些事实说明，法家始终是儒家的对立面和批判者，也是体现孔孟之道的所谓“清官”的对立面和批判者。我们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正是肯定他们批判孔孟之道的进步作用，怎么能同歌颂“清官”是一回事呢？在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或儒家曾把一些法家别有



用心地列到“清官”里去，那是他们为了掩盖儒法两家的斗争，混淆儒法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消除法家的影响，而用儒家“清官”的面貌歪曲法家的缘故。这种现象正好是儒法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体现剥削阶级利益、意志和要求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等，只能是奴役、压迫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在剥削阶级中，决没有替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办事的“清官”大老爷。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这话真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劳动人民清楚地记得，清朝的衙门口、帝国主义的宪兵队、国民党的警察局，哪个不是维护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里，“善人”不善，“清官”不清。“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清官”论的有力否定。《红楼梦》第四回里，贾雨村把维护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财势作为“护官符”，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连他的恩人尚且不顾，对劳动人民就更可想而知了。其实，那些口称“清官”、鼓吹“仁义”的儒家之徒，没有一个不是贪利的。这些平时大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清官”，真要见了利，就象苍蝇见屎一样，眼红心动，丑态百出。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清官”论正是否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抹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明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反动派却宣扬“清官”对农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隋书·循吏传》）。明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反动派却把“清官”统治的地方描绘成“政务宽和”、“政平讼理”、“吏不敢欺”、“人怀其惠”（《晋书·良吏传》）的一种升平景象。反动统治阶级鼓吹“清官”论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忠君“爱民”的偶像，给人民群众一种幻想，似乎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统治阶级中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可以过“好日子”，借以麻痹农民的革命斗志，或者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民革命引到邪路上去。这种宣传，在历史上曾经迷惑了一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水浒》的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小说里一些农民起义军



用“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歌词表达自己的心愿，正是这种“清官”论欺骗作用的反映。有些封建统治者就曾直接利用“清官”这个招牌来瓦解农民起义。明代中期，黄萧养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杨信民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放松了武装斗争。结果，遭到董兴调集的两广、江西地主军队的血腥屠杀而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清朝中期，河南、湖北、四川等省白莲教组织农民大起义，四川总督派号称“刘青天”的南充知县刘清，到农民军中去诱降，农民领袖王三槐因此中计被捕。这些“清官”毫无例外地都是口讲孔孟之道的儒家。许多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常常在“清官”、“好皇帝”的诱惑下，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因而遭到了失败。“清官”论在政治上是反动统治阶级配合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破坏农民革命的重要手段，在思想上是他们利用孔孟之道束缚人民，执行“牧师职能”的方法之一。“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论。

历史上法家的作用与所谓“清官”的作用是截然相反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在奴隶起义的基础上，顺应历史潮流，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提出了一条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西汉以后，地主阶级逐渐走向反动，法家作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在农民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敢于批判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敢于在不同程度上揭露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他们对于解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是寄希望于“清官”和孔孟之道，而是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务实，提出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有利于国家独立统一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尽管这些作用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但就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来说，与地主阶级中的反动派，与儒家路线，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这样，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和儒家之徒，对待法家同对待所谓的“清官”，就大不一样。一个是骂，一个是颂；一个是压，一个是捧。他们对法家恶毒咒骂，疯狂攻击，百般迫害，致使不少法家代表人物遭贬职、排斥、监禁甚至丢掉生命。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法家和所谓“清官”有根本区别。我们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正是为了彻底否定“清官”论，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下去。

刘少奇、林彪站在修正主义的反动立场上，尊儒反法，“清官”论就是他们吹



捧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是一个儒家学派的忠实信徒，也是“清官”论的鼓吹者。他居然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用儒家“清”与“贪”的对立，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歪曲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这是“清官”论在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形式下的复活和翻版。毛主席彻底批驳了这种谬论，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提法，就会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以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使运动走到邪路上去。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刘少奇的后尘，一面大骂法家是“罚家”，一面叫嚷“大家都当董仲舒”，妄图以鼓吹“清官”论的董仲舒为榜样，改造党的干部队伍，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但是，他同历代鼓吹“清官”论的反动家伙一样，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这些事实说明，“清官”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阻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好同我们今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方法上看，一个是借古讽今，一个是古为今用；从矛头所向来看，一个是对准人民革命，对准社会主义，一个是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对准林彪反党集团，对准孔孟之道；从政治目的来看，一个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分裂党、分裂人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个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维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根本不同的路线。

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用地主阶级人性论来划分“清官”与“贪官”，歌颂“清官”的反动作用，是修正主义的。今天，我们把“清官”论摆到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中来看，进一步看清了它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分清了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同歌颂“清官”的本质区别。我们天津站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道，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更加丰富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革命干劲。我们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正义战争必然胜利

——批判《盐铁论》中儒家的军事投降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九舰理论小组

今年一月，我们舰在参加西沙自卫反击战中，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上级党委的正确指挥以及兄弟部队和民兵的密切协同下，为党为人民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战后，指战员们发扬我军能武能文的革命传统，联系这次战斗实际，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武器，研究儒法军事路线斗争的历史，深挖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研究了《盐铁论》中儒法两家关于战争问题的论战，认识到当时围绕着战争问题而展开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儒家竭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法家则针锋相对，坚持一条抗战的正确路线。西汉中期，地主阶级顺应历史潮流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奴隶主残余势力不断受到打击，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一再被削弱。隐藏在中央政权内部的复辟势力、地方诸侯王、工商奴隶主，便把实现复辟的一个重大希望，寄托在我国北方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对西汉内地不断发动的军事侵扰上。他们暗里与匈奴奴隶主串通一气，妄图里应外合，明里制造谣言，施展骗术，推行军事投降主义。汉武帝去世以后的第六年，在复辟势力为了猖狂反扑而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儒生射出了两支毒箭，一支射向坚持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政治路线，一支射向主张抗击匈奴侵扰的法家军事方针。杰出的法家、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决保卫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并在战争问题上同投降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桑弘羊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词严地舌战群儒，把他们批驳得理屈词穷。

西汉儒家在政治上“克己复礼”，搞倒退，在战争问题上对匈奴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军事侵扰，实行投降主义。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一面大搞“克己复礼”，



一面充当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间谍”，叫嚷要借苏修力量“箝制”国内外革命力量。事实有力地说明，古今反动派要在政治上搞反革命复辟，在军事上就必然要在反动倒退势力的武装入侵面前屈膝，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是说，战争这种东西是具体的，或者是正义的、革命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或者是非正义的、反革命的、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战争，决没有既不是前者又不是后者的抽象的战争。区分战争性质也有严格的尺度。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战争都是一定阶级为推行一定的政治路线而采取的军事手段，是流血的政治斗争。政治路线的性质决定了为这一政治路线服务的战争的性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逆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推行一条维护和复辟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政治路线，并为此而发动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被剥削阶级和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一条建立和巩固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政治路线，为此而坚决抗击反动倒退势力的武装进攻，这类战争就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西汉时期我国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侵袭中原，大肆掳掠人口和财富，这样的战争是要使历史倒退，加重人民的苦难，显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西汉王朝为巩固封建制中央政权，抗击匈奴奴隶主武装侵袭，这类战争符合人民的愿望，因而是正义的革命的。

在盐铁会议上，孔孟之徒蓄意抹杀两类战争的不同性质，大肆渲染战争恐怖，叫喊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并把这一切笼统归咎于“战争”。桑弘羊及其助手盛赞了汉武帝坚持抗匈战争给西汉社会带来的兴旺景象，列举了汉朝建国初期与匈奴“和亲”妥协反而招致“暴害不息”的事实，指出“战争灾难”是匈奴奴隶主发动掠夺战争造成的，抗匈战争则是“兴义兵以诛暴强”，从而粉碎了孔孟之徒混淆两类战争，用战争恐怖恫吓人民，妄图使人民不敢起来抗击匈奴奴隶主掠夺的阴谋。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壮丽的共产



主义事业有着崇高的献身精神。他们不但能够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在修正主义者、投降主义者散布的“战争恐怖”瘟疫面前具有强大的免疫力，而且能够高举正义战争的旗帜胜利前进。林彪同盐铁会议上的反动儒生一样，混淆两类战争的性质，宣扬战争的所谓残酷性，妄图投靠苏修，实现他变社会主义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迷梦，只不过是痴心妄想。在西沙自卫反击战中，我参战军民为保卫祖国领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这是对正义战争的颂歌，也是对儒家和林彪投降主义谬论的有力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对付。我们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对正义战争采取拥护和积极参加的态度，对于非正义战争采取抵抗和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向非正义战争投降的叛徒们，为了反对革命暴力，却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林彪不是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吗？其实，林彪和孔孟这种骗人的鬼话，早就被桑弘羊戳穿了。在盐铁会议上，孔孟之徒对抗匈战争的一个谬论，就是鼓吹“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宣扬匈奴奴隶主发动掠夺战争的本性可以用孔孟道德加以感化，不必以牙还牙，以战去战。桑弘羊及其助手在会上摆了大量事实，辛辣地嘲笑了孔孟之道的无用，斩钉截铁地指出：对待掠夺者只能“武折”，不能“德怀”。就是说，只能以强大的武力去粉碎反动派的武装进攻。

儒家说，对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可以用“行文”、“尚德”的办法感化它，使强盗萌发善心，这实际上就是说，反动派的本性可以改变。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判过这种论调。毛主席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反动阶级发动非正义战争，有其深刻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垄断为基本经济特征的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决不会放弃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他们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世界领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超级大国在欧洲，在中东和地中海，进行着剧烈的争夺。经济上的争夺，政治上的扩张，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演变成为军事上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匈奴奴隶主对西汉内地的掠夺，也不是出于某个匈奴单于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奴隶主阶级反动意志的表现，它同样



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决不是靠什么“行文”、“尚德”所能改变的。如果汉武帝不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多次出兵还击匈奴，西汉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就要被腰斩，社会就要由封建制倒退到奴隶制。可见，对待一切反动派决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毛主席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帝国主义的傀儡南越西贡政权，不顾我国严重警告，以武力威胁我渔民，撞坏我渔船，向我执行巡逻任务的舰艇开枪开炮，不是我军民毅然进行了自卫反击，用武力斩断了西贡反动派伸向西沙的黑手，五星红旗就不可能依然飘扬在伟大祖国西沙群岛的上空。

正因为反动没落阶级的掠夺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要保卫进步的社会制度，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就必须既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不断加强进行正义战争的准备。在盐铁会议上，孔孟之徒打着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幌子，反对法家在经济上的进步措施，妄图破坏进行抗匈战争的经济基础。他们攻击和诽谤盐铁官营等政策违背了孔孟鼓吹的“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什么“民间”一大“疾苦”。桑弘羊揭下了他们这副假面具，反驳说道：如果取消盐铁官营，就必然是“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孔孟之徒的罪恶用心，是要破坏战备，把人民交给匈奴奴隶主宰割。

恩格斯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汉武帝所以能在短短八年里，对匈奴奴隶主政权的军事侵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反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实行了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法家的经济政策，使西汉王朝获得雄厚的经济力量，实现了“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战前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是战时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参加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的部队，经过战斗实践，更是深深体会到，西沙之战取胜在西沙，胜利的基础却是在全国。这个胜利，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使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技术装备及其他物质保证。叛徒、卖国贼林彪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妄图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破坏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林彪的阴谋是注定不能实现的。



凡是叛徒，凡是在军事上搞投降主义的人，总是要看大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看小革命阶级的抗战能力，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西汉孔孟之徒也不例外。他们竭力夸耀敌军的厉害，把匈奴的骑兵描绘得十分神奇难打，“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叫嚷抗战下去就会招致“刎颈之祸”、“死亡之患”。桑弘羊却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概指出：“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匈奴奴隶主头子的历史命运，不就是一片枯黄的落叶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应当坚持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去对付并战胜一切反动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既然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最后胜利就一定属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赢得人心的正义战争。尽管进行这一战争的新兴力量开始时处于暂时弱小状态，它一定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是要求变革、要求前进的力量，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因而它终于在战争中战胜了表面上强大实际上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至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直接领导、直接进行的奴隶战争、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则更是直接显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正是由于奴隶战争、农民战争发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才为新兴地主阶级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封建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才有可能出现。没有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极大地摇撼了被奴隶主复辟势力代表赵高篡夺了领导权的秦王朝统治，刘邦领导的起义军又继往开来，在同项羽集团复辟势力的斗争中执行了法家路线，就没有西汉王朝，因而也就没有抗击匈奴奴隶主政权侵扰的战争的胜利。

顺应历史发展的正义战争，必然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必然有着胜利的前途。这个在大量历史事实中显示出来的规律，是一切进步阶级、尤其是今天无产阶级建立必胜信念的基石。这个信念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信念是林彪和孔孟之徒散布的投降主义、失败主义所动摇不了的。正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怀着这一信念取得了西沙之战的胜利。我们将继续百倍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海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

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是我们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一份考卷。它的诞生，是党亲切关怀和直接支持的结果，是革命样板戏登上银幕、推动电影艺术革命的产物。一句话，它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边学边闯地搞出来的。

下面，想就这部影片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初步的体会，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从路线的高度开掘题材，提炼主题

《闪闪的红星》原著是一部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它为改编电影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小说到电影，不是简单的艺术形式的改变，而是从生活出发，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典型化，进行一次认真的再创作。

进行艺术构思，首要的一条，就是立意要高。所谓立意高，是指主题思想和英雄形象的基调要高。这部影片主要是写儿童、给儿童看的，但它不是一般的儿童片。我们不能向文化大革命以前拍的那些儿童片靠拢，不能追求修正主义宣扬的“儿童趣味”，也不能追求虚假的紧张情节和惊险动作；不仅不能追求这些东西，而且应该坚决摒弃它，批判它，战胜它。我们的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我们的创作就必须对革命负责，对下一代负责，让无产阶级的崇高思想和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怎样才能达到立意高呢？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从路线的高度，对题材进行严格的开掘，对主题进行反复的提炼，努力刻画英雄人物的典型



性格，立意才能高。立意高不是脱离实际的高，而是在深刻地、典型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和斗争的基础上而达到的较高的思想境界。学习这一宝贵的经验，把它运用到这部影片的创作中来，就需要结合我们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和小说作者一起对原著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生活进行深入的再开掘。

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开始，我们仅仅着眼于小冬子“在红星下成长”。围绕着这条线，对原作的人物作了些调整、合并，时间跨度作了些压缩。结构起来一看，象个电影设想了，但是又感到不满足：立意还是不够高，小冬子仍然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他的思想、行为还不能光彩照人。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题材开掘得不够深，没有抓住路线这个纲。

于是，我们重新研究原作所反映的斗争生活，进行再认识。沿着“在红星下成长”这条线深入下去，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剖视到小冬子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时期，突出的问题是：革命成果“得而复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引导着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和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则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引来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把绝大部分的革命成果都断送了。革命成果的得失过程，深刻地表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当错误路线被否定之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又可以经过斗争夺回革命成果，赢得新的胜利。四十年前我党历史上的这一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抓住“得而复失”的问题深入开掘，从路线的高度揭示这一场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既使影片的立意有所提高，又赋予这一革命历史题材以新意，也为小冬子的成长找到了历史的依据。

我们的认识并没有到此结束。现实中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在我们创作过程中，欣逢党的十大胜利召开。十大文件强调指出，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千百万”，都是从儿童团过来的。要重视儿童团，决不能轻视儿童团，这一光辉思想又进一步照亮了我们的构思。我们觉得，把小冬子放在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大起大落的背景中去，还只是写了他的典型环境这一面；而要突出在大背景中的小英雄典型性格，我们的立意还必须“更上一层楼”，用我们构思时的语言说，就是要表现出“**儿童团斗垮还乡团**”。如果没有充分表现出儿童团的光和热，那只能表明创作人员还没



有充分认识到革命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一伟大真理。冬子的童年，是英雄的童年，他不是等待胜利中慢慢长大，而是在夺取胜利中迅速成长，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冬子为夺回红色江山而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强调了冬子的“夺”，突出了他的斗争性格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能使人物上升为一个“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的无产阶级少年英雄典型。

我们把冬子放在最能反映路线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刻画，并不是要让孩子直接阐述路线斗争，而是把他的命运和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冬子从一个小奴隶变成了革命的小主人，牵着大土豪胡汉三游街，扛起了红缨枪去上学；可是，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冬子又吃二遍苦；而在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革命重新蓬勃发展，冬子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通过冬子经历的道路和具体感受，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上，把两条路线作了鲜明的对照，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恶，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创作目的就在于通过冬子的形象，使我们的年轻一代记住：坚持或者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应该永远发扬中国共产党培育下的儿童团的光荣革命传统，坚决、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持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掌握英雄的成长和成熟的辩证关系， 努力塑造英雄的典型性格

在创作中，我们曾不断听到这样的疑问：十岁左右的小冬子毕竟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英雄，而不是成熟的革命先锋战士，他能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来塑造？能不能成为影片的主要英雄人物？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革命少年儿童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文艺作品中的地位。从红军时代的儿童团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小兵，曾有过无数与冬子年龄相仿的孩子，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既然现实生活里涌现过那样多少英雄，那么，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就应该使他们的英雄形象比实际生活中更高、更理想、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性，成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榜样。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影片特定的题材和主题出



发，在银幕上塑造好冬子的英雄形象，为儿童团高唱一曲革命赞歌，不仅为今天的青少年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且对于从儿童团过来的老一辈革命战士，也是一次幸福的回忆。

对于英雄人物的成长和成熟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成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更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成长的结果。伟大的群众斗争必然造就出许多杰出的英雄，他们从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思想上、才干上成长的速度往往超过年龄的递增，这是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所证明的事实。革命样板戏塑造的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一出场就具有很高的思想起点，而随着矛盾冲突的层层激化，他们的英雄形象又越来越高、丰满。这说明，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是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对英雄的刻画应该从他不断成长、臻于成熟的过程中来完成。

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把冬子这一英雄人物的发展过程和相对成熟统一起来，把他的成长和高大统一起来，尽力在银幕上树立起一个可爱、可信、可学的“党的孩子”的光辉形象。

一、在冬子的身世、经历和斗争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他的思想起点；牢牢把握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性格特色。

冬子一出场，是一个年仅七岁的苦孩子，但我们没有在“苦”字上做文章，而是通过他想红军、盼红军的“开场白”，表现其强烈渴望翻身闹革命的阶级情感，通过他与胡汉三第一次直接交锋时的“亮相”，表现其朴素的反抗精神。这样，从一开始，就阐明冬子性格的阶级特色，使他的起点高于一般的革命儿童。

我们坚持从正面描写冬子的“党的孩子”的形象，时刻不忘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少年英雄，决不片面地强调他“仅仅是一个孩子”而降低他的思想高度；同时，也不把他变成“小大人”。他在即将去远征的父亲面前立誓要“使劲长”，长大了也当红军，他的语言充满了孩子气，但也透出了“党的孩子”的气质。他巧妙地筹盐过卡，又嘲弄敌人哨兵，他的行动是机智的，也是顽皮的，是属于一个可爱的儿童团员所特有的。他把那碗多盐的野菜汤倒在大锅里，他把那件棉大衣披到放哨的叔叔身上，他的行为是崇高的，但这种优秀品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直接从吴大叔、宋大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学来的。凡此种种唯冬子所独有的性格特色，我们处处注意不把它磨平，不搞成一般化。



要突出英雄性格的美，还必须注意他的形体造型的美。这种美，也是有阶级性的，不可等闲视之。那种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形体造型搞成五大三粗的做法，同把他们打扮得华丽、纤弱一样，都是丑化和歪曲。在冬子的形体造型上，特别是肖像造型上，我们强调要健美、挺拔，富有革命光彩。根据冬子特定的生活道路，我们为他设计了苦孩子、儿童团员、小篾匠、小学徒和小红军战士等一系列形体造型；并在摄影上利用阶调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的光效（如顶逆光、轮廓光、眼神光等），勾勒他的肖像的美。既突出他质朴深厚的劳动人民气质，又体现时代、环境和年龄的特点，力求通过艺术造型表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达到精神美和形体美的统一。熬盐吹火时，冬子那件红艳艳的背心，辉映着焯焯火光，烘托着他朝气蓬勃的革命风貌；米店劈柴时，冬子那把柴刀的有力起落，显示出他决心要劈开旧世界的顽强革命精神。

二、正确处理冬子与革命长辈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冬子为中心，以冬子为落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矛盾现象：冬子是主要英雄人物，却是被教育者；他的革命长辈是教育者，却是次要英雄人物。两者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要么是贬低了革命长辈的形象，使冬子的性格失去了根基；要么是孤立地突出了其他英雄人物，压低或湮没了冬子，使他相形失色。处理好这个关系，关键就在于：每一场戏，特别是重场戏，都要围绕着冬子安排，其他英雄人物的戏都要落在冬子身上。如果不落，就是压戏；如果落得不准，就会夺戏；如果落得好，就是垫戏。

掌握了这一环节，就可以放手把其他英雄人物写好。父亲把麻药让给其他伤员，自己忍痛动手术，是写父亲的戏，目的则是让冬子懂得：为了消灭所有的白狗子，使人民永远得解放，就要不怕苦，不怕死。母亲为掩护群众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写母亲的戏，但落点仍在冬子身上，是为了熔铸冬子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阶级深情。在导演、摄影处理上，我们同样依据这一道理，运用电影镜头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始终把冬子置于事件和观众视线的中心。父亲远征前夕，画外是父母纵谈革命远景和对后代的期望，画面却多次出现了冬子在帐子里屏息谛听的面孔。当父亲撩开帐子抚摸孩子时，冬子虽装着睡觉，却控制不住眼角的两行热泪。这样，让观众清晰地看到革命长辈以自己的言行，把毛泽东思想的雨露点点滴滴洒进这棵革命幼芽的心田，也真切地感受到冬子心里的巨大波澜。这样的处理，既符合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又做到了“水涨船高”，突出了冬子的英雄形象。

三、掌握冬子性格发展的连贯性和阶段性，把主要力量放到重场戏上去，突



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影片故事情节，是冬子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对性格诸方面的描写中，既不是平均地、面面俱到地罗列，也不是孤立地、机械地拼凑，而是有主有从，主从结合，重点突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即主要侧面。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形象的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冬子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切热爱，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整个情节就是围绕着这一主要性格特征而展开：紧扣住他同土豪胡汉三反复进行较量的矛盾冲突，把他在红星照耀下从苦孩子成长为红军战士的思想发展的脉络，理成一条单纯、清晰、连贯的纵线。同时，在纵线安排上，通过冬子勇敢地拦截胡汉三潜逃，坚毅地忍住悲愤劝阻群众下山救母亲，机智地筹盐过卡，沉着地掀起一场群众夺米风暴，最后火烧、刀劈胡汉三等几个典型事件，在各个阶段上有层次地刻画他的思想深度。这样，就使影片的矛盾冲突，始终以冬子为中心，一浪高过一浪地展开，也就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出冬子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发展到高度的阶级觉悟的成熟过程。

突出重点，把主要力量放到重场戏上去，从横断面上突出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我们塑造冬子形象的重要艺术方法。在冬子成长过程中，有思想最活跃、情感最激荡、英雄性格表露得最鲜明的重场戏，我们决不零打碎敲、轻易放过，而是力求做到象革命样板戏精心设计成套的重要唱段和核心唱段那样细刻深掘，把戏做透做足。母亲从光荣入党到英勇牺牲这一段戏，是冬子性格成熟的关键，我们就集中笔墨，作为塑造“党的孩子”的形象的核心部分来描写。母亲宣誓入党时，以传来遵义会议喜讯为背景，金色的曙光透窗而入，烘托着冬子决心学习母亲、誓做党的孩子的思想飞跃；母亲牺牲时，在那熊熊烈火的映照下，冬子的意志和党的要求已融为一体：“决不让群众吃亏”，是党对妈妈的要求，也是党和妈妈对冬子的要求，妈妈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在这里，我们为了强化冬子的感情高潮，用鲜明的两极镜头，多次重复展现了烈焰腾空的土楼和冬子激情澎湃的面容。一个比一个更大、更强的近景、特写镜头，刻画了冬子的感情起伏，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已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为革命抒情，抒革命之情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无产阶级“没有感情”，“不会抒情”，我们必须通过文艺作品给予有力的回击。哪里有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哪里就有无产阶级的



革命激情。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是最崇高、最壮美、最丰富的阶级感情。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刻画英雄人物现实斗争中的精神面貌时，动人地展现出他的远大理想；在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在银幕上充分地抒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

为革命抒情，抒革命之情，首先要求创作人员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有深厚的感情和正确的认识。冬子的经历中，有父亲远别，有母亲牺牲，当然决不能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去渲染所谓“生离”与“死别”，但也不能因为怕犯这样的错误而“退避三舍”。我们不回避描写革命的挫折失败和斗争的艰难困苦，甚至于流血牺牲，但一定要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敢于抒发革命战士的豪迈激情和广阔胸怀。亲人行将远别，谈论的是入党、斗争和远大的革命理想；游击队风餐露宿，但透过一碗野菜汤、一件棉大衣和一个满装着群众心意的盐筒，洋溢着温暖的阶级友爱；错误路线使革命战士陷入白色恐怖，但是富有想象的“岭上开遍映山红”的歌声却倾诉了他们坚信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母亲英勇牺牲，一个战士倒下去，接着就是烈火化作红旗，无数个新战士走进革命行列。在这里，只要准确地把握革命事业发展的主流和英雄人物思想的本质，就可以大胆地抒发革命之情。

既要敢于抒发革命之情，也要善于抒发革命之情。我们在创作中决心抛弃那种“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的庸人哲学，决不做懒汉懦夫，而要刻苦琢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的电影艺术，应该充分运用色彩、音乐、电影语言等多种艺术手段，为无产阶级英雄创造出激越而深邃的艺术意境。

绿色，是我们这部影片色彩的基调。它既符合江南风光和人物斗争生活的环境特征，又含有丰富的思想寓意。我们力求绿色正确还原，做到银幕“出绿”，使整个环境气氛充满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郁郁葱葱的青山翠竹，烘托冬子天天向上的战斗童年和欣欣向荣的革命事业。但是，把绿色作为色彩基调，并不排除其他色调的运用，特别对红色的运用。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党；绿色象征着冬子如同一棵新生的嫩芽，也象征着“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革命群众。“万绿丛中一点红”，红星、红旗在影片中起着点题作用。在母亲入党一场戏里，我们从抒发人物革命激情的需要出发，着意突出了红色。这场戏第一个镜头就是一面鲜红的党旗，温暖的红彩充满着整个银幕。黎明前的黑夜，更把红色衬托得格外鲜艳夺目。当吴修竹畅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时，喷薄四射的红



日，云雾缭绕的高山，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乐曲，由色调、景物、音乐所构成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和冬子与母亲心头激荡的革命激情融汇在一起，使影片具有高亢、壮美的格调。这里，自然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抒发革命激情，需要特别注意电影语言的充分运用。所谓电影语言，就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气氛的渲染和镜头的组接，由视觉形象和音乐形象交织成的无言的电影艺术意境。这种形象的电影语言，和精炼的文学语言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求影片的对话要少。对话少而精，文学语言就突出了，电影语言也就多了，才能充分发挥电影综合艺术的特长。游击队营地之夜和冬子进姚湾镇筹盐，都是一句对话也没有，然而一系列少言以至无言的镜头，在相应的伴奏音乐烘托下，却“畅所欲言”地表现了同志之间、红军和群众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展示出冬子在党和群众的温暖怀抱里幸福成长的意境。此处无言胜有言，多少丰富的思想内涵尽在这不言之中。当然，这种无言的电影语言一定要有鲜明的动作性，能让观众透视到人物内心的激情。例如，在冬子参加柳溪战斗的一节戏里，为了描写他未能参战又急欲参战的心情，原来的设计是：冬子被留在村外后，他急切地爬上树梢了望，又悄悄下树奔向战场。这样处理，不足以准确、细致地表现他的强烈情绪。经过多次琢磨，拍摄时才改为冬子在溪畔青石上霍霍磨刀。磨刀这一动作，为冬子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觉形象，既展现了他渴望参加战斗的焦急心情，又揭示出他内心起伏着强烈的阶级仇恨。

竹排激流一场，描写冬子在群众斗争的太学校里经受了锻炼之后，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就情节发展而言，这不过是一场过场戏。但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场平淡的过场戏，而是把它看作象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来对待。在选择外景时，我们特别注意场面中一定要有湍急的激流，尽力显示大江东去的气势；拍摄透过竹林远眺竹排的时候，又特别挑选在竹叶翠绿欲滴的旺长季节，力求获得最理想的绿色和茁壮挺拔的形象。对这一镜头的摄影处理，采取了横移的拍法，通过竹林前后层次的交错移动，造成富有生命活力的动感。经过细致琢磨，最后才形成影片中的这个场面：巍巍青山，湾湾绿水，翠竹掩映江流，雄鹰搏击长空；祖国的雄伟山河，托起了冬子乘坐的小小竹排，闪闪的红星在他掌心中发亮，滔滔江水又把他送往新的斗争激流。这里没有一句对话，然而通过壮丽的画面和激扬的歌声，构成了一个充满革命的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尽情抒发了冬子激流勇进的战斗豪情。

抒发革命之情，必须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有时激昂，有时深沉，做到波澜起伏，不是平铺直叙。要含蓄、发人深思，力避浅露。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



谓的“含蓄”，是要把他们的反动思想本质写得隐晦、曲折，使人捉摸不透。我们所要求的含蓄，是要表现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深度。冬子在米店的一段戏，我们总觉得在冬子走向成熟之后的斗争中，应有一段内心世界的剖视，于是，加了一场“夜谈”——在宁静的月夜下，两个小战友，仰望北斗星，向往延安，纵谈革命胜利后戴着红星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一加，不但使整个影片节奏疾徐、张弛有致，进一步使艺术上虚实、动静结合，而且把冬子的精神境界又向上推进了一步；他把红星戴在椿丫子的头巾上，意味着他不仅把这颗闪闪的红星放在自己的心坎上，也放到了战友的心坎上，激励着战友的革命斗志，这表明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在他的身上发出了瑰丽的光彩。

坚持不懈地改造世界观、艺术观

回顾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过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要深入地进行无产阶级电影艺术革命，创作出革命的电影艺术作品，必须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坚持进行思想革命，同资产阶级旧思想、旧作风、旧手法彻底决裂，不断增强革命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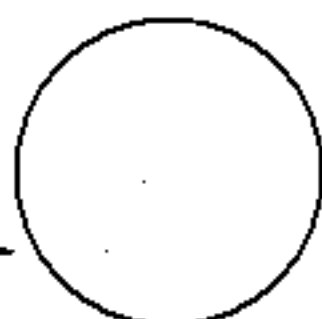
影片的创作过程，就是我们重新学习、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和艺术观的过程。哪些方面我们的思想跟上去了，从实际出发，按照革命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和艺术经验做了，创作上就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哪些方面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在创作上就出现了缺点和不足。如：有些戏处理得还较粗糙，没有细致地表现好发展层次和过程，个别情节推敲得不够严谨；冬子的个别语言不象孩子的话。特别是对母亲牺牲的处理，调子不够高昂，更是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的弱点。由于我们对英雄人物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只是在从容就义的“从容”上做文章，没有着力刻画她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英勇斗争精神，以致这一英雄形象受到了削弱。脱离开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去片面地追求人物的“从容”，正是我们对革命样板戏学习不够的表现，也是旧的文艺思想在新的创作实践中的反映。上述这些缺陷，凡能弥补的已在补拍，但它的深刻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电影艺术革命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长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革命文艺创作的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改造世界观、艺术观，才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拍出更好更多的革命电影来。

我们愿象影片的主人公小冬子一样，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努力学习，继续作战，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为无产阶级电影艺术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厂也能造出四百吨大平板车

河北沧州市交通局四〇〇小组



编者按：看了这篇讲辩证法的材料，令人鼓舞。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正在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难道事实不正是和将是这样的吗？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各地许多单位的支援下，我们沧州市自行设计、制造成功了我国第一辆四百吨大型公路平板车。这辆车包括五百马力牵引车和平板车两部分，全长三十三米，宽三点八米，高三点四五米，有一百一十六个轮子，自重达一百三十六吨。通过多次空车、满负荷道路试车，各部运转正常、性能良好。经有关部门鉴定批准，已交付使用，投入生产。

四百吨大平板车的制造过程，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过程。

沧州市，城市小，只有十四万人，没有什么大工厂，全是些小厂小社，机器设备、技术条件都比较差。靠这样的“小家当”能不能造这样大的平板车呢？有人认为，小厂小社搞这样的大平板车是“门不当，户不对”。厂小车大，一小一大，这确实是个矛盾。但是，“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大和小是相比较而言的，世界



上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在一定的条件下，大和小可以转化。沧州市虽然不大，但把小厂小社算在一起，也有七十多个，两万多工人。设备虽然不多，但全市的机械设备集合起来，也有三千来台。就单个看，一个小厂小社确实人少、设备单，但开展社会主义协作，把这些小厂小社的人力物力都集合起来，这个力量不就很大了吗？大平板车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同一切庞然大物都是可分的一样，它也是可分的。大平板车是由两万多个部件组成的，每一个部件比起整个车来，那就小得多了。如果全市搞会战，小厂小社一齐上，三千来个“小蚂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去啃大平板车这块“大骨头”，那就没有什么啃不动的。

小厂小社，作用不小。文化大革命以来，沧州市通过小厂小社的团结协作，搞出了技术条件要求较高的单晶硅和大型轧延机，实现了小型化肥厂半年设计并建成投产，六千瓩发电机组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高速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为什么就不能依靠我们的小厂小社把大平板车造出来呢？广大群众说得好：厂小不要紧，车大不可怕，团结起来力量大，大小就转化。他们在战略上以小攻大，即以小厂小社攻整个大平板车；在战术上则是以大攻小，即一大批小厂小社的人力设备攻一个或几个部件。就这样，经过全市工交战线包括社办、街办、队办、校办工厂的积极努力，仅花了九十九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大平板车造出来了。

造这样大的平板车，我国还是第一次，没有现成的图纸，要靠自己搞设计。可是全市没有一个汽车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机械行业的技术人员也不多。怎么办？我们就发动群众和现有技术人员来搞。参加“三结合”设计小组的大都是工人群众，包括近几年入厂的青年工人。靠这些人能不能设计这样大型复杂的车辆呢？有的人说：“要解决这项技术复杂的设计问题，没有几个‘大人物’算是不好办。”言外之意，就是说工人群众缺乏技术知识，解决不了问题。这种看法对吗？不对！有没有知识，知识的多少，技术的高低，是相对的，可变的。实践出真知。科学技术知识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在实践中用心学习，注意总结经验，无知可以变有知，知之不多可以变成知之较多。不



仅如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广大工人群众处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就是设计大平板车的技术基础。广大工人群众，很少受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敢想、敢干，有不怕挫折的顽强精神。只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经验集中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为资产阶级的“大人物”所预料不到的奇迹。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批判了林彪鼓吹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信心，积极投入了设计工作。他们说，脱离人民的“上智”最“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的“下愚”最“智”，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大平板车来。广大职工人人献计献策，个个为设计大平板车出主意、想办法。直接参加设计的汽车司机、汽车修理工、木工、装卸工和技术员、干部，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听到、看到的各种车辆的特点，构思着大平板车的雏型，有的做模型，有的在院子里画“地图”。他们说：“大平板车再大也大不过地球，咱早晚会把它比划出来。”三结合设计小组的同志们，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并根据多次到外地参观、学习的经验，主要参考上海三百吨大平板车设计图纸，选用十多种国内定型车辆的结构，经过科学地分析、归纳，有机地综合统一起来，经过上千次的修改，终于作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工人们搞设计，敢于冲破洋框框，克服前进中的种种困难。设计制造大平板车的轮胎就是突出的一例。大平板车的轮胎按设计要求，规格与普通解放牌汽车的轮胎一样大小，但负荷却要由一点五五吨增加到五吨。国内还没有造这种轮胎的先例。红旗橡胶厂的工人和技术员，根据他们多年翻修各种轮胎的经验，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提出了通过增大内压、增加帘子布层数来增大负荷的设计方案。有人认为这样会使胎壁增厚，胎囊缩小，抵消增大内压的作用；还有人用“违反国际资料规定”为理由否定这一方案。然而，工人们坚持试验，反复修改，改用新材料，采取新工艺，使其增层而基本不增厚，终于制成了大平板车的这种轮胎。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完全合格。这个事实有力证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工人群众，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能够用辩证法冲破洋框框的束缚，把前人



没有做过的事做出来。

有了图纸，要把它变成车辆，这里还要解决许多矛盾。比如，加工一些大的部件，一般需要有比较大型的精密度较高的设备。可是小厂小社里只有一些小设备、小机器。怎么办？我们还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解决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工人们就是按照这个道理，解决了大部件和小设备之间的矛盾。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但大平板车可分为若干部件，大平板车的每一个部件也都是可分的。把大部件看成由若干部分组成，以小设备的整体，对大部件的一个局部，这样，小设备相对地变大了，大部件则相对地变小了。工人们就是采取这种将大化小、分割歼灭的办法，用小设备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加工。大平板车的副梁，长一百二十厘米，重八百多公斤。加工副梁需要大刨床。承担副梁加工任务的交通局运输一队，只有一台小牛头刨，只能加工长六十五厘米以内的部件。工人们就分三段加工，先在中段刨出退刀槽，再刨一头，以前一头作基准找正找平，再加工另一头。这样，牛头刨床虽小，但面对着副梁的三分之一就相对地变大了，加工起来就占了优势。同样是用这种办法，在半米的镀槽里镀出了近一米的转向油缸；用小千斤顶代替了大型压力机，完成了牵引车大梁的校正任务。

在一定条件下，大可以化小，小也可以变大。大设备所以能够加工大部件，是因为它具有加工大部件的性能。能不能叫小设备也具有大设备的性能呢？工人说得好：“机器是人造的，机器的性能也是人给的，在小设备上闹革命，搞革新，小设备就能长能耐，干出大设备所能干的活来。”我们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实现了近百项小改小革，提高了现有小设备的能力，使小设备完成了一个个大件加工任务。平板车的转向油缸和悬挂油缸，都是较大的部件，按规定必须用大型立式搪床搪孔，没有这种大型搪床，农机修理厂的工人就在一台小车上搞革新。他们改装了车头，做了工卡具，终于以小攻大完成了这两种部件的搪孔任务。运输一队的工人们在小皮带车床上搞革新，代替了大型座标搪床，完成了牵引车内、外半轴的加工任务。工人们说：“技术革新威力大，小设备一革新，就敢同大设备比高低。”



要使小的东西发挥大的作用,关键在于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比如说,每节重达二十五吨的车架,要由主梁和五百三十多块不同形状的钢板焊接成,完成这道工序要求较大的厂房和二十五吨以上的大型吊车或大天车。可是总装车间是个大席棚,没有大天车,全市也没有大吊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工人们七嘴八舌,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土办法。他们先在车架两头正中各焊上一根轴,又做了两个支撑架,用五吨的小导链组成小导链群把车架吊起来,放在两个支撑架上,这样,车架就象大风车一样悬在空中,用手一推就可以随意翻转,焊接非常方便。一个去参观的工程师赞叹地说:“这个办法太好了!在洋本本上是找不到的,坐在办公楼里是想不出来的,只有群众的智慧才能放出这样的光彩!”

有些人看不起土办法,认为土办法搞简单东西、干粗拉活行,技术性强、结构复杂、质量要求高的活,土打土闹不行。其实,土办法虽“土”,但它并不粗,并不落后,它是来自群众实践的办法,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因而也是多快好省的办法,照样可以攻克技术上的难关。平板车的主梁,是车的脊梁骨,是由锰钢板焊成,焊成后的弯曲度不能超过千分之一。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难关。按要求,要有一套自动焊接设备和严格的焊接工艺才行。工人们说:我们就不信用土办法拿不下这个“千分之一”。他们集中集体的智慧,拿出了一套土办法:为防止整体变形,实行对角焊,连续焊;为防止局部变形,根据钢板受热而内应力集中、内应力一集中就出现变形的道理,焊接时边焊边浇冷水,防止钢板内应力集中,并结合采用了焊哪里就在哪里用铁卡子强行固定的办法。结果,焊接出的主梁弯曲度仅千分之零点三,超过了原设计的要求。

所谓“土”和“洋”,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土”就没有“洋”。洋办法是土办法的继续和发展。不从“土”开始,坐等求“洋”,那就会被“洋”缠住自己的脑袋和手脚,什么东西也干不成。任何事物都是从较低级向较高级发展的。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从“土”到“洋”,这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区别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四百吨大型平板车的制造成功,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党支部

内容提要：农村党组织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抓紧两条道路斗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并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样，才能不断巩固、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发展、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我们小靳庄大队有一百零一户，五百八十二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党支部的路线不对头，一度成为“老大难”单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紧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提高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使大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更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几个月来，革命、生产又取得了新的成绩，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党员和群众在斗争中进一步受到锻炼，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新人新事新气象不断涌现。革命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粮食平均亩产去年达到五百五十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两番，今年又增加到八百二十斤。

小靳庄的面貌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们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党支部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紧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是有深刻教训的。文化大革命前，党支部五名委员都是贫下中农，他们也有搞好工作的愿望，但是由于路线觉悟不高，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错误地认为阶级敌人被我们打倒了，地主、富农“老实”了，因此不抓路线，不抓阶级斗争，把党支部变成了单纯抓生产的班子。路线不对头，造成资本主义倾向泛滥，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四旧”，腐蚀人们的思想，使



集体经济受到了削弱，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新的党支部委员会产生以后，摆在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要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究竟抓什么，应该怎么抓？我们联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认识到，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农村党支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党内外群众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任务，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生产抓不上去，还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的教导，联系我们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反复向党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进行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比。小靳庄在解放前，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佃户村，这里是“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一九三九年闹大水，颗粒没收，全庄外出逃荒一百五十多人，连病带饿而死的有六十多人。全村贫下中农，都有一部“糠菜团子泪水煮”的悲惨家史。我们先后五次发动贫下中农，大讲村史、家史，忆苦思甜，激发大家的阶级感情，并联系实际揭露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经过基本路线教育，贫下中农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立下了改变小靳庄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我们就带领社员群众，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大干社会主义。小靳庄原是一片盐碱地，为了改造土壤，挖河泥垫地，一九七一年我们提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战斗口号。经过三年奋战，改良了土壤，粮食生产大翻身，年年跨过《纲要》。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感人。一九七二年遇到了旱灾，广大社员担水抗旱，四十天扁担不离肩。我们又一次体会到，地靠人变，人靠路线。路线对了头，群众当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够充分调动起来，困难再大，也能克服，条件再差，也能改变。

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在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党组织要带领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引导群众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我们经常抓住现实生活中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发动社员群众开展大讨论，进行路线教育，使大家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有一次，我们大队给国家加工苇席，任务完成后，剩下的苇子又织了二十领席，当时有人主张拿到自由市场高价出售。党支部认为，是高价出售，还是卖给国家，这不单是多卖或少卖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两条



道路的斗争。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进行分析讨论。经过讨论，广大贫下中农坚决不同意高价出售，他们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不能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结果把这部分席子交售给国家了。我们感到，群众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就能从根本上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界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资本主义倾向，一些歪门邪道就没有市场。现在，在我们小靳庄，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正气大大发扬，资本主义成了过街老鼠，谁要想搞资本主义，不仅在生产队里行不通，甚至连自己的家门也出不去。

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们大队思想文化阵地上，封、资、修的黑货还有很深的影
响，一些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和孔孟之道的坏书、坏戏、坏故事流传很广，毒害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小靳庄过去所以成为“老大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剥削阶级利用“四旧”拉拢腐蚀干部，毒害人们的灵魂，破坏集体经济。我们只有从各个角落不断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才能发展。提高认识以后，几年来，我们带领社员群众，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交锋，对腐蚀人们的剥削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文化进行了反复的批判。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展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锐利武器。从一九七一年八月份开始，我们开办了政治夜校，以学政治、学理论为主，并把学文化、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全大队二百五十多名社员参加了学习。三年来，有四十二人摘掉了文盲帽子，一百九十多人学会了写大批判文章，一百七十多人学会了写革命诗歌，初步建立了一支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全村看书学习的空气越来越浓。政治夜校成了社员群众学习革命理论的课堂，批判资产阶级的战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

几年来，我们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计划地组织党员和群众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结合政治运动，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通过看书学习，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推动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九七二年，庄稼遭了虫害，阶级敌人乘机散布“天命论”，胡说什么“闹虫子是天年”，妄图动摇我们战天斗地的决心。我们就组织社员大学《实践论》，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树立了实践第一，人定胜天的思想。大家说：“我们不信天命，要



革命。”社员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三天的时间，就从玉米秸里剥出了四十多斤钻心虫，使农作物基本上免除了虫害，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创作革命诗歌，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现在，全村大人小孩大多数都会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群众性的文艺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反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表彰新人新事。全村有一百多人经常参加诗歌创作活动，不到一年工夫，就写出了一千四百余首战斗的诗歌。批林批孔运动中，社员们以诗作武器，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批判了过去流传的坏书，社员群众集中了几百册革命书籍，开办了图书室，并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场院、地边、饲养室、炕头上，都成了讲革命故事的场所。过去，在我们大队，订婚要彩礼，结婚讲排场，治病请巫婆，死了人看坟地，男尊女卑等旧风俗、旧习惯的流毒很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组织党员和群众批判了浸透孔孟之道毒素的《三字经》、《女儿三字经》和反动谚语，批判了孔老二和林彪诬蔑劳动妇女，宣扬封建礼教的罪行，破旧俗立新风。全大队有十二个姑娘主动把彩礼退回婆家；有二十三名订婚青年，响应党的晚婚号召，推迟了婚期；一百余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社员订了节育计划。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得到了落实。现在，订婚不要彩礼，结婚不讲排场，讲科学，破迷信，遇灾害病不求神，村里死了人开追悼会，实行火葬，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形成。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当我们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封、资、修的反动思想文化就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就遭到破坏，各项工作就搞不好。反之，当我们注意了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政治思想战线就生动活泼，新人新事新风尚就不断涌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革命和生产就得到顺利发展。正如社员群众说的：“可别小看了唱戏，唱啥学啥，听啥学啥。过去唱那些坏戏，都是教人想升官发财，剥削别人，受了这个害，那还不去搞资本主义歪的斜的？如今唱英雄，学英雄，越唱越听心越红，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就更足了。”

集体经济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就会带领群众走什么样的道路。斗争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而坚强的领导班子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支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路线问题。新的支委会成立后，就



如何改变小靳庄落后面貌的问题，在领导班子内部曾出现过不同看法，有个别委员认为，要改变落后面貌，就要狠抓副业，社员的工分值每天搞到一元五，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当时，我们就以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靠什么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批判刘少奇“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批判重副轻农的错误思想。一些老支部委员深有感触地说：“跌过跤的道记得最清，亲身经历的错误印象最深。我们过去走过的错误道路坚决不能再走。”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要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就要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抓革命，促生产。以后我们就比较自觉地注意了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比较地注意了抓好党支部领导成员的路线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斗争需要团结，团结是为了战斗，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搞好革命团结的基础。根据我们以往的教训，我们在加强团结上特别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树立立党为公的思想，要求支部领导成员关心政治，关心大事，关心集体。二是坚持斗争哲学，不搞“中庸之道”，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支部领导成员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不是符合党的原则，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常围绕着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整风学习，开展谈心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纠正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上。三是注意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新的支委会是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七名委员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两名，女同志一名，还包括了原来的三名委员，其中有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新、老干部都注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努力在斗争中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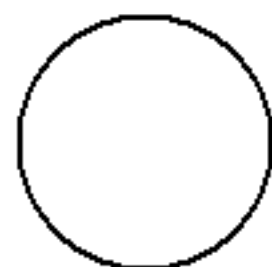
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支部就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新的支委会成立以后，明确提出：凡是要求党内外群众做到的，支部委员要首先做到，要真正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几年来，支部领导成员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我们不仅要求干部带头，而且教育干部的家属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支持干部搞好工作。党支部领导成员注意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经常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逢年过节都要进行家访，关心群众的疾苦，征求群众的意见，努力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抓好批林批孔，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得很

中国共产党辉县委员会



我们县位于太行山的东南部，山区、丘陵面积占百分之七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劈山治水，改土造田，使全县的面貌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过去，辉县是个“山秃水缺土层薄”的穷地方，现在，山区初步实现了通水，通电，通公路；水浇地达到一人一亩，修了二十七万亩大寨田，在乱石滩上造了两万七千亩良田，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进行了平整。去年，粮食亩产六百五十斤，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点五倍。今年又战胜了几十年没有的大旱，小麦亩产一季跨过《纲要》。集体储备粮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二十倍，社员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我们县这几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我们体会，根本原因是路线对头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排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执行，这是发展生产、改变面貌的根本原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县的干部在广大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密切了干群关系，使领导思想比较符合辉县的实际情况，这对充分调动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对这一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党的路线是通过干部贯彻执行的。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干部能不能经常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能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很大。有了正确的路线，会产生好的作风；有了好的作风，才能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县委也订过改变辉县面貌的规划，但是，实现不了，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这主要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刘少奇一伙极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说什么国家干部是“脱产干部”，不劳动理所当然。结果，就造成一些干部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怕艰苦，不劳动。那怎么能改变面貌？文化大革命中，在群众的帮助下，广大干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传统观念，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以新的姿态和革命化的作风，走上了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和群众共同劳动，共同战斗。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干部是不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广大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大问题。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我们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破坏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攻击干部参加劳动是“变相劳改”，目的是用修正主义思想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时刻保持警惕。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这里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有人说：“联系群众不一定到基层，更不一定参加劳动”，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如果干部长期脱离劳动，就会与劳动人民没有共同的实践，没有共同的感情和语言，就会失去劳动人民的本色，就会慢慢变质，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因此，我们县委这几年来，一直坚持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定出制度，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县委书记到其他领导干部，都经常深入基层，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六年以来，第一书记每年平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一十天，县委常委九十六天，公社干部一百七十五天，大队干部二百六十五天。由于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广大干部就能够和劳动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团结战斗，站



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列，带领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更好地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农业大干快上。过去，我们虽然也知道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口头上也说要抓阶级斗争，但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如何，特点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全县曾经有六十多个比较后进的大队，生产长期上不去。对有一些队派去工作组，几进几出，也没有解决问题。有人认为：“这些队群众落后，条件差，面貌难改变”。后来，我们就下决心亲自到一个比较后进的大队蹲点。首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田间、地头、饭场、牛棚和贫下中农广泛接触，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大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主要干部被阶级敌人腐蚀，致使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受到破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大张旗鼓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打击隐藏的阶级敌人，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干部，很快地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这个大队，干部和群众团结战斗，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就修建了三个蓄水池和八千多米石砌渠道，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使粮食亩产由一百多斤上升到七百多斤。县委推广了这个大队的经验，全县六十多个比较后进的大队也相继改变了面貌。斗争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亲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取得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表现十分激烈。我们要掌握这一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也非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不可。去年冬天，在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中，有个大队出勤的劳动力突然减少了，忙着盖房占宅基地的人突然增多起来。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大队参加劳动的公社党委书记很快了解到，原来是外地来了个“算命先生”，散布什么“属土命的不能破土，破土必有大灾大难”，“新媳妇要住新盖的房，才能富贵荣华”，造谣惑众。公社党委抓住这件事，借批林批孔运动的强劲东风，发动群众，狠批了孔老二的“天命论”和“男尊女卑”的反动观点，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说：“不信天命干革命，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们大干一百天，劈开半座山，造出百亩田。在这以后，我们



还批判了流毒较广的《三字经》、《女儿经》和一些反动谚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占领整个农村阵地，从而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助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集中群众智慧，依靠群众力量，开展改造自然的斗争。以前，一提起治水造田，一些人总是说，这里条件差，那里有困难，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仍然在穷山恶水面前发愁。后来，我们到拍石头公社参加劳动，请教一位老贫农能不能治水造地。这位老贫农说：“过去单干时，村村户户的土地都以河心为界，你造田他不许，他造田你不许，结果谁也造不成，河身越冲越宽。现在有了人民公社，大家一股劲儿，一定能治住洪水，造出好田”。老贫农的话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治水造田的强烈愿望，也说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使我们心里亮堂了，进一步看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到“守老摊子不叫革命”，必须振奋革命精神，带领群众大干。县社干部带领群众大战两个冬春，在乱石滚滚的郊东沟里造出了三千亩良田。群众促干部，干部带群众，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干得好。接着，我们又带领万名造田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名叫“洪洲城”的一片乱石滩，在滩上造了一万多亩“东西南北一展平，上盖一米活土层”的大寨田。事实教育了我们，过去的所谓“难”，就是眼里没有群众。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发挥出来，就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使过去不敢想的事也可以办到，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在治山治水造田的斗争中，我们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断总结和推广群众的经验，蓄住天上水，挖出地下水，截住潜流水，引出沟泉水，提水上山岗，因地制宜，小型多样，小水巧管，滴水归田，并且形成一套“由上至下，层层筑坝，节节拦洪，搬石运土，河滩造田”的办法，既蓄住了洪水，又扩大了耕地。几年来，在战胜干旱，夺取丰收的斗争中，这些工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逐步掌握自然规律，取得带领群众征服自然的主动权。过去，我们多数同志虽然生长在辉县，并没有真正认识辉县。有的人说：“辉县山区多，底子薄，要大变、快变办不到”。辉县的面貌到底能不能大变、快变、彻底变？毛主席说：“你对



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参加劈山治水、改土造田的斗争中，背着行李，带着劳动工具，爬高山，走险路，边劳动，边访问，看地形，查水源，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调查，走遍了全县的山川，访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队，广泛听取了贫下中农的意见，得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辉县的自然面貌才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广大群众改天换地的力量。思想路线对头，对辉县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过去只看到穷山恶水困难大，看不到条件能转化。现在，看到山区有山区的好处：建水库有山沟，修水渠有石头，造水泥有原料，劈山造田有空间，只要领着群众干，辉县面貌定能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重新安排河山的规划，也有了实现规划的信心。全县实现水利化，需要修建四个中型水库，我们计划四年建成，五年配套，当年见效。当时有人说：“四年不要说建四个了，连一个也搞不成”。到底行不行，实践来验证。今年我们已经建成了第一个水库，并且为明年修建第二个水库备好了百分之七十的材料。这个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倒了各种各样的悲观论调和懒汉懦夫思想，证明我们的规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切实可行的。同时，使我们深切感到，领导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不能象小农经济那样只限于修修补补，应该树立雄心壮志，敢于拿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的积极可靠的规划。而要有一个积极可靠的规划，并且领导群众逐步实现这个规划，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经常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正确认识社会，认识自然，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形成正确的领导思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县直机关没有修建楼、堂、馆、所。有的公社至今没有新建一间办公室，他们说：“粮食不上纲，公社不盖房。”资金绝大部分用在水利建设方面了。我们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继续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为彻底改变辉县面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 办好社会主义农业

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赵 丰 年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亿万农民意气风发学大寨，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夺得了又一个丰收年。

今年是我国农业连续第十三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棉、油、麻等经济作物收成很好，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新发展。全国大寨式的县、社、队越来越多。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地区大量涌现。黄河以北出现了一批亩产过“长江”的县；长江以南出现了亩产超千斤的省，以及亩产一千六百斤以上的县。北方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西北黄土高原一些省、区，奋发图强，夺得了较大幅度的增产。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今年也实现了全区粮食自给，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还出现了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我国广大农村，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丰收，不仅保证了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增加了国家、集体和社员群众的粮食储备，而且促进了工业、交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这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农业减产、人民生活不断下降的状况，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革命加生产即能



解决吃饭问题”这一真理；同时，也给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污蔑以有力的回击。

现在，我国农业战线的形势是大好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开展了规模壮阔的改造山河的斗争。历史上为害最大的黄河、淮河、海河初步得到了治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三亿二千万亩易涝农田大多数得到了初步改造；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灌溉面积不断增长；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开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提高。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今年的农业丰收又一次证明了，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二十几年来，我国农业所以能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抓住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在农村开展了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伟大的政治运动，改造了所有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断扫除上层建筑领域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使我国农业走上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主席为我们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就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在自然灾害的袭击中，不断发展。

在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始终是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



线,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但是,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就必须继续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发展农业要抓路线,学大寨要讲路线,这不仅过去、现在是对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对的。大寨,是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榜样。大寨的干部、群众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和阶级敌人斗,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和资本主义倾向斗,和各种错误思想斗,使人变地变产量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学大寨、抓路线、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这些单位大都经历了一个对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对大寨根本经验从不认识到比较认识的过程。他们的共同经验是: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就前进,生产就发展,集体经济就巩固壮大;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革命,不抓阶级斗争,不但生产上不去,还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今年以来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新的强大动力。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农村,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在进一步解决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许多地方在革命大批判中,还联系和回顾农业发展的过程,紧紧围绕农村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中心,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从路线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和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要进一步发展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保证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我国农业的连年丰收还证明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的完全正



确。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方针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理解，各级领导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自觉性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这是我国农业取得连续十三年丰收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全国来看是如此，从一个地区来看也是这样。冀、鲁、豫三省近年来农业以及工业发展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省、地、县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派出大批干部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把地方机动财力的大部分用于发展农业，组织工业和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几年来，这三个省围绕农业新发展了一千多个“五小”工业，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有的省，如湖南一九七〇年以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省工业部门积极协作，为农业提供化肥设备，自制合成氨设备六十六套，建成八十七个氮肥厂，磷肥厂由九个增加到三十二个，磷肥产量跃居全国首位，对农业持续增产起了作用。农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粮、副食品和工业原料，为工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钢铁、煤炭、化肥、机械等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事实又一次证明，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促进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绝不应当分割开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农业发展了，全国人民都高兴，各项工作都主动，也必将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坚实的基础。工业发展了，可以进一步支援农业，使社会主义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阐明了农业和工业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各项建设事业中，能不能从这个全局出发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关键还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的自觉性。有的地方口头上也讲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但是在行动中却往往没有这样做。有的甚至挪用支援农业的资金、材料，这不仅影响农业的发展，而且反过来影响工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真正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工作。同时反对各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象昔阳以及其他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地区那样，勤俭节约，艰苦创业。



在加强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各级干部进一步发扬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普遍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之一。深入批判了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各级干部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的自觉性更高。各地都有大批干部到基层蹲点，参加劳动，帮助工作。事实证明，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三大革命运动，改变一个地方的农业面貌，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办不到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是许多先进单位的共同体会。要搞好批林批孔，解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和分析当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要治山治水，改造山河，就要和群众一起，深入实际，摸清情况，制订切合实际的规划，并带领群众干；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就要真正在群众中蹲下来，亲身参加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这样才能避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掌握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对这个问题，各级干部获得了更深刻的体会。身不离劳动，就能心不离群众，和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就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精兵简政，精简会议，克服“五多”，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这也是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办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

加速发展农业，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指示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共同心愿。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一个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各级领导同志要使自己的思想及时跟上形势，鼓足干劲，积极地、热情地带领群众前进，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总结抗旱经验 促进农业发展

贺建农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形势一派大好。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农业生产在连续十二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了丰收。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还经常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干旱，历来是我国北方农业生产的大威胁。广大农村群众、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运用唯物辩证法，同大自然斗，同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斗，取得了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

广大群众抗旱斗争的实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唯物辩证法。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北方地处昆仑、祁连、秦岭、大别山系以北，因山阻雨，年降水量少而不均。据历史资料记载，解放前的五百八十一年间，河北省就发生旱灾四百零七次；另据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八年旱灾季节资料的分析，春旱约占百分之六十三，春夏连旱约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解放后二十五年来，也经常遇到干旱。

干旱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对待干旱这种自然灾害的态度，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则是根本不同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极力鼓吹儒家唯心论的“天命论”，把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一遇水旱灾害，就搞什么求雨、卜筮的把戏，借以愚弄、剥削人民，使生产为遭到破坏。主张革新、进步的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以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天命论”。荀况就曾经提出过“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阶级的局限，法家不可能对“天”作出科学的解释，也不可能认识劳动人民是“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指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自然的主人，并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干旱也是如此。要认识和战胜干旱，就要从本质上，战略上，把它看成是纸老虎，藐视它，敢于同它作斗争；在战术上，又要把它看成是真老虎，重视它，努力创造条件，促使它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战而胜之。解放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群众不信天命干革命，同自然灾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干部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持“农业学大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抗旱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河北省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七二年都遇到了特大干旱。但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九二〇年有九十七个县的耕地不能播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一九七二年有的地区连续十个月没下透雨，干旱程度和范围都超过一九二〇年，但是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干旱进行顽强的斗争，大旱之年仍然夺得了农业丰收。事实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旱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的科学总结。要战胜干旱，就必须抓住水这个主要矛盾，并正确处理好水和农业其它各方面的关系。

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充分利用地上水，这是抗旱的一条经验。我国北方总的讲雨水偏少，而且在季节上分布不均。春季降水量只占全年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少中又有多，每年汛期，降水又过度集中，约占全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过去，大量雨水，特别是降到平原地区的雨水，不能充分拦蓄，白白流入大海。春天缺水干旱，汛期又多水成涝，几乎年年如此。

能不能从降水的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从而改变又旱又涝的局面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天然降水的多少和降水时机，当前我们还不能人为地加以控制。但是，能不能按照农作物的需水规律，对地上水加以支配和调度，则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最近几年，河北省发动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利用坑塘、深沟等，大搞平原蓄水，千方百计地把地上水蓄起来，秋蓄春用，春旱冬抗，从降水的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许多



地方改变了春天苦于没水，汛期又生怕水流不走的被动局面，变春季无水为有水，少水为多水，春旱为不旱。这说明，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使有限的客观物质条件得到充分利用，解决好农作物的需水和自然降水在时间上的矛盾，逐步从必然中获得更多的自由。

毛主席说：“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平原蓄水省工、省料、见效快。它除了浇地抗旱，还可以起到排沥除涝，淡化咸水，补充地下水，发展渔、苇生产等作用。但是，有的同志对小坑塘发挥的大作用还不认识，认为一个小坑塘浇不了几亩地，顶不了大用，要解决干旱问题，就要上大工程。这些同志还不完全懂得大与小的辩证关系。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少就没有多，大水是由小水组成的。如果站在一个小的局部，把坑塘一个个孤立起来看，确实很小，但从全局看，发动群众，各地都搞，几万个、几十万个坑塘都蓄上水，它的作用就很大了。在我国北方，由于脱坯盖房、挖土垫圈，差不多村村都有几个大坑，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蓄水。因此，看不起小型水利工程，完全是不对的。

坑塘和水库在蓄水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它们又各有自己的蓄水特点和规律。坑塘蓄水不能生搬水库那一套蓄水方法，否则要碱化土地。它既要符合蓄水的一般规律，又要适应平原蓄水的特点。坑塘蓄水要分别在汛期、秋季、冬季进行，把水库所不能拦蓄的平原雨水，河道流水，灌溉弃水拦蓄起来。同时，要考虑到同骨干河道、沟渠配套工程相联结，做到能蓄能排，排蓄结合，使水位始终控制在返碱的临界深度以下。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地上水，而又避免土地碱化。平原蓄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注意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既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当我们已经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就要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深入研究事物的特殊本质，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不断发现新事物，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提高我们同大自然作斗争的本领。

透过现象抓规律，合理开发地下水，这是战胜干旱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我国北方，由于地上水不足，要解决干旱问题，更重要的措施是，积极打井，合理地开发地下水。过去由于形而上学的束缚，有的人把打机井神秘化，看不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只靠少数专业队伍，不去发动群众，结果打井活动冷冷清清，地下水得不到很好地开发利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形而上学和爬行主义，群众性的打井活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现在，许多地方的生产队都能打机井。男



同志能打，女同志也能打。仅河北省的机井就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六倍。群众性打井活动的普遍开展，为合理开发地下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要合理开发地下水，就要深入研究地下水的客观规律。一般地讲，机井多，浇地就多，但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认为机井越多越好，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开发地下水过程中，有的地方就曾出现过一个矛盾，即机井增加很多，浇地面积却增加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认识和掌握地下水的运动规律。地下水本来是分层的，各地的储量也不同。但有的地方光打浅井，有的地方光打深井，而且井的平面布局又很密。一个浅、一个深，两者表面看来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即都是集中取了一层水，不符合地下水分层运动的规律。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取得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要失败。打井也是一样，要做到合理开发地下水，必须按照地下水的埋藏规律和储量情况，因地制宜地搞好井位和井深的布局。河北省有一个县按照本县地下水的规律，调整了布局，全县机井减少了八百眼，浇地面积反而扩大了四万多亩，单井效益提高了一倍，一眼顶了过去两眼用。

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最近几年，深、中、浅层地下水位都出现过下降的趋势。开始，人们用更换提水设备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但水位仍然下降。这时有人认为，地下水就要枯竭，再也不能打井了。地下水位的下降是不是意味着水源的枯竭呢？大量提取地下水，是造成水位下降的一个原因，但不会因此而枯竭。因为地下水本身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它和地上水又是直接联系的，不是孤立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近几年来，各地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对雨量和地下水动态的观测活动，掌握了天然降水和地下水位变化的大量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人们看到在开发地下水的过程中，年降水量与地下水位的年升降是息息相关的：平水年下降与回升趋于平衡，丰水年回升大于下降，枯水年下降大于回升。地下水位还可以达到多年平衡，即水位逐年下降，丰水年一次恢复。同时还发现，靠近渠道、坑塘等蓄水地方的机井，水位则不下降或下降不多，还原也快。这些情况说明，地下水和地上水是一个整体，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它们又统一又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地下水位的下降和回升，是正常现象。那种一看到地下水位下降，就认为水源将要枯竭，不能再打井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就是因为大量提取，连年干旱，自然渗透减少，



又没有及时进行人工补充造成的。因此，要合理开发地下水，就要对地下水不但有所取，还要有所补，以加速它的循环流动量。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利用河、沟、渠、库、坑和土壤蓄水进行自然渗漏，以及有计划地利用河道、灌溉弃水进行人工回灌，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改变地下水不足的情况，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形成干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解决干旱的措施不能是单一的，必须是综合的。有了水，没有其它条件相配合还不行。毛主席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要解决干旱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水与土等各方面的关系。水和土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群众说：“治水不改土，有水没用处；改土不治水，大旱要吃亏。”这是对水土辩证关系的总结。有了水，不搞土，土地不平，长期大水漫灌，不但浪费了水，而且会使土壤板结，产生盐碱，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反之，搞了土，土地平整，水土配合好了，水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有限的水量就可以浇更多的土地，少水相对地变成多水，小水能够大用。有些地方，即使一时没有水源，也可以从搞土入手，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通过深翻改土，加厚活土层，就可以大大提高土壤的含水能力。据北方丘陵地区调查，当活土层加厚到八、九寸时，每亩地的含水量可以达到八万斤以上，形成一个看不见的“地下水库”，就能抗御一定程度的干旱。这个事实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搞了土就等于搞了水。毛主席早就号召我们学一点土壤学，这对我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水土关系的辩证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动权，是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水土的综合治理。有些地方，植被稀少，就要大搞植树造林，以林治水，以林固土；有些地方，土质瘠薄，就要大量增施有机肥料，以肥保土，以土保墒。因此，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争取从根本上战胜干旱。

在抗旱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防涝。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指示，高度概括了旱与涝、灌与排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抗旱防涝的根本指导思想。旱和涝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毛主席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旱和涝这两个对立面，也处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从时间上看，一年之内可能出现先旱后涝、春旱秋涝，也可能连续几年出现旱或涝；从空间上看，这个地区旱，那个地区可能涝。这种旱中有涝，涝中



有旱，旱涝交错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一些地方，在旱涝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却不能辩证地加以处置，往往是旱了就盼水，片面抗旱，忽视了旱后可能要涝；涝了又怕水，片面除涝，忽视了涝后可能要出现旱。如果遇旱兴灌弃排，遇涝兴排弃灌，时兴时废，那么，旱涝问题就会长期得不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海河流域的人民在治理海河过程中，既考虑到防洪除涝，又考虑到蓄水灌溉。同时在一切实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井灌，不断提高抗旱能力，使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近几年，河北省既有全省性的大旱，又有局部性的洪涝，但粮食产量仍然逐年提高。经验说明，防洪除涝的标准越高，抗旱灌溉的能力就越强。如果没有根治海河骨干和配套工程作基础，在河北就不可能大规模地搞平原蓄水；同样，抗旱工程越好，除涝能力也就越高，如果没有坑塘、沟渠等蓄水工程配套，骨干河道就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益。因此，只有坚持抗旱除涝一起抓，才能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抗旱除涝，是在广阔领域里同大自然作战，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长期斗争。这就需要对农田基本建设有一个长远的全面规划。有了长远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就能照顾到各个方面的特点及其互相关联，“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因此，各级领导都要充分发动群众，统筹安排，作出农田基本建设长远的全面规划，并根据这个规划做出近期安排。这样，就会使广大群众和干部既知道自己搞什么，又知道全局怎么搞；既着眼于当前的建设，又看到了未来的前景，从而大大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实施规划中，要特别注意当年施工，当年受益的问题。远和近也是相反相成的。远之所以远，就在于它综合了全局，指明了方向。由远想到近，能够鼓舞人心，提高抓好当年生产的积极性。近之所以近，就在于它解决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近看到远，为实现长远规划积蓄了物质力量，能够促进长远规划更快地实现。这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扎扎实实地搞下去，就能积小变为大变，使山河旧貌换新颜。

毛主席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永远不会完结。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矛盾，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批林批孔为动力，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努力作战，继续前进。



学大寨就要抓路线

宁江



今年，我们农业又获得了丰收。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许多事实说明，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持久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是推动我们在农业战线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强大力量。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我们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和道路，鼓舞着我国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十年来，我们广西南宁地区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干部、群众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发扬，大寨道路越走越宽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时间，全地区旱涝保收田的面积增加一百二十多万亩，粮食增产十二亿斤，等于过去二十年增产的总和，甘蔗、黄红麻、茶叶、水果的产量成倍增长。今年上半年，虽然遇到几十年未有的干旱和严重的霜冻、水灾，早造粮食仍然获得丰收，单产和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晚造也获得大丰收。广大社员群众从这些变化中，更加看清了社会主义农业的灿烂前景，共同称赞这是坚持“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取得的胜利。

农业学大寨，归根结底是个路线问题。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大寨



之路。大寨，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坚持继续革命，坚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典范。学大寨，就要在农村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要我们抓住农村的这个主要矛盾，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认真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就抓住了农村工作的要点，抓住了学大寨的根本。

要真正把大寨的经验学到手，推得开，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南宁地区学大寨过程中出现的几次起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觉悟不高，对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抵制不力，学大寨只学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象大寨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狠抓两条道路斗争上，结果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多灾低产面貌长期不能改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受到了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比过去有所提高。一九七〇年，我们地区深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抓紧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但是，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满足于已经取得的一些成绩，阶级斗争抓得不紧，阶级敌人就乘机破坏，煽动资本主义妖风，影响到早造粮食减了产。下半年我们汲取了教训，继续努力，粮食生产不但弥补了上半年的损失，而且取得了全年增产。一九七二年以来，随着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我们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反复进行批判，打击了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出现了生产持续上升的局面。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告诉我们，农业学大寨运动，既是一场向自然界进军的革命，又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阶级敌人要破坏，修正主义路线要干扰，资本主义倾向要捣乱，旧的习惯势力也会出来施加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就有可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所指引的轨道，偏离农业学大寨的正确方向。

在学大寨运动中，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根本问题，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



本主义。绝不能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就不存在了。事实不是这样。从我们地区的情况看，当前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一方面有些批判过的错误的东西又有抬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倾向也常常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突出表现在集体经济内部，按照什么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的问题上。比如，在经营方针上，是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还是重副轻农；在种植计划上，是坚持在国家生产计划指导下实行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还是搞无计划的自由种植；在产品销售上，是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把集体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在收益分配上，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还是分光吃光，不留积累，甚至贪污盗窃、挪用公款、挥霍浪费集体财物，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处理不好，势必导致资本主义泛滥，瓦解和削弱集体经济。

对于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这些问题，我们只有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它的本质。应该看到，由于农村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由于工农联盟的巩固，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不得不改变手法。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打着“发展集体经济”的招牌，以关心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想诱使某些基层干部脱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轨道，违背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从而扭转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从内部搞垮集体经济。认识两条道路斗争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特点，很有必要。不然，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往往抓不住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有一个县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他们在学大寨运动中，对本县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动向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没有真正做到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分析集体经济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度有许多生产队以集体名义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倾向严重，致使农田耕作粗放，粮食减产。后来，县委提高了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及时刹住这股歪风，把劳动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才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件事情使我们认识到，抓好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反复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需要深入到实际中去，精心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才能看得准，抓得牢，掌握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主动权。



抓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人民内部也会经常出现某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这种思想要敢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但是，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必须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别开来。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复辟活动，必须予以坚决地揭露和打击。对人民内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教育问题。要坚持进行思想教育，运用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着重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全区农村广泛开展了新旧社会对比、执行正确路线与执行错误路线的对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活动。这样，进一步“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同时，还注意了结合当地实际，帮助群众从路线上分清那些是党的政策所许可做的，那些是不许可做的，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

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我们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不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行。它对生产发展的关系不是不大，而是很直接、很重要的。农村中的“四旧”，是深入学大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严重障碍。过去我们也讲要反对“四旧”，但总是认为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不那么直接。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是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谓“四旧”，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一类黑货，都是为“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我们学大寨，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为革命种田，为人类多作贡献，“四旧”则鼓吹“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等地主资产阶级哲学，企图诱使人们放弃农业劳动外出搞副业，捞“横财”。我们学大寨，要坚持阶级观点，“四旧”就贩卖“同姓共族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妄图模糊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我们学大寨，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业机械化，而“四旧”则宣扬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等天命论，妄图阻挠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对“四旧”的破坏作用，不能低估。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把批判农村“四旧”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和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为革命种田蔚然成风，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气象。

农村各级领导干部是学大寨的指挥员，他们的路线觉悟高低，对于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关系很大。我们的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情况是好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继续提高基本路线觉悟的问题。有一些干部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但是，在斗争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有时就分不清是非，划不清界限。例如，对集体经济内部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就往往搞不清它的性质，看不到它的危害，甚至错误地认为是群众的要求，不敢抵制，不敢批判。同时，小农经济的思想还经常影响着一些基层干部，当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就容易产生停顿下来的思想，缺乏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远大理想和魄力。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由于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所造成的。我们地区从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把提高干部的基本路线觉悟当作学大寨的经常性的任务来抓。地、县分批轮训社、队干部，使社、队的主要干部每年都有机会到地、县学习一至二次。此外，全地区每年都抽调五千多名地、县、社机关干部深入到基层，具体地帮助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总结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在提高理论水平的基础上，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鉴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从切身体会中提高路线觉悟。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还必须认真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切实解决农村工作中的依靠力量问题。广大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才能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但是，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经济已经建立，贫下中农已经当家作主，再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意思就是说，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过时了。这种“阶级路线过时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这个论断告诉我们，依靠贫下中农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需要长期实行的路线。我们始终要依靠贫下中农，是由贫下中农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所决定的。在农村中，贫下中农对旧社会最痛恨，对新社会最热爱，他们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只有依靠他们，才能顺利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办好集体经济，打击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有效地巩固工农联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武鸣县凤林生产大队地坛生产队建立贫协小组前后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没有建立贫协小组以前，这个队的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泛滥，学大寨运动冷冷清清，大队分配的水利工程任务，三年完不成，粮食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一九七二年建立和健全了贫协小组，树立了贫下中农的优势，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被打了下去，资本主义妖风被顶住了，学大寨运动搞得热气腾腾，一年完成了过去三年没完成的水利任务，两年内粮食增产六成。

几年来，我们在全地区范围内，对贫下中农队伍进行了全面整顿，由下而上地建立和健全了贫下中农协会（贫协小组）。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又特别注意加强对贫下中农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贫协组织的活动，增强了贫下中农的阶级责任感，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树立了贫下中农的优势，保证了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学大寨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发展。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学大寨运动推向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程度。

（本文作者系中共南宁地委工作人员）



科 学 史 研 究

对人体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

金 卫

随着人类的出现，也就揭开了人类对人体自身的认识史。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类对人体结构、功能的认识的发展史，就是唯物论不断战胜唯心论、辩证法不断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本文仅从几个方面对这一斗争作一些初步回顾，希望能对更深入和更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起一些促进作用。

关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远古，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对人体的认识是表浅的、笼统的。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在认识生、老、病、死这些自然现象，特别是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对人体的认识才由表及里，逐步地发展起来。

对人体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认识，有赖于对人体的解剖分析。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内经》中说：“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解剖分析的重要性和认识人体结构、功能的可能性。公元十一、二世纪，我国已有了根据实物绘制的人体解剖图谱。但是由于儒家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厚葬”、“祭祖”，散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谬论，严重阻碍了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时，对人体的研究也



象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充满着尖锐的斗争。“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自然辩证法》）一五四三年，即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同年，维萨里发表了《人体的构造》，向人体认识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他不顾宗教禁律，解剖尸体，用科学观察驳斥统治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种种谬说，因而横遭打击，被迫离职，并曾被宗教裁判所判过死刑。一五五三年，“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自然辩证法》）十九世纪初，我国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王清任，反对儒家认为解剖人体是大逆不道的封建礼教，通过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著成《医林改错》一书，改正了古书上对人体结构的一些错误说法。孔孟之徒对他大肆攻击，骂他“不仁”，是“狂徒”、“邪人”。这些历史说明，人类对自己身体认识的发展，也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在这个领域内，没有冲破反动阶级陈腐的传统见解的勇气，就不能前进一步。

十七世纪哈维应用实验方法完成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也遭到讽刺和攻击，但却为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呼吸、消化、神经等器官、系统的分析研究也相继发展起来。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细胞学说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它证明了“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反杜林论》）近年来有人估计，整个人体约由多达一百万亿的细胞组成。这许许多多的细胞构成了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系统。

细胞的发现使“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自然辩证法》）人们进而在细胞水平上对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从人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发现到细胞的发现，人们的认识过程基本上是沿着从整体到局部的方向进行的。这种把人体分解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而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的方法，促进了近代对人体认识上的巨大进展。但是这种方法把人体内各个部分孤立起来，撇开整体、撇开身体内部总的联系去进行研究，就逐渐形成了人体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局部观点。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莫干尼把器官看成是独立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学者微耳和则进一步把完整的机体割裂开来，把人体说成是“细胞联邦”，声称细胞才是真正的个体，“具有所有生命的特征”，而且不服从整体的一般规律，“向往自由，向往自主”；他否认神经系统在人体内的主导地位，鼓吹每一个细胞都是中心，说：“在整个神经系统内决没有



一个部分可以算是真正的中心点，能够象政府机关那样，将各种命令颁布到四面八方”；他反对整体的统一性，直到死前四年（一八九八年）还坚持机体不外乎是细胞的总和，声称“唯有抛弃神话式的统一，把各个部分也就是细胞看作生命的原因，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微耳和所处的时代，恰恰正是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体内各器官、系统的相互联系及神经系统的主导地位的时代。当时有不少学者和微耳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批判他的细胞病理学乃是“片面病理学”，批判他关于人体是独立细胞的联邦这套说法乃是“假原则”，用“严格地说并没有局部的疾病”的论点来驳斥微耳和“除局部疾病以外没有别的疾病”这种错误论断。恩格斯在当时就认为，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反映出自然科学家由于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因而在解释本来是可以证明自然界中的辩证法的最新事实时，陷于束手无策。虽然微耳和等人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却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他们对人体的总的观点，反而赶不上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古代学者。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学家在以法家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曾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始终；并认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说明人体各个脏器在正常或病理情况下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指出“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认识到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等在疾病发生上的意义，说明人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人的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观点，虽然对人体各个局部的认识没有达到科学的分析，但在总的联系上却比以微耳和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局部观点正确得多。当然，后来董仲舒之流极力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黑货塞进对人体的认识，在阴阳五行等学说中，掺入了儒家思想的糟粕。清除这些垃圾，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的光荣任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对神经系统在机体整体统一中的作用作出了深刻的辩证概括：“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延伸），便占有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组成整个身体。”（《自然辩证法》）十九世纪末以来，对神经系统，特别是管理各种内脏活动的植物神经系统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人体内各种活动的神经调节。二十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由内分泌腺分泌的几十种激素，以及其他一些生理活性物质，从而发展



了体液调节的概念。全身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因此通过神经系统和体液系统就把各个器官、系统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现已确证下丘脑的神经细胞分泌多种激素控制着内分泌腺的活动，这就打破了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之间绝对分明的界限，确立了在神经系统主导作用下统一的“神经体液调节”。正是这种神经体液调节，实现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相互联系，保证了人体的整体统一。

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很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长期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已走向没落、反动而极力支持形而上学世界观，以微耳和为代表的局部观点不但当时没有被击败，反而影响逐渐扩大，阻碍了人体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在西医临床工作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疾病、不见病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意义等等偏向，就是这种局部观点对医疗实践的恶劣影响。基础医学各科中，也是对局部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各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则很缺乏。即使在生物、人体研究的新领域中，形而上学局部论也还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近二十年来，关于生物高分子（蛋白质、核酸等）的结构、功能的研究发展很快，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就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新领域对人体科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体的遗传、记忆、免疫等重要生命现象，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各种生理活动及其神经体液调节的机理等等，程度不同地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从一个侧面得到了新的说明。这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病理过程的物质性和可知性的有力论证，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新胜利。但是有人却恣意曲解这一成就，断言一切生命活动可以还原为分子的活动，生物学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一部分，从而否认事物的多样性。毛主席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矛盾论》）否认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特殊本质，便无法解释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也不能理解整体中的局部同孤立的局部有何不同。在历史上，莫干尼把器官绝对化，微耳和把细胞绝对化，现代还原论者们则把分子绝对化，实质上乃是形而上学的局部论、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深入批判把局部的东西看成高于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局部论，仍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战斗任务。搞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便是从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方面正确研究人体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



防止否认局部的东西，把整体看成是脱离局部的，把生命活动看成是神秘的这种“活力论”倾向。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说什么生命活动乃是一种具有造物、成形作用的神秘的“活力”（即所谓“隐得来希”）的体现。此后，这种“活力论”的观点花样不断翻新，成为对生物、人体的认识中唯心主义观点的一个顽固堡垒。近年来，国际上也有人在各种幌子下，抹杀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实际上乃是“活力论”的再现。修正主义搞什么“心灵学”，有些迷信活动也鼓吹这种东西，以欺骗和蒙蔽某些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深刻地揭示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既注意对机体整体活动规律的研究，又注意对局部的东西、直到生命活动的理化基础的研究，使我们对人体的认识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发展。

关于平衡和运动的关系

人体的结构和功能非常复杂，外界环境也经常在变动，机体如何能保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这是对认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祖国医学早就用“阴”、“阳”的对立统一来概括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并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强调了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平衡和协调对于正常生命活动的进行是很重要的。十九世纪，法国生理学者伯尔纳提出：细胞直接生活于血液、组织液等“内环境”中，“内环境的稳定是自由和独立生命的首要条件”。二十世纪以后，许多学者对内环境稳定现象及其机理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内环境稳定”（“稳态”）的科学概念，加深了对人体各种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认识。

诚然，人体内环境和生理功能的相对稳定是一个普遍现象。体温、血压、脉搏、血液酸度、血糖浓度等等，正常时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偏离这一稳定水平的波动即由神经体液调节机构加以调整而恢复常态。否则，过高或过低都不能保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将引起疾病甚至死亡。但是，在人体内，究竟稳定、同一性是绝对的，还是变动、斗争性是绝对的？在如何理解机体的平衡、稳定现象上，尖锐地反映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伯尔纳说：“所有的生命机构，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虽然伯尔纳指出内环境稳定的重要性，促进了对生物和人体生命活动及其调节机理的研究，但他在理论概括上，离开机体“永无休止的运动”，单纯强调一切为了稳定，有很大



的片面性，导致了生物学和医学中形而上学的平衡论。也有一些人，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人体内的平衡、稳定现象及其重要意义，又从另一个极端陷入形而上学，因此也不能正确揭示人体的客观辩证法。反对这两种片面性，是正确认识人体和发展我国新医学的必要条件。

早在伯尔纳发表他的基本观点之前四年，恩格斯就曾写道：“**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自然辩证法》）这是对生物和人体功能活动的多么精辟的科学论断！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在人体内到处都是对立统一：物质的同化与异化，神经的兴奋与抑制，肌肉的收缩与舒张，血流的推力与阻力，体热的产生与发散，血液的凝固与抗凝固，微循环中的缩血管物质与舒血管物质，免疫反应中的抗原与抗体，激素之间的相互拮抗与相互制约，……没有一个器官没有一种过程不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种物质变为另一种物质，一种能量转换为另一种能量，一种状态变化成另一种状态，无时无刻不在人体内广泛进行着。“**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反杜林论》）死亡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人体内，到处都在新生，又不断在衰亡。不仅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人，直到衰老、死亡的全过程中体现着生与死的矛盾，同一个人，每一瞬间也都处在不断的产生与衰亡之中。皮肤不断在生长，又不断在剥落；血球不断在生成，又不断在破坏；就是被认为不能再生的神经细胞，它的蛋白质等成分也是在不断更新。看起来是同一个人，实际上他的一生中，整个身体不知换了多少遍。任何平衡都是、也只能是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整个身体的各个部分自始至终都处于不断的产生和消灭之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这种运动通过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化两种形态表现出来，显示出人体及各个器官发展的阶段性。

对机体平衡、稳定现象的不同理解，在医疗实践上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片面强调平衡、稳定，导致了那种消极平衡、被动防御、偏重静养的医疗保健思想。从运动与平衡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人们认识到，运动对于人体比稳定、平衡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坚强的斗争意志，革命的乐观情绪，紧张的工作学习，经常的体力劳动，积极的体育锻炼，符合于人体的辩证运动，无疑是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保证。当然，如果完全否认人体内相对平衡、稳定的一面，也会忽视必要的保护、必要的休息、必要的调节，这也是片面的。如果我们正确地把握了运动和平衡的辩证关系，并对不同的人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具体分析，一定可以促使我国医疗保健工作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

关于精神活动和人脑的关系

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对人的精神活动和离奇的梦境迷惑不解，便以为在人的肉体中存在着不死的灵魂。这种原始的愚昧观念，为剥削阶级和宗教势力所利用，并加以鼓吹，使人的精神活动长期以来被神秘化。我国的进步思想家，很早就提出过关于精神活动的唯物主义观点。荀子指出“形具而神生”，说明人的精神活动依赖于人的身体；王充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范缜也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都驳斥了超自然的灵魂的存在。在精神与脑的关系上，《内经》中有“头者精明之府”等记载，李时珍进一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但对其具体认识还很不够。十七世纪笛卡尔根据刺激角膜经常引起眨眼这类事实，提出了“反射”的概念，但他并没有抛弃关于灵魂的谬说，而把人体说成是藏在人脑松果体中的“灵魂”所操纵的机器。这种二元论思想对人脑的研究有顽固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英国生理学家谢灵顿，虽然对脑和神经系统生理学作过不少研究，但还公然认为我们根本没有把人的精神活动和生理过程联系起来的科学权利。近年来有些研究脑功能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貌似新鲜的说法，把精神看成是对脑的发信者，实质上还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脑是信使”、“脑是意识的译员”这种二元论老调的重弹。更有甚者，有的神经学家还直言不讳地宣称：“人类有不死的灵魂，这个论点是我们西方文明的基本公理”，妄图把人类的精神活动永远置于科学研究之外，作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然而，这些谬论不可能阻止人们沿着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揭开人类精神活动奥秘的胜利进军。十九世纪，由于比较广泛地采用切除或刺激动物脑部的某些部位等实验方法，配合临床观察和尸体解剖，对于脑的功能的科学认识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当时确定了人类大脑皮层语言中枢的定位，证明了人类的语言活动，有赖于大脑皮层某些特定区域的结构与功能的完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中枢的发现就从一个重要方面确立了精神活动和脑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有人却把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孤立地定位于大脑皮层个别点，荒谬地声称某一点管“私有欲”，某一点管“宗教的自我”等等，进而导致“颅



相学”骗人术的出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他们不了解人脑是个加工厂，人的精神活动不仅同人脑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实践不可分离。离开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就不可能正确揭示人脑的功能。

一八六三年谢切诺夫发表了《脑的反射》，指出没有外界对感官的刺激，即使是一瞬间的心理活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来看，仅用古典的反射论来解释人脑的精神活动，既流于机械，也很不充分，但在当时能明确地提出大脑反射的观点，则是唯物主义地认识人脑功能的一个重要进展。《脑的反射》一书出版后，立即遭到沙皇反动政府的查禁，并经沙皇内务大臣批准对作者进行起诉。起诉书中称“谢切诺夫的著作解释了大脑的精神活动”，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论，“破坏了现实生活的社会道德基础”，“是一种莫大的危险”。此后，就把谢切诺夫列入沙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中，进行了长期的迫害。这就看出，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唯物主义观点，是多么恐惧，多么仇视。但是，对人脑的唯物主义认识是扑灭不了的。事实上，在谢切诺夫之前，一八四五年，英国神经学家莱科克就发表了《论脑的反射功能》一文，提出了人脑的活动也是反射这一观点。这说明自然科学的理论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什么特殊天赋的创造物，而是历史进程中业已成熟的东西的体现；也说明对于人脑的唯物主义科学认识是必定要发生并不断得到发展的。

二十世纪以来，研究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许多新方法、新领域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以丰富的科学资料论证了关于人脑功能的唯物主义观点。人们已经可以记录到在进行思维活动、随意运动时大脑发生的某些电变化；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某些化学物质在精神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一些药物对精神活动的影响。神经生理学的新发展表明，脑干网状结构对大脑皮层的传入冲动，在维持清醒意识上具有重要作用，而网状结构的活动又有赖于体内、外的刺激。这就证明，人的精神活动既不能离开人脑，也不能离开人体内、外部世界而独立存在。神经外科的发展，为直接研究人脑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手术治疗中，刺激脑的感觉区，可以引起感觉成分，但从未感到任何客体，这就说明，人的感觉并不象生理学唯心主义者弥勒所说的那样，是脑、神经固有的“特殊能量”，不反映客观世界；恰恰相反，人的感觉只能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刺激颞叶的一些部位，引起了患者对一些往事的回忆，这正好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人的精神活动是人脑功能的确凿证据。现代科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人的精神活动乃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人的正确认识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



结果。

关于人体的结构、功能和社会实践的关系

人体的结构、功能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十分激烈。

在人类的形成上，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鼓吹上帝造人，否认人体乃是地球上物质发展的结果；在个体发展上，宣扬宿命论，否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在社会实践中能够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和人脑的结构、功能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才能问题上，则极力鼓吹先验论、天才论、生理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等种种唯心主义谬论，否认社会实践对人的知识与才能的决定作用。孔老二的什么“生而知之”，苏修御用学者的什么“天才的思维是天才大脑的功能”，叛徒、卖国贼林彪的什么“脑袋长得好”，都是为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谬论。现代人体科学的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剥掉了这些骗人鬼话的层层画皮，证明了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和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人体由生物进化而来。我国唐代法家刘禹锡就曾指出：“人，动物之尤者也”，万物“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这表明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人类（“倮虫之长”）是动物进化的最高产物。达尔文根据大量科学资料，得出了人类是由某种古猿变来的科学结论，从根本上摧毁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但是，由于从纯生物学的观点看问题，达尔文没有能解决猿是怎样变成人的。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体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形成，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于劳动，才使猿的前肢变成了人的手。“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并且，“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自然辩证法》）类人猿的脑量，根据颅腔的容量计算，约三百五十至六百五十毫升，到北京猿人，平均脑量已增到一千零七十五毫升，而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则达一千四百毫升。大脑的内部结构也愈来愈复杂，而且鲜明地打上了劳动的烙印：猿猴大脑内管理前肢和后肢的皮层运动区大致相等，人类则由于手的分化和在劳动中手的活动极其频繁而复杂，人脑内管理手的皮层运动区就比足区大得多，精细得多。猿猴大脑内并没有语言中枢，大脑左右两半球在结构上是对称的，人类则由于语言的出现，相应地在大脑皮层出现了语言中枢（绝



大多数人定位在左侧半球),最近还证实人类两侧大脑半球的结构也因此成为不对称。现代科学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个体的结构、功能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改变着人体的结构和功能。肌肉愈用愈发达,感官愈练愈敏锐,在不同专业化的劳动岗位上,人的神经系统和各种器官的功能,由于经久不懈的锻炼,可以达到惊人的灵敏、精确的程度。正是熟能生巧,劳者多能!人体体质的强弱也是可以改变的。早在公元二世纪,我国名医华佗就认识到:劳动和体育锻炼可以使**“身体轻便而欲食”**、“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的弟子吴普按他创造的**“五禽戏”**的方法,坚持身体锻炼,在年龄很大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耳目聪明,齿牙完坚”**。现代运动生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体育锻炼能给整个身体以全面而积极的影响。运动是健身的法宝。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可以使体质由弱变强,强而愈强。青少年处于长身体的时期,体育锻炼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强壮的身体不是**“保”**出来的,而是**“斗”**出来的。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导,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体质显著增强,发病率明显降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人的知识和才能,则更为社会实践所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类的认识史,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都证实着这个真理。多年来,人们对于一些处于特定的与外界隔绝条件下的小儿的观察,对一些感觉功能有严重缺损的人的观察,以及对许多遗传因素极其一致的单卵双生儿的追踪观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知识与才能的形成与发展都取决于社会实践。二十世纪中对**“狼孩子”**的观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狼孩子”**被救回人类社会时,不但不会说话,只能象狼那样嚎叫,而且连直立走路都不会,只能象狼那样四足爬行。仅仅在他们回到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培养训练,才能逐渐学会说话,学会人的生活。这充分说明,离开社会实践,根本就没有人的知识和才能可言。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天才的大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社会实践是人的知识才能唯一的、不竭的源泉。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和人体自身。这个过程始终受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革命人民充满信心,瞻望未来:在



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剥削阶级鄙视劳动、脱离实践的恶习将被彻底清除，劳动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剥削制度彻底摧毁，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原则和无政府状态将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消除，环境污染得到完全控制，整个大地将被改造得更加优美；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失业、贫困现象完全克服，同时由于人民的创造性和智慧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在疾病和早衰的征服中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斗争，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人们仍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继续认识和改造自己，并在德、智、体诸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 * *

人体是地球上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个认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新进展，有力地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人体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对于人体的认识并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在人体认识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同样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辩证唯物主义人体观的胜利，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销声匿迹，它们还一定要改头换面顽强地表现出来。随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益腐朽没落，在人体科学领域内还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反动政治目的相联系的谬论。例如，有人公然鼓吹人的阶级地位是为人的生物差别所决定；有人歪曲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这一重大成就，胡说什么机器比人更聪明，妄图否定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人极力把生物、人体内环境稳定的生物学概念硬搬到人类社会，否认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诸如此类，都是为剥削和压迫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必须不断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教导：“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对人体的正确认识，过去是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现在和将来也必定要、并且必定会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开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一定能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对人体的认识，使这一认识更接近客观真理，并更有成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